纪念南昌航空大学建校60周年学术文库

Germany and NATO

FR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O

联邦德国与北约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的联邦德国虽然没有摆脱战败国的阴影，但在北约的共同核力量建设、常规武装力量建设、战略调整、危机处理、北约对华约均势的重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刘芝平／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联邦德国与北约发展

Germany and NATO

FR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O

联邦德国与北约发展

刘芝平／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邦德国与北约发展/刘芝平著. 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7-210-04843-5

Ⅰ.①联... Ⅱ.①刘... Ⅲ.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展 Ⅳ.①K518②E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8707 号

书名:联邦德国与北约发展
作者:刘芝平
责任编辑:邓丽红
美术编辑:关科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发行部电话:0791-6898801
编辑部电话:0791-6898702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230千字
印数:1-2000册
ISBN 978-7-210-04843-5
赣版权登字—01—2011—131

定价:20.00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序

德意志人是一个充满谜团的神秘群体，他们冷峻而又不失激情，思维缜密而又时常感情用事。尤其在民族问题上，作为以德语为联系纽带的群体，德意志民族似乎早已存在。然而在中世纪，顶着“神圣罗马帝国”桂冠的德意志人，并不是以一个小而紧密的民族国家取胜的。他们以基督教的普世情怀为武器，以罗马帝国曾经的跨州威权为资本，以帝权和帝国所表现的世俗“天下第一国”为载体，长期执欧洲发展之牛耳。随着英国，尤其是法国的崛起，德意志人感到自己在组建民族国家方面落后了，于是奋起直追，但是很快又遇到了难解的民族问题。这就是德意志的统一是走“大德意志”道路还是“小德意志”道路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两条道路之争涉及德意志最大的邦国奥地利是否进入并入主未来的德意志国家，而其实质，则是德意志新国家，究竟是由单一的德意志人组成，还是因着统治着大量非德意志人的奥地利（当时奥地利的控制区内，德意志人仅为640万，而非德意志人则达2524万）的

加入,而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欧洲民族主义浪潮的感召和冲击下,“小德意志”方案占了上风,德意志走上了一条褊狭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导致了德意志人的兄弟火拼——普奥战争,也使其较为快速地建立了民族国家——德意志第二帝国。第二帝国初期,由于俾斯麦的掌控,德意志民族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不仅是有节制的,而且俾斯麦高超的外交技巧还常常使国家化险为夷。然而到了威廉二世时期,德意志人的世界情怀似乎有所复萌。而一个依靠王朝战争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与原有的世界情怀相结合,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兴盛的时代,很容易成为原有世界秩序的挑战者。果然,威廉二世领导下的德国,未能实现“和平崛起”。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崛起,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 世纪 30 年代,希特勒引领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把民族主义推向极致,奏响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狂曲,同时也把原先善恶交织的“世界情怀”,演绎成一场噩梦。纳粹德国带给世界的灾难是如此深重,以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德意志民族已经无药可救,躲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办法,要么毁灭德意志人的现代化成果,让他们退回到古老的农耕时代,要么分解德意志民族,使之再次“邦国林立”。然而真实的历史轨迹是,这两项毁灭性的措施都没有采取,而德国也没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对德意志民族和世界各国来说,双方都避开了一场大灾难。奇迹是如何发生的?答案必定是综合性的,需要若干本研究专著的“合作攻关”才能渐次呈现。在这一综合性的答案中,西方世界接纳德国,德国融入西方世界,这一环节无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逐渐形成两极对抗的格局。这一格局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究竟是祸是福,到目前为止还难以作出客观而精准的评价。然而,它是人类社会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客观存在,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在两极格局中,联邦德国选择了向西方世界“一边倒”的基本国策。作出这一选择,应该说是历史的必然:处于战败国的地位,本身又是“西”占区的继承者,自然不可能倒向东方世

界。然而,西方世界中的主要国家,不久前都是轴心国集团的敌对者,双方刚刚经历过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世界大战。固然,主要矛盾制约次要矛盾,但是,次要矛盾有时也会影响主要矛盾。联邦德国要在西方世界的主要载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站住脚,并在一定程度获得发言权,这不是一件顺理成章、唾手可得的事情。同时,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北约本身也会遇到很多挑战,其中包括核力量建设和战略调整,特别是差一点导致北约解体的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的事件,形成北约组织发展史上面临的最大危机。高超的政治家善于变危机为机遇,联邦德国就拥有这样的政治家。在北约的发展进程中,联邦德国在其中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它在西方世界中的发言权也越来越大。

因此,本书所探讨的西德在北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论对于德国史研究,还是对于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都有很大的意义。本书作者刘芝平先生曾经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当年在博士研究生招生时,我一下子就被他的材料吸引住了:平生一直喜爱和敬佩自强不息之士,眼前的考生不就是这样的人吗?他的家境并不富裕,父母也没有很多的社会关系可以为他铺垫发展道路,相反,他前进的每一步都需要自己去探索和努力。同时,与同龄人相比,命运也没有更多地眷顾他。他非但从未享受过诸如免试直升、硕博连读等优惠条件,有时为了便于克服困难,还把一步分作两步走。然而,他凭着自己的灵气、能力和同命运抗争的勇气及韧劲,不仅艰难地走完了攻博前应该走的路,而且在科研上已经超过了其他同学。在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们之间的交往是令人愉快的。“响鼓不用重锤敲”,他的灵性与悟性,大大提高了我们之间的沟通效率,我甚至感到,有些话刚刚讲出半句,他已经领悟到全句的意思。在科研方面,他视野开阔,思路敏捷,善于寻找热点问题,并选择突破口,据此搜寻相关资料,而且能在研究过程中,独立搭建文章框架,合理组织材料,基本上能够做到一次成文。在上海攻博期间,他有效地利用大

城市信息通畅、资料丰富的有利条件,围绕本书所探讨的课题,展开了艰苦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愿本书的出版能在我国学术界起到抛砖引玉、深化德国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作用。

郑寅达

2011年5月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联邦德国加入北约 ——8

第一节 西方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提出及初期解决方案 ——8

第二节 联邦德国对重新武装问题的态度 ——27

第三节 欧洲防务集团的夭折与联邦德国加入北约 ——43

第四节 小结 ——52

第二章 联邦德国与北约核力量建设 ——56

第一节 北约"多边核力量计划"的酝酿 ——57

第二节 联邦德国的核政策 ——68

第三节 "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流产与北约核计划小组的成立 ——82

第四节 小结 ——92

第三章 联邦德国与北约的常规军事力量 ——95

第一节 不同时期联邦德国国防军在北约军队中的地位 ——95

第二节 联邦德国对北约防务费的贡献 ——107

第三节 联邦德国从"有国无防"状态发展成为北约欧洲支柱的原因 ——113

第四节　联邦德国国防军的自主性问题 —— 124

第四章　联邦德国与北约的战略调整 —— 129
第一节　门外汉的联邦德国与北约的"地区遏制战略" —— 130
第二节　联邦德国与北约的"大规模报复战略" —— 137
第三节　联邦德国与北约的"灵活反应战略" —— 144
第四节　小结 —— 153

第五章　联邦德国与北约危机的处理 —— 156
第一节　北约前所未有的危机——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 156
第二节　联邦德国与北约危机的处理 —— 165
第三节　小结 —— 176

第六章　联邦德国与两德统一前北约对华约在欧洲均势的重建 —— 183
——以联邦德国与北约"双重决议"的出台和实施为个案
第一节　施密特的演说与"双重决议"的萌芽 —— 184
第二节　"双重决议"萌芽的原因 —— 191
第三节　"双重决议"的制定 —— 196
第四节　联邦德国在"双重决议"制定后的最初反应 —— 203
第五节　科尔政府与"双重决议"的实施 —— 211
第六节　小结 —— 217

结语 —— 221
附录 —— 226
参考文献 —— 253
后记 —— 271

导 言

一、选题主旨和意义

“冷战”是20世纪后半期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内容，分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军事政治组织北约和华约之间严重的军事对抗则是冷战的重要表现形式。长达40多年的冷战最终在1991年宣告结束，华约的解体是其重要标志之一。与华约的命运相反，北约不仅在冷战中取得胜利，而且还成为当今世界无可挑战的政治军事组织。因此，在探讨和总结这一局面形成的原因时，诸如“北约在冷战中何以抗衡华约并取得胜利，其成员国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什么样地位和作用?”这样的问题就凸显出来。

联邦德国是北约成员国，而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北约抗衡华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从历史原因来看，由于纳粹德国是二战的罪魁祸首，德国在战后受到了严厉的制裁。联邦德国是在德国的美、英、法三个西方占领区（后合并为西占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建国时就背负着战败德国的

历史负担,承受了战胜国对它的制裁,丧失了大量主权特别是国防权和外交权。具体来说,联邦德国在国防上被非军事化,安全问题完全由西方占领国负责,外交权力则基本上由盟国高级委员会控制。然而,随着冷战的加剧特别是标志两大阵营第一次公开军事较量的朝鲜战争的爆发,西方急需挖掘联邦德国的军事潜力,以抗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通过1954年签订的《伦敦—巴黎协定》,联邦德国在1955年被接纳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实现了重新武装,完全被纳入西方的防务体系。同时,由于北约盟国特别是法国对联邦德国具有极强的防范心理,《伦敦—巴黎协定》对联邦德国军力的发展设置了许多限制性条款。这样,加入北约的联邦德国日后既要为北约抗衡华约作出军事上的贡献,又要在作贡献时受到北约特定的制约。在北约成员国中,联邦德国在冷战中的这种军事作用是极其独特的。

同时,尽管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主要是出于恢复主权、保障国家安全和实现两德统一目标的主观考虑,但在客观上讲,由于它本身是冷战的产物,又处于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这又使它深深地卷入冷战之中。也正是由于联邦德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当华约在东欧特别是民主德国部署庞大的常规部队,以及北约头号敌国、华约的头号强国苏联又不断在东欧部署核武器的情况下,联邦德国不仅面临着来自华约的常规进攻和核战争的双重威胁,而且它受到的这种威胁远远大于北约盟国。因此,联邦德国的安全政策特别重视联盟、均势和军事实力的作用。所有这些,既对联邦德国在北约抗衡华约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又使它的地位和作用与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差异特别突出。

由于以上原因,研究联邦德国在北约抗衡华约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入研究冷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然而,联邦德国在北约抗衡华约中的作用又是通过联邦德国在北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出来的,所以研究联邦德国在北约抗衡华约中的地位和作用最主要的是研究联邦德国在北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由于北约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政治军事组织,没有任何同类性质的组织能够

与之抗衡，而统一德国又继续留在北约，这样，研究冷战时期的联邦德国在北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研究后冷战时代的统一德国在北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也有助于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问题的研究。

但是，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尽管有些学者对个别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却不够深入，更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基于此，希望本书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

Stanford M. Lyman. *NATO and Germany –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Supranational Relations*,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该书对研究联邦德国与北约的关系作了一定的探索。其不足之处在于：它虽然是 1995 年出版的，但成书却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当时无论是北约，还是联邦德国，建立时间都还不长，联邦德国正式加入北约的时间则更短，学术界对联邦德国、北约有关问题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这就决定了该书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Burchett, Wilfred G. *Cold war in Germany*. Melbourne : Word Unity, 1950. 该书探讨了德国在冷战中地位问题。Geoffrey Stewart – Smith. *Brandt & the Destruction of NATO*, Foreign Affairs Pub. Co., 1973. 该书力图将联邦德国与北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论及了"新东方政策"对北约发展的影响。Beatrice Heaser. *NATO, Britain, France and The FRG – Nuclear Strategies and Forces for Europe, 1949—2000*.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1988. 该书对北约、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核政策分别作了概述。Wilfrid L. Kohl, Giorgio Basevi. *West Germany: A European and Global Power*.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LexingtonBooks, 1980. 该书是一本论文集，主要论述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有文章涉及联邦德国与北约问题。Catherine McMardle Kelleher. *Germany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该书从整体上对核政策进行了研究，资料较为丰富，对认识联邦德国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核政策作了较多的工作。美中不足的是,该书没有将联邦德国核政策对北约"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流产和"核计划小组"的成立的影响进行分析。M. E. Bathurst and J. L. Simpson. *German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Community*. London: Stevens & Sons Limited, 1956. 该书主要从法律角度论证联邦德国在大西洋共同体中的地位。Simon Lunn. *Burden – sharing in NATO*.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The Ro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b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该书对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东西方的冷战形势进行了大量叙述,并对北约成员国防务责任的分担问题进行粗略的概括。Gavin Kennedy, *Burden Sharing in NATO*,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79. 该书对北约防务责任的分担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也为这一问题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Wolfram F. Hanrieder. *Germany, America, Europe: Forty Year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该书主要探讨了(西)德欧关系中的德国问题、(西)德美欧的经济关系问题、联邦德国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问题,并对联邦德国安全政策问题有所涉及。Heinrich von Brentano. *Germany and Europe: Reflection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London: *Andre Deutsch Limited*, 1964. 该书是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1969—1974)在1966 年前的演讲集,主要是从各个方面论证自己对发展德欧关系所作的贡献。Bruce George. *Jane's NATO Handbook*. Coulsdon: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Limited*. 这是英国一信息机构有关北约问题的报告,分年度出版。各年度报告中有北约成员国军事问题的大量资料。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这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有关世界各地区军事问题的报告,分年度出版。各年度报告中有北约各成员国军事问题的翔实数据,是研究北约及其成员国军事的必备资料。

(二)国内研究

潘其昌:《走出夹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作者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与实践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论述,为学术界进行相关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至于联邦德国与北约有关的问题则不是该书关注的重点。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原则和操作两个层次、分裂和统一两个时期对德国的内政和外交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分析。关于联邦德国与北约有关的问题,作者在“阿登纳西欧一体化政策的实践”一节中有所涉及,用一定的篇幅对联邦德国与欧洲防务共同体、联邦德国与《伦敦—巴黎协定》有关的问题进行了概述。孙秀民:《统一后的德国对欧洲及世界的影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专门安排篇幅来论述德国在北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正如书的标题所示,该书论述的只是统一德国,对联邦德国与北约有关问题则没有涉及。侯力强:《大西洋联盟与德国重新武装》,上海:复旦大学,1995年。这是作者在复旦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用40%的篇幅详细地论述了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问题,对于相关问题的后续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吴学永:《论德国安全政策》,北京:北京大学,1994年版。这是作者在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者用国际政治理论,对联邦德国安全政策的原则、目标和手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对联邦德国安全政策的手段军事实力、联盟政策、均势政策的分析,对于研究联邦德国在北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问题具有启发意义。陈佩尧:《北约:战略与态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作者论述的重点是北约组织,对联邦德国对北约的贡献问题也有所涉及。

三、研究思路

由于北约是一个国家间的组织,其发展必然涉及组织扩充和成员国之间的团结问题;由于冷战时期的北约是一个以军事性为最显著特征的集团,战略安排、军事力量建设及其部署、成员国之间军事上的联系程度也必然会成为其发展的主要内容。这些方面相互关联,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组织发展是北约发展的基础,成员国之间

的团结特别是军事上的紧密联系有利于北约的军事一体化和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军事力量是北约组织各成员国的安全保障，也是它们抗衡华约的坚强后盾，战略安排的目的则在于调节和指导成员国的军事力量以达到北约组织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本书将从这些方面来论证联邦德国在北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具体来说，本书将通过对"联邦德国加入北约"、"联邦德国与北约核力量建设"、"联邦德国与北约的常规军事力量"、"联邦德国与北约的战略调整"、"联邦德国与北约危机的处理"、"联邦德国与两德统一前北约对华约在欧洲核均势的重建"等问题的论述，全面、系统地分析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在北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分别剖析其原因，从而从军事上揭示联邦德国在北约抗衡华约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研究方法

本书在论述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在北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时，除运用分析、综合等最基本的方法外，还将充分运用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和统计学方法。

比较史学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对联邦德国与北约盟国特别是欧洲盟国的军队规模、防务费数量及其所占份额的比较分析上，尤其体现在各种排名上。

在计量史学和统计学的运用上，主要是通过详尽的数据和表格来分析、论证有关问题。其中，所用数据多达 30 多页，所用表格有 17 个。以表格为例：

第 1—6 章共 9 个，包括 1976 年北约各国军队的主要装备表、1969—1980 年联邦德国对北约裁军态度的调查表、1969—1976 年联邦德国对政府防务开支看法的民意调查表、1950—1954 年北约各国的军费开支表、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北约与华约在中欧的常规力量对比表、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北约与华约的战略力量对比表、1974—1977 年联邦德国对苏联态度的民意调查表、1979 年联邦德国国防部关于抵抗意志问题的民意调查表、1981 年联邦德国对"双重决议"态

度的民意调查表。

附录表格8个，它们是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才统一安排到附录中。这些表格包括：1960—1976年北约各国的军队人数及其构成表、1975—1990年北约主要欧洲成员国的兵力对比表、1949—1974年北约各国的防务开支表、1960—1976年北约各国的军费开支指数表、1970—1976年北约各国的防务费及其占北约欧洲盟国和北约整体的份额表、1961—1977年北约各国防务费占国家开支的比例表、北约各国的人均防务费统计表、北约各国所承担的基础军事设施建设费用份额表。

第一章

联邦德国加入北约

第一节 西方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提出及初期解决方案

一、战后初期西方的对德安全政策

由于德国曾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并给世界特别是欧洲文明带来了浩劫，尽管它被战败，但饱受战火蹂躏的欧洲人仍然把来自德国的威胁看做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即使是美国，也将其视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为了避免德国再次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美英法等后来的北约主要成员国的直接反应是解除其武装，并消除它的军事潜力。

波茨坦会议将非军事化作为对德管制的一个重要政治原则，规定解除德国全部武装使之完全非军事化，铲除或控制一切可用于军事生产的德国工业。二战后，美、英、法在对德非军事化方面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措施。

在解除德国武装方面：1946 年 1 月 14 日，美国总

统哈里·杜鲁门在第一篇国情咨文中说,为了巩固二战的胜利成果,要确保德国永远不能再进行侵略战争,使它不再拥有导致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手段。这样,就要解除其武装,以及采取必要措施使它不能重新武装。① 4 月 29 日,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在巴黎外长会议上宣布了曾于 2 月秘密通知三大国的关于解除德国武装与占领德国二十五年的美国计划。法国代表要求,将鲁尔地区国际化或将其经济潜力完全摧毁,并对莱茵兰进行永久军事占领甚至建立独立的莱茵国,以防止德国的重新崛起和在他们看来会带来的新危险。考虑到法国对德国的安全要求,贝尔纳斯建议,无论如何都得解除德国武装和占领德国二十五年,必要时甚至占领四十年之久。② 对此,英、法代表同意进行讨论。该计划后来虽然由于苏联的拒绝而流产,但它反映了西方国家对德国的恐惧和解除其武装的强烈愿望。

在消除德国的军事潜力方面:1947 年 8 月 22 日至 27 日,美、英、法代表在伦敦举行会谈,讨论德国的工业生产问题。会议公布了一项新的英—美占领区的工业计划,宣布由占领当局确定战时工业的具体标准,规定一切为战时工业建立起来的企业或改建为战时工业的企业都予以拆除或破坏。③ 这一新计划的宣布,可以说是对波茨坦有关决议的具体实施。

1948 年 2 月 23 日至 6 月,为讨论德国问题,美、英、法、比、荷、卢六国代表在伦敦断断续续举行会议。他们强调,不能允许德国再次成为一次侵略势力。会议最后就德国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世人所称的“伦敦建议”。建议规定,对鲁尔区的煤、焦炭和钢铁生产的分配实行管制,以防止该地区工业的集中成为一种侵略的工具,确保对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参加欧洲经济规划的国家都有利。实际上,这一规定

---

① 《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篇》,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7 页。

②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 95 页。

③ 同②,第 127 页。

是对德国与发展军事有关的基础工业加以限制。这表明,西方消除德国军事潜力方面的措施进一步强化了。

到了1949年,西方国家虽然扶持西占区德国人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联邦德国,但它们对其非军事化的努力并没有停止。同年11月15日,美、英、法三国高级专员与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在彼得斯贝格举行会谈。英国高级专员罗伯逊将军在会上着重指出,西方在军事工业、非卡特尔化、赔偿和拆除设备方面对德国所规定的政策和措施无论如何不能修改,希望德国方面不会制造麻烦。专员们还表示,各占领国军事长官将对已达成和有待达成协议的事项进行监督。

在采取措施解除德国武装和消除德国军事潜力并不断加以强化的同时,美英法等国还双管齐下,反对德国重新武装,这从它们的声明或领导人的言论中可以略见一斑。

在1948年的六国会议上,美、英、法三国代表团强调,在欧洲和平没有达到保障之前和事先未经协商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普遍地从德国撤军,重申禁止成立德国军队和德国参谋部的规定,并建议,一旦出现德国重建军事力量或重新推行侵略政策的危险时,占领国政府应进行磋商。1949年11月,三大国与联邦德国签署的《彼得斯贝格协定》也规定在联邦德国领土上维持非军事化,《占领法规》严禁联邦德国建立武装力量。

在法国,反对德国重新武装的情绪高涨。法国与德国是世仇,在二战中又惨遭希特勒纳粹的蹂躏,因而它在战后初期主张严惩德国,并谋求建立针对德国的同盟体系。它在1947年签订的法英《敦克尔刻条约》和1948年签订的法、英、比、荷、卢五国《布鲁塞尔条约》,都是为了防范和制衡德国。出于同样的理由,法国反对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当时,法国认为德国的危险比苏联大,"法国的对外政策主要被如何防御德国的威胁所困扰,它对苏联的威胁的认识是犹豫的,勉

强的"[①]。所以,1949 年 7 月 28 日,法国国民议会尽管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北大西洋公约,但无论是条约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大多数人对法国加入北约是否会被迫接受美国扶植联邦德国的政策深表忧虑,担心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反对者着重强调北约与德国问题的密切联系,他们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的缔结将导致联邦德国最终加入北约和重新武装,认为这不符合法国的利益。如,法国共产党指责北约只不过是把联邦德国与西方联结在一起的工具,联邦德国最终加入北约是不可避免的。戴高乐也认为联邦德国会成为北约的成员国。[②]《世界报》更是明确评论:"北大西洋公约包含着(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好比鸡蛋有蛋黄。"[③]条约的拥护者舒曼虽然努力淡化北约与德国问题的联系,并着重强调北约给法国带来的安全保障,但他也不得不对议员们所担心的问题作出保证。他说,联邦德国重新武装"是一个不会出现的问题,不论现在还是将来。德国还没有缔结和平条约,它没有军队,也决不应该有。它没有武装,也不会有"[④], 对法国及其盟国而言,让德国以一个足以自卫或帮助其他国家进行自卫的国家加入大西洋公约是不堪设想的。[⑤] 在此情况下,无论在政府还是在议会内,尽管大家对缔结公约是否会导致德国的最终加入和重新武装这一问题不去追根问底,但他们内心深处是担心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

1950 年上半年,舒曼给阿登纳的私人信件中写道,法国民众担

---

① Guy De Carmoy.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France 1944—1968*,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 27.

② Ireland, Timothy P. *Creating the Entangling Alliance: The Origin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Greenwood, Connecticut, 1981, p. 159.

③ McGeehan, Robert. *The German Rearmament Question: American Diplomacy and European Defense After World War* Ⅱ,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1971, p. 17.

④ F. Roy Willis. *France, Germany and the New Europe 1945—1967*, Lond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57.

⑤ Alfred Grosser. *The Western Alliance: European - American Relation since 1945*,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0, p. 90.

忧,(联邦)德国一旦恢复了元气,就会进攻法国;反过来说,德国人也有安全要求。因此,他建议成立欧洲煤钢联营,把两国的煤钢生产置于其他欧洲国家都可参加的高级联营机构。表面看来,舒曼计划公平大度,即成立煤钢联营是为了消除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德之间的安全忧虑。实际上,计划深藏玄机,舒曼是想借此防范和制约联邦德国。因为,一国要重整军备,首先会在煤、铁、钢的增产过程中显其端倪,如果建立舒曼所建议的那种机构,那么只要联邦德国有个风吹草动,法国就会立即觉察出来。

到 1950 年 11 月,当西方舆论开始讨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时,法国对此深感不安。新闻部长戴尚代表政府发表声明说,世界必须明白,如果安全体系同意德国重新武装的话,法国不可能仍然留作该体系的伙伴。法国的声明再一次表达了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及加入北约的强硬态度。

在英国,反对德国重新武装的愿望也非常强烈。早在 1944 年 11 月,英国战后计划委员会就提交了一份题为《西欧和北大西洋的安全》的报告。报告中提到,英国未来可能面临的威胁除了苏联就是来自重新武装的德国。北约成立后,英国许多政要强烈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1949 年 12 月 5 日,总参谋长威廉·斯利姆元帅在美国西点军校发表的演说中强调,德国是欧洲大陆最危险的国家,他表示强烈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

在美国,也没有立即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打算。1950 年 2 月 1 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作证时强调,"目前没有希望立即重新武装德国。在此之前,需要解决诸多政治问题,以提供一个更广泛的政治框架"。马歇尔也认为,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使联邦德国积极参与西方防务。①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直到 1950 年初,为避免德国(联邦德国)

① Ireland, Timothy P. *Creating the Entangling Alliance: The Origin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Greenwood, Connecticut, 1981, p. 213.

再次发展成为大战的策源地，西方国家力图解除其武装，限制其军事潜力的发展，并反对它重新武装，这一切表明它们在安全问题上对德国的担心和防范，表明它们在战后初期的对德安全政策方面采取的是一种抑制政策。

二、西方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酝酿

在对德实施抑制政策的过程中，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已经爆发。西方领导人意识到，要维护欧洲和平，还需要复兴西欧经济，而西欧其他国家的经济对德国依赖极深，没有德国的经济恢复，就不可能有整个西欧的经济恢复。因此，西方占领国不仅逐渐放宽了对德国工业生产的限制，而且还斥巨资扶持其发展（马歇尔计划的成效尤为显著），强调西欧各国的经济生活与一个民主的德国的经济生活必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

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强大实力，德国在历史上是欧洲均势的关键，而战后不久的将来仍将如此。正是以上经济和政治上的考虑，他们扶持西方占领区的德国人建立了国家。因此，联邦德国的成立不只是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新国家、增添了一个新成员那样简单，对西方来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西方希望通过赋予德国一定的主权并把它纳入西欧，德国人民就会积极地支持西方对抗苏联[②]。为此，1949 年 11 月 9—10 日召开的西方三国巴黎外长会议认为，支持和鼓励德国与欧洲各国人民的大家庭的进一步融合是适宜的。1950 年 3 月 30 日，欧洲委员会正式邀请联邦德国。

正因为在经济、政治上扶持德国（联邦德国）的发展，因此，西方虽然在安全问题上对德实施抑制政策，但这种政策在冷战环境中不仅不可能长期实施，而且最终只能与前者融合。

---

① Manfred Jon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Adiplomatic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83.

② Ireland, Timothy P. *Creating the Entangling Alliance: The Origin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Greenwood, Connecticut, 1981, p.138.

冷战爆发后，西方将苏联共产主义看做一个咄咄逼人的恶魔，西方诸国希望“团结”起来进行对抗。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谈到共产主义对希腊的威胁时，呼吁西欧团结起来对付东欧的进一步苏维埃化，[①]敦促比、荷、卢三国加入英法《敦刻尔克条约》。这个条约原是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德国威胁，形势的发展变化使英国想用它来阻挡苏联的威胁。[②] 随着冷战形势的急剧发展，西方国家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加深了。1948 年，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帮助该国共产党将非共产党人排挤出联合政府，西方世界将这一事件看做是苏联“制服”捷克斯洛伐克的举措，并认为是苏联向西扩张早期行动的第一步。贝文认为，莫斯科正在“积极准备向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延伸其控制，其后是中东，然后无疑将是巴尔干各国和远东”。[③]美国驻德军事长官卢西亚斯·克莱向华盛顿发出警告，战争“将会戏剧性地突然发生”，法国总理乔治·皮杜尔也在探询美国对他的国家给予军事保障的可能性。

柏林危机爆发以后，西方与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苏联在柏林危机中的行动有触发一场军事冲突的危险，西方认为，苏联的威胁是一场潜在的军事威胁，这就使得东西方的对立关系中增加了过去少有的内容。尽管双方都没感到必须大力加强军备以准备战争，但双方都逐渐从军事角度来看待相互间的关系。在美国，这种变化更为明显地带来更多具体的后续行动，它倾向于过分夸大苏联的军事实力。[④] 同时，这场危机还使美国在对外政策中过分强调军事力

---

① *Speech by Bevin.* January 22, 1948, in Carlyle,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7—1948, pp. 201—221.

② John Kent and John W. Young. *The ' Western Union ' Concept and British Defence Policy, 1947—1948*, in *British Intelligence Strategy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1*, ed. Richard J. Aldrich,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166—192.

③ David Dilks. *The British View of Security: Europe and a Wider World, 1945—1948*、Universitetsforlaget, Oslo, 1985, p. 52.

④ Thomas G. Paterson. *Meeting the Communist Threat: Truman to Reg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5—53.

量的重要性。杜鲁门后来回忆说,这次经历让他认识到,"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是从实力地位进行领导。我们必须扩大自己和盟友的武装,同时,在同俄国人打交道时,决不能让他们以为我们是软弱的。"①

西方国家要在与苏联对抗时显示实力,最低限度要求不处于下风,亦即势均力敌,特别是在欧洲维持均势。美国认识到,两次世界大战都已证明欧洲对于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为了不让欧洲均势倾覆以再度卷入战争,美国当时想亲自维护和平时期的欧洲均势。② 然而,德国在欧洲均势中具有特殊作用。早在 1919 年,英国已故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派的创立者哈尔福德·麦金德在其经典著作《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提出的心脏地带理论中,充分论证了德国位置的战略性。历史发展证明,麦金德的论述不无道理。从 19 世纪后期到二战结束,地处中欧的德国就一直在欧洲的均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战结束后,德国东部落入俄国人之手,西部则被西方所占领,中欧处于东西方对抗的前沿和聚焦的区域,仍然是维持世界均势的关键所在。

因此,西方为遏制苏联而筹建北约时,就力图重新武装德国并将其纳入西方阵营。1948 年 4 月 1 日,美、英、加三国华盛顿会谈通过了一份政策性文件,即五角大楼文件。文件特别指出,情况允许时,应邀请德国(或德国的三个西方占领区)等参加布鲁塞尔条约和北大西洋区域防务协定,这一目标不应公开透露,可在防务协定适当的附加条款中予以规定。9 月 9 日,美、加和布鲁塞尔条约国在华盛顿会议中通过了一份备忘录,即"华盛顿文件"。文件明确写明,参加国认为,最终必须就西班牙、西部德国(倘德国仍然分裂)与北大西洋安全

---

① Harry S. *Truman*, *Memoris*, *vol.* 2,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Doubleday, N. Y., Garden City, 1956, p. 171.

②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Eleventh Edition 1988, p. 52.

安排的关系作出决定，同时，北约缔约国将在条约生效时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宣称针对西部德国在内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直接或间接的侵略威胁，将被他们视为需要进行磋商的事态发展，从而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10月，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西方联盟总司令委员会主席蒙哥马利元帅说，保卫西欧对付侵略的计划没有一个实现，若在西欧组织防务，非采取非常措施不可，西方的防务布局必须包括西部德国，但部队状况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连能否守住莱茵河这条线都靠不住。由于这种担忧，他在1949年1月要求贝文采取措施，使西部德国加入西方联盟及正在讨论中的更广泛的北约。他指出，“我们的计划是建立在常规武装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要与俄国所部署的用来对付我们的兵力较量的话，我们就需要强大的兵力。德国不参加，要提供这些部队就没有希望”[①]。

对于重新武装德国和将其纳入西方阵营的重要性，杜鲁门表述得更为清楚。他说，德国人居住的地方是欧洲的心脏，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多少世纪以来都证明，他们具有保卫这块土地的意志和能力，“没有德国，欧洲的防御不过是大西洋岸边的一场后卫战。有了德国就能够有一个纵深的防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来自东方的侵略”。为此，他强调，把西部德国置于欧洲防务部署中并鼓励欧洲人自己进行最大的努力是推动北约组织起作用和必须做的两件事。[②]

1949年5月2日，美国参议院就北约举行听证会时，杜勒斯强调北约在解决德国问题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西部德国有可能试图寻求在东西方之间进行讨价还价的地位，它甚至会为了失去的东部领土而与苏联结成“暂时性的联盟”。如果德国

① Montgomery Bernard Law, Ist Viscount Montgomery of Alamein. *The Memoirs of Field – Marshal the Viscount Montgomery of Alamein.* K. G. London: Collins, 1958, pp. 508—511.

②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00—301页。

和苏联结盟，两国将有足够的实力来统治欧洲大陆。为此，他指出，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德国或者至少是德国的一部分纳入西欧阵营中来。①

即使德国的世仇——法国，主张将西部德国纳入西方防务体系的也不乏其人。在西方联盟陆军司令部任职的法国将军安德烈·鲍柯认为，假若西方盟国在一旦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就立即将三分之二的联邦德国领土拱手相让，并沿莱茵河一线进行防御，它们就不可能获得联邦德国的同情和支持。因此，他主张，西方国家应实行"前沿战略"，在莱茵河以东进行战斗，并"尽可能地靠近铁幕"②。前沿战略一旦实施，事实上则将联邦德国纳入了西方的防务体系。

1949 年 8 月，国际形势发生了不利于西方的重大变化，苏联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苏联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后，美国的战略核优势有逐渐消失的危险，这使美国对欧洲的核保护伞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北约的常规部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1950 年 3 月 16 日，丘吉尔在下院提出，如果西方盟国要想承担北约规定的责任，以控制漫长的欧洲前沿阵地，那么，德国人提供的援助是至关重要的。③ 4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中说，必须使用一切可以支配的资源来反对莫斯科的侵略。④ 文件特别提出，在增强实力的过程中，自由国家可撇开苏联，与联邦德国签订和约，这样它就有能力和资源支持自由世界。

上述情况表明，冷战发生后，西方国家不仅认识到德国（西部德国）在东西方对抗的战略性作用，而且把它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共同

---

① Ireland, Timothy P.. *Creating the Entangling Alliance: The Origin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Greenwood. Connecticut, 1981, p. 139.

② Ibid, p. 169.

③ Peter Calvocoressi, Coral Bell.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9—1950*. London: Oxdord University Press, p. 218.

④ Ernest May. *America Cold War Strategy: Interpreting NSC 68*. St. Martin's Press, NewYork, pp. 236, pp. 245—246.

体，将它当做军事上的潜在盟友。为此，它们在成立北约时就开始酝酿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将其纳入防务阵营。

三、西方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正式提出

正当西方酝酿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时，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一开始原本是朝鲜半岛的一场内战，但是，在冷战的大环境下，战争很快就超出其本身的影响而具有更广泛的政治军事意义。在西方看来，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以苏联为后盾的北朝鲜首先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引起的。由于南朝鲜和美国订有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因此，对西方来说，北朝鲜对南朝鲜的进攻，象征着苏联和东方在东线向美国和西方的进攻。西方国家由此断定，苏联已改变战术，从冷战转为热战，以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它们将朝鲜战争看做是苏联沿着易北河（欧洲的三八线）进行侵略的先声；或者是企图转移美国对欧洲的关注；或者是对欧洲施加政治压力，以此威胁美国放弃稳定欧洲西部的打算；或者是至少要考验一下新的大西洋联盟的力量和决心，也要考验一下美国所承担的义务。[①] 出于这些考虑，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英等国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于是，朝鲜战争便不再是在亚洲的一个偏僻角落里进行的孤立的战争，而是演变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进行的第一次真正的军事较量[②]。

然而，西方想在朝鲜战场速战速决的计划因遭受重大挫折而落空。在此情况下，对二战记忆犹新的美国开始进行大规模扩军备战。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估计，预计中的这笔费用会是"沉重的，但不至于像我们不扩军备战而引起的战争那样沉重，

---

① A·W·Deporte. *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the Enduring Bal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td, 1979, p. 180.

② 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8页；沈志华：《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与新看法》（续），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89页。另参见：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起源、学术特征及其批判》，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9页。

我们现在对此深信不疑”。[1]杜鲁门总统宣布实施“全国紧急状态”，并进行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它使美国的武装力量增加了100万，总数达350万人，军用飞机和作战车辆的生产几乎是平时的5倍。[2]

同时，美国政府开始重新检讨它的防务义务，认为一旦同苏联在欧洲大陆发生军事对抗，北约的现有力量是十分不足的，而且没有理由必须让美国单独弥补这方面的缺陷。[3] 正因为如此，美国断定必须加强西欧本身的防御。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参议院的一次委员会上说，动员欧洲兵力是当务之急。7月14日，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致电国务院说，把联邦德国的军事潜力纳入西方防务至关重要。[4]

7月22日，艾奇逊向部分驻欧使节通报，美国正在加强自身的防务努力，为此目的，杜鲁门总统准备要求国会拨款100亿美元。其中，约40亿-60亿美元将用于北约国家。美国希望，此举能使西方的共同力量达到并保持在充足水平。他还说，美国要求欧洲国家就他们加强防务努力的性质和范围作出尽可能坚定的承诺。[5]

7月26日，美国驻法大使布鲁斯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也表示，联邦德国参与欧洲防务至关重要。他进而提出，解决德国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创建一支“欧洲军”，这样就能消除对纯粹的德国国家军队的恐惧；不过，这支欧洲军应以某种方式与大西洋共同体和北约组织联

---

① Samuel F. Wells Jr.. *The First Cold War Buildup: Europe in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y and Policy, 1950—1953*," in *Western Security, The Formative Years: European and Atlantic Defense, 1947—1953*, ed. Olav Riste, Unixersitetsforlaget, Oslo, 1985, p. 185.

② Samuel F. Wells Jr.. *The First Cold War Buildup: Europe in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y and Policy, 1950—1953*, in *Western Security, The Formative Years: European and Atlantic Defense, 1947—1953*, ed. Olav Riste, Unixersitetsforlaget, Oslo, 1985, p. 185, p. 184.

③ Dereck W. Urw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a short political histor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1, p. 148.

④ FRUS, 1950, vol. 3, pp. 180—182.

⑤ Ibid, p. 138.

系起来。[①]

针对朝鲜战场的紧张局势和行政部门的上述对策,美国参议院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史称"伟大辩论"),并通过了第99号决议。决议批准行政部门提出的关于增派大量部队到西欧的倡议,同意任命一位美国将军担任盟军最高司令。决议表示,欧洲地面部队应对盟国地面部队作出必要的贡献,要利用意大利、联邦德国和西班牙的军事资源进行供给。[②]

另外,8月份发生的几件事情更加坚定了美国推动盟国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决心。当时,关于苏联即将对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的谣言四起,民主德国宣称波恩政府的命运将同汉城政府一样,并且还首次提到联邦德国即将发生"武装起义"。[③]同时,乌布利希还让其特工使西方得到错误情报。情报称,苏联给民主德国5万人的军事化警察部队运去进攻性的装甲车(实际上这支部队始终只装备了轻武器)。所有这些情况很容易使西方联想、类比和推测:苏联有可能通过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发起进攻而在西线大举进攻美国和西方。

在急需加强西方武装力量的时刻,法国的防务政策引起了美国的不安。法国政府曾答应增加它为欧洲防务提供的部队,以便在3年内提供15个有作战实力的师。但事过不久,法国舆论突变,说重整军备有可能抑制经济增长。由于法国对其欧洲防务的承诺又不能兑现,美国人认为,必须把各种可能进行的合作都抓在手里。

大量情况表明,联邦德国在军事上对北约的贡献将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从地理位置上讲,它正好处在欧洲防务的前沿;从军事潜力上讲,它具有巨大的工业资源和人口,完全能够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从战斗力来讲,德国人不仅有同俄罗斯人大军团作战的丰富

---

① FRUS, vol.3, 1950, pp.157—158.

② Simon Lunn. *Burden-sharing in NATO.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The Ro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b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p8—9.

③ Robert McGeehan, *The German Rearmament Question: America Diplomacy and European Defense after World* Ⅱ.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1971, p.24.

经验，而且创造过辉煌的战绩。为了有效地反对共产主义以保卫欧洲，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感到，必须让联邦德国发挥作用。这样，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就提上了西方的重要议事日程。

1950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联邦德国参加西方防务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他说，重要的是找出一条适当的途径，使（联邦）德国有可能在西方防务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西方增加部队的目的应是保护整个大西洋地区免遭侵略，由于德国人民生活在这一地区，所以他们十分希望找到一条正确的途径，以便他们能在防务中参与协作。同时，希望联邦德国用自己的经济和人口潜力来保卫领土，从而为西方世界的防务作出努力。

9月8日，艾奇逊和国防部长路易斯·阿瑟·约翰逊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建议，通称“一揽子计划”。计划的要点主要包括增派美军去欧洲、建立北约一体化部队、美国人担任盟军最高司令、建立不超过师级建制的联邦德国部队、联邦德国尽早加入北约、禁止联邦德国建立总参谋部和重要军事装备等。“一揽子计划”反映了美国的矛盾心理，它既要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又要对其军事实力加以限制。但是，美国提出计划一事表明它在制定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具体方案了，意味着它加快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步伐。

四天之后，大西洋联盟的“三强”美、英、法三国外长举行纽约会议，讨论如何加强“自由世界”在欧洲和亚洲的防务。艾奇逊在会上说，美国不要含糊的协议而要具体的决定，并正式提出了让联邦德国加入西方防务的问题。

法国外长舒曼起初对艾奇逊的建议断然拒绝。他在参加纽约会议前就表示，他将支持法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即“根本就不存在德国重新武装问题”，而且在纽约会议上不会提出这个问题，[①]否则，会议会导致盟国的严重分歧。[②] 他的态度是，除非盟国部队在欧洲大大加

---

① Monnet, J. *Memoirs*, Fayard, 1976, pp. 341—342.

② FRUS, 1950, vol. 3, p. 267.

强,从而使法国政府能够应付由于联邦德国武装力量的建立而产生的心理反应,否则,他不能对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问题作出任何决定。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一开始也对艾奇逊的建议表示反对,但最终还是表示同意美国的主张。为了迫使法国就范,美国在会议最后一天威胁说,如果法国不同意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它将取消对法国的军援。当时,法国在印度支那战场上越陷越深,迫切需要美援。因此,舒曼不得不妥协,他虽然不同意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一体化防务体系,但同意其重新武装。从会议公报的内容来看,西方决定建立保卫西欧的统一武装部队,立即加强西欧的军事力量。公报还提到,要尽可能吸收联邦德国参加这一防务活动,采取必要步骤保证联邦德国和柏林的国际安全,结束战争状态和进一步放宽对联邦德国的管制,以便加速恢复它作为"自由国家大家庭"中的一员的地位。这样,北约主要国家暂时达成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协议。

15—18 日,北约又举行了部长理事会第五次会议,集中讨论如何保卫北约免遭类似北朝鲜对南朝鲜的进攻特别是联邦德国参加西方防务问题。会议开幕后,荷兰外交大臣德克·斯蒂克抢先发言,提出建立一定的联邦德国部队,以便在尽可能东面的地方保卫西欧。在法国对此表示反对后,大家都反对法国,特别是英国国防大臣伊曼纽尔·欣韦尔还与法国国防部长朱尔·莫克展开了激烈辩论,指责他缺乏现实感①。最后,在莫克提出将联邦德国部队建制限制在团以下的主张后,法国代表团在基本问题上作了让步。会议一致同意,在欧洲采取前沿战略。也就是说,为确保西欧的安全,尽可能将侵略阻止在东部。然而,这种战略要求军队数量远远超过当时北约可动用的军队,这意味着防务计划必须重新修订。1950 年 9 月 26 日,会议重开。理事会明确指出,前沿战略意味着将在联邦德国领土上进行防卫,因此决定研究联邦德国参与的政治、军事问题。

① Alfred Grosser. *The Western Alliance: European – American Relation since 1945*.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0, p. 123.

由此可见，由于朝鲜战争从一场内战演变成两大阵营的第一次公开军事较量，从而使东西方全球冷战升级为局部热战，西方担心苏联将朝鲜战争作为在全球进攻西方的第一步，于是将防务和安全问题置于对外政策的首位。为了能够有效抵御苏联可能发动的进攻，它们在酝酿已久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会议的磋商与协调，正式达成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以将其纳入西方防务体系的重大决定。可以说，西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正式提出，是战后西方在经济、政治上实施扶德政策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更是西方在东西方冷战加剧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决策。

四、西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欧洲军方案

法国虽然同意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要求，但还是担心重新武装后的联邦德国会做大。因此，它开始寻求变通方案。这样，“普利文计划”应运而生。

1950 年 10 月 24 日，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以发表政府声明的形式宣布了法国对西方防务的计划，即“普利文计划”。计划规定，联邦德国不得加入北约，不能设立国防部、国防军和总参谋部，即将组建的部队编制为营级单位，每个单位为一千人，但总人数不得超过欧洲军的五分之一，在欧洲军内的任何一国部队不经批准不得单独行动，但目前对本国军队拥有支配权的参加国，将继续保留对其未编入欧洲军的军队的权力，欧洲军的防务部长经由理事会批准，可将某国在欧洲军中的部队交由该国政府使用，以满足该国在共同防务之外的需要①。

从计划的内容来看，法国希望通过建立“一支置于单一的超国家机构控制下的欧洲军”，严密监控联邦德国的军事能力，使它无法建立一支可用于发动侵略的国家军队，以实现只武装联邦德国人而不武装联邦德国国家的目的。这表明，法国不仅想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过程中限制其军备，而且还希望借此确保对它的军事优势。

---

① 《战后历史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 150 页。

为协调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和法国国防部长莫克在北约防务委员会会议召开前夕举行了一次会谈。莫克在阐述"普利文计划"的精神时说,法国认为应尽快任命一名最高司令,并立即把可供调遣的军队置于这位最高司令的管辖之下。他还强调,只有在签订《欧洲煤钢联营条约》以后,欧洲才能建立一支包括德国军事单位的"特别试验性"部队。对此,马歇尔强调,在确知北约各国能就联邦德国对欧洲防务作出贡献达成何种安排之前,美国不会在北约一体化部队的指挥和军事结构等问题上作出最终承诺。[①] 马歇尔和莫克的立场表明,美法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上还存在重大分歧。

事实上,大多数美国官员认为"普利文计划"只是法国试图拖延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一个伎俩。[②] 尽管如此,但国务卿艾奇逊并不悲观,认为法国虽然仍未公开表示接受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基本原则,"普利文计划"本身却表明它已在考虑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这可作为美法继续努力的新起点。[③] 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对法国计划的反应虽然冷淡,但是对美法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仍然抱有希望。

与此同时,法国也开始表现出灵活性。11 月 3 日,针对艾奇逊对莫克在北约防务委员会会议上僵硬态度的抱怨,普利文表示,同意北约军事委员会和常设理事会中的法国代表与盟国代表讨论涉及德国对西方防务贡献的任何计划。[④]

在上述基础上,北约常设理事会和军事委员会 12 月中旬举行联席会议,并通过了"斯波福德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是建立欧

---

① FRUS, 1950, vol. 3, p. 411, 423.

② McGeehan, Robert: *The German Rearmament Question: American Diplomacy and European Defense After World War* Ⅱ,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1971, p. 67.

③ Ireland, Timothy P.. *Creating the Entangling Alliance: The Origin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Greenwood, Connecticut, p. 202.

④ FRUS, 1950, vol. 3, p. 433.

洲军将会碰到一系列政治、军事和财政上的问题,为了不致拖延联邦德国对西方防务作出军事贡献,作为一项过渡性措施,立即在最高司令主管下组建联邦德国部队;二是联邦德国部队的基本编制为五六千人的团级单位,总数不超过盟国防卫西欧部队的五分之一,即十五万人左右,并不得配备重型武器,不得建立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三是美国方面保证迅速支持舒曼计划和在1951年初召开讨论建立欧洲军的会议。

北约理事会认为,这种参与将会加强欧洲防务,不会对北约的"纯防御性质"有任何改变。部长们还恳请联邦德国的三个占领国——美、英、法与联邦德国合作,探索实现这种参与的途径[1]。

"斯波福德方案"规定的建立联邦德国部队的程序及其编制和在欧洲军中的份额虽然超出了"普利文计划"的范围,但是有关联邦德国不得设立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以及将讨论建立欧洲军的规定则尊重了法国的意见。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个妥协方案。尽管如此,但方案的通过还是表明,西方国家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上已突破了外交僵局,确立了联邦德国参与共同防务的一些原则。

为拟定联邦德国参加西欧防务的具体实施办法,1951年1月9日—6月4日,盟国驻德副高级专员和军事代表与联邦德国代表和军事专家在彼得斯贝格举行会谈,会议最后提出了一份报告。从报告的内容来看,建议虽然对联邦德国的军备特别是军事指挥机关和军工生产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它所规定的联邦德国军队的人数和编制大大超过了"普利文计划"和斯波福德妥协案所规定的水平。因此,法国政府拒绝接受,彼得斯贝格会谈宣告失败。

彼得斯贝格会谈虽然失败了,但它只是表明西方国家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具体实施方案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由于在此之前已达成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协定,它们在此问题上的谈判和磋商仍在继续。6月底,艾森豪威尔与莫内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在会谈后进

①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Brussels. *NATO: Facts and Figures*, pp. 28—29.

一步认识到，不解决相关的政治问题，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就无法进行，问题的关键是实现法德和解，以欧洲方式解决德国问题。莫内在会谈中强调，"仓促建立几个德国国家师，将重燃西欧各国之间的宿仇旧恨。……如果我们从另一方面去做，你让法国、德国和它们的邻国共同开发它们的资源，共同进行防卫，那么欧洲将恢复抵抗意志"①。不难看出，莫内是想通过欧洲统一，并建立一个防务共同体来解决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问题。艾森豪威尔表示，他完全赞同莫内的建议。7月，他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指出，欧洲军计划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另一个途径。②

彼得斯贝格会谈的失败，艾森豪威尔接受了欧洲军计划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促使美国政府决定搁置通过北约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计划，转而支持法国提出的建立欧洲军的计划。与此同时，联邦德国也认识到，只要法国坚决反对，它就无法通过在北约结构内进行重新武装而赢得安全、平等和主权。鉴于这种情况，通过参加欧洲军进而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不失为联邦德国可接受的选择办法。至此，在大西洋两岸，建立欧洲军都被视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唯一途径。

9月12—14日，美、英、法三国外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决定与联邦德国政府缔结"和平协定"以代替"占领法规"，并同意在一个欧洲大陆的共同体内给联邦德国以平等权。

半年后的1952年5月26日，美、英、法和联邦德国代表在波恩签订了《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三大国关系的条约》，即"一般性条约"或"德国条约"、"波恩条约"。条约规定，结束对联邦德国的占领权，恢复联邦德国主权，联邦德国参加欧洲防务共同体，三大国军队继续驻留联邦德国等。第二天，法、德、意、比、荷、卢六国外长在巴黎签署《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又称"欧洲军条约"或"巴黎条约"）。

① Monnet, J. *Memoirs*, Fayard, pp. 358—359.

② Fursdon, Edward. *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EDC): A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pp. 117—118.

条约规定:欧洲军由各成员国交由欧洲防务集团管辖的各国部队组成,除陆军外,欧洲军的基本军事单位由同一国籍的士兵组成。条约还规定了陆军战时和平时的基本军事单位及各国在一体化军队的规模。关于欧洲防务集团和北约的关系,条约规定,欧洲军隶属于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双方相互将来自第三方的攻击视为对自己的攻击,同时,只要美国同意,北约各项保证将扩大到欧洲防务集团。[①] 这样,西方国家不仅在是否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的一致,而且制定了具体方案,即欧洲军方案,其实质是要各参加国的防务部队统一在一个"超国家"的组织之内,以便在武装联邦德国的同时,对它进行限制。

第二节 联邦德国对重新武装问题的态度

一、联邦德国对重新武装问题的最初态度

在酝酿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时,美英等国本以为会受到联邦德国欢迎,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二战中,德国遭受的破坏极其严重,当时有的预言家悲观地估计,"每个德国人每 5 年才能有一只盘子;每 12 年有一双鞋子;每 50 年有一套衣服;每 5 个孩子中有一个能用自己的尿布"[②]。加上战后初期由于缺少食品和住房而产生的混乱现象,生存斗争不可避免地占去了大部分德国人的全部精力。[③] 所以,德国人对纳粹政权崩溃后的普遍反应是要求退出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他们对于政治上的重新建设并不关心。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精力去关心重新武装的事情。

(联邦)德国人民不仅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关心重新武装的事情,

---

① 《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集》,第一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 年版,第 443—449 页。

② Ludwig Erhard. *Prosperity through Competition*, London, 1959.

③ Dereck W. Urw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a short political histor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1, p. 98.

而且在心理上也没有做好准备。因为二战,他们不仅“精神负担沉重”和“深感羞愧”,而且还受到世界舆论对集体过错的指责。这种责难不仅把纳粹独裁者而且也将全体德国人民视为恶神,让他们对发动战争和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尤其是纽伦堡审判及其后续审判成为德国人最耻辱的场面,因为这是战胜国的法庭在德国的土地上把一个借德国名义行事达 12 年之久的政权判为有罪。[①] 加之德国人民由于纳粹德国的崩溃“失去了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②],他们不得不任人支配、指控和宰割。在这种情况下,要使绝大多数联邦德国民众理解盟国的思想转变是不容易的。正是这些盟国曾连续不断地污辱过德国的军国主义,正是这些盟国在纽伦堡的审判中将德国的高级将领们作为战犯而处死,也正是这些盟国把德国人在军事上的长处看成是德意志民族特征的最大污点,而在几年之后,这些盟国却要德国人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总之,由于冷战的发生及其发展,西方国家的对德安全政策虽然在短短几年内从抑制转向了扶持,但对于生活在由二战带来的恶果的环境中的联邦德国人们来说,却是难以适应的。

另外,居民男女比例也不利于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二战中,约有 200 万德国士兵阵亡,150 万人被俘,200 万人失踪,[③]这些人主要是青壮年男性劳力,这就使得战后初期德国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特别在 20 ~ 40 岁年龄段,男、女之比为 100: 160。[④] 在男女比例如此失调的情况下,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不仅缺乏兵源,而且容易造成社会和家庭的不稳定,并使从事生产的青壮年男性劳力进一步减少,从而影

①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 174 页。

② 同上,第 184 页。

③ Dereck W. Urw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a short political histor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1, p. 31.

④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 204 页。

响经济的恢复。

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联邦德国人不仅对重新武装不热情,而且还持强烈反对态度。有人担心出现二战中的军国主义灾难,有人担心重新武装会刺激苏联而引发另一场"朝鲜战争"。许多人认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应是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这就需要与苏联进行有益的谈判,而重新武装会破坏这种前景,并使德国的分裂状态永久化。还有人对拟议中的有限武装表示不满。

在此情况下,当时亲西方的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一开始也不得不反对重新武装,表示原则上反对任何重新武装德国的行动。[①] 他认为,德国的安全问题一要靠西方的保证,二要靠成立联邦警察部队来解决。

直到1950年9月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讨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时,绝大多数联邦德国人仍然对此抱完全消极的态度。统计资料表明,联邦德国当时反对重新武装的人的比例高达70%。[②] 对此,美国一些高官当时也有些觉察。1950年10月初,美国驻德高级专员麦克洛伊向国务院报告说,即使美法就联邦德国重新武装问题迅即达成协议,也至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使德国人作好心理准备,同意为西方防务提供武装部队。[③]

总之,由于二战的深刻教训及现实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重新武装和参加欧洲防务的想法在联邦德国是普遍不得人心的。

二、联邦德国在重新武装问题上的态度转变

联邦德国虽然一开始反对重新武装,但从1950年12月起,其态度逐渐向赞成方向转变。当时,北约斯波福德方案确立了联邦德国在北约框架内参与西方防务的一些原则,并建议由美、英、法与联邦

① Manfred Jon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Adiplomatic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89.

② Charles Williams. Adenauer. *The Father of the New German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0, p.366.

③ FRUS, vol.3, 1950, pp.394—395.

德国合作探索实现途径。联邦德国政府随即声明,准备为西方防务作出贡献。后来,尽管斯波福德方案流产和拟定具体实施方案的彼得斯贝格会谈失败了,但在西方决定实施欧洲军方案后,联邦德国积极参与欧洲防务建设,先后与西方国家签订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1953 年 3 月,两条约得到联邦议会的正式批准。联邦德国之所以完成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

(一)联邦德国人特别是阿登纳对共产主义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对苏联有着根深蒂固的成见,这成为他们赞成重新武装并皈依西方的一个精神动力

阿登纳对共产主义制度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视态度。他举例说,东德由于形成了令人窒息的不自由气氛,天天有数以百计的逃亡者来到西方,并在联邦共和国寻找栖身之所。[①] 在西欧一些国家,共产党一度进入政府。在 1946 年的意大利大选中,共产党获得了 19% 的选票,并与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组成了三党联合政府,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在同年的法国大选中,共产党得票率最高,达 28%,也与天主教民主党和社会党联合组阁。[②] 后来,尽管在美国的大力干涉下,法、意共产党都被挤出了本国政府,但阿登纳还是随时防备着共产主义。另外,由于苏联军队攻入德国时违反军纪的事件时有发生,再加上从苏联、波兰等东方集团国家归来的战俘对苏军负面事件的种种描述,联邦德国人对苏联抱有强烈的反感情绪,以至于他们虽然“对所有军事问题感到反感和厌恶,但一旦指出来自共产党威胁的危险,他们便感到德国重新武装的必要性似乎是有道理的”[③]。阿登纳善于抓住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反复提到形势的严重性。他

---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3—195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48—49 页。

② Dereck W. Urw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a short political histor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1, p. 6.

③ Kurt Sontheimer.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West Germany*. London: Hutchinson & Co. Ltd, 1972, p. 170.

总是忘不了告诫人们，尽管共产党在联邦德国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但绝对不应低估共产党和东方对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和工人团体进行渗透而产生的影响。

苏联在历史上的一些行为也加深了联邦德国人对它的仇视。二战期间，苏联违背自愿原则，通过战争、最后通牒、强制订约等方式从西部邻国取得了近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联邦德国由此认为，苏联国土辽阔，必然要自动地把它的毗邻小国纳入势力范围。

同时，在阿登纳看来，苏联是一个极不守信的国家。为此，阿登纳还举例说，1925 年以来，苏联在 11 项互不侵犯条约中背弃了 10 项，其中 4 项是在二战后背弃的，在 18 次结盟中背弃了 15 次，其中 11 次是在二战后背弃的。[①]

联邦德国人不仅仇视共产主义和苏联二战中的行为及不信任苏联，而且对其战后行动也警惕在心。在阿登纳心里，西方与苏联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态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认为西方在二战后已经把兵力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并把战时生产转变为和平生产，与此相反，苏联却不断地扩建军备工业，重建庞大的武装力量，并在东德大量驻军和扶持东德建立武装力量。他由此得出结论，苏联的目的在于战争，它完全同沙皇时代一样，苏联是要向西方推进的，要在欧洲占有或征服新的地盘[②]。总之，联邦德国认为苏联是当时世界紧张局势的根源，是麻烦的制造者。

正是出于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仇视与防范，阿登纳强调，苏联式的极权国家只懂得一种决定性的因素，这就是实力，要与它就解决国际问题进行谈判并获得成功的话，即使不能比它强大，也要跟它一样强[③]。在 1952 年签订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后和 1953 年上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3 – 195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6—7 页。

② 同上，第 98 页。

③ 同上，第 438 页。

半年在美访问期间,他都表达了对苏联的类似看法,并将苏联比作希特勒德国,认为西方防务力量加强一分,苏联不搞热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一分。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前文所述的联邦德国人特别是阿登纳总理对共产主义及苏联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对联邦德国的外交安全政策产生影响。阿登纳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及对苏联的不信任,使联邦德国在当时条件下难以建立与苏联的互信合作机制;他把苏联等同希特勒纳粹政权,将之看做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使联邦德国必然制定防范苏联的政策;他信奉实力政策,使联邦德国很自然地走向重新武装道路;他对西方国家和苏联看法的巨大反差,使联邦德国参加西方防务体系也顺理成章。所有这些,都是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纳入西方防务体系的精神动力。

(二)阿登纳强烈反对中立化主张是促使联邦德国赞成重新武装并皈依西方的重要因素

早在 1945 年 10 月 31 日,阿登纳在致前杜伊斯堡市长魏兹先生的信中谈到国际形势时就指出,东、西欧截然分开是世界形势的基本事实。1949 年 3 月,阿登纳参加各国议会联盟在伯尔尼召开的会议。他在作关于德国局势的报告时再次强调这一看法,并进一步指出,世界已经形成两大国家集团,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这一集团保卫着基督教和西方文化财富、自由和真正的民主,另一方是苏联及其卫星国。

由于地处中欧,联邦德国处在阿登纳所述的生活理想完全对立的两大集团之间。因此,他认为,在两大集团之间采取一种中立态度是不现实的,如果不愿被碾碎的话,德国必须不是倒向这方,就是要倒向那方。[①] 阿登纳的这些观点清楚地表明,他反对联邦德国走中立化道路,认为在世界上已形成两大对抗集团的形势下,结盟才是唯一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 98—99 页。

的出路。

为此,他在1951年3月四大国外长召开巴黎预备会议时批驳了中立化思想。他指出,中立是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处于战争地带的国家,只有强大到能保卫自己的边境时才能保持中立,否则只有同友好国家结成防御体系。他还强调,在中立情况下,一旦东西方在欧洲爆发热战,德国就会遭受朝鲜一样的命运。[①] 显然,阿登纳不仅拒绝任何形式的中立化,而且认为中立化是会给德国带来战争灾难,因此应该予以避免。

同年上半年,阿登纳与英国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会谈时进一步表明了对中立化问题的立场。他认为,一旦德国中立,苏联人在德国的势力就会占上风,法、意共产党肯定会因此大受鼓舞,而建立一个统一的、非共产主义的西欧联盟的设想将成泡影。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问题上,阿登纳认为苏联之所以反对,其近期目标是要绝对阻止西方利用联邦共和国的战争潜力进行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长远目标则是要把联邦共和国纳入其势力范围。[②] 12月,阿登纳在访问英国期间一再表示,德国中立化对德国和整个西方来说都是巨大的危险,因为,苏联已立足于欧洲的中心,它的力量和影响将变得如此强大,会像磁石吸铁一样把削弱了的欧洲国家吸进它的势力范围中去。[③] 透过阿登纳的谈话可以看出,他反对中立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中立化会使联邦德国乃至西欧被他所仇视的苏联纳入势力范围。

由于反对中立化,阿登纳还与苏联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1952年3月10日,苏联向美、英、法三国驻莫斯科代表递交了一份照会,建议三国立即考虑对德和约问题,并要求由一个代表德国的全德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3—195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页。

② 同上,第568页。

③ 同上,第675页。

政府参加签约。苏联拟定的对德和约草案建议,实现德国统一,各占领国在和约生效一年内撤走驻军及军事基地,德国可建立仅用于防卫国土所需的军队,并有义务保证不参加旨在反对任何一个曾以自己的武装部队参与对德作战的国家的任何集团或军事联盟。① 这个照会并没有动摇阿登纳政府的立场。② 阿登纳的判断是,这一计划将使统一后的德国成为一个中立化和受监督的二等国家,而从中立化的德国的落后状况来说,无法依靠自己的武装部队来保卫国土。他指出,苏联的目的已昭然若揭,即搞长期谈判,使这一时期本来就困难重重的有关欧洲防务集团的讨论陷入僵局。因此,当西方三国声明不理会苏联照会而继续进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与德国条约谈判时,阿登纳非常欢迎。他强调,一个中立的德国要是失去了西方联盟的保护,在军事上将受到苏联的压力,在政治上将为苏联所颠覆,而且要是就苏联提出的那种一箭双雕的建议进行谈判,那就等于冒着丧失国家安全的危险而去追求镜花水月般的统一谈判。

事实上,阿登纳以上反对中立化的立场不无道理。在苏联提出德国中立化主张时,联邦德国建国不久,经济落后,国际地位低微,又几乎被剥夺了军事生产能力,因此光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保护自己。在冷战环境中,处于前沿地带的联邦德国不可能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政治真空地带,它不得不作出选择,要么重新武装并与西方结盟,要么同苏联走在一起,所有其他一切中间道路都是不现实的政治,而只能是一种冒险。然而,东方的苏联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是阿登纳所仇视的,联邦德国又是在西方国家一手扶持下建立起来的,这样,它除了参加西方防务体系外,别无选择。

(三)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联邦德国决定重新武装和参加西方防务的催化剂

---

①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cation*,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1985, p. 361.

② Charles Williams. *Adenauer*: *The Father of the New German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0, p. 377.

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北朝鲜军队的胜利进军使联邦德国居民惶恐不安，因为德国的形势同朝鲜类似，都是在东西方支持下分别建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性质不同的国家，其中前者的军事力量比后者强大。当时在民主德国驻扎的苏军有22个师，民主德国自身的警察部队在1950年达到了5万人。相比之下，在联邦德国的西方驻军只有美、英两国各两个师和一些法国部队，联邦德国各州的警察部队总共只有1万人。[①] 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德国担心朝鲜的类似情况在德国重演。[②] 他们思考着：朝鲜战争是否是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国家全球性进攻的一部分？苏联集结的大军是否会进攻联邦德国？

正当联邦德国为安全问题担心时，美国希望西欧增加常规部队特别是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以加强北约防务。对波恩来说，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对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③] 1950年6月底，联邦德国向西方三国高级专员递交备忘录，指出联邦共和国日益增加的安全需要，表示必须加强各州警察部队，建立地方基层辅助警察力量，加强税卡和铁道警察力量，而目标是建立一支联邦警察部队。对于这份备忘录，高级专员们都只是用已经发表过的声明例行公事地作了答复。阿登纳对此忧心忡忡。他坚信，苏联对德国所拟定的做法同朝鲜是一样的，在未来几个月中，苏联将在很大程度上对东德放手不管，以制造给这个政府以更多的行动自由的假象。他害怕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苏联就会把它看成是东德警察去“解放”联邦德国的好时机。[④] 联邦德国的反应表明，它已将安全问题置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97、401、408页。

② Charles Williams. *Adenauer: The Father of the New German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0, p.365.

③ Gale A. Mattox and John H. Vaughan, Jr. *Germany Through American Eyes——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Issues*, Boulder, San Francisco &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9, p.4.

④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98页。

于突出位置,并提出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要求。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宣传也增加了联邦德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心。民主德国领导人皮克和乌布利希一再声称,要"解放"西德。联邦德国将这些宣传与民主德国的军事现状联系起来,深信民主德国将发动进攻。8 月 17 日,在与高级专员举行的彼得斯贝格会议上,阿登纳将安全问题提交讨论。他要求,让联邦政府建设一支 15 万人的防卫部队,以便在东德人民警察进攻西德而盟国不能介入时,这支部队将能有效地抗击。他还提醒高级专员们注意,不应忘记,"谁占有西德及其钢铁生产,谁就有可能赢得第三次世界大战"[①]。

8 月 29 日,联邦德国政府又向盟国高级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远东局势的发展使联邦德国人民产生了不安全的感觉,担心西方在联邦德国的驻军及联邦德国薄弱的警察力量无力抵御来自苏联和东德的进攻,请求增加占领军的兵力,认为这样才能向居民显示出西方国家在危急关头保卫联邦德国的决心。备忘录还声明,假如建立一支国际西欧军,可以派遣(联邦)德国部队参加的形式对此作出贡献。[②] 从备忘录的内容可以看出,联邦德国不仅意识到国土防务力量的薄弱,流露出对安全问题的担心,而且表达了加入西方防务的迫切愿望。

1950 年晚秋,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这一事件对联邦德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民众中笼罩着恐惧气氛,他们对民主德国进攻联邦德国的担忧进一步加重了。

到 1952 年秋,朝鲜战争尽管已经进行两年之久,停战谈判也进行了一年多,但不仅看不出停战的明显迹象,而且战争正酣。另外,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如火如荼。所有这些,更加使阿登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 401 页。

② Manfred Jon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Adiplomatic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90.

纳相信,联邦共和国坚定地加入西方世界的防务体系,乃是免遭一场浩劫的唯一保证[①]。

不过,联邦德国在重新武装和参加西方防务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阿登纳及其领导的政府尽管在此问题上持坚决的赞成态度,但国内的主要反对党却表示拒绝。为此,联邦议会对此进行了激烈辩论。社会民主党人强烈反对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尤其是反对后者。在阿登纳的不懈努力下,联邦议会才最后批准这两个条约。

综上所述,正是在朝鲜战争引起东西方冷战升级为局部热战后,联邦德国由于自身所处环境与南朝鲜的相似性,对安全的担忧加重。在此情况下,联邦德国加快了重新武装和参加西方防务的步伐。联邦德国政府不仅频频向西方高级专员委员会提交备忘录,而且阿登纳等赞成重新武装的强硬派在国内与反对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才会在1953年得到联邦议会的批准。也许,如果朝鲜战争不爆发,联邦议会仍然会批准阿登纳政府重新武装及参加西方防务的要求。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两条约的批准绝对会推迟。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联邦德国才大大加快了融入西方防务的进程。

(四)重新武装对联邦德国的重要性

阿登纳政府反对中立,仇视共产主义和苏联,在不得不对两大集团作出选择的情况下,又爆发了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第一次公开对抗的朝鲜战争,因此,皈依西方是其必然选择。对联邦德国来说,皈依西方可以获得以下利益:

第一,保证联邦德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民主自由。二战后,受冷战的影响,联邦德国是循着"美、英、法三国占领区—美英双占区加法国占领区—西占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一发展轨迹建立起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3—195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4页。

来的,因此,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建立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且,它们也十分珍惜这一制度,希望站在西方国家一边,以便保护这一政治成果。关于这一点,阿登纳在回忆录中曾经写道,“对我们来说,拯救我们的政治自由、我们的个人自由、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在许多世纪中形成的以基督教人道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的唯一道路是:坚决地同一些民族和国家站在一起,只要它们对国家、个人、自由和所有制方面的观点和我们一致;我们必须坚定和顽强地抵抗继续来自东方的任何压力”①。1952 年 12 月,阿登纳在联邦议院对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进行二读时再次谈到这一问题。他指出:“正如事态的演变一样,谁否定了欧洲防务集团,谁也就否定了欧洲。谁否定欧洲,谁就是把西欧各国人民,特别是把我们德国人民拱手交给布尔什维克主义奴役。谁否定欧洲,谁就是放弃欧洲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生活方式。谁否定欧洲,谁就是德国人民的掘墓人,因为他剥夺了德国人生活下去的唯一可能性;而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富有意义和宝贵的,这是他们的自由的、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生活。”“签订这些条约事关德国的自由、德国的生存以及德国子子孙孙的前途。”“眼前我们要在奴役和自由之间作出抉择,我们选择自由。”②也就是说,在对两大阵营对抗体系中,阿登纳认为只有选择与本国意识形态相同的西方,并坚决反对东方,才能保护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第二,可以借此消除西方世界对联邦德国的猜疑,并获得它们的信任。阿登纳认为,联邦德国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消除西方各国到处存在的对德国人的不信任。为此,必须努力逐步地建立起别人对德国人的信任,而达到这一点的前提则是,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明

---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 99 页。

② 同上,第 195—196 页。

确表示皈依西方。[①] 为消除西方对联邦德国的对苏政策的担心,阿登纳特别保证,决不会执行拉巴洛式的政策。

第三,可以有效抵御东方。阿登纳认为,西方世界处于极大的危险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这个西方世界的一部分,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比其他国家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他以民主德国的现状作为佐证,指出联邦德国若与苏联结盟就会变成卫星国,变成莫斯科推行强权政治的、毫无骨气的工具。相反,只有同西方国家紧密结合起来,才能防止被苏联控制。正因为如此,阿登纳强烈要求加入欧洲防务集团。他认为,由于加入欧洲防务集团,而这个集团本身又通过与英国缔结防御联盟以及美国的安全保证和北大西洋公约联系在一起,联邦德国就为此获得可以想象的最大安全。[②] 为了让政府的提案能够顺利通过,阿登纳对那些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人进行了猛烈抨击。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1953 年 3 月 19 日,联邦议会多数票赞成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条约顺利通过了三读,并于 5 月 15 日得到联邦议院的最终批准。

第四,可以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创造重要条件。阿登纳认为,联邦共和国只有坚定地加入西方联盟体系之后,才能在重新统一政策上获得有效的支持。[③] 如果没有德国条约,(联邦)德国就要冒西方三盟国和苏俄搞幕后政治交易的重大危险。对此,他进一步阐释,德国的重新统一不是单靠自身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而要完成这件事情,只能通过原来的四盟国对此完成一致意见。在美、英、法、苏四占领国中,联邦共和国使其中的三个即西方盟国通过德国条约站到了自己一边,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④] 就联邦德国加入西方防务体系与德国统一的关系来说,阿登纳的分析具有现实性。在当时的情况下,联邦

---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 99 页。

② 同上,第 631 页。

③ 同上,第 48—49 页。

④ 同上,第 182—183 页。

德国如果不是与西方而是与苏联结盟，毫无疑问，不仅会损害二战结束以来联邦德国（建国之前为德国西部占领区）与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而且还会使它们之间的关系恶化。这样，在德国未来的统一问题上，三西方占领国可能会一致反对，从而在四占领国中形成3个反对、1个赞成（假设苏联赞成）的不利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统一不可能实现。相反，联邦德国通过参加西方防务而与西方结盟的话，就会继续赢得西方的信任和援助，并逐步为实现德国的最终统一创造条件。权衡利弊，通过重新武装并与西方结盟，既是联邦德国理想的方针，又是其现实主义的抉择。

（五）联邦德国对重新武装提出的前提条件

“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国家的根本属性。”[①]战后，德国由于被分割、占领和管制，一切对内对外事务都由盟国决定，因而毫无主权可言。联邦德国建国后尽管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联邦政府，拥有自己的根本大法——《基本法》，然而，由于受“占领法规”的限制，它仍然不能行使自己内政、外交上的自主权，因为盟国继续保留着最高权力。在一无军队和国防部，二无外交部和外交权力的情况下，德国就谈不上拥有主权。如果说有的话，那也只是“有限量的并且随时可以废除的主权”[②]。

在没有充分主权的情况下，联邦德国虽然不反对重新武装和对西方防务作出贡献，但它并不把重新武装本身看做必须达到的目的，而只是把它当做谋求安全、主权和平等的一种有效手段。

由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一开始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迫切需要，而不是联邦德国自己的强烈愿望和主动要求，这就为它同西方国家在政治上讨价还价以争取主权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关于重新武装的前提条件，阿登纳在1949年12月7—8日举行的

① 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

② Wolfram F. Hanrieder. *The Foreign Polices of West Germany, France, and Britai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Inc, 1980, p.27.

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党代会上作了直接的表述。他说,重新武装是有关政治前途的重要问题,会对自身的国际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同等的义务必须以同等的权利为前提,联邦共和国参加欧洲防务的先决条件就是与其他欧洲国家同样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争取充分的主权。

1950年8月29日,联邦德国向西方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重新调整联邦共和国与占领国的关系问题的备忘录",对西方归还主权及如何归还问题作了阐述。备忘录第二条指出,"如果德国人民必须履行由于当前形势和这种形势的特别危险性而赋予他们在欧洲共同体范畴内的义务……如果德国人必须作出各种各样的牺牲,那么通往自由的道路对德国人也应该如同对所有其他西欧国家那样畅通无阻。"至于怎样归还联邦德国的主权,第三条写道,"联邦政府认为有必要把德国与占领国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联邦政府请求盟国的外长在即将召开的纽约会议上发表大致如下声明:1. 结束盟国和德国之间的占领状态;2. 今后,占领的目的旨在防卫外来的危险;3. 将逐步签订一系列条约来调整占领国与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关系。"①备忘录是联邦德国对参加西方防务与恢复主权之间关系的具体阐述,它以外交公文的形式正式表明了参加西方防务的前提条件,归其一点,那就是与西方盟国一样享有完全的主权。

正因为要在重新武装和参加欧洲防务中争取主权,所以联邦德国政府及其民众强烈反对带有歧视性的斯波福德计划。1950年12月11日,阿登纳在与美国记者金斯帕里-史密斯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了对计划的拒绝态度。他说,只有享有完全平等的原则(特别是在武器和领导权方面),(联邦)德国才让美国最高司令部来权衡德国部队加入大西洋共同体的问题。他表示,数量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德国不坚持在大西洋军队中数量上的一致,但德国部队无论如何不能只是充当炮灰。然而,德国部队如果没有自己的重武器,就不可能有效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10页。

地进行自卫，就只会成为炮灰。他还强调，司令部里如果没有重要的代表，德国士兵就会感到自己是低人一等。同时，联邦德国舆论也提出了参与西方共同防务的两个先决条件，即联邦德国全部领土都必须纳入欧洲防务的范围，以及联邦德国军队具有平等地位，不能让本国派遣的部队比其他国家派遣的部队处于不利的条件下作战。

1951年1月9日，在拟定联邦德国参加西欧防务的“具体实施办法”的彼得斯贝格会谈中，当盟国尤其是法国要求对德国部队进行“特别”的限制时，联邦德国代表始终坚持获得平等的权力和待遇，其中特奥多·布兰克更是在会谈一开始就表示，只有盟国特别是法国接受这一要求，有关各方面才可能就德国的防务贡献开始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工作[①]。

为了争取主权，阿登纳对西方的不信任表示强烈不满。1952年2月，他在伦敦与艾登、艾奇逊和舒曼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时就此发表特别声明。声明说，“要我们就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三番五次地许下诺言，以证明我们的良好动机。我请诸位不要误会，如果我说，一个正在参加入伙的人还没有进来就得声明三次，说自己是个老实人，抱的只是良好的动机，那么这就是一个古怪的伙伴。任何人都不会不清楚，如果没有良好的愿望，声明和协定就毫无意义。如果老是盯住一个伙伴叫他必须证明自己有良好意愿，那就会使人产生一种极坏的印象。”[②]为了进一步消除西方国家对安全问题的疑虑，他还请外长们不妨看一看联邦共和国的实际情况。他说，联邦共和国目前驻有配备重武器的美国师和英国师，今后许多年也是如此，而且随后还要驻扎欧洲防务集团部队。另一方面，德国的警察没有任何武器。在作了这些近乎控诉的声明后，他还反问西方外长们，“人们干嘛要

① Major - General Edward Furdon. *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London and Basingstore: The Mac Millan Ress, Ltd, 1980, p. 107.

②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03页。

害怕赤手空拳的人呢?”①

由此可见,在重新武装及参加西方防务问题上,联邦德国并不是被动应付,而是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追求的,那就是取得充分的主权。为争得主权,它再三强调其法理依据,“同等的义务以同等的权利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联邦德国进而提出重新武装及参加西方防务的条件,即西方对它不能有任何形式和任何类型的歧视,联邦共和国在主权方面与西方国家必须完全平等。这种平等不仅包括军事上的平等,而且包括政治上的平等。在军事上,它坚决要求本国部队在武器和指挥权方面享有与西方国家完全平等的待遇,以避免充当西方国家与东方集团对抗的炮灰;在政治上,要求结束占领与管制状态,以求与其他参加该防务集团的国家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

第三节 欧洲防务集团的夭折与联邦德国加入北约

一、欧洲防务集团的夭折

在美、英等国提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将其纳入西方防务体系问题后,虽然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获得了法国的支持和联邦德国的响应,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一事并不顺利。法国尽管提出了“欧洲军计划”,但它对欧洲防务集团很不满意。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规定联邦德国部队将以1.3万人的师级编制编入欧洲军,这大大超过了法国最初的设想;英国没有加入欧洲防务集团,更进一步增加了法国对联邦德国军事力量的担忧。在法国看来,没有英国作为有力的抗衡力量,随着联邦德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它必将成为欧洲防务集团以及西欧的主宰。另外,法国还希望在限制联邦德国军队独立的同时,保持法国独立的国家军队和法兰西联邦的完整,从而保持其世界大国的地位。然而,这些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04页。

为使欧洲防务集团朝着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1953 年 2 月 11 日,法国提出了签订附加议定书的要求。在美国的推动下,法国和其他缔约国于 3 月 25 日在罗马就议定书问题达成了妥协。根据议定书,法国虽然基本上保持了国家军队和联邦的完整,但对联邦德国的安全忧虑仍然没有消除。法国的这种忧虑,又因为英国的立场而变得愈加严重。1953 年 2 月,法国就英国与欧洲防务集团的合作以及英国对欧洲大陆安全所承担的义务向英国提出一项建议:英国承担义务,无限期地在欧洲大陆维持目前水平的驻军,同时附有一项特别条款,规定在紧急情况下,英国可以撤出驻欧陆部队以应付紧急事态。然而,建议遭到了英国的拒绝。

正因为如此,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在法国遭到了强硬派的强烈反对。2 月 25 日,戴高乐将军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是建立在不真实的基础上的……它最终必遭失败"。他预言,美国部队可能从欧洲撤出,法国部队将成为(联邦)德国部队的辅助性部队;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将破坏法国军队和法兰西联邦的完整,也将阻碍一个真正的欧洲的形成。① 戴高乐此时虽然没有担任任何公职,但其崇高的威望使其主张对法国在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上的立场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3 年 10 月 29 日,法国议会通过一项决议,明确要求政府在批准条约之前,必须确保法国的利益——特别是法兰西联邦——不受到损害;同时,在英国的帮助下,建立起适当的欧洲力量均衡。②

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批准虽然在法国遇到了极大阻力,但是美、英等国态度强硬。同年 12 月中旬,北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字国就欧洲防务集团问题联合举行外长会议。英国代表在会上表示,欧洲防务集团是共同努力的目标,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可能性。美

① Major - General Edward Furdon, *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London and Basingstore: The Mac Millan Ressltd, 1980, p.211.

② Major - General Edward Furdon, *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London and Basingstore: The Mac Millan Ressltd, 1980, pp. 211, 223.

国代表则明确警告法国，如果欧洲防务集团失败的话，“将迫使美国对她的基本政策作出令人痛苦的重新评价”①。

为争取法国议会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美、英两国相继作出安全承诺。1954年4月3日，英国与欧洲防务集团临时委员会的六国全权代表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英国和六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其主要内容包括：英国将与北约组织内的欧洲防务集团军队进行相互磋商与合作；将在欧洲大陆（包括联邦德国）继续保持必要和适当的部队。16日，美国也郑重承诺，将继续在欧洲驻扎足够的军队。

但是，英、美的承诺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仍无获得迅速批准的希望。此后不久，随着法国在奠边府的惨败和约瑟夫·拉尼埃政府的垮台，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获得迅速批准的希望破灭了。

在此情况下，美、英两国紧急商讨对策。1954年6月25—2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与来访的丘吉尔首相和外交大臣艾登进行了一系列会谈。艾森豪威尔表示，即使失去法国，也不能失去德国，应该采取措施，使德国站在西方一边。最后双方秘密商定：万一条约遭到国民议会的拒绝，美、英两国就应立即使《德国条约》生效，并就德国重新武装问题与阿登纳达成一项合适的安排。② 为进一步向法国施加压力，两国于7月4日正式宣布了上述决定。

面对美、英的巨大压力，内外交困的法国新政府——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内阁提出了修约要求。对此，其他国家表示强烈反对。美国认为，法国的修约要求是无法接受的。联邦德国指责法国的修约要求对它有明显的歧视，并将阻碍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因而是完全不能接受的。③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意大利一致认为，法国的要求

---

① Major - General Edward Furdon, *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London and Basingstore: The Mac Millan Ressltd, 1980, p.231.

② FRUS, 1952—1954, vol. 5, pp. 986—989.

③ FRUS, 1952—1954, vol. 5, p. 971.

自相矛盾、混乱不堪，并且对德国充满歧视，蛮横傲慢。[①] 法国的修约要求和盟国的反应表明，它们在欧洲防务集团上的分歧没有克服。

尽管如此，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字国还是于8月19—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条约的批准问题。在会上，法国代表正式提出了修约要求，孟戴斯－弗朗斯总理以德国条约第7条为依据，接连几天强调，一旦德国统一，每个条约参加国都应有权退出防务集团。法国的要求遭到了其他五国的一致反对。8月29日，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欧洲防务集团就此夭折。

二、联邦德国加入北约

欧洲防务集团虽然夭折了，但美、英等国并没有放弃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将它纳入西方防务体系的努力，它们积极寻求可行性替代方案。

其实，美、英两国的这一努力在欧洲防务集团夭折之前就已经暗中进行了。1952年8月28日，美国新任驻联邦德国高级专员沃尔特·多纳利致电国务院（即第887号电报），认为联邦德国已显示出强大活力，法德之间的力量对比日益变得不利于法国。[②] 出于这一考虑，美国开始寻找万一条约失败的替代方案。12月，国务院负责德国事务的官员莱昂·富勒提出了一份题为《一旦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和德国条约遭到失败，美国应采取的政策》的报告。报告强调法德两国掌握着最终批准条约的钥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同时提出了条约失败情况下的几种可能的替代方案：1. 联邦德国加入北约；2. 联邦德国与北约以某种方式更紧密地联系起来；3. 联邦德国独立地重新武装；4. 联邦德国以某种方式对西方防务作出非军事性贡献；5. 退而实行“外围战略”，即只守住从挪威经英国、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一线。[③]

为讨论替代方案，1953年1月28日，美国国务院与军方举行了一

① FRUS, 1952—1954, vol. 5, p. 1042.

② FRUS, 1952—1954, vol. 5, p. 693.

③ FRUS, 1952—1954, vol. 5, pp. 693—694.

次重要会谈。军方表示，如果欧洲防务集团计划不能实施，军方倾向于使德国全面加入北约；[①]国务院则认为，要使条约得到批准，必须拥有某种替代方案。[②] 由于存在明显的分歧，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半年后的8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对德政策和欧洲防务集团的替代方案再次进行讨论，并通过了一份"政策性文件"。文件建议，如果事态的发展表明，欧洲防务集团已不可能实现或者无限期地推迟，(联邦)德国就应该加入北约。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法国不大可能同意这种安排。文件得出结论，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案。[③] 从文件的内容来看，美国已有实施北约替代方案的打算，只是考虑到法国的态度才没有坚持和推行。

同年12月14日，由于法国在欧洲防务集团上的僵硬态度，杜勒斯在北约理事会上指出，忽视联邦德国对西方防务贡献的重要性是愚蠢的。他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如果与我们的希望和信念相反，欧洲防务集团最终失败，这将迫使美国对其外交政策作出痛苦的重新估价。"[④]这表明，美国将继续寻求欧洲防务集团可能夭折情况下的替代方案。

7月3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有关德国问题的决议，要求美国政府在欧洲防务集团受挫时为联邦德国恢复主权及承担防务贡献采取必要的措施。

当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后，美国立即作出强烈反应。1954年8月31日，杜勒斯指出，法国背弃了过去所提的建议，是一次"不幸事件"。他声称，法国的行动改变不了某些基于原则的、铁一般的事实，那就是欧洲大陆的有效防务要求(联邦)德国作出重要的军事贡献，不能判处(联邦)德国永久中立，另一方面，也不

---

① FRUS, 1952—1954, vol. 5, p. 711.

② FRUS, 1952—1954, vol. 5, p. 717.

③ FRUS, 1952—1954, vol. 5, pp. 799 - 800.

④ FRUS, 1952—1954, vol. 5, p. 469.

得对它的主权,包括属于它的单独和集体自卫权利,加以歧视。他强调,"西方国家有责任尽快地尽一切力量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主权,并且让它有机会对国际和平和国际安全作出贡献"。他最后建议,由于欧洲防务集团垮台产生了一种非常的局势,应立即召开北约理事会特别会议,并同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举行商谈,以采取相应的行动。另外,杜勒斯还再次发出威胁说,如果不能打破僵局,美国将十分痛心地重新评估对北约承担的义务。[①] 美国的反应对法国震动极大,特别是其威胁更使法国深感不安。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国对法国进行了大量军援。从1950年6月至1954年5月奠边府沦陷,军援总额达26亿美元,占法国在印度支那军费的比例最高年份高达70%。[②] 可以说,没有这些援助,法国所进行的战争将更艰难,所付出的代价将更大。

除了上述努力,美国还积极争取联邦德国的支持,并与之商讨对策。在欧洲防务集团还没有夭折之前的8月16日,杜勒斯访问联邦德国,与阿登纳商讨了如何使联邦德国恢复主权并作为平等伙伴加入"自由各国人民的大家庭"的问题。杜勒斯表示,不能让联邦德国靠向东方,同样也不能出现一种新的"超国家主义",因为人们不愿意看到一支摇摆于东西方之间的德国国家主义军队。

与此同时,英国也在进行寻求替代方案的各种努力。1952年12月16日,艾登在与杜勒斯会谈时说,对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能否获得通过还须抱怀疑态度。因此,他一直考虑在北约组织内部控制联邦德国的问题。针对美国国务院富勒的报告,他表示,在北约内实现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方法比外围战略更好。他还要求对这种想法保密,不能向法国人暗示,欧洲防务集团还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代替品。[③]

①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Eleventh Edition, 1988, p. 52.

② 方连庆等:《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③ 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78页。

1954年6月3日，鉴于法国议会不批准条约的可能行为将在联邦德国造成严重后果，英国秘密通知美国，它正在就替代方案进行研究，初步考虑是修改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建立某种兼有欧洲防务集团与北约组织特征的安全组织。[①] 英国的举措表明，它寻求替代方案的行动在秘密、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欧洲防务集团夭折的第五天，英国高级专员弗雷德里克·霍耶·密勒把丘吉尔的亲笔信交给阿登纳，并表明英国政府的立场。他说，英国政府考虑了两种选择：或者是联邦德国加入北约，或者是一种松散形式的欧洲防务集团，它不具有超国家的性质，而能保持与英联邦的联系，但前一种解决办法更好，因为北约已作为一个组织存在了。他表示，如果联邦德国加入北约，那么既不容许歧视它，又不容许出现不受监督的联邦德国国家军队，因为那是许多国家的公众舆论所不能接受的，认为可以把欧洲防务集团范围内一致同意的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所规定的一些限制也同样运用到北约中。他也谈到，几个月来，有一个英美工作组在伦敦从事工作，拟定一项在欧洲防务集团万一失败时的变通方案。

到9月5日，艾登"突然想起"可以利用布鲁塞尔条约把联邦德国纳入西欧防务。他认为，该条约就能变成一个洛迦诺式共同防御公约，而且欧洲防务集团的超国家特点将消失，联合王国也就可以成为正式成员，它的新面貌可以使它成为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中那些憧憬欧洲统一的人们向往的中心。艾登还表示，在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就应该要求英国增加对欧洲大陆的军事贡献的想法在英国是不受欢迎的，如果在复活的西欧联盟范围内这样做，就较为容易地让人接受。[②] 这样，就形成了艾登方案。

艾登方案的核心是"北约—布鲁塞尔"双重结构，即将联邦德国

① FRUS, 1952—1954, vol. 5, p. 970.

②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06—207页。

同时纳入北约和布鲁塞尔条约组织，以保证对它进行军事监督。为阐述和推行这一方案，从1954年9月11日开始，艾登遍访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字国。12—13日，他在联邦德国与阿登纳交换了看法，并特别倡议不歧视原则是实现这个计划的准则。[1] 15日，他在与孟戴斯－弗朗斯会谈时指出，法国如果否定该方案，就会把联邦德国赶入苏联的怀抱，把美国赶回“美国堡垒”。

对于艾登方案，美国起初不甚满意，但经过英国的详细解释后，美国也认识到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在美、英的双重压力下，法国也同意联邦德国恢复主权并加入北约。不过，它同时要求，必须使扩大后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足以限制联邦德国的军事自由并防止它再次发动侵略。1954年9月，法国政府向联邦德国和英国递交备忘录。在备忘录里，法国政府表达了以下观点：联邦德国必须保证，除了提供给北约组织最高司令部支配的武装部队之外，不保存其他武装部队；联邦德国必须发表一项特别声明承担义务，在处理领土问题——如奥得－尼斯、重新统一——时不使用武力。一旦违反了这个诺言，其后果将是在紧要关头失去保障和取消任何援助；英国必须全面地参加布鲁塞尔条约体系；英美必须作出保证，不将驻欧洲大陆的军事力量撤到某种最低限度之下。[2]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也同意对重新武装作出自愿限制，西欧盟国也接受了英国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向欧洲防务集团签字国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发出邀请，要它们9月28日参加伦敦会议。

接到邀请后，联邦德国积极准备与会。为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目的，联邦德国于9月23日向伦敦会议的参加国分发了备忘录。备忘录表示，联邦德国准备同时加入北约和修订后的布鲁塞尔条约，将防务贡献限制在修订后的布鲁塞尔条约规定的范围内，希望北约继续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3—195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4页。

② 同上，第363—364页。

发展军事一体化组织，建议美、英、法三国重申对联邦共和国的安全保证，同时结束对德占领状态，签订驻军协定，删除德国条约中的紧急状态条款。①

从备忘录的内容可以看出，联邦德国虽然赞成加入北约，但同时在积极争取主权。为此，它特别要求在实现重新武装时不能有任何歧视，要求结束美、英、法三国对它的占领状态，并通过签订条约来驻扎盟国部队。备忘录受到了美国的欢迎。

上述情况表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将其纳入西方防务体系一事出现了重大转机。在艾登的积极斡旋下，1954 年 9 月 28 日—10 月 3 日，美、英、法、德、意、比、荷、卢、加九国外长在伦敦举行会议。艾登以会议主席身份呼吁，在不歧视联邦共和国的情况下，确定联邦德国参加防务贡献的方式和规模的必要措施，这些措施可以全部纳入北约范围，或是全部或部分地纳入布鲁塞尔条约范围。② 杜勒斯在会上重申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将其纳入北约的决心，同时再三强调将在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欧地区留驻部队。阿登纳为了使西方满足其要求并打消西方和邻国对它的担心，特地在会议上声明，不在领土内制造任何原子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即 ABC 武器）以及长射程火箭、导弹、感应水雷、军舰和战略轰炸机，决不以武力来实现重新统一或改变目前疆界，保证以和平方法解决与其他国家的争端。③ 这些声明终于使法国消除了安全顾虑。在这些相互谅解、妥协和合作的基础上，伦敦会议终于通过了最后决议书，声明尽快结束联邦德国的占领状态并取消占领法规，要求联邦德国加入北约。

根据伦敦会议达成的原则协议，西方国家 1954 年 10 月 21 日—

---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3—195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368—371 页。

② 同上，第 381 页。

③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1985, pp. 419—424.

23日在巴黎举行了一系列会议，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和协定。其内容主要包括：美、英、法结束对联邦德国的占领和撤消有关机构，三国所保留的权利将由使节予以行使；联邦德国行使主权国家内政外交的完全权利；三国军队留驻联邦德国，但非经联邦德国允许，不得增加驻军数量；在布鲁塞尔条约的基础上建立西欧联盟，并吸收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参加，删去原条约中一切有关防止德国重新侵略的条款；和平时期，英国在欧洲大陆驻军为4个师和第二战术空军，其余西欧联盟成员国的军队人数以1952年签订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规定为准，即法国为14个师，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各12个师，荷兰和比利时共5个师，卢森堡为1个团。各国如要扩充兵力，须经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联邦德国建立一支50万人的军队，并加入北约；联邦德国不得在其境内制造ABC武器及其他一些规定的武器。[①]

巴黎会议签订的这些文件，连同伦敦会议达成的最后决议书，被统称为《伦敦—巴黎协定》。1955年5月5日，协定正式生效，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

第四节 小结

联邦德国加入北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种复杂性又使得它成为北约成员时在联盟体系内的地位和作用也具有复杂性。

联邦德国建国时，背负着战败国的历史负担，丧失了大量主权，特别是国防权和外交权。在军事上，它不仅被解除了武装，而且还被禁止重新武装，其安全完全由西方占领国的驻军负责；在外交上，建国时的外交权基本上被盟国高级委员会控制。1951年后，它虽然建立了外交部，但实际权力不大，重大外交决策还是由盟国高级委员会决定。不

①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1985, pp. 425—437.

过，西方占领国虽然出于安全考虑而抑制德国，但同时也在经济、政治上逐渐扶持它的发展。就在西方执行矛盾政策的过程中，冷战爆发。美、英等西方国家为了在冷战中保持与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均衡甚至优势，需要增强联盟军事力量。基于此，它们开始酝酿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大大增加了，甚至认为这次战争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北约头号强国美国开始大规模扩充军备，并希望西欧盟国提高对西方防务的贡献。然而，西欧薄弱的军事力量不得不使美国另寻对策。由于联邦德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巨大潜力，美国与其盟国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联邦德国政府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一开始表示反对，后来虽然赞成，但主张以恢复主权为前提。正是由于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问题不仅是由美、英首先提出来的，而且这一问题对西方来说又具有现实的紧迫性，这就为联邦德国争取主权并提高其在将要加入的西方联盟体系中的地位提供了便利条件。

另外，在西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过程中，苏联始终反对。在抵制不成的情况下，苏联提出了让重新武装后的德国保持中立的方针。西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要将其纳入联盟体系。东西方的这种斗争态势凸显了联邦德国在冷战中所具有和将会具有的战略性地位和作用。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有助于联邦德国争取主权，有助于提高其日后在西方体系中的地位。

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善于捕捉时机。他巧妙而充分地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提高谈判砝码，特别是要求“同等的义务”要以“同等的权利”为前提，即要争取与在体系内的平等权。为尽快实现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以便为西方防务作贡献，美英等国不得不尽量满足它的要求。正因为如此，联邦德国加入北约是在终止占领制度的基础上、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完成的。这就不仅在形式上体现了平等原则，而且为联邦德国日后行使真正完全的主权提供了法理依据。另外，盟国虽然保留了在联邦德国驻军的权力，但与此前不同的是，如要增加驻军数量，须经联邦德国允许，这是联邦德国在西方体系内地位提高的

一个重要表现。

与此同时，由于二战因素，西方对联邦德国具有防范心理，这使得西方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同时又约束其发展。在这方面，法国的表现尤其突出。法国与德国是世仇，又是遭受二战破坏最严重的西方国家，因此，它一开始就反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在美、英的强大压力下，法国后来尽管勉强同意，但它力图限制联邦德国的军备规模，并保持自己对它的军事优势。所以，《伦敦—巴黎协定》虽然规定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行使完全主权，但实际上是有种种限制的。首先，美、英、法保留原来行使或持有的有关柏林和德国全境的权利和责任，包括德国的重新统一和缔结和约在内；其次，三国驻军权力仍然保留；再次，协定要求联邦德国保证不在领土内制造 ABC 武器及其他若干武器，军队规模不超过 12 个师、50 万人；最后，由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有权指挥辖区的所有部队及控制其教育和训练，因此，联邦德国即使拥有一支军队，这支军队也不能自主活动，它只能被纳入北约盟军的配备中。上述情况表明，联邦德国在加入北约时与其他成员国处于实际上的不平等地位。

至于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对其在联盟内作用的影响，可从两个角度来考察。

从联盟体系来说，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联邦德国加入北约是西方在冷战中的重大胜利，因为这一事件提高了西方因在两大阵营第一次公开军事较量的朝鲜战争中遭受挫折而低落的士气，壮大了声威。

第二，联邦德国人口众多，又是欧洲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西方国家，所以它加入北约后，北约的总体实力特别是在东西方对抗的中心——欧洲大陆的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第三，北约吸收联邦德国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西方力量整合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使法德走向实质上的和解，而且协调了美、英、法等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利益，从而有利于西方减少内耗，增强凝聚力。

第四，联邦德国处在与东方对抗的西方前沿，它加入北约后，增

强了北约抗衡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实力，并使北约防御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纵深得以扩大。

第五，由于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前是北约成员国的敌对国家，它作为形式上法律地位平等的成员加入北约，为北约日后进行类似情况的扩充开创了先例，有利于北约抗衡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进一步增强。[1]

从联邦德国自身来说，虽然《伦敦—巴黎协定》的限制条款使它在入约时就与盟国处于实际上的不平等地位，从而影响它在北约中发挥与其潜力相称的作用，并进而影响它将来在北约中的地位，但是，用发展的观点来考察，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将使其在西方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更为重要。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将对其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协定生效后，阿登纳认为，协定是联邦德国的一个严肃义务，是符合德国历史的意向的。因此，阿登纳政府特别强调，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并履行联盟的义务。从此，阿登纳坚定了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而阿登纳和杜勒斯一样，是实力政策的追随者，他相信只有从实力地位出发才能对付苏联人，才能使苏联在某一天放弃"苏占区"（东德）。[2] "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和实力政策结合后，联邦德国在北约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会进一步提高。一方面，为巩固与西方盟国的关系，它会努力在条约范围内增强实力，来履行对北约的"严肃义务"，以便为西方的防务作出更大的贡献。这种贡献越大，其在北约中的作用就越大，地位也就越高；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最终统一，联邦德国需要增强实力，以便未来增强与苏联在东德问题上的谈判地位，这样也会增强它在北约中的作用和提高其地位。

---

① Heinrich von Brentano. *Germany and Europe: Reflections on Germany Foreign Policy.* London: Andre Deutsch Limited, 1964, p.182.

② Kurt Sontheimer.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West Germany.* London: Hutchinson & Co. Ltd, 1972, p.179.

第二章

联邦德国与北约核力量建设

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轴心是硬权力。[①] 其中,核威慑力是硬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志。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由于与华约(苏联)在常规力量的对比中处于劣势,北约决定用核武器来弥补这一不足。在美国成功制造出战术核武器后,北约从 1954 年开始正式提出用原子武器装备联盟的问题,将核力量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苏联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在北约领导人特别是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和美国的推动下,北约酝酿建立"多边核力量"的计划,并最终在 1963 年的渥太华会议上形成了具体决议。"多边核力量计划"的主旨是,在美国的帮助下,用核武器装备成员国(主要是欧洲成员国)军队,交给北约组织统一指挥。这一计划一旦实现,就势必影响北约成员国在联盟乃至国际体系中的硬权力分配。正因为如此,北约国家特别是主要成员国围绕计划进行了激烈争斗。在此过程中,由于联邦德国积极

①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92 页。

谋求核装备，争斗的焦点又逐渐集中到联邦德国身上。最后，计划流产，而代之以核计划小组。从此以后，北约共同核力量建设问题销声匿迹。本章即以"多边核力量计划"的酝酿、流产和计划小组的成立为个案，探讨联邦德国在北约共同核力量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节 北约"多边核力量计划"的酝酿

1952年，北约理事会里斯本会议作出决议，决定在欧洲建立90个常规师，核力量则寄希望于美国的战略部队。然而，到1953年，北约各国的表现表明，里斯本会议提出的地面部队建设目标明显是不现实的。北约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由此认为，西方在东西方常规力量对比中的巨大劣势可能是一种长期状态。在此情况下，要与东方抗衡的话，西方显然需要另寻出路。

恰在这时，美国成功地将原子弹"微型化"，造出了可以消灭敌军而不使整个地区变成废墟的"战术"核武器。美国在核武器上的进步给西方带来了希望，他们决心加强北约的核力量建设。

到1954年，北约军事领导人要求在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①]这年4月，北约理事会提出用原子武器装备北大西洋联盟的问题。同年10月，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阿尔弗罗德·格仑瑟将军(1953—1956)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决定，我们在中欧的战略要求使用原子武器，而不管敌方使用与否，我们必须用原子弹弥补敌我之间的不均衡，以取得胜利。"[②]这表明，北约的核力量建设问题已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1955年开始，西方联盟内部广泛讨论战术核武器问题，许多

---

① Carl H. Amme. *NATO Strategy and Nuclear Defense*. New York,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Inc, 1988, p.27.

② Alfred Grosser. *The Western Alliance: European – 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45*.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0, p.166.

人主张给联邦德国国防军在内的北约部队装备战术核武器。[1] 1955年12月,美国代表在北约理事会上公开宣布,在最近几年内为北约盟国提供战术火箭武器,即既能运载普通弹头又能运载核弹头的武器,包括"诚实约翰"非控制导弹、"斗牛士式"火箭和"奈克式"防空火箭,用来装备北约成员国军队,其中包括联邦德国国防军。此后,短程战术核武器的进步和生产中程弹道导弹的明朗前景为欧洲的核防卫提供了新的可能。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1956—1963)提出并大力宣传两项重要的核建议:其一是在欧洲建立美国的核武器储备以提供弹头,使更多的欧洲国家拥有更多形式的原子武器的投射能力;其二是发展北约的弹道导弹,以抗衡苏联导弹对欧洲的威胁。

1957年3月中旬,诺斯塔德访问联邦德国,并与其总理阿登纳、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进行了秘密会谈。21日,他在波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希望北约欧洲成员国军队在和平时期受到热核战争的战术和技术训练……用运载核武器的手段和战术经验来武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参加国一事能够在美国现行法律范围内进行。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还示意,联邦德国力求获得核武器的愿望一旦提出,就会得到他的支持。[2] 诺斯塔德是北约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又是掌握着先进核武器的美国的将军,他在北约核力量建设问题上的态度对北约的核力量建设进程影响极大。

4—5月期间,北约军事委员会华盛顿会议提出了一个MC70计划纲领。纲领规定,在1958—1963年期间,北约将在中欧配备30个师,并为所有这些师和北约的空军配备战术核武器。按照这个计划,联邦国防军每个师应配备1个"诚实约翰"导弹营,每个军配备1—2

① *NATO Letter*, December, 1956, p.37.

②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73.

个"中士导弹"营。[1] 这样,北约开始就核力量的建设问题谋划具体方案。

北约的决议得到了美国的支持。7 月初,国务卿杜勒斯透露,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考虑一个在欧洲贮存核武器的计划(实际上已作出决定和执行)。美国政府在北约核力量建设上的举措引起了国内舆论的质疑。对此,艾森豪威尔进行了辩护。在 7 月 17 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如果我们的目的之一是防止扩散核武器……那么贮存核武器而使其他十五国拥有核武器的理由是什么?"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如果欧洲人受到核武器攻击,他们应该有权、有可能和有能力进行同样的反击,另外,如果欧洲人从美国得到已经可供使用的核武器,他们就不要浪费资源去制造他们自己的核武器,从而造成一种各自独立行动的十分危险的形势。他还强调,无论计划如何,只要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是美国人,美国对使用核武器就有最后的决定权。

10 月 4 日,苏联在世界上首次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这不仅表明美国失去了核火箭优势,其宣扬的大洋彼岸"不易受攻击"乃至"坚不可摧"的神话遭到破灭,而且表明苏联在发展洲际导弹方面已走在美国人前面,一旦发生战争,美国领土也会像北约其他国家的领土一样遭殃,这已经成为非常清楚的事情了。前空军部长芬勒特在谈到苏联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时写道,"1957 年秋季发射的两颗俄国卫星开辟了战后历史的新时代……我不知道从 1917 年俄国革命以来有任何事情能够这样恶化……我国的实力地位。"[2]美国政论家苏兹贝格在谈到西方战略计划失败时明确指出,"看来,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我们和我们的原则都遭到了失败……现在,我们好像处在一片昏暗的森林中,不知道如何走出去。"[3]基辛格也承认:"现代军事装备

---

①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1957, January 5, April 17, 1958.

② T. Finletter. *Foreign Policy: the next Phase*, New York, 1958, pp. 1—23.

③ C. Sulzberger. *What's Wrong with U. 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59, p. 101.

的威力和速度结束了我们传统的不易受攻击的观点，而实力在地球上的极化则减少了我们传统的安全保留地。”[①]他还坦言，“在我们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处于受敌人直接攻击的境地。”[②]由于苏联人造卫星的升空恶化了美国的安全形势，杜勒斯于11月宣布，将在北约欧洲国家内建立核导弹基地。显然，美国计划的目的是要使现有的导弹——核武器更加接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以便弥补自己在制造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的落后状态。

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组织就建设共同核力量问题加紧协商。1957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上，当讨论禁止核试验问题时，参加会议的英、法两国领导人虽然出于发展自己核武器的目的而坚决反对禁止核试验，但他们都同意，当美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可用于作战时，可在他们的领土上部署这种导弹。在此基础上，会议达成共识并作出决议：建立核弹头储备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有效保卫联盟。[③] 此外，决议还规定，中程导弹的弹头应当交给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支配。[④] 与此同时，杜勒斯国务卿在12月16日的外长理事会上提出，愿向北约成员国提供中程导弹和发射基地以建立北约的原子武库，从而给这一纲领性要求注入了现实内容。在这种储备体制下，美国保管的原子装备要在北约防御计划和直接参加国的同意下提供使用。万一发生敌对行动时，就把原子装备放手交给相应的北约最高司令，再由他交给适合使用原子武器的北约部队加以使用。

在北约作出上述决定后不久，美国进行了导弹差距的辩论，大肆渲染西方防务的不足之处。同时，东西方冷战形势严峻，赫鲁晓夫就德国和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牒。因此，北约欧洲国家害怕美国核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撤离欧洲，认为削弱美国战略武器所提供的威慑力

① H. A.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57, p. 9.

② H. A.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57, p. 84.

③ Uni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reau of Public Affairs Public Service Division. *NATO: 1949—1959——the First Ten Years*,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p. 15.

④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Washington, January 6, p. 14.

量就会增加在欧洲发生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在恐惧的驱使下，欧洲人力求在核武器问题上取得更重要的地位，力求在某些情况下拥有本国或欧洲的核武器。为了抵消这种要求及其背后的恐惧，美国决定在不放弃其控制权的条件下，尽量让盟国更多地染指核政策和核决定权。

1958 年，美、英两国签订关于在英国领土上建立核导弹基地的协定。协定规定，美国向英国提供商定数量的中程导弹以及有关的专门设备，并且给予必要的帮助，以使英国人能够很快掌握美国的导弹。同时，协定还规定，提供给英国的美国导弹上的核弹头应完全由美国掌握，归美国保管和监督。

北约国家在建设共同核力量方面虽然达成了前文所述的一些共识，并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但此后两年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针对这种状况，北约秘书长保罗·亨利·斯巴克(1957—1961)、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诺斯塔德、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和荷兰驻北约大使迪尔克·斯蒂克于 1960 年 9 月 9 日在斯蒂克的别墅里举行了一次会议。诺斯塔德建议，建立一支北约中程导弹力量，并由北约理事会监督，以便把北约变成“第四核力量”。[①]经过讨论，这个方案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赞同。

对于诺斯塔德的建议，北约各国政府的反应不一。英国由于一心保持其“核俱乐部”中有实力的成员地位，对此是不热心的。早在 5 月 30 日，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1957—1963)就以“可靠性问题”为由，对这个建议泼了一盆冷水。他在下院辩论中说，“扣动扳机也许只需要一个手指头，但是现在会有十五个手指头放在扳机上”[②]。1960 年 11 月 4 日，国防大臣哈罗德·沃特金森(1959—1962)说，“把核武器重担全部抛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们并没有摆脱我们的

① Cf. *Adenauer's account in Erinnerungen*, 1959—1963, pp. 71—72;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1960.

② *H. C. Deb.*, Column 1003, Vol. 624.

责任”,北约组织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国家,它没有自己的军队和武器,如果它需要核武器,那只能依靠一个或几个成员国来供应。他还声明,“威慑力量的作用在于威慑。要是发表的规章看来限制很严格,要在扳机上按十五个手指头,那还算什么威慑力量呢?坦率地讲,我不能答复这个问题;但我认为,下院在这些讨论中必须记住这个问题。”[①]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对于诺斯塔德的建议基本上持反对态度。

法国一心谋求大国地位,戴高乐曾在回忆录中说过,“法国如果不是站在前列就不成其为法国”。[②]为此,法国积极研制原子弹。1960年2月13日,当法国在撒哈拉沙漠的试验基地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戴高乐总统向负责试验的部长发去贺电,宣称“法兰西万岁!从今天早晨起,法兰西是更加强大了,更加值得自豪了。”7月中旬,法国政府提出的一个法案规定,在1960—1964年的五年内,拨款约120亿新法郎以建立一支核打击力量,并使武装部队的几个部门实现现代化。其中,50亿款项准备用在核武器(包括氢弹)与弹道导弹方面的研究和试制项目上。在拨给空军的45亿款项中,相当一部分准备花费在制造50架能够运载原子弹的飞机上。10月7日,戴高乐在演说中声明,“万一不幸,世界上发射了原子弹,我们法国务求从自由世界发射的原子弹没有一颗是未得它的同意而发射的,没有一颗是未经它的明确决定而从它的领土上发射的。”10月下旬,国民议会通过了建立核打击力量的法案。总之,由于法国将获得核武器作为获得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并且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才好不容易挤进“核俱乐部”的,所以它更加不欢迎有关建立“第四核力量”的建议。

尽管英、法对北约的共同核力量建设不热心甚至反对,但北约领导人还是极力推动。1960年11月21日,在巴黎召开的北约组织议

① (英)G·巴勒克拉夫:《国际事务概览》(1959 - 1960),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

② Charles de Gaulle. *The Call to Honour*, London,1955, p.9.

员会议上，诺斯塔德将军在一篇关于联盟军事情况的演说中详尽地介绍了他的建议。他说，应当给予考虑的是，要保证联盟能够获得原子武器的基本库存，获得这种对保护欧洲必不可少的武器，并给联盟各国在控制这些特殊武器方面以必要的平等发言权。对此建议，虽然英国代表团表示强烈反对，但斯巴克秘书长全力支持。11 月 26 日，他从美国访问回来后就在即将结束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斯巴克表示，他毫不犹豫地强烈支持这个赋予大西洋联盟以核力量的总设想。[①] 然而，由于各方分歧较大，会议还是没有就诺斯塔德将军的建议达成一项具体的决议。

为进一步讨论北约的核力量建设问题，几天之后，西欧联盟也在巴黎召开会议。会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创立一支北约核力量，并敦促北约理事会制订一些大家都同意的程序，让理事会的所有会员国以完全平等的地位加以决定，这些程序将保证对核武器的政治控制权。表面看来，西欧联盟的这项决议使北约共同核力量建设出现了转机，实际上仍然希望渺茫。因为，英国代表团与上次北约巴黎会议的态度一样，又一次对北约共同核力量建设表示反对。

与英、法两国不同，美国对诺斯塔德的建议表现出热情。由于担心英、法等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和对联邦德国核野心的忧虑，国务院针对诺斯塔德的建议起草了一个后来称之为多边核力量的报告草案。按照草案，这支核力量 1960 年的表现形式为，以北约中美国的舰只为基础，建立一支北极星潜艇部队；在此之后，如果欧洲对它有兴趣，这支拟议中的核力量将由至少三个国家长期提供人员。

1960 年 12 月 16 日，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在北约理事会上正式提出了建立这支多边核力量的构想。赫脱构想的核心是，美国同意在 1963 年以前向北约转让 5 艘各装备 16 枚“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以及向盟国出售 100～120 枚安装在海面舰只上的北极星导弹。赫脱还建议，在北约组织内，建立一个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

① *NATO Letter*, January, 1961, p. 3.

国乃至加拿大代表组成的领导小组。小组将拥有广泛的职权,其中包括共同规划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核战争。[1] 与诺斯塔德的建议相比,赫脱构想主要是从海上力量角度建设北约多边核力量,而且构想在北约核武器的监督问题上比诺斯塔德谨慎得多,但他们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即要建立北约的共同核力量。

对于赫脱的建议,大多数代表是小心谨慎的,其中,英国代表团表示,联盟必须首先决定基本战略,然后才去考虑需要用什么武器来实行这个战略。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和国防大臣沃金森还先后发言,强烈主张对北约组织的战略进行一次审查。这就表明,英国并没有就此采取积极的立场。与之不同的是,联邦德国代表团对建议表示了最大热情的支持。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 12 月 17 日的发言中指出,美国的建议是对联盟的一个新的推动力,是一个加强相互信赖的因素,是一个新的鼓舞,是向前迈进的、令人鼓舞的巨大步伐。他认为,联盟应尽快作出具体的决定。他还说,联邦政府认为,可靠方案应在最近几个月制定,并在 1961 年春提交政府首脑批准。[2]

由于上述分歧,会议没有达成具体协议。会议最后发表的公报说,理事会以极大的兴趣注意到美国的建议,并指示成员国常驻代表详细研究这个建议及与之有关的问题;北约组织必须能够用任何适当的力量来回击任何进攻,并在联盟的核力量和常规部队之间必须有适当的平衡,以提供必要的灵活性。[3]

尽管如此,但为了弥补洲际导弹方面的不足,美国在 1960 年底制定的 MC96 指令性计划草案中规定,到 1963 年底,美国向欧洲盟友提供 100 枚以上射程为 2000 公里的“北极星”中程导弹。这些导弹不仅用来装备潜艇,而且部署到西欧大陆的各个火力点上,联邦德

①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p. 142.

② (英)G·巴勒克拉夫:《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74—175 页。

③ *NATO Letter*, January, 1961, p. 13.

国国防军也将分配到一部分这种导弹。

另外，肯尼迪总统上台时虽然反对核力量扩散，但同意国务院和法国让·莫内的观点，即宣布联邦德国在欧洲国家中具有平等地位是重要的。因此，他相信，应该对国务院所制定的政策给予广泛而有条件的支持。1961 年 5 月 12 日，肯尼迪的战略特别顾问亨利·A·基辛格在波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同意盟友在使用战术原子武器上拥有发言权。五天之后，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发表演讲时具体提出，愿意和其他成员国共同拟订适当的办法，建立一支北约组织的核力量，并对其实行严密、灵活的控制，以适合北约组织所有国家的需要。① 为此，他宣布，“美国将向北约提供 5 艘——以后还会更多——北极星原子导弹潜艇。它们属于防御性武器，服务于北约的指导方针，由它控制和使用。”不仅如此，他还希望最终建立一支北约的海上力量，确实由多国所有，多国控制。②

然而，法国仍然拒绝加入多边核力量和接受美国提供的‘北极星’导弹。1962 年 1 月 29 日，戴高乐在讲话中虽然赞扬美国用核武器保护欧洲为世界自由作出了贡献，但他又推论，古巴导弹危机已经表明，在涉及根本利益的核对抗中，美国是不会与其盟国商量的，所以，法国必须坚持建立自己的原子打击力量的计划，即使这个力量比世界上现有的打击力量要小，这支力量仍然有其威慑作用。他强调，至于多边核力量，假定法国在危机中有权撤回它的兵力，其程序也很复杂，很费时间，这样一来在需要采取行动时引起瘫痪。由于种种原因，提供“北极星”导弹是不实际的。法国因为缺乏发射用的潜艇和核弹头，“北极星”导弹对它毫无用处；当法国有了这些东西时，“北极星”导弹又过时了。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戴高乐表示，法国绝不

①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4—67.

②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John F. Kennedy, 1961). Washington : the Office of the Federal Register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 General Services Adminstration, 1962, p. 385.

反对超级大国停止核试验。如果库存的核武器被销毁的时刻真的到来，法国将高兴地参加这一行动，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谁也不能阻挡它获得自己的核武器。①

与此同时，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的有经验的海军军官，都对由多国人员混编操纵核潜艇的想法感到十分吃惊。他们强调，操纵像装备弹道导弹的潜艇这样复杂的武器系统，要求经过高水平的训练和具有精确的操纵水平，试图让所受教育和训练完全不同并且操不同语言的舰员来操纵这样一种潜艇是愚蠢的。他们的反应使美国的建议遭遇困境。

为推动建立北约共同核力量进程，1962 年 11 月，美国决定取消由美英两国联合研制"蓝光"导弹的计划。"蓝光"导弹是一种现代化的运载系统，对于要建立独立的核力量的英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计划的取消意味着，英国或者由于缺乏适当的运载系统而不得不放弃建立独立核力量的计划，或者自己以昂贵的代价来研制这种导弹。显然，美国是想以此逼英国支持其建立北约多边核力量。

1962 年 12 月初，西欧联盟大会巴黎会议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建立一个北约核防务组织。同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 12 月 18—21 日在巴哈马群岛拿骚举行会晤，并达成协议。按照协议，美国将出售"北极星"潜艇导弹给英国，以代替蓝光计划；将英国装有"北极星"导弹的潜艇同美国的一部分(同等数量)已经用核武器装备起来的潜艇一起编入美国所筹划的盟国核力量。② 当英国感到国家最高利益受到威胁时，可以自由决定"北极星"导弹的使用。肯尼迪和麦克米伦还在最后声明中同意，"两国政府关于提供"北极星"导弹的目的在于，经与其他北约盟国磋商后，建

① (法)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第 672 页。

②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Washington, January 14, 1963, p.44.

立北约多边核力量"①。

同时,美国还向法国提出类似建议。在提出这些建议时,美国特别强调,只有"一体化",在美国指挥官控制下的核力量才有可能得到它的援助。美国的立场有悖于法国建立独立核力量的防务政策。1963年1月14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肯尼迪总统打算把大西洋联盟国家所有的战略力量都集中起来听从美国指挥,他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当然,法国反对美国建议的还包括其他方面。主观上讲,法国担心,英国一心想影响美国,到头来会看不到那些最终可能导致欧美之间产生根本分歧的因素,这样,如果美国控制了英国核力量,欧洲的自卫能力总有一天会大大削弱。② 此外,法国还认为,拿骚协议再次体现了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这是对它的歧视;客观来说,法国当时根本没有装备北极星导弹的合适潜艇,即使美国提供北极星导弹,法国也不能用来建立潜艇核力量。

就在美英签订拿骚协议和法国对此持反对态度时,有迹象表明,法国和联邦德国即将签订友好条约,美国担心紧密的法德关系也可能在核领域内导致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对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态度更为积极,并决心为实现这个计划承担起领导作用。1963年1月初,美国派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去北约理事会特别是去联邦德国提出具体的建议。同日,阿登纳与鲍尔会晤时声明,联邦共和国原则上同意就美国建议的多边核力量计划举行谈判。③

1963年5月22—25日,北约理事会在渥太华举行会议,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会议决定以美英拿骚协议为基础建立北约组织的联合核力量。在北约组织内设立由各国部队组成的新的核力量司令

① *Public papers*, 1962, pp. 908—910.

② Alan Sked and Chris Cook. *Post - War Britain: A Political History*,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Ltd, Harmondsworth, 1979, p. 189.

③ (联邦德国)威廉·格雷韦:《联邦德国外交风云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598页。

部,决定把3艘装有"北极星"导弹的美国潜艇,252架能够运载核武器的英国轰炸机,以及准备用原子武器装备起来的北约其他8个成员国(包括联邦德国)的战术空军交给这个司令部指挥。[①] 至此,北约组织形成了建立多边核力量的具体计划。

为了检验北约多边核力量的可靠性,1964年下半年,由美、英、联邦德国、意、土、希、荷兰等国海军官兵组成的混编部队乘坐美国的导弹驱逐舰"皮德尔号"试航。同年10月2日,在联邦德国资深外交官格雷韦同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希望多边核力量条约能在年底签署。这似乎给外界传递了一个这样的信息,谈判已进入决定性的阶段,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实现已近在咫尺。

第二节 联邦德国的核政策

在核问题上,《伦敦—巴黎协定》中特别规定,联邦德国不在领土上制造核武器。这一规定既是北约国家要求联邦德国所作的保证,也是联邦德国自身的承诺。同时,联邦德国当时不仅保证不制造核武器,而且也没有拥有核武器的打算。阿登纳总理确信,加强北约的常规武装力量就有可能击退任何潜在的进攻,而无需诉诸核武器。因此,联邦德国将对北约常规力量作贡献定为军事政策。[②] 关于北约盟国对联邦德国核政策以及联邦德国自身在核问题上的态度,美国著名德国问题专家凯瑟琳·凯莱赫曾经指出,当时几乎没有人期望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有一个核武装的德国,而所有的德国人都把生产和拥有核武器看做是雄心勃勃的大国的事情,而不是德国的要求。[③]

①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6, 1963.

② Carl H. Amme. *NATO Strategy and Nuclear Defense*, New York,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Inc, 1988, p.21.

③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9.

当然，这一情况并不表明，联邦德国核政策就不会有任何变化。事实上，它只是承诺不生产核武器，而没有承诺不会拥有。因此，随着形势的变化，其政策也有变化的可能。

在联邦德国签署《伦敦—巴黎协定》两个月后，北约军事战略发生调整，即从“地区遏制战略”转变为“大规模报复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特别强调核力量的作用。为检验该战略的效果，北约多次进行核战争演习。在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一个月，即1955年6月，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就在联邦德国、荷兰和法国东南部组织了代号为“全权处理”的军事演习。这次军事演习的基本假设是敌方一开始入侵成功，然后被北约部队击退。演习中，北约模拟用335枚原子弹对敌军事目标进行攻击，结果造成了170万人“死亡”和350万人“受伤”，这还不包括放射性污染的作用。[①] 核武器在模拟演习中展现出来的巨大杀伤力在联邦德国引起了极大震动，使它在安全问题上产生了新的担心——唯恐遭受核攻击。

到了1956年，联邦德国在安全问题上的这种担心由于严峻的冷战形势而加剧。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苏联对西方国家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这一事件表明，东方阵营的核实力在大大增强。形势的变化使得联邦德国害怕苏联使用常规武器进行侵略的情绪减弱，而对核战争的恐惧则增强。

就在这时，北约盟国的军备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提出雷福德计划，准备大力削减80万常规部队，将战略建立在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基础上，[②]其他北约盟国的常规部队也在削减。同时，法国把部队调到阿尔及利亚，英国依赖核武器防御，比利时缩短兵役期。所有这些情况使联邦德国对安全的忧虑进一步加深了。这样，它开始重

---

① Robert Endicott Osgood. *NATO: The Entangling Alliance*. Chicago & Loxdox: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 126.

②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35*, August 13, 1956, p. 263; Carl H. Amme. *NATO Strategy and Nuclear Defense*, New York,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Inc, 1988, p. 21.

新评估其安全政策。波恩原先认为，联邦共和国的重新武装有助于阻止苏联的侵略，这时它却强调说，联邦共和国的武装水平将有助于阻止核战争。显然，联邦德国已将核战争视为对其安全的首要威胁，为对付这种威胁，它必然会采取相应措施。

正是这种情况下，联邦德国政府开始表示，它对本国武装部队获得战术核武器一事产生了兴趣。[①] 1956 年 12 月，联邦德国代表在北约理事会与法国等盟国一道，要求美国广泛分配核武器。[②] 为阐述其政策的合理性，阿登纳总理指出，北约组织对苏联的攻击作出使用非核武器的反应不再可能了。[③] 言下之意，北约除使用战术核武器来对付苏联的攻击外别无选择。1957 年 1 月 2 日，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接见《明镜》报的记者时说，在当前情况下，联邦德国最重要的目标是防止核战争。[④] 几天之后，施特劳斯又表示，核装备可以成为提供有效防御的手段，在决定性战场中，可以使用战术核武器。[⑤] 这样，联邦德国寻求战术核武器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

此后不久，联邦德国出现了国防军是否也应在北约内部用原子武器装备的问题的讨论。对此，阿登纳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如果联邦共和国一开始就阐明国防军不用原子武器装备，形势就会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

1957 年 3 月，阿登纳与其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和来访的北约秘书长诺斯塔德对建设北约的核力量问题进行了秘密会谈。

---

① Wolfram F. Hanrieder. *Germany, America, Europe: Forty Year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Yale University, 1989, p. 42.

②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p. 125.

③ Wolfram F. Hanrieder, Graeme P. Auton. *Policies of West Germany, France, and Britai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 Hall, 1980, p. 9.

④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p. 75.

⑤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AZ*), February 12, 1957; *Bulletin*, January 8, 1957.

4月3日，阿登纳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要求用"战术核武器"装备国防军。他在批评一些包括国内著名科学家在内的持不同意见者时，驳斥了他们在联邦共和国核武装问题上的警告，说他们"什么也不懂"。①

4月5日，在联邦议院大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们问及国防军是否用原子装备这一问题时，阿登纳回答说，如果伦敦裁军谈判失败，联邦共和国就要求用战术核武器来装备国防军。他指出，战术武器（此处指战术核武器）和巨大的原子武器（即战略核武器）是有区别的，战术武器只是继续发展炮兵，联邦共和国不能在正常的装备方面放弃部队最新武器的发展工作，在英国宣称成为核强国和西方发展原子武器的努力正在全面进行的情况下，联邦共和国不能使发展停顿下来，只能适应并关心何时何地出现缓和。之后，他还强调，"剥夺武器和不参加最新发展并不意味着缓和，如果这些事情只靠一个国家去做的话；如果只有联邦共和国单独去做的话，肯定无济于事"。他表示，他不认为，拥有这种武器会使国家面临遭受原子报复的危险，因为，苏联知道，对德国的报复行动将会立即引起西方的核反击。在最近一年或一年半内，外交政策的发展变得更加严峻了，"我们德国人完全把和平归功于美国原子武器非常强大这一事实"②。阿登纳的辩护表明，联邦德国政府要求获得原子装备的决心已变得非常强烈。

然而，对深受二战之苦的联邦德国人们来说，对国防军进行原子武装的问题无疑犹如一块斗牛士的红布。因此，阿登纳的言论立即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抗议。当月，十八位著名的原子科学家给阿登纳发了一份联合署名的抗议电报。他们声明，将拒绝任何合作，并说，如果这个小小的德国没有原子武器的话，它可以为自己和世界和平

① （苏）A. C. 阿尼金：《外交史》（第五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88页。

②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6, 1957.

服务。[1] 最大的在野党社会民主党也强烈反对国防军装备原子武器。5月5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埃里希·奥伦豪尔在弗伦斯堡州党代会上说,如果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就阻止国防军装备原子武器,并负责不使西方盟国把原子武器储存在联邦境内。[2] 正当社会民主党反对对国防军装备原子武器时,北约军事委员会华盛顿会议通过决议,为北约中欧部队装备战术核武器,并对联邦德国的装备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在1958—1963年期间,每个师配备1个"诚实约翰"导弹营,每个军配备1—2个"中士导弹"营。这样,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态度更加强硬了。6月16日,奥伦豪尔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选举大会上更加明确表示,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国防军停止装备原子武器,要求同参加伦敦裁军谈判的国家举行谈判,以取得一项在德国土地上不驻扎外国原子武装部队或者储存原子武器的协议。他再次重申,国防军不要原子装备。[3] 原子科学家的呼吁和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在联邦德国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纷纷表示支持他们的主张。

与之不同的是,阿登纳对原子科学家们的抗议表示不满。他说,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德国部队的装备如果比美国人、比利时人、法国人、荷兰人或者意大利人都应该差一点,那么他们的地位势必因此而降低,这是不可思议的。他反问,"这些国家的士兵可以拥有战术核武器,难道国防军士兵就不能拥有?"[4]作出这番论述之后,他特别强调,联邦共和国虚弱就会减少对西方防务的贡献,增加苏联侵略成功的希望,[5]无论如何,歧视德国士兵实际上是解散整个西方联盟,而包含在十八位科学家要求中的结论就是解散这个联盟。至

① *Die Politische Meinung*, May, 1957, Seite 55—60.

②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5—195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47页。

③ 同上,第347—348页。

④ *Bulletin*, April 6, 1957.

⑤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p.93.

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阿登纳只不过是将其视为反对党的反对意见罢了。

为取得原子科学家们的支持，以便在原子技术上获得他们的合作和国内舆论中掌握主动，阿登纳于这年9月邀请他们到总理府，并请豪辛格和斯派达尔将军给他们作有关世界军事形势的报告。阿登纳通过两位将军向他们说明，装备不同的北约部队——有些部队在技术上配备的武器质量远比另一些部队高——是不能统一行动的。另外，他还认为，在东西方力量对比的现实中，若西方自愿放弃原子装备，而东方不承担对等义务的话，那么西方的行为则无异于自残，是极其愚蠢的。这不能实现东西方原子裁军的目标，更不能实现全面、有监督的裁军。他还指出，一个国家在外交政策方面可以发挥它能够显示力量的许多作用，但一个不拥有防御力量的国家，“最多只不过是一个保护国，而不会是一个独立国。”[①]这表明，在阿登纳看来，核武器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既然如此，联邦德国要求获得原子装备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于是，阿登纳一个月后在华盛顿正式提出了联邦德国的核武装问题。与此同时，联邦德国新闻媒介也开展了广泛的宣传运动。1957年10月19日，《新莱茵报》的一篇文章写道，“很遗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军事上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东欧接受其意志的地步。因此需要武装、武装、再武装，需要拥有火箭和原子武器，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得到迄今为止用政治手段所得不到的东西。”[②]

11月16日，阿登纳同来访的法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莫里斯·富尔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富尔提出了以下建议：在北约理事会十二月会议上，德国、意大利、比荷卢经济联盟国家和法国应防止在北约内部存在两类国家。人们不能容忍，只有美国和英国拥有核武器和带

---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5—195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48页。

② （苏）A. C. 阿尼金：《外交史》，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91页。

有核弹头的导弹，原则上，在北约国家里不应该有这些歧视。阿登纳对富尔的看法表示赞同。他认为，在北约内部，欧洲国家必须要求充分的政治协商，必须要求北约内部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必须竭尽全力谋求同英国协调一致。他指出，在签订北大西洋公约的时候，美国的力量远远超过了苏联，但九年后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的力量和来自它那里的危险增大了，而在美国，同时也在欧洲，却使人觉察到筋疲力尽的迹象。欧洲不拥有原子武器，可原子武器不仅决定未来的战争，而且也保障和平。外交部长冯·勃伦塔诺在与富尔进行会谈时指出，在现实情况下，联邦共和国不打算从事核武器生产以及建议修改巴黎协定，但是，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以及在为和平目的生产原子能方面交换研究成果是有意义的。联邦政府期待并且在即将召开的北约理事会上建议，北约不是作为个别国家或个别政府，而是一个能够提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武器必要储备的组织。北约国家取决于在华盛顿或伦敦所作的政治决定，是不可容忍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如果北约国家不拥有原子武器，可能引起苏联用常规武器发动进攻，从而导致征服欧洲，因为用原子武器进行反击的冒险并不直接存在。[①] 从阿登纳和勃伦塔诺与富尔会谈的内容可以看出，联邦德国政府这里提出的北约国家必须享有平等权的主张实际上是为争取自己在北约框架内装备核武器进行宣传，以争取盟国的支持。

在联邦德国急需取得联盟的支持时，诺斯塔德来访。他在发表电视讲话时指出，只要形势不发生变化，防御性核武器对加强国防军的战斗力来说是完全必要的。[②] 诺斯塔德的立场极大地鼓舞了联邦德国。

然而，如要获取原子装备，单纯依靠盟国的支持是不够的，还必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5—195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 381—385 页。

②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p. 94.

须有法理依据。为此,阿登纳政府将用原子武器装备国防军的问题提交联邦议院讨论。经过激烈辩论,联邦议院最终于1958年3月25日通过决议,决定按照北约1957年MC70计划给国防军装备战术核武器。[①] 决议具体指出,装备战术核武器的美国部队将继续驻在联邦共和国领土上,它们将由装备同样武器但受到美国控制的联邦国防军补充。[②] 决议表明,尽管联邦德国在国家掌握的权限内不拥有原子武器,但它力图通过曲折途径,即通过支持和加强驻扎其领土上的盟国核部队方式来实现,也就是在北约范围内和美国的最高指挥下可拥有原子武器。实际上,这是一种"搭车"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原子装备,联邦德国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以将国内外舆论的攻击矛头转向北约组织,以避免自己成为攻击的靶子;另一方面,又可以借北约组织之力获得原子装备。

决议通过后,国防军开始在北约1957年决议范围内配备与战术核武器有关的装备。到1958年10月,联邦德国建立了200多个发射核弹头的导弹装置。1959年3月,国防军的第一个特种营(这是北约计划建立的9个联邦德国营之一)配备了一种具有核运载能力的武器,即"诚实约翰"导弹。[③] 这样,联邦德国开始进行获得原子装备的具体努力了。

为了进一步寻求盟国支持,联邦德国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于1959年4月份访问了美国。这次访问是富有成效的。施特劳斯访问结束后指出,他是带着坚定的信念离开美国的,他坚信美国政府把创建现代化的国防军所取得的不断进展看做是德国同美国之间进行良好合

① Carl H. Amme. *NATO Strategy and Nuclear Defense*. New York,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Inc, 1988, p.21.

② Alfred Grosser. *The Western Alliance: European – 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45*.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0, p.168.

③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9,1959.

作，以及达到共同安全目标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①] 施特劳斯的评价不无道理。此后不久，联邦德国和美国签订了一项原子合作协议。按照协议，美国将训练国防军使用和防御原子武器，并把原子武器系统的无核部分连同有限制的资料移交给联邦德国。[②] 因为有美国的支持和合作，联邦德国国防部在年底发表的声明中说，除“诚实约翰”导弹外，其他有核运载能力的导弹即“奈基Ⅱ型”、“斗牛士”、“马斯”等有核运载能力的导弹也将供应联邦德国。[③] 显然，联邦德国获取原子装备的目标更加清晰了。

到 1960 年，联邦德国对多边核力量的关心程度完全超过了其他欧洲盟国。[④] 在联邦德国根据北约决议给国防军装备有核运载能力的导弹的过程中，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诺斯塔德提出把北约组织变成“第四核力量”的建议。建议最早是他在 1960 年 9 月与北约秘书长斯巴克和阿登纳等人的会谈中提出的。针对该建议，美国国务卿赫脱提出了建立北约多边核力量的报告草案。对于这些建议和草案，虽然英、法都不热心，但联邦德国却表现出了极大热情。阿登纳在 11 月 1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了支持态度。他说，关于欧洲原子武器的控制问题，必须在 12 月召开的北约理事会上讨论，他赞同由北约各国组成一个“共同机构”来控制盟国的核武器。为此，他还批评了法国的政策，并说不需要每个国家去制造自己的原子弹。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接见《法兰克福汇报》记者的谈话中说，在给北约组织装备原子武器的问题上，他与诺斯塔德的意见一致；他对赫脱先生在同一问题上发表的意见也感到很大的兴趣。在他看来，这两个人的意见虽然有所不同，即诺斯塔德考虑的是北约陆海空的全面

① （英）G·巴勒克拉夫：《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49 页。

② 同上，第 149 页。

③ *The Times*, December 17, 1959.

④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p. 120.

核打击力量,赫脱考虑的则主要是海上核力量,但他们的基本点是一致的,这就是使北约组织成为核力量。施特劳斯认为,他看不出有什么政治或军事上的理由来反对这样的建议。① 从可行性分析,联邦德国领导人的立论是较为现实的。这是因为,联邦德国不但受《伦敦—巴黎协定》约束不能制造核武器,而且由于西方对它的防范心理没有消除,联邦德国即使通过与美国的双边协议来取得核武器也会使国际社会对它的动机深表怀疑。但是,一旦接受诺斯塔德将军或赫脱的建议,联邦德国就可以通过北约组织获得这些武器,从而减少甚至避免国际社会对它的猜疑。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英、法等国对多边核力量计划反应冷淡,联邦德国却强烈赞成和极力支持。

此后,联邦德国为实现北约多边核力量计划进行积极努力。1961 年 4 月中旬,阿登纳在赴美访问前夕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希望美国总统继续进行使北约组织本身成为一个核力量的计划,并将此列为他必须促使美国总统注意的最重要的三个问题之一。② 当时,国际舆论认为,建立北约核力量问题是阿登纳心中最重要的事情。③ 然而,会谈的结果令阿登纳失望。关于北约组织的武器政策,阿登纳被迫承认赫脱计划已经大部分被放弃,并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意放弃"一切需要的军事手段应该保持和发展"的看法,同意在进一步讨论裁军问题以前停止向国防军运交具有核运载能力的战术导弹。④ 这次访问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与国际形势有关。当时,美国正与苏联就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谈判,它希望至少在此时避免背负核扩散的责任。由于这一点,联邦德国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要求。

然而,随之而来的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加剧和日内瓦会议的失败,以及苏联恢复核试验,使得联邦德国重新进行促使北约建设多边核

① (英)G·巴勒克拉夫:《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63 页。

②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April 11, 1961.

③ *The Times*, April 12, 1961.

④ *The Times*, April 15, 1961.

力量的努力。1961年11月初,阿登纳受邀访问美国。访问前夕,因为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正考虑迫使联邦德国重申1954年的诺言——决不希望拥有自己的核武器,[①]阿登纳想趁此机会再次提出联邦德国的要求。他在16日宣布,北约组织当局应该不必经过美国总统批准就能下令使用核武器,他还建议和肯尼迪总统讨论这个问题。[②] 不难看出,阿登纳实际上是在给美国施压。然而,肯尼迪想通过加强常规实力的措施与苏联进行谈判,为西柏林建立一种实际上确保现状、形式上结束"占领"的新地位。为此,他向联邦德国增派了6个师。作为回报,他希望阿登纳公开地重申以前的声明,表示联邦共和国无意拥有核武器,以消除苏联人对它复仇主义的担忧。[③] 由于双方存在重大分歧,阿登纳的努力没有成功。

尽管在美国进行的努力遭到挫折,但联邦德国仍然积极争取装备原子武器。11月29日,联邦德国政府强烈要求建立一支北约国家集体控制下的核力量,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政策。[④] 军界领导人更是主张直接控制核武器。12月初,施特劳斯在谈及北约核力量政治控制问题的看法时建议,北约核力量的控制应该从15个指头减少到2个指头,即由美国和在其国土上部署了核武器的国家控制。[⑤] 这一建议得到北约中欧总司令、联邦德国将军斯派达尔的支持。12月12日,斯派达尔在巴黎召开的西欧联盟议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慷慨陈词,要求核武器归欧洲大陆所有,要求"两个指头控制扳机"。军界的要求表明,他们不仅要求在北约框架内拥有核武器,而且要自己来控制核武器。显然,这比联邦德国此前提出的要求更进了一步。

当联邦德国争取在北约框架内拥有和控制核武器时,北约组织为了在更前沿的地方抗衡苏联,却要求各成员国增加常规武装力量。

①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13, 1961.

② *The Times*, November 16, 1961.

③ *The Times*, November 21, 1961.

④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1, pp. 146—151.

⑤ *The Times*, November 16, 1961.

其中，北约对联邦德国提出的要求是：第一，为计划中的12个师补充4个带有加强侦察营和工兵营的机械化装甲旅；第二，扩充空降师（当时只有2个旅），使之能成为装甲步兵师；第三，所有现役部队的兵员数应该超编制，这样，即使缺少一些指挥员、度假人员和病员，部队也能在短时间内做好战斗准备。

然而，联邦德国国防部和陆军司令部经过详细的核算发现，假如北约的全部要求和国家对军队的全部希望得以实现，国防军规模需要从当时的37.5万扩充到75万，每年的军费开支将高达300亿马克。但是，财政部长施塔克强调，按当时的状况，今后每年只能向国防部提供200亿马克的军事开支。按照国防部的估计，一支50万人的联邦国防军就需要200亿马克的开支，所以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主张50万人的扩军目标，他表示宁愿把预算资金用于核武器，而不是用于常规部队。为了说明这一点，他特别强调，"一颗原子弹抵得上一个旅，而且价钱又便宜。"因此，他希望用一种小规模的核战手段来弥补士兵的缺乏。①

同时，施特劳斯对北约对常规战争的重视程度提出了警告。他说，"不能因为相信在常规战争中可以防止核战争带来的牺牲就视前者为最小的祸害并容忍常规战争带来的损失……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并不能使核武器消失。"②他断言，如果北约为常规战争作准备，核威慑将失去其可靠性。在与军事记者阿德尔贝尔特·魏因施泰因的谈话中，他又一次强调，西方的师只能用战术核武器才能提高自己的价值，他们应该用这种现代化的武器在最前线进行威慑。

1962年6月初，施特劳斯访问华盛顿，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举行会谈。当时，麦克纳马拉说，西方必然会遇到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一次核反击或者是不适当的，或者是不可靠

① *Der Spiegel*, N1. 41/1962. 转引自上海国际关系学会：《战后国际关系史料》，第72—73页。

② *Der Spiegel*, N1. 41/1962. 转引自同上，第66页。

的，因此，大型核武器在大战中首先是用来消灭军事目标的，在一定形势下，常规师能够防止战争。对此，施特劳斯反驳说，他并不认为，在铁幕边的西方战线上部署的最小的核武器也足以触发一次世界大战。他暗示，他对自己不能像戴高乐那样行动感到遗憾。施特劳斯指出，西欧需要60～100个师才能起威慑作用，而不是30个常规师，原子弹是一种政治武器，人们能够用它来增加居民对原子轰炸的恐惧。施特劳斯的强硬态度激怒了美国人。为说服欧洲人消除对苏联核武器的恐惧，使施特劳斯放弃依靠核防御的想法，麦克纳马拉解释道，美国对苏联那种能打到西欧的核力量和能打到美国的核力量同样深感忧虑，美国已使北约的核防卫符合全球的需要。[①] 尽管如此，施特劳斯还是坚持他的核防御主张并断然拒绝北约的要求，认为50万常规部队足够了。7月17日，施特劳斯晋见了阿登纳总理，他的计划得到了总理的同意。

1962年底，北约组织在巴黎召开部长会议，联邦德国再次要求建立核威慑力量。1963年2月，阿登纳针对美、英签订的拿骚协议大谈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认为，拿骚协议是建立有效的北约多边核力量的重大步骤。我们决定为实现这些计划而合作”。[②] 当时，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被法国拒绝，戴高乐的拥抱政策也使联邦德国许多政治家感到不快。他们担心，戴高乐会努力迫使波恩不得不在巴黎与华盛顿之间作出选择并使他们选择巴黎。他们认为，多边核力量是对付这种压力的合适手段，对新任外长格哈德·施罗德和国防部长凯·乌韦·封·哈塞尔来说尤其如此。

在美国的支持下，联邦德国的不懈努力初见成效。1963年5月，北约理事会渥太华会议提出建设多边核力量的具体计划。同时，联邦德国在这些计划中还获得了明显特权。如联邦德国所指望的那

① *Der Spiegel*, N1. 41/1962.

②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p. 228.

样，北约组织的水面核舰艇以尽快速度建造，而且还可以由他们的造船厂承造。特别重要的是，由于联邦德国答应承担建立多边核力量所需费用的35% ~40%，美国同意提供多边核力量的人员和对这种力量利用的份额应与各国的财政贡献相一致。这就意味着，北约核舰队中将有35% ~40%的舰艇由联邦德国官兵驾驶。更确切地说，根据当时《纽约时报》所披露的数字，归联邦国防军指挥的用“北极星”导弹装备起来的水面舰艇将达10艘。[①] 正因为如此，计划的公布对联邦德国是一个鼓舞，此后，它对建设北约多边核力量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1963年6月，波恩不仅热情接待遍访欧洲国家但在许多国家遭受冷遇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而且还再三表示完全支持建立北约多边核力量的计划。

与此同时，针对美、苏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全名为《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联邦德国国防部长哈塞尔坦言，如果多边核力量同美国禁止核扩散是一回事的话，那么这个禁止是不能永久维持下去的。此外，他在谈到自己对多边核力量的理解时还表示，这个建议不能代替德国人在本土上发射中程弹道导弹的要求。[②] 哈塞尔的弦外之音很清楚，那就是联邦德国无论如何要拥有核武器。当然，这一要求将依靠其一直积极争取的北约多边核力量来实现。

前文所述表明，由于北约军事战略对核力量的强调、北约盟国军备政策的变化、苏联核威胁的增大，特别是北约建立多边核力量的举措，联邦德国这一时期防务政策的核心不是追求常规防御，而是核防御，这种政策使得它为实现北约共同核力量进行了不懈努力。其目标是，通过支持建立北约多边核力量，争取在北约框架内拥有和参与控制核武器。

---

①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9, 1963.

② 《威尔逊及其对外主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1页。

第三节 “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流产与北约核计划小组的成立

多边核力量计划出台后尽管得到联邦德国的全力支持，但英、法的反应却比较冷淡。在英国，反对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声浪高涨。1963年6月，遍访西欧并在联邦德国受到热情接待的肯尼迪总统在英国受到了冷遇。同月，英国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声明，他的党反对核武器扩散，反对联邦德国进行原子武装。为阐述其观点，他还以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作为重要论据。他谈到，在他最近访问莫斯科期间，赫鲁晓夫就联邦德国要求原子武装的问题提出了严重警告。威尔逊借此告诫本国政府及北约盟国，联邦德国一旦获得原子武器，东西方之间就不再有共处的可能。[①] 工党当时是英国的在野党，表面看来，威尔逊在北约多边核力量上的立场只是一个反对党领袖对执政党政策发表的不同主张。实际上，由于与保守党长期轮流执政的工党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因此，它对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反对代表了大量民众的心声。

对多边核力量计划持反对意见的工党不仅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还重视每一次议会辩论机会。1963年7月2—4日，在下院的一次有关外交政策的辩论中，威尔逊激烈反对联邦德国以任何形式进行原子武装。他说，应该全力以赴地坚持提出订立一个防止核扩散条约的建议，禁止把核武器扩散到已存在的或自称的四个独立核大国以外去。为说明这一点，他再次谈到了苏联在多边核力量计划问题上的态度对签订防止核扩散条约乃至东西方关系的影响。他指出，俄国人会把多边核力量或多边混合部队看做是对这样一个条约的破坏；如果这个多边核力量在谈判之前就已存在的话，他们就会把它看做是对缔结这个条约的一种障碍。他表示同意苏联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9—196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47页。

的这种看法，认为多边核力量计划的确是一种必然会造成签订防止核扩散条约失败的障碍物。他再次警告说，任何用核武器武装联邦德国的建议，都意味着缓和东西方紧张状态的希望就此结束。他强调，这是他一贯的看法。威尔逊还表示，他的话在他自己看来似乎已经很猛烈了，但与赫鲁晓夫在会谈中用来表达同样想法的那种激烈的言词相比，就显得黯然失色了。他深信，用核武器武装联邦德国的建议意味着任何积极的共处政策的结束。为了说明事态的严重性，他甚至认为多边核力量计划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他说，"这个建议可能成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成为通向第三次世界大战道路上的一个决定性的里程碑，正如希特勒向莱茵省的进军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①]此外，威尔逊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在多边核力量计划上的主要动机是把联邦德国置于一个国际核力量中，以防止它成为一个核大国。但是，他不相信这个计划是达此目的的唯一办法，相反，建立多边核力量的建议会刺激联邦德国发展核武器的欲望。他说，事实上，在这个建议提出之前，情况就已经如此，"只要一提起核武器，德国人的胃口就开了"。最后，威尔逊郑重声明，不论何种情况，工党都完全、彻底、毫不含糊地反对任何使德国（联邦德国或东德）直接或间接动用核武器，或者在决定使用核武器方面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的建议。[②] 威尔逊的辩论表明，反对多边核力量计划不仅是威尔逊的个人主张，而且是工党的既定政策。他们之所以对多边核力量计划表示强烈反对，虽然担心这个计划会破坏东西方关系乃至影响东西方共处是其重要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担心联邦德国成为核大国。

工党的立场为其在国内赢得了高支持率。1964 年 10 月，工党上台执政。此后，担任首相的威尔逊以政府为平台更加积极地反对多边核力量计划，反对联邦德国分享核武器。针对美国人所持的"必须

① 《威尔逊及其对外主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148—150 页。
② 同上，第 150—152 页。

在核问题上给予德国一席之地,以防止他们拥有德国的原子弹而努力"的观点,威尔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形象而生动地说,"如果你有一个男孩并希望他不生淫逸之心,带他去看脱衣舞是不明智的"①。11 月 23 日,威尔逊在下院演讲中坦承,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同他在莫斯科的会谈伙伴苏联是一致的。11 月 27 日,英国政府在契克斯召开的防务会议决定,坚持反对多边核力量计划,认为有必要另外制定一个使英国核力量国际化的计划,这个计划既要避免人员混合配置,又要避免在政治上受到"给德国人染指核武器上的扳机"的指责。12 月 7 日,威尔逊在与约翰逊总统举行第一次会晤时指出,国际政治问题就是欧洲反对德国人染指核扳机的任何建议,即使这种建议是间接的也好。他还说,"问题不在于西方是否已经确信德国人没有能力影响使用核武器的决定,而在于苏联是否会相信这一点。如果我们希望使东西方局势走向缓和,不管这种缓和是多么缓慢,则多边核力量可能是一个不祥的挑衅。"②他根据契克斯防务会议的精神向约翰逊提出建立大西洋核力量的建议。建议规定,英国将所有的北极星核潜艇、美国把同等数量的核潜艇交给北约组织,构成这支大西洋核力量的核心,只要北约作为一个有效的组织存在一天,这些舰队就一直交给北约组织调度,受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直接控制,同时还应设立一个特别的大西洋核司令部。③

从建议的内容来看,英国所说的大西洋核力量实际上是建立在已有的核力量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这样建立起来的大西洋核力量实际上是已经拥有核力量国家的联合核力量。不难看出,英国的意图在于一举三得:其一,主动提出建议可以避免背负妨碍多边核力量建设的罪名;其二,以盟国现有的核力量为基础建立联合核力量,

①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52.

② 《威尔逊及其对外主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210 页。

③ 同上,第 303 页。

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联邦德国排除在联合核力量之外，从而避免联邦德国染指核武器；第三，英国早就建立了核力量，而且拥有北极星核潜艇，如果以现有核力量建立联合核力量就可以继续保住英国的核强国地位，保持自己在联盟内部的实力地位。当然，从威尔逊在野期间及上台后的一系列公开言论来看，最重要的还是防止联邦德国染指核武器。

与英国类似，法国也反对多边核力量计划。起初，为了拉拢联邦德国，戴高乐不仅向阿登纳保证不反对联邦德国参加多边核力量，而且还与联邦德国签订合作条约。然而，当多边核力量计划正式出台并有可能变成现实后，法国却改变了态度。1964 年 7 月 3 日和 4 日，戴高乐在波恩举行的德法协商会议上公开批评了多边核力量。同时，他对德法关系总的发展情况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联邦政府不能下决心奉行一项对美独立的政策。他说，美国实际上是反对欧洲联合的，欧洲一旦遭到苏联进攻，美国无论如何不会动用核武器进行保护，因此联邦德国必须同他一起推行一种由欧洲利益指导的欧洲的外交政策，并在防务特别是在军备领域内同法国密切合作。[①] 戴高乐在批评多边核力量的同时又对联邦德国的防务政策进行指责，这不能说是随意或巧合，而应该是有意的安排。这表明，法国此前表示的赞成联邦德国参加多边核力量是假，反对是真。

法国此后的声明也证明了这一点。1964 年 10 月 24 日，法国外长顾夫·德姆维尔在巴黎向联邦德国国务秘书卡斯腾斯声明，法国反对多边核力量计划。他在申述法国改变方针的理由时十分直率，他说，1963 年之所以没有提出异议，是因为当时这个计划还模糊不清，没有估计到它会实现。11 月 3 日和 5 日，德姆维尔和蓬皮杜总理

① （联邦德国）威廉・格雷韦：《联邦德国外交风云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第 603—604 页。

再次公开声明反对多边核力量。[①] 所有这些表明，法国反对多边核力量的行动从秘密转向公开。

从戴高乐东山再起后的一系列外交举措考察，法国反对北约建立多边核力量的原因与其力图通过建立独立的核力量来实现全球大国地位有关，但反对联邦德国染指核武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北约拟定建立多边核力量的具体计划的情况下，后一个因素更为突出。

英、法因反对联邦德国拥有和参与控制核武器而反对多边核力量计划，那么推动多边核力量计划出台的美国的态度又如何呢？

肯尼迪总统虽然推动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最终出台，但同时又表示要单独控制核武器、反对联邦德国拥有核武器。在多边核力量计划出台前，肯尼迪大力推行他上台之前就主张的对外政策。他认为，美国不仅在东西方对抗中丧失了核优势，而且在东西方对抗中处于劣势地位，需要改变外交政策。为此，他猛烈抨击杜鲁门的遏制战略和艾森豪威尔的解放战略，决定在对外政策中推行"和平战略"。和平战略的主要手段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强调用和平方式加强西方盟国的地位，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寻求同苏联对话，避免刺激苏联。无疑，这种战略对美国的核政策产生了影响。1961 年 10 月 14 日，肯尼迪在给阿登纳的信中，除了谈及要减少中欧的军事对峙、采取保证双方不受突然袭击的预防措施、重申美国有关"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外，还特别提到坚持美国单独控制原子弹头、不扩散生产原子弹所必需的情报和材料的政策。11 月，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女婿、苏联《消息报》的主编阿列克赛·阿朱别伊进行了一次长谈。肯尼迪在这次谈话中先让苏联放心。他指出，联邦德国没有原子弹，它的武装力量处在北约的统治之下，而这个北约又是由美国人指挥的，因此，苏联的安全不会

① （联邦德国）威廉·格雷韦：《联邦德国外交风云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第 602－604 页。

受到威胁。肯尼迪接着说道："如果德国发展了自己的原子武器或拥有大量导弹或成为一个意味着战争威胁的强大国家，我将理解你们的忧虑，并分担这种忧虑。"①肯尼迪与阿朱别伊的谈话是在他给阿登纳的信后不久进行的，从两者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显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精心的安排，其目的在于防止核扩散，防止联邦德国拥有核武器。

此后不久（1962 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使肯尼迪总统确信，在危急时刻只能有一个指挥中心。② 他同苏联的交涉是事后而不是事前通知盟国的，这表明他并不想把他们当做核伙伴来看待。另外，这件事还使他决心进一步推行和平战略。1963 年 5 月 25 日，美国虽然推动北约组织制定了多边核力量的具体方案，但事隔半月，即 6 月 10 日，肯尼迪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再次向苏联发出共同寻求和平的呼吁。他谈到，全面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冷战已经过时，应该改变东西方对立局面。他提出，如果苏联不恢复核试验，美国也将不在大气层进行新的核试验。他还宣称，历史证明，民族之间的敌视并不是永存的，美国执行的是和平的战略而不是毁灭的战略。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对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实施产生了不利影响。

肯尼迪遇刺后，继任总统的约翰逊继续推行肯尼迪的对外政策。一方面，约翰逊对联邦德国充满戒心。1964 年 4 月，他在接见联邦德国《快捷》画刊记者时说："你应该设身处地为俄国人想，设身处地去体会一下他们的感情，他们对德国人不放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③另一方面，他又采取了一些实施多边核力量计划的举措。1964 年 6 月，联邦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访问美国时与约翰逊商定：两国在年底签署"多边核力量"条约。10 月 5 日，鲍尔通报了约翰逊

---

① 潘其昌：《走出夹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17 页。

② Alan Sked and Chris Cook. *Post - War Britain: A Political History*,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Ltd, Harmondsworth, 1979, p. 187.

③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1964.

总统对艾哈德一封信的反应。鲍尔说,约翰逊比肯尼迪更坚决地把多边核力量计划看做是美国外交政策牢固的组成部分。[1]

如果说美国总统在多边核力量计划问题上执行的左右摇摆政策对该计划的实施不利的话,那么国防部长的坚决反对则使这个不利因素增加了。从1961年起就担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对多边核力量的态度极为冷淡,他强烈反对建立北约独立的核力量,强调必须对核力量集中指挥控制。[2] 1964年10月,他在与联邦德国资深外交官格雷韦会谈时明确表示,五角大楼是美国反对多边核力量计划的中心之一。他说,五角大楼首先关心的是完整地保持美国总统尽可能对西方的所有核武器拥有中央集权的、唯一的控制权和指挥权,任何"多边化"都被看做是对这种垄断地位的削弱而受到批判性的评价。身为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的这种表态无疑对想拥有和参与控制核武器的联邦德国是一大打击。

虽然英法开始反对多边核力量计划,并将反对联邦德国拥有和参与控制核武器作为他们反对该计划的一个主要原因,虽然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但联邦德国的热情仍然不减。1964年10月,艾哈德总理声明,即使其他北约国家不参加多边核力量,美德也将单独签字。[3] 一石激起千层浪,北约欧洲盟国反应强烈。法国十分恼火,英国也表示反对美德单独签订多边核力量条约,其他北约成员国则纷纷宣布不参加多边核力量条约。

这时,美国人投身于缓和,多边核力量这样的计划也难以赢得人心。在这样的气氛中,不扩散思想占了优先地位,允许把核武器转让给一个多边组织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努力遭到了日益增长的反对。

---

① (联邦德国)威廉·格雷韦:《联邦德国外交风云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06—607页。

②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p. 182.

③ Roger Morg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 Germany 1945—1973: A Study in Alliance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50.

国会对待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情绪比约翰逊预计的消极。12月初，美国作出了在越南作战行动大规模升级的决定。与此相联系，美国整个政策的优先次序发生了变化。约翰逊和腊斯克不仅认为欧洲受到危害较少，从而也较少重视，而且他们的敌情观点也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苏联，倒是中国突然被视为主要对手。① 因此，多边核力量计划更不受重视了。

在这种情况下，1964年12月15—17日，北约理事会巴黎会议在多边核力量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严重对立。联邦德国外长施罗德一方面表示拥护多边核力量政策，愿意研究具体和建设性的替代性建议，另一方面又批评说，联盟伙伴在北约理事会知情的情况下谈判14个月之后，"对未来作不确定的预测就不再是合适的"。施罗德的发言激怒了法国人。法国方面感到自己挨了一击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法国对多边核力量计划除了批评外，没有提出具体的替代性办法，而只是通过对未来作或多或少不确定的预测来驱散联邦德国的忧虑。曾赞成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北约秘书长斯巴克这时不仅改变了态度，而且对计划进行猛烈攻击。他断言，计划会拆散联盟并只能给欧洲联合带来困难。受到普遍尊敬的挪威外长霍尔沃德·朗格也强调多边核力量在联盟内部会起"涣散"作用，并突出地提到了它结构的人为性质和复杂性。有些人没有表态，有些人则强调不扩散原则的优先地位。正当北约各国代表在巴黎唇枪舌剑时，约翰逊总统在华盛顿发出了一项内部指示。指示要求美国所有驻外代表不得在这个领域起领导或推动作用，不得宣传美国的观点，而只能顺应盟国之间最大可能的一致，要给法国敞开一扇门，避免同法国代表进行公开或私下的争吵。② 为达此目的，约翰逊还设法假手同他接近的一位记者将指示透露给公众。

① （联邦德国）威廉·格雷韦：《联邦德国外交风云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09页。

② 同上，第610—611页。

从各国代表对多边核力量的立场来看，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三派，即热情支持的联邦德国、极力反对的北约其他欧洲成员国、原先推动多边核力量计划出台而会上又保持中立的美国。也就是说，只有联邦德国是多边核力量计划唯一的热心支持者，这样会议出现了对多边核力量计划的一片喊打之声。在这样的气氛中，北约组织要在多边核力量问题上通过任何建设性的决议根本是不可能的。

会议结束后，美、英、联邦德国、荷、意五国外长协商，决定在1965年1月底或2月初在罗马或海牙举行副外长级会议，以便研究这个问题。然而，这次会议最终没有开成。至此，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气数已尽。

就联邦德国而言，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流产意味着：通过参加一支集体的北约核力量来补偿其放弃生产核武器并防止北约内部分裂为有核和无核国家两个集团（或至少是缓和这种分裂局面）而付出的一切努力失败了，这无疑是对它的一次沉重打击。对此，联邦德国政治家也有深刻的认识。自始至终主持联邦德国方面谈判的外交官格雷韦甚至认为，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流产是比50年代初期的欧洲防务共同体夭折更为严重的外交失败。[①] 多边核力量计划流产后，艾哈德总理在外交上非常被动，加深了对盟国牺牲联邦德国利益的猜疑。另外，在计划流产后不久，由于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北约进行纵深防御的可能性大为减小，波恩对自身安全更为关注了。因此，联邦德国除了加强军事力量外，寻求在北约核事务中取得发言权也成为其迫切需要。

与此同时，为了打破外交僵局和避免联盟分化，北约其他国家开始寻找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替代方案。在各方努力下，北约建立了“麦

① （联邦德国）威廉·格雷韦：《联邦德国外交风云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594—595页。

克纳马拉委员会”[①]。1966 年 2 月召开的北约理事会华盛顿会议决定将委员会命名为核计划小组。12 月 15 日，核计划小组正式成立。小组主席由北约秘书长兼任，成员包括四个常任成员和三个非常任成员，联邦德国成为常任成员之一。[②] 核计划小组开会的方式与通常的北约会议大不相同：会议没有固定的地点，而是根据情况在一个成员国召开；参加的人数是受限制的；7 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只许各国驻北约大使和参谋长陪同。此外，只许秘书长和大西洋盟军两位最高司令参加。人们以这种方式赋予这种会议一种亲密和严格保密的性质。核计划小组会议通常与防务计划委员会[③]会议联合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北约安全与防务政策中与核力量有关的事务，并负责就北约核防务和核发展计划向防务计划委员会提出建议和研究报告。另外，北约如果抢在敌方之前作出使用核武器的决定，那么北约的司令官必须执行核计划小组为在欧洲战场上使用核武器而制定的各项方针。这是北约使用核武器的先决条件。这表明，核计划小组在北约的核政策方面不仅具有建议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北约的核政策，这样，作为小组常任成员的联邦德国也就在北约核政策问题上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

此后，核计划小组正式运转并成了北约的一种机制。1967 年 4 月 6 日，核计划小组华盛顿会议发表声明，现有核打击力量及其使用计划是十分具体和令人满意的。这样，北约再也没有进行建设共同核力量的努力了。1969 年 11 月 28 日，联邦德国不得不在不扩散核

---

① Roger Morg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 Germany* 1945—1973: *A Study in Alliance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41.

② 另外三个常任成员分别是美国、英国、意大利。三个非常任成员任期为 9 至 18 个月，席位分别由地区上相连的两个小国即土耳其和希腊、比利时和荷兰、丹麦和加拿大轮流接任。

③ 防务计划委员会是北约负责审议防务政策和制定统一军事计划的最高决策机构，它是由除法国之外的成员国国防部长组成。在每年春、冬两季外长会议前后召开会议。防务计划委员会主席由北约秘书长担任。

条约上签字,最终放弃拥有核武器的权利。[①]

另外,核计划小组成立不久就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联邦德国与英国的共同方案为基础提出了核武器的战术使用原则,[②]以及把这种准则列入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有效作战计划。这种情况表明,核计划小组成立后,联邦德国对北约的核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四节 小结

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提出和核计划小组的成立是北约前期在核力量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事件。综上分析可以看出,整个事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出台,第二阶段为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流产和核计划小组的成立。这两个阶段都与联邦德国密切相关,联邦德国也自始至终积极参与其中。

在第一阶段,尽管美国和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提出建立多边核力量的初衷是,在里斯本计划不能实现以至于北约常规武装力量在东西方对抗中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通过建设北约组织的核力量,来弥补总体上的不均衡。对联邦德国来说,由于处于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一旦两大集团之间爆发战争,就会毫无掩蔽。同时,在严峻的冷战形势面前,联邦德国尽管想拥有核武器,但又必须遵守《伦敦—巴黎协定》的有关规定,而不能去探求或威胁建立一支独立的核力量。因此,多边核力量建议提出后,联邦德国不仅高度重视,而且逐渐将防务政策的重心从常规防御向核防御转变,强烈要求在北约框架内对国防军进行原子武装和参与控制核武器。由于这些原因,加上联邦德国与法国签订合作条约并有核合作的趋势,美国力图

① 1968 年 7 月 1 日,美、苏、英和其他国家签订了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

② Wolfram F. Hanrieder. *Germany, America, Europe: Forty Year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Yale University, 1989, p.49.

寻求一条让联邦德国满意的途径,以避免刺激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于是,通过多边核力量计划让联邦德国参与“核分享”以防止它成为独立的核国家便成为美国的政策目标。在北约多边核力量建设问题上,英、法两国出于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力量的目的不仅不乐意参与,而且反对之声强烈。但是,在美国和北约高层的推动下,北约最终制定了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具体方案。

在北约核力量建设的第二阶段,整个过程几乎都是围绕联邦德国进行的。英国工党政府认为,建设多边核力量不是防止联邦德国成为核大国的有效途径,更不是唯一的办法。在英国看来,“一提起核武器,德国人的胃口就大了”,并且,如果让联邦德国分享和参与控制北约核力量,那么不仅会导致东西方共处的结束,而且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推动因素。因此,英国以缓和东西方局势为借口,反对联邦德国以任何形式“染指”核武器,并且以此作为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与英国一样,反对联邦德国“染指”核武器也成为法国的政策目标。对此,法国政要曾经予以承认。1965 年 11 月,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同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谈话时透露,法国政策是反对联邦德国参与任何核事务,特别是反对联邦德国对核武器有任何影响,而多边核力量会增强“德国人对核武器的胃口”。他强调,德国是一切“不扩散”努力的真正对象,“在这方面存在着对德国人的真实恐惧”[①];美国这一阶段在多边核力量问题上的政策是表面上一开始支持,并采取具体行动来推动。但是,在“和平战略”的指导下,美国为了避免刺激苏联,对多边核力量的热情大减。在英、法强烈反对联邦德国“染指”核武器、其他国家也附和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开始转向中立,并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联邦德国在多边核力量问题上不仅坚持坚定、强硬的支持态度,而且还与其他北约盟国作了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

---

① (联邦德国)威廉·格雷韦:《联邦德国外交风云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第 628 页。

概括起来，在北约多边核力量建设问题上，英、法最初因为有心有意建立自己的核力量而对北约多边核力量建设勉强同意，此后又因一心一意反对联邦德国以任何形式“染指”核武器而对多边核力量建设无心无意；美国最初因为有心有意建立东西方的军事平衡和防止联邦德国自己发展成为独立的核大国而一心一意推动北约多边核力量建设，此后又因对苏推行和平战略和联邦德国对北约多边核力量热情高涨而变得“半心半意”，在英、法等国强烈反对联邦德国“染指”核武器的情况下，最终对多边核力量建设无心无意；联邦德国因为有心有意对国防军进行原子武装和参与控制北约核武器而一心一意支持并力图推动多边核力量建设，然而最后变成了孤家寡人。在这种情况下，多边核力量计划最终流产。但是，为避免联盟分裂，北约又决定成立核计划小组，并让联邦德国成为其中的常任成员以对其进行安抚。

就联邦德国而言，整个事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流产反映了北约盟国对加入北约后的联邦德国仍存戒备心理，联邦德国在北约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内在的弱点；另一方面，作为多边核力量计划替代方案的核计划小组的成立及联邦德国成为其中的常任成员，是联邦德国努力及北约对联邦德国安抚的结果，这又说明联邦德国在北约内的作用在增强、地位在提高。

第三章

联邦德国与北约的常规军事力量

由于核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在两大集团都拥有这种武器特别是达到核均势后，核力量主要是起政治威慑作用，而不太可能成为实战武器。因此，常规力量在两大集团的军事对峙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除了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这段时期以外，北约在其他时期都特别重视常规力量建设。本章力图通过详尽的数据，用事实来论证联邦德国在北约常规力量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第一节 不同时期联邦德国国防军在北约军队中的地位

联邦德国在建国后一段时期内，由于受到《波茨坦协定》的限制，没有建立军队，内阁中也不设国防部，武装力量只有警察部队，安全问题完全由美、英、法等西方国家负责，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加入北约。可以说，联邦德国在加入北约前处于名副其实的"有国无防"状态。

加入北约后,联邦德国开始履行自己和北约的防务职责。1955年6月7日,即《伦敦—巴黎协定》正式生效、联邦德国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后一个月,联邦政府在原来负责盟国驻军事务的管理机构“布兰克办事处”(布兰克是联邦政府的特别代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国防部。国防部是军队平时的领导机构,部长由文职人员担任,战时由联邦总理担任军队最高统帅。为了吸取第三帝国的教训,以避免出现希特勒式的军事独裁,联邦德国将联邦安全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委员会主席由联邦总理兼任,常务委员由国防、内政、外交、财政和经济部长组成。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简称“总监”,相当于军队总参谋长)列席委员会会议。总监是国防部长和联邦政府的军事顾问、国防军最高军事代表和军衔最高的将领,他在国防部长领导下,具体负责执行既定的战略方针和军事政策,对武装力量没有作战指挥权。这样,联邦德国建立了一套美、英式的国防体制。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开始组建军队。按照《伦敦—巴黎协定》的规定,联邦德国可建立建制为12个师、人数为50万人的军队。因此,它在建立国防体制的同时,也开始组建军队。在时任国防部长特奥多·布兰克的主持下,联邦德国制定了一个分三阶段的扩军计划,即1956年组建部队9.6万人,1957年增加到27万人,①1958年扩充到50万人,②达到最高规模。

然而,在创建军队的初期,联邦德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军官、武器弹药、军事设施等极其匮乏。有鉴于此,它在联盟内积极寻求帮助。1955年6月30日,联邦德国和美国、英国在波恩签订了互助条约。根据条约,联邦德国在建立武装力量的过程中将得到美、英的大力支持。美、英两国保证在数年之内提供总额为340亿马克(89.5

① *Der Spiegel*, *N1. 41/1962*, Seite 32—53. 转引自上海国际关系学会:《战后国际关系史料》,第四辑,第59页。

②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p. 108.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美国的二十多个教官和顾问小组积极参加了联邦德国武装力量的组建工作。1956年初,一批联邦德国军官前往美国去接受重新训练。

在美、英等北约盟国的帮助下,联邦德国创建军队的条件尽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对其庞大的扩军计划而言,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不仅如此,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也对联邦德国扩军计划的实施极为不利。从国际环境来看,北约正在全面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剑盾战略)。这一战略是在北约头号强国美国的核武器对苏联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制定的。战略特别强调作为"剑"的核武器的作用,而将"盾"部队——常规部队当作辅助性力量。由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推行,北约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纷纷削减常规部队。同时,在美国政府及北约军事领导人的推动下,北约还酝酿建立多边核力量。北约的核战略及其举措使联盟形成了依赖核武器的氛围,这对联邦德国常规力量的扩充计划难免会产生影响;就国内形势而言,受上述形势的影响,联邦德国政府从1956年底开始就谋求为本国军队装备战术核武器,并且联邦议院于1958年3月25日正式通过了关于批准政府用原子武器和导弹装备联邦国防军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装备有战术核武器的美国部队将继续驻在联邦共和国的领土上,它们将由装备同样武器但受到美国控制的联邦德国军队补充。为了能为国防军装备战术核武器,总理阿登纳坚决支持建立北约多边核力量,并为之进行积极的外交努力。联邦政府对核武器的过度重视及其对核装备的追求,使其常规部队的重要性下降。无疑,这对布兰克扩军计划的实施也是一个不利因素。

除客观因素外,联邦德国扩军还遇到了主观上的阻力。布兰克1956年10月16日卸任后,继任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军事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崇尚"质量优先"原则,特别相信核武器的作用,甚至认为"一颗原子弹抵得上一个旅"。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施特劳斯不仅没有执行前任的扩军计划,而且还对计划缩

水，将军队和平时期的最高编制定为35万人。

由于以上因素的影响，联邦德国的扩军计划落空了。按照原定计划，到最后阶段即第三阶段——1958年应该达到50万人。实际上，直到1960年，联邦德国的军队数量才有27万。[①] 这不仅离扩军计划最后阶段的要求相距甚远，而且还刚刚达到第二阶段的扩军目标。

不过，联邦德国军队从无到有，再到建立27万人的规模，还是使它在北约内部具有一定地位。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之初，北约成员国在联邦德国的驻军约45万，其中美国约24.6万、英国6.8万、法国4.8万、加拿大6万、比利时2.3万、荷兰0.5万。[②] 此后一段时期内，这六国在联邦德国的驻军虽然有所变化，但基本稳定。这样，联邦德国军队规模占了北约驻联邦德国部队总额（六国驻军加联邦德国国防军）的近37.5%，成为北约前沿部队的主力。

当然，就北约各国军队总的规模而言，联邦德国在联盟内部还不占有重要地位。在有军队的北约十四国中[③]，联邦德国虽然排名第

①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3—1974*,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3, p. 79;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8—1979*,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8, p. 88;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2—1973*;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2, p. 74;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4—1975*,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4, p. 8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5—197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5, p. 8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6 - 1977*,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6, p. 83;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7—1978*,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7, p. 87.

② 《德国统一纵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页。

③ 北约1949年成立时只有12个国家，即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丹麦、挪威、冰岛、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葡萄牙。1951年10月17—22日，北约理事会伦敦会议同意接纳希腊、土耳其为北约成员国，1952年2月18日，两国正式加入北约。联邦德国1955年加入北约后，北约成员国增至15个。由于冰岛没有军队，因此，北约有军队的成员国只有14个。

六,但与前五名相差悬殊。当时,排在前五名的美国、法国、英国、土耳其、意大利的军队分别为 298.9 万、102.6 万、59.3 万、50.0 万、40.0 万。[①]联邦德国军队与这些国家相比,比例最高的也只有 65%,比例最低的则不及 10%。在有军队的 11 个北约欧洲成员国中,联邦德国的军队规模排在法、英、意之后,居第四位,但比例分别只有三国的 25%、44% 和 65%。

此后几年,北约国家的军队数量虽然都有增减,但联邦德国军队数量在北约总体排名和北约欧洲成员国中的排名基本保持不变,只是国防军在北约前沿部队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在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中,联邦德国对北约联合武装部队出力最大。1963 年 5 月,北约驻西欧的地区军队共 24 个师,其中 5 个美国师,3 个英国师,2 个法国师,2 个比利时师,2 个荷兰师,而联邦德国占了 10 个师。此后,联邦德国又拨出 2 个师交给北约指挥。

到 1966—1967 年度,国防军数量在联盟内部的排名及军队数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军队规模排名而言,在总排名中,联邦德国前进了两位,即由 60 年代初期的第六位升至第四位。在北约欧洲成员国排名中,联邦德国已经位居第二,仅仅排在法国之后;在数量对比上,联邦德国军队有 44 万人,除与排名第一的美国(309.4 万)仍然相差悬殊外,与其他排名在其前面的国家的实力相差不大。联邦德国军队与第二名法国的 52.3 万人相比,相差 8 万左右,与第三名土耳其的 45 万人相比,则只有 1 万的差距了。[②]另外,由于法国在 1967 年完全实质性地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③]这样,就参与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的国家而言,联邦德国已经排名第三,在欧洲国家中则排名第一了。

---

①② (比利时)罗贝尔·克洛兹:《欧洲有没有防务?——可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四十八小时》,施谋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 222 - 224 页。

③ 法国政府虽然在 1966 年 3 月 10 日和 29 日向北约其他十四个成员国递交的备忘录中就已经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但其驻联邦德国部队仍然留驻,要从 1967 年 7 月 1 日起才不再受欧洲盟军司令部的管辖。

联邦德国在联盟内的重要性之所以增强，主要在于北约主要国家的军队实力发生了消长变化。联邦德国由于重视常规部队建设而实力大增，法国、英国由于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体系瓦解不再需要大量海外驻军维护殖民利益而大力削减常规部队，联邦德国正是得益于这种大消大长的变化而脱颖而出。

当然，也不能夸大联邦德国国防军的地位。因为，当时的军力对比是非常微妙的。排在联邦德国之后的英国有军队 43.7 万，[①]这与联邦德国相差无几。

尽管如此，总的来说，这个排名和军队对比表明，联邦德国国防军已经成为北约常规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邦德国国防军在北约内所占有的上述地位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初，而且随着美国驻欧部队的减少，它在北约欧洲的地位进一步增强。1966 年，美国驻欧部队为 36.5 万人，1968 年减为 30 万人，[②] 1971 年 9 月 30 日更是降至 26 万人。[③]

到 1972—1973 年度，北约各国军队数量的排名再次洗牌。联邦德国国防军达到 46.7 万，在北约内排在美国的 239.1 万和法国的 50.0 万之后，[④]已位居第三了。在北约欧洲成员国中，则仅次于法国位居第二。然而，就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组织而言，国防军数量已排名第二，并在欧洲成员国中独占鳌头了。与排在其后的意大利的 42.8 万相比，国防军要高出 4 万，与英国（排在意大利之后）相比，国防军高出的数量多达 9.5 万。

---

① （比利时）罗贝尔·克洛兹：《欧洲有没有防务？——可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四十八小时》，施谋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 222—224 页。

② （联邦德国）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 399 页。

③ *Hearings Before the Special Subcommittee on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Commitments of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2, p. 13168.

④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5—197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5, p. 22.

此后几年，联邦德国进一步加强了在北约的这种地位。如，到1975—1976年度，联邦德国国防军达到49.5万，[①]接近《伦敦—巴黎协定》的最高限额，虽然也是位居第三，但比法国仅少0.75万。在北约欧洲成员国中，联邦德国国防军数量也是仅次于法国军队。如果就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组织而言，国防军数量仍然排名第二，并在欧洲成员国中仍然独占鳌头。与排在其后的欧洲国家意大利的42.1万相比，[②]国防军要高出7万多，与英国（排在意大利之后）相比，高出的数量则多达15万。

从1976年开始直到两德统一前这段时期，北约各国军队的数量虽然各有增减，但联邦德国在北约内的总体排名和在北约欧洲成员国中的排名基本不变，而且还进一步加强了自1972—1973年度以来在北约中的地位。在这12个年度里，联邦德国有6个年度在北约整体排名中位居法国之前而仅次于美国。[③] 在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中，

①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5—197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5, pp. 78—79;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6—1977*,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6, pp. 80—81, 83;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7—1978*,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7, pp. 84—85, 87;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8—1979*,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8, pp. 88, 90—91.

②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5—197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5, pp. 22, 78;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5—197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6—1977, 1976, p. 80;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5—197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7—1978, 1977, p. 84;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8—1979*,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5, p. 90.

③ 1976—1977年、1978—1979年、1979—1980年、1981—1982年、1986—1987年和1987—1988年度，法军数量比联邦德国国防军多；而1980—1981年、1982—1983年、1983—1984年、1985—1986年、1988—1989年和1989—1990年度，联邦德国国防军比法军多。

不仅如此,联邦国防军数量比排在其后的意大利军队最低高出18%,有7万,最高高出41%,有14万;与英国军队相比,联邦德国国防军最低时也高出44%,有15万,最高时则高出60%,多达18.5万。

无可争辩的数据表明,这段时期联邦德国国防军数量在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的欧洲国家中始终雄居第一。也就是说,从数量上考察,联邦德国国防军从70年代初期起就成了北约的欧洲支柱。

如果对比北约的前沿部队(北约在中欧的部队),则联邦德国国防军的数量在北约中的比重会更大、地位也更重要。据联邦德国1975—1976年国防白皮书统计,国防军陆军包括野战军陆军12个师(36个旅)和国土防卫军共30多万人,占北约中欧盟军总数的50%。另外,受过训练、随时可以征兆的预备役人员达200万(每年有10万人以上被召去接受时间长短不等的训练);空军占北约中欧盟军总数的1/3,共11万多人,作战飞机24个中队,飞机总数近500架,还有24个"奈克—大力神"地对空导弹连和34个"隼式"导弹连的防空部队;海军近4万人。有3个驱逐舰中队,1个护卫舰中队,4个快艇中队,2个潜艇中队,6个扫雷舰中队和1个登陆艇中队,活动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此外,还有4个中队驱逐轰炸机和F-104G型侦察机(72架),以及1个中队布雷盖公司的大西洋式飞机。[①] 其后,国防军在中欧北约盟军的这种地位不仅得到了巩固,而且还略有加强。如至1981年,国防军占北约部署在中欧的地面部队的50%,地面防空力量的50%,各类型作战飞机的30%。为了保卫北部沿海,联邦德国提供了大约全部可供使用的欧洲海军的1/3,占北约部署在波罗的海海军的70%,海上空军力量的100%。所有划归北约的联邦国防军部队都是满员的,在北约内战斗力最强。为了提高北约的常规战斗力,联邦德国从1982年开始又另增2个旅的国土防御部队划归北约指挥,再调整4个旅以便同其他北约国家的武装力量合作或置于北

① (比利时)罗贝尔·克洛兹:《欧洲有没有防务?——可以改变世界的四十八小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4—166页。

约司令部领导之下，再建6个旅的国土防御部队作为地方预备部队，同意把海军作战行动的区域扩大至北部地区，使北约司令部实施的灵活作战方案成为可能，并提供约9万后勤人员，为美国增援部队迅速投入战斗作好准备。[①] 两德统一前夕，北约盟军在联邦德国的驻军约38万，即美国2个军，包括4个师、1个旅和5个空军中队，约有24万人；英国4个师，约为5.5万人，法国3个师，约为5万人，比利时2个师，约为3万人，加拿大和荷兰各1个旅。[②] 当时联邦德国军队却有49.4万，[③]比北约盟国驻军多10多万。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军队数量而言，联邦德国国防军从70年代初期开始就已成为中欧地区北约盟军的核心力量。

当然，一个国家军队的实力如何，不能只看其数量，还要看其装备怎样。据统计，在这段时期里，联邦德国国防军就是除美军以外的北约国家军队中装备最好的。以1976年为例(详情见附表)：

主战坦克：联邦德国有1400辆，仅次于美国，比排在其后的法国多32%，比第四名英国多54%。

中轻型坦克：联邦德国有2437辆，排在美国和土耳其之后，但在北约欧洲盟国中排名第一，比第四名意大利多62%，是第五名希腊和第六名法国的2倍。

装甲车：联邦德国有7736辆，仅次于美国，比排在其后的英国多43%，比第四名意大利多90%，比第五名荷兰多287%，是第六名土耳其的4.7倍。

精确制导武器：联邦德国有1516件，排名第一，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土耳其、比利时八国的总和还多。

陆军直升机：联邦德国有550架，排名第三，与排名第二的法国相当，比第四名英国、第五名意大利多70%，是第六名荷兰的近5倍。

---

① Weissbuch 1983, *Herausgegeben vom Bundesminister der Verteidigung*, Seite 125 – 126.

② 张炳杰：《德国——历史与现状》，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

③ 吴学永：《论德国安全政策》，北京：北京大学，199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9页。

主战舰艇:联邦德国有 17 艘,排名第六。

轻型舰艇:联邦德国有 56 艘,仅次于美国,比荷兰、丹麦多 10 艘,比第五名法国多 24 艘,是第六名葡萄牙的 2 倍。

潜艇:联邦德国有 24 艘,排名第三。

扫雷艇:联邦德国有 57 艘,排名第一,比第 2-6 名的意大利、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分别多 14、13、19、20、28 艘。

海军战斗机:联邦德国有 139 架,仅次于美国。

海军直升机:联邦德国有 63 架,排名第四。前三名美、英、法分别为 426、129、70 架。

战斗机:联邦德国有 509 架,排名第四。前三名美、法、英分别为 3400、557、550 架。

空军直升机:联邦德国有 117 架,排名第四。前三名美、法、意分别为 422、197、130 架。

表 3-1　1976 年北约各国军队的主要装备

国家	主战坦克	中轻型坦克	装甲车	精确制导武器	陆军直升机	主战舰艇	轻型舰艇
美　国	6700 (1)	5375 (1)	22000(1)	905①(2)	8000 (1)	175(1)	69 (1)
西　德	1400 (2)	2437 (3)	7736 (2)	1516 (1)	550(3)	17 (6)	56 (2)
法　国	1060 (3)	1120 (6)	1392 (7)	92①(8)	552(2)	53 (3)	32 (5)
英　国	910 (4)	271 (10)	5395 (3)	101①(7)	384 (4)	75 (2)	23 (7)
意大利		1500 (4)	4030 (4)	172①(3)	372 (5)	19 (5)	13 (8)
荷　兰		810 (7)	2000 (5)	106①(5)	90 (7)	15 (7)	46 (3)
加拿大		255 (11)	1122(10)	103②(6)		21 (4)	6 (12)
土耳其		4450 (2)	1650 (6)	18②(9)	168 (6)	14 (9)	
比利时		604 (8)	1390 (8)	113②(4)	74 (8)	2 (13)	8 (11)
挪　威		186 (12)	nd④	nd④	nd④	5 (12)	13 (8)
丹　麦		308 (7)	698 (11)	nd④	12 (10)	7 (10)	46(13)
希　腊		1170 (5)	1130 (9)	nd④	72 (9)	15(7)	13 (8)
葡萄牙		115 (13)	4②(12)			7 (10)	28 (6)

表 3-2　1976 年北约各国军队的主要装备(续)

国家	潜艇	MCMs	海军战斗机	海军直升机	战斗机	空军直升机
美　国	78 (1)	3 (12)	156③(1)	42③(1)	3400 (1)	422 (1)
西　德	24 (3)	57 (1)	139 (2)	63 (4)	509 (4)	117 (4)
法　国	21 (4)	38 (4)	111 (3)	70 (3)	557 (2)	197 (2)
英　国	31 (2)	43 (3)	26 (4)	129 (2)	550 (3)	71②(5)
意大利	8 (7)	44 (2)		56 (5)	336 (5)	130 (3)
荷　兰	6 (8)	37 (5)	23 (5)	19 (6)	162 (9)	
加拿大	3 (11)				210 (8)	
土耳其	14 (6)	25 (7)	10 (6)	15 (7)	319 (6)	30 (9)
比利时		29 (6)		4 (9)	144 (11)	8 (10)
挪　威	15 (5)	10 (9)			145 (10)	42 (7)
丹　麦	6 (8)	8 (10)	8 (7)		116 (12)	8 (10)
希　腊	6 (8)	14 (8)		5 (8)	235 (7)	38 (8)
葡萄牙	3 (11)	7 (11)			52 (13)	46 (6)

注:① 1973 年数字。

② 这是已知数字,实际数字超过表中数量。

③ 包括海军陆战队的数字在内。

④ 即,no details available, though country known to possess these weapons.

⑤ 括号内数字为排名。

⑥ 本表根据 Gavin Kennedy. *Burden Sharing in NATO*,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79. 和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7—1978*,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7. 提供的资料制作。

以上分析表明,在精确制导武器和扫雷艇数量上,联邦德国不仅排名第一,而且比其他国家都具有压倒性优势;在主战坦克和装甲车数量上,联邦德国比美国以外的北约国家都具有压倒性优势;在中轻

型坦克数量上，联邦德国在北约欧洲盟国中具有压倒性优势；在陆军直升机和海军战斗机数量上，联邦德国在北约欧洲盟国中处于优势地位；在潜艇、海军直升机、战斗机、空军直升机数量上，联邦德国处于中等地位。综合这些因素可以看出，在除美国以外的北约各国军队中，联邦德国国防军装备最为精良，其中，陆军装备更是具有压倒性优势。

总的来说，联邦德国国防军在北约常规力量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前期。在这一阶段，在中欧地区的北约盟国军队中，国防军所占份额已在 40% 上下，已成为一支主干力量；在北约欧洲盟国中，国防军尽管排名第四，但所占份额只有 1/10 左右，如 1960 年为 9.1%，1961—1962 年为 11.6%，还不是主干力量；就北约总体而言，国防军在 14 国中排名第六，处于中等地位，不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阶段：从 6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初期。在中欧地区的北约军队中，国防军所占份额不仅达到了 50%，而且还几乎两倍于其后的美国驻军，这样，它就从中欧地区北约军队的一支主干力量发展成为该地区的支柱；在北约欧洲盟国中，联邦德国国防军排名第三，所占份额已比 60 年代前期翻了一倍，达到 20% 左右，成为北约欧洲盟军的主干力量。另外，由于法国从 1967 年起就完全实质性地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所以排在其后的联邦德国在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内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北约欧洲盟军头号常规军事大国；在北约整体上，国防军数量也位居前列，在 14 国的排名中升至第四，成了北约军队的重要力量。

第三阶段：从 70 年代初期到两德统一前。在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内，国防军在欧洲盟军中虽然所占份额与第二阶段相当，也在 20% 左右，但其数量不仅最多，而且还大大高出排在其后的意大利和英国而独占鳌头。同时，在主要武器装备上最为精良。这两大优势加上其士兵训练有素、军纪严明，使国防军成了欧洲战斗力最强的北约军

队,亦即从北约欧洲盟军头号常规军事大国变为头号常规军事强国,从中欧地区北约盟军的支柱发展成了整个欧洲地区北约盟军的支柱。

简而言之,联邦德国国防军在北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一个漂亮的"三级跳",经历了"北约中欧盟军的主干力量—北约中欧盟军支柱—北约的欧洲支柱"的递进式发展过程。在两极格局中来考察,这一过程也是联邦德国对北约抗衡华约中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的发展过程。

当然,也要认识到,联邦德国军力发展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首先,联邦德国国防军没有建立统一的总参谋部,并且是将军队全部交给北约组织指挥的唯一成员国,这就排除了国防军独立发展的可能。其次,1954年修订的布鲁塞尔条约第二号和第三号议定书给联邦德国规定了一些限制:常规兵力不得超过12个师、50万人和1000架作战飞机,水面舰只排水量最大不超过3000吨,潜艇不超过350吨,并禁止在其领土上自行生产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某些常规武器。第四号议定书规定,建立一个隶属于西欧联盟的军备控制署,负责检查这些条款的执行情况。巴黎的限制性条款也不允许它以北约其他的主要欧洲成员国法国和英国的同等规模来发展自己的军备工业。这些规定对联邦德国军备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其军队装备。再次,联邦德国境内强大的美国驻军的存在相对降低了国防军在北约中的作用。最后,联邦德国境内北约兵力部署的相互重叠客观上妨碍了国防军自身的调动。

第二节 联邦德国对北约防务费的贡献

从以各国货币单位计算的军费及其增长幅度、以各国货币单位计算的军费平均增长率、各国占北约防务费和北约欧洲成员国防务费的份额、各国防务费占国家开支的比例、各国人均防务费、各国占基础设施费用的份额等方面来考察,联邦德国对北约的防务费都作

出了重大贡献。具体来说：

一、在以各国货币单位计算的军费及其增长幅度方面

以市场价格计算，加入北约时，联邦德国的军费开支为73.83亿马克，5年后增加到了121.15亿马克，[①]净增47.32亿马克，增长率为64.1%。同期，在北约其他主要成员国中，法国军费从110.20亿新法郎增加到191.62亿新法郎，净增81.42亿新法郎，增长73.9%。意大利从5.51亿里拉增加到7.1亿里拉，净增1.59亿里拉，增长28.9%。英国从15.65亿英镑增加到16.57亿英镑，只净增0.92亿英镑，增长5.9%。在增长率上，联邦德国是意大利的2.2倍，英国的近11倍。与法国相比，从直观数据上看，联邦德国比法国低10多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法国除去这一时期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巨额花费，则联邦德国的增长率比法国高。

在1960—1967年期间，联邦德国军费从121.15亿马克增加到214.08亿马克，[②]净增92.93亿马克，增长76.7%。同期，意大利军费从7.1亿里拉增加到13.59亿里拉，净增6.9亿里拉，增长91.4%。法国军费从191.62亿新法郎增加到289.12亿新法郎，净增97.50亿新法郎，增长50.9%。英国从16.57亿英镑增加到22.76亿英镑，净增6.19亿英镑，增长37.3%。这样，在这些主要的北约欧洲成员国中，联邦德国军费的增长幅度只次于意大利，比法国高近26个百分点，是英国的2倍。

在1967—1973年期间，联邦德国军费从214.08亿马克增加到319.08亿马克，[③]净增105.00亿马克，增长49.0%。同期，意大利军费从13.59亿里拉增加到23.92亿里拉，净增10.33亿里拉，增长76.0%。英国军费从22.76亿英镑增加到35.05亿英镑[④]，净增12.29亿英镑，增长54.0%。法国军费从289.12亿新法郎增加到422.84亿新法郎，净增133.72亿新法郎，增长46.3%。与意、英、法

①②③④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NATO: Facts and Figures*. Brussels: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1976, pp.296—297. 以下法国、意大利、英国同类数据资料来源与此同。

相比,联邦德国增长幅度只略高于法国,而比意、英两国低,但从绝对数来看已经很高了。

从1955—1973年这一长时段来考察,联邦德国军费增长了332.2%,与意大利相当,比法国和英国分别高49和218个百分点。

二、以各国货币计算的军费指数平均增长率

以市场价格计算,1960—1974年,西德军费的年均增长率为8.1%,[①]在北约各国军费增长率排名中排名第八,落后于意大利两个名次,但领先于英国3个名次,领先于法国4个名次。在北约主要欧洲成员国中,西德这一增长率只次于意大利的9.9%,[②]比法国和英国则分别高1.3和2个百分点;若以不变价格计算,西德的军费年均增长率为4.2%,[③]在北约各国增长率排名中排到了第六位。西德的这一排名不仅大大领先于英国和法国,而且超过了以市场价格计算的军费增长率排名在其前的意大利。从年均增长率的具体对比来看,西德虽然只略高于意大利,但比英国和法国都高3.7倍。

三、在北约防务费和北约欧洲成员国中的份额方面

以1970—1976年为例,1970年,联邦德国军费为70.67亿美元,高于法国的59.82亿美元、英国的59.50亿美元,是意大利25.99亿美元[④]的2.7倍,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在北约防务费总额和北约欧洲成员国防务费总值中,联邦德国军费分别占6.80%和28.27%,而法国、英国、意大利分别是5.76%和23.93%、5.72%和23.80%、2.50%和10.40%。1972年,联邦德国军费为95.31亿美元,分别比法国的62.38亿美元和英国的69.68亿美元高52.8%、36.8%,是意大利32.51亿美元的近3倍。在北约防务费份额中,联邦德国军费提高到8.21%。在北约欧洲成员国防务费份额中,联邦德国军费首

①②③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5—197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80.

④ Gavin Kennedy. *Burden Sharing in NATO*,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79, p. 41. 以下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的同类数据来源相同。

次超过30%,达到31.65%。1973年,联邦德国军费剧增到140.44亿美元,大大高于法国的84.38亿美元、英国的86.73亿美元、意大利的39.97亿美元,分别是它们的1.7倍、1.6倍和3.5倍。在北约防务费总额中,联邦德国军费所占份额首次超过了10%,达到11.42%。在北约欧洲成员国防务费份额中,联邦德国军费继1972年后又迈上新台阶,超过1/3,高达34.62%,而法国、英国分别为20.80%、21.38%,意大利则只占9.85%。1974—1976年,联邦德国军费在北约防务费总额中所占份额都超过了10%,在北约欧洲成员国防务费总值中所占份额都超过了1/3。具体而言,在这三年中,联邦德国军费分别达到了166.88亿美元、195.40亿美元、187.58亿美元。与北约其他主要成员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相比,联邦德国军费远比它们高,分别是它们的1.4~1.7倍、1.6~1.7倍和4.0~4.9倍。

此后,尽管联邦德国军费所占份额虽然有所减少,但仍然可观。如,80年代初期,在北约防务开支的欧洲份额中,联邦德国负担的比例仍然高达29.2%。[①] 总的来说,就北约的欧洲防务开支而言,联邦德国在北约预算的欧洲份额中最高,而且要比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主要欧洲成员国高得多。

四、在防务费占国家开支的比例上[②]

以1961—1976年为例。1961—1967年,从各成员国防务费占本国国家开支比例的对比来看,联邦德国只次于美国和葡萄牙,每年都排名第三,最高比例有35.3%,最低也有32.2%。同期,在北约其他

① *Weissbuch 1983*, Herausgegeben vom Bundesminister der Verteidigung, Seite 124—127.

② (比利时)罗贝尔·克洛兹,施蘖仁等译:《欧洲有没有防务?——可以改变世界的四十八小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0页;Kenneth A. Myers. *NATO——The Next Thirty Years: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Setting.* New York: Westview Press, Inc, 1980, p.407; Gavin Kennedy. *Burden Sharing in NATO*,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79, p.40.

主要欧洲成员国中,法国最好排名只是两年排名第五,另三年则排名第六,防务费占国家开支的最高年份为27.2%,最低年份为22.7%。英国虽然最好排名达到了第四,但另外四年各有两年排名第五、第六,防务费占国家开支的最高年份为27.8%,最低年份为21.3%。意大利最好排名却排在第八名,另外四年更是排在了倒数第四的位置,防务费占国家开支的最高年份为19.8%,最低年份只有13.7%。与法、英、意三国相比,联邦德国的排名不仅靠前,而且防务费占本国国家开支的比例比它们同类比例高得多。

从1968年开始到1973年,联邦德国防务费占本国国家开支比例在各成员国中都排名第三,最高年份的比例达到了31.8%,最低也有28.2%。同期,在北约其他主要欧洲成员国中,法国排名最好的一年为第四,最差的一年排到了第七,其他四年各有两年排名第五和第六,防务费占国家开支比例的最高年份为21.7%,最低年份为18.6%。英国排名最好的一年为第四,最差的三年则排到了第七,防务费占国家开支比例的最高年份为21.1%,最低年份则不及10%,只有9.4%。意大利排名最好的两年也排到了第九名,最差的一年则排到了倒数第三,其他三年也排到了倒数第四,防务费占国家开支比例的最高年份为13.5%,最低年份只有10.6%。这样,就这段时期的排名来看,与法、英、意三国总体上都比1961—1967年倒退不同,联邦德国不仅始终保持了第三的位置。在防务费占本国国家开支的比例上,前三国不仅比1961—1967年下滑了,而且最高年份也只有20%左右,有的国家甚至在某些年份低于10%,而联邦德国虽然比1961—1967年也有所下滑,但仍然保持30%左右的比例。

1974—1976年,联邦德国防务费占本国国家开支的比例已跃居北约第二位,而且其比例都接近30%。相比之下,法、英、意三国的排名虽然也有所上升,但它们的防务费占本国国家开支的比例要低得多,分别低9、18、20个左右的百分点。

五、在人均防务费方面

长期以来,联邦德国的人均防务费仅次于美国,排在北约主要欧

洲国家的首位。以1972—1976年为例:在具体数量上,联邦德国的人均防务费比北约其他主要欧洲成员国高。1972年,联邦德国的人均防务费为146美元,[①]略高于法、英两国,分别比它们多4和5美元,是意大利的2倍多;1973年,联邦德国的人均防务费为215美元,比法、英两国分别高13.8%、33.5%,是意大利的2.9倍;1974年,联邦德国的防务费比法、英两国约高28.4%,是意大利的3倍;1975年,联邦德国的人均防务费比法、英两国分别高11.6%、41.3%,是意大利的3.4倍;1976年,联邦德国的人均防务费为242美元,[②]虽然比1975年略有减少,只比法国多1美元,但比英国高27.4%,是意大利的3.6倍。

在排名上,联邦德国这段时期的人均防务费都在北约中排名第二,在欧洲盟国中排名第一,同期,法国、英两国的最好排名虽然分别排到了第三和第四,但最差排名则分别为第六和第七,而意大利的最好排名也排到了第十位,最差时则排到了倒数第二。

六、在所承担的北约基础设施费用方面

在北约全部基础设施的规划中,联邦德国支付的费用居欧洲盟国之首。北约组织的基础设施供整个联盟使用,包括机场、交通网和弹药库等静态设备。建设基础设施所需资金由北约的集体储备来支付。按照规定,集体储备由各国根据北约理事会一致同意的百分比为基础,以捐助的形式建立。对于基础设施承担的份额,北约理事会最初在1956年初曾作出规定,此后又在1960年作了相应的修订。根据这些规定,联邦德国所承担的份额为13.72%,仅次于为美国的

①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5—197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5, p.76. 以下1973—1975年同类数据出处与此同。

②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6—1977.*,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78.

36.98%，高于法国的11.87%和英国的9.88%。[①] 然而，联邦德国所承担的上述份额还只是账面上的数字，实际数字几乎翻了一倍，超过了北约基础设施总费用的1/4，高达26.76%，[②]大大超过法国和英国。

还有一点常常被忽视但又非常重要的是，联邦德国向盟国驻军所提供的土地和住房。实际上，它被盟军所占用的土地比任何一个盟国要多，高达152300公顷(包括西柏林供盟军使用的2500公顷)。以货币计算，这些地产如果用于民用的话，每年的使用价值达20亿马克。同时，联邦德国提供给北约盟国士兵的家属住房也达到了惊人的131866套，其中89795套住房是完全免费的。光美军就得到住房67200套，其中无偿住房56195套。联邦德国每100套住房就有一套是由武装力量的家属居住的。[③]

第三节 联邦德国从“有国无防”状态发展成为北约欧洲支柱的原因

从1955年加入北约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短短20年里，联邦德国从建国初期的“有国无防”状态一跃而成为北约的欧洲支柱。此后，这种支柱地位不仅得以保持，而且还得到加强。它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跨越式转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在联邦德国推行安全政策的过程中，军事实力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由于战后的特殊处境和冷战时期的特殊地位，联邦德国对安全

---

① Alastair Buchan. *NATO in the 1960s: The Implic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London: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y Studies, 1960, p. 112.

② Bruce George. *Jane's NATO Handbook: 1989—1990.*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Limited, 1989, p. 333.

③ *Weissbuch* 1983, Herausgegeben vom Bundesminister der Verteidigung, Seite 124—127.

问题特别重视，并因此将安全政策置于国家政策的首位。加入北约前，联邦德国虽然对安全问题重视，但是，由于没有外交主权，安全问题完全由西方占领国美、英、法三国负责，所以没有安全政策可言。1955 年加入北约后，联邦德国才在北约范围内制定自己的安全政策。

从加入北约到两德统一前，联邦德国的安全政策先后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阶段，从加入北约到阿登纳 1963 年离职[②]这段时期，联盟政策成为联邦德国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第二阶段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和库特·基辛格政府时期。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为避免危机期间剑拔弩张局面的出现，美、苏两国都开始调整自己的战略，在竞争的同时开始进行有限合作，奉行维持现状的政策，相互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以此为契机，联邦德国将安全政策转变为以东方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缓和政策，松动和改善同东欧国家的关系；第三阶段，从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末，亦即勃兰特政府和施密特第一任政府时期。这段时期，由于东西方关系进入缓和状态，联邦德国进一步加强了前一时期的"缓和政策"，大张旗鼓地推行"新东方政策"。"新东方政策"的目标不仅是要松动和改善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而且要发展同它们的关系，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大缓和政策；第四阶段，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在这一阶段，联邦德国一方面继续保持同东方集团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东西方再次进入严重对峙时期，联邦德国在加强与西方联盟关系的同时，又大力推行均势政策。

在推行以上安全政策的过程中，联邦德国认为，对北约组织的贡献与经济实力同为政治潜力依靠的两个主要因素，[③]又是促使"德国

① 参见吴学永博士学位论文：《论德国安全政策》，北京：北京大学，1994 年，第 18—19 页。

② 阿登纳先后四次组阁。前三次执政时期分别是 1949—1953 年、1953—1957 年、1957—1961 年，第四次开始于 1961 年，任期至 1965 年，但在 1963 年就提前离职了。

③ Helmut Schmidt. *The Balance of Power: Germany's Peace and the Super Powers*, London: William Kimber & C. Limited, 1971, p. 155.

对民族意志和民族地位的自我意识增强"①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而对北约的贡献又主要体现在军队实力即联邦国防军的规模和质量上。

正因为如此，联邦德国历届政府都重视国防军建设。阿登纳执政时期，尽管热衷于对国防军进行核装备，但十分重视常规军事力量建设。他曾对美国1956年6月提出的大幅度削减常规部队的雷福德计划进行了抨击。他认为，该计划隐藏着对德国人的极大危险，如果实现的话，美国将会袖手旁观不能进行干涉，因为干涉意味着一场原子战争。7月，阿登纳在联邦议院辩论时明确声明，反对有利于片面地改用原子武器装备的举措，把重点放在优先发展原子武器上是错误的，人们应该尽一切力量阻止核战争。如果西方削减它的常规防务力量，俄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军队就将在欧洲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② 8月25日，他与美国国务卿的弟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会晤时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的法国武装部队几乎全部驻在北非，英国将撤走它的海外兵力，对此我并不见怪它们；而且我们才刚刚开始扩军。如果美国也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显著地减少它的常规部队的兵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会垮台。"③从这些不难得出结论，阿登纳既然担心盟国削减常规军事力量会损害甚至搞垮北约，并且使苏联在欧洲处于军事优势地位，那么除了反对盟国的这种举措外，大量增加本国常规军事力量就成了必然选择。

路德维希·艾哈德、库特·基辛格政府时期，由于多边核力量计划破产和联邦德国在不扩散核条约上签字，所以更加重视常规力量建设。1966年12月，在基辛格政府担任副总理兼外长的维利·勃兰特在北约理事会巴黎会议召开前夕说，维护和重建东西方政治和军事均势——如果它在某些方面被破坏的话——一直是联盟所要完成

---

①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5, p.156.

②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5—195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27—230页。

③ 同上，第241页。

的任务，只有均势才能制止侵略和政治威胁；加强防务是（联邦）德国安全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它为了均势目标而积极参与推行的政策，它表现为联盟内联邦德国受到赞许的高额防务开支。他坦言，（联邦）德国在联盟内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整个防务所作的贡献，而（联邦）德国之所以在大西洋联盟中有参与决策权，是因为国防军在北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联邦政府仍将给予国防军必要的支持和必需的资金，使它能够完成保卫和平的使命和维护（联邦）德国在联盟内的影响。勃兰特还明确表示，对于每一项旨在加强联盟内军事合作、节省开支和提高武装力量战斗力的倡议，联邦政府都给予大力支持。1968 年，勃兰特还在一次演讲中强调，“现在还继续讨论德国军国主义的危险，这简直就是不正确的了”，联邦武装力量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而是联盟内部的防务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如果我们的盟国大大削减其在欧洲大陆上的军事力量之后，有朝一日又认为联邦国防军过于庞大了，这是简直不能容忍的。”①

勃兰特担任总理后更加重视国防建设，并将联邦德国防务政策的原则概括为 5 个方面②，即均衡原则、防御原则、保护和忠于联盟原则、手段和使命相称原则、国家安全利益原则。在论述这些原则时，勃兰特指出，任何防务政策都是以维持欧洲均势为基础的。东西方之间保持军事力量的平衡是西欧安全和联邦德国缓和政策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保持军事平衡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约的军事实力。要确保这些东西，联邦德国必须作出同自己军事地位相适应的贡献。他还强调，尽管有保护联盟和军事机构的必要，联邦共和国的安全不能只依赖北约组织的效能，因为联邦德国虽然效忠于它，但

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克·哈普雷希特：《维利·勃兰特——画像与自画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 277—278 页。

② Helmut Schmidt. *The Balance of Power: Germany's Peace and the Super Powers.* London: William Kimber & C. Limited, 1971, pp. 231—233.

它仍可能丧失凝聚力和重要性。因此，必须使联邦共和国在联盟及其机构内的政治作用和军事作用适应本国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变动频繁的情况以及相应变动的要求。

在勃兰特之后继任总理的施密特在勃兰特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均势战略，特别是建立对东方的军事均势，这使得他毫不松懈地加强国防军建设。

由于历届政府的重视，国防军发展迅猛。正是在阿登纳至施密特政府时期，联邦德国从"有国无防"状态发展成了北约的欧洲支柱。此后，坚持联盟政策的科尔政府继续维持并加强了这一地位。

二、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国防军的高额军费开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后，联邦德国经济发展战略得当，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在工业生产方面，1948 年，联邦德国的前身西占区的工业生产只占资本主义世界的 3.6%，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也不及英国和法国。然而，到 50 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在超过法国后又超过英国，从而在 20 世纪中第三次跃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工业强国，这一地位保持了 20 年之久，直到 70 年代中期才被日本超过。此后，联邦德国虽然屈居第三，但是，由于日本不是北约成员国，联邦德国仍然占据北约集团第二工业强国地位。当 1976 年日本超过联邦德国时，联邦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 9.2%，远远超过北约其他主要欧洲盟国法国(6.4%)、英国(4.4%)和意大利(3.4%)。

在对外贸易方面：1950 年，联邦德国商品出口额为 19.93 亿美元，只占资本主义世界的 3.5%，居第五位。1960 年，达到 114.15 亿美元，超过英国的 106.9 亿美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1981 年，增加到 1760.9 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的 9.9%。在商品出口急剧扩大的同时，联邦德国的进口也迅速增加。1965 年，联邦德国的商品进口额也超过了英国，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到 1981 年，联邦德国的商品进口额为 1639.14 亿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比例达到了 9.0%。

在国际储备方面:1950年,联邦德国只有外汇储备1.9亿特别提款权,只占资本主义世界总额的0.4%。到1971年,已猛增至171.84亿特别提款权,超过美国,跃居资本主义世界首位。1981年,联邦德国的国际储备达402.92亿特别提款权,是美国的1.6倍、法国的1.9倍。

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1950年,联邦德国折合233.4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8.2%、英国的62.5%、法国的81.0%。50年代后半期,联邦德国已经超过了法国,1960年又超过英国。到1980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折合8207.6亿美元,已相当于美国的31.2%、英国的156.9%、法国的125.1%。

在人均收入方面:1950年,联邦德国只有419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4.3%,也低于法国和英国。1960年,达到1209美元,已相当于美国的47.5%,低于英国的1272美元,但略高于法国的1209美元。1970年,联邦德国的人均收入增加到2759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2.5%,高于法国的2538美元和英国的2042美元。[①] 5年后,联邦德国人均收入高达6409美元,把法国(5521美元)和英国(3725美元)远远甩在后面,并一举超过美国(6351美元),位居北约国家榜首。[②]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1981年才被美国重新夺回。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使国防军得到了雄厚的军费支持。

三、联邦德国民众的支持使联邦德国既保证了扩军的顺利实施,又保护了扩军的成果,从而使联邦德国既获得了北约的欧洲支柱地位,又巩固和加强了这种地位

联邦德国之所以从零开始,在短短20年内建立成一支近50万规模的庞大军队,进而从“有国无防”状态发展成为北约的欧洲支柱,

①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62页。

② Gavin Kennedy. *Burden Sharing in NATO.*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79, p. 63.

并且长期保持这种地位,固然与其安全政策和经济实力有关,但是,如果没有民众的强大支持,要实现这种跨越式转变是不可能的。

由于联邦德国处于东西方对抗的前沿,联邦德国民众对国家安全问题极为关心,这种关心又由于政府对国防的重视而增强。这样,在国家经济实力强大的情况下,大部分民众支持国防建设。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长期对政府的扩军规模持肯定态度,反对北约裁军。如,民意调查表明,在1969、1976、1979、1980年里,反对北约裁军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达到59%、55%、57%、66%,[①]比赞成北约裁军的人的比例分别高出47、45、43、55个百分点。(详情见表3-3)

表3-3 1969—1980年,联邦德国民众对北约裁军的态度

("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北约减少军队?")

调查时间	赞成	反对	不确定	不了解
1969年1月	12	59	29	n. a
1976年3/4月	10	55	24	11
1979年9月	14	57	16	13
1980年2月	11	66	17	6

资料来源:Office of the Federal Chancellor (West Germany). *Dreissig Jahre NATO*, Collection of Surveys Marking 30th Anniversary of NATO Alliance, Bonn: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1979; *NATO in the* 1980*s——Challenges and Response.*

另一方面,由于第一方面的原因,大部分民众也支持政府的国防预算。以1969—1976年为例,据有关机构统计,在1969、1971、1972、

① Office of the Federal Chancellor (West Germany). *Dreissig Jahre NATO.* Collection of Surveys Marking 30th Anniversary of NATO Alliance, Bonn: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1979, p. 36.

1973、1974、1975、1976年份里，对政府增加国防预算持支持态度（在政府增加预算时表示支持或希望政府进一步增加预算）的成年人的比例分别有52%、58%、49%、49%、51%、52%、60%，[①]这比持反对态度的人的比例分别高21、20、11、14、17、14和33个百分点。详情见表3－4：

表3－4　1969—1976年联邦德国民众对政府防务开支的看法

1. 认为联邦德国防务费“太多”或“非常多”的人在各年龄段的比例（%）

年份	总计	16—24岁	25—29岁	30—49岁	50—64岁	65+
1969年	31	38	35	31	30	27
1971年	38	45	43	39	31	33
1972年	38	44	41	40	35	29
1973年	35	43	36	37	30	29
1974年	34	41	46	34	30	26
1975年	38	44	39	37	32	37
1976年	27	37	31	26	25	22

2. 认为联邦德国防务费“太少”或“非常少”的人在各年龄段的比例（%）

年份	总计	16—24岁	25—29岁	30—49岁	50—64岁	65+
1969年	16	18	16	15	17	16
1971年	12	12	10	12	13	12
1972年	11	9	11	10	12	12
1973年	10	8	15	11	7	13
1974年	9	7	8	10	10	10
1975年	10	6	13	9	10	10
1976年	13	11	12	13	14	11

① Brady, Linda P., Kaufman, Joyce P. *NATO in the 1980s——Challenges and Response*, New York: Praeger, 1985, p. 242.

3. 认为联邦德国防务费“正好(适当)”的人在各年龄段的比例(%)

年份	总计	16—24岁	25—29岁	30—49岁	50—64岁	65+
1969年	36	30	31	37	38	40
1971年	46	41	44	46	50	49
1972年	38	36	38	38	38	39
1973年	39	33	39	37	44	39
1974年	42	39	32	45	44	39
1975年	42	37	40	44	44	38
1976年	47	38	47	50	50	45

资料来源：Brady, Linda P., Kaufman, Joyce P. *NATO in the 1980s——Challenges and Response.* New York: Praeger, 1985.

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长期较大幅度增加军费和维持高额军费开支的政策就会遇到极大的阻力甚至不可能实施。相反，正是在民众的支持下，联邦德国军费从1970年的70.67亿美元增加到了1976年的187.58亿美元，[①]增幅高达65.4%。

正是由于大部分民众在这两个方面的支持，联邦德国在国防建设过程中既减少了扩军压力，又减少了裁军压力，还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军费支持，从而不仅保证了扩军的顺利进行，使国防军最终成为数量最多的欧洲盟军，而且还保证了军队现代化的实施，使国防军的武器装备在美国以外的盟国中最为精良，成为欧洲盟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这些因素，又使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的欧洲支柱。也正是有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联邦德国才不仅获得了北约的欧洲支柱地位，而且还保护了扩军的成果，从而巩固这种支柱地位。

① Gavin Kennedy. *Burden Sharing in NATO.*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79, p.41.

四、北约各国军队实力的彼此消长乃至大消大长是联邦德国国防军在北约及北约欧洲成员国中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的外部条件

1960至1966—1967年度里，在建立武装力量的北约14国中，有10个国家的军队规模缩减了。其中，法国、英国、意大利分别减少了50.35万、15.54万、2.4万，这些国家除意大利的减幅只有6%外，其他国家的减幅都大，减少幅度最大的法国减少了49.1%，英国减幅也高达26.4%；与此相反，联邦德国不仅是军队规模增加的四国之一，而且其净增加数和增加幅度分别达到了18万和69.2%。另外，尽管联邦德国的增幅屈居葡萄牙之后，但其净增加数却是葡萄牙的2.6倍。正是在各国军队规模急剧的消长变化中，联邦德国国防军规模在北约欧洲国家中的份额翻了一番，排名从第四升至第三，并因此从北约中欧盟军的主力发展成为中欧盟军的支柱和欧洲盟军的主力，在北约整体排名中也从第六升至第四，从而成为整个北约的重要力量。

在1966—1967年度至1972—1973年度里，北约各国的军队规模又发生了重大的消长变化，又有7个国家的军队削减了。其中，英国和法国分别减少了6.53万和2.19万，减幅分别为14.9%和4.2%。与前段时期相同，联邦德国又是军队数量增加的国家之一，增加额和增加幅度分别达到了2.7万和6.1%。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军队数量尽管也增加了，但其总数都比联邦德国少。这样，北约各国军队规模经过这次消长变化后，联邦德国国防军不仅在北约欧洲国家中数量最多，而且还大大高出排在其后的意大利和英国而独占鳌头，从而从北约的中欧支柱一跃而成为北约的欧洲支柱。

从1960—1973年这一联邦德国军力发展最重要的时期来看，北约中有11个国家的军队缩减了。其中，法国和英国分别减少了52.54万和22.07万，减幅分别高达51.2%和37.2%。与此相反，联邦德国是军队人数增多的三个国家之一，增加额和增加幅度分别高达20.7万和79.6%。意大利的军队人数也增加了，但总数少于联邦德国。

另外,土耳其的军队规模在1960年虽然几乎两倍于联邦德国,高达50万,但是,到1973年,土耳其军队已经减少了5.1万,而联邦德国国防军却增加了20.7万。相比之下,土耳其军队减幅达到10.2%,而联邦德国国防军的增幅却高达79.6%。正是经过这种大消大长的变化,联邦德国国防军规模超过了土耳其军队,成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中除美军以外人数最多的军队。

从这以后直到两德统一前,北约各国特别是北约主要欧洲成员国的军队规模再次发生了有利于联邦德国的变化。其中,英国、意大利、法国三国军队又分别减少了6.07万、3.76万、3.43万人,减幅分别达到了16.3%、8.8%、6.9%,而联邦德国国防军却再次增加,增加额和增加幅度分别有2.73万和5.8%。经过这次改变,除美国外,无论是在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中,还是在整个北约中,联邦德国都成为军队人数最多的国家。

五、联盟给了联邦德国国防军较大的发展空间

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法律文件《伦敦—巴黎协定》曾规定,联邦德国最多只能建立12个师、50万人的军队。表面看来,北约对联邦德国军队的发展规模限制甚严,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一方面,协定限制军力发展的对象不只是联邦德国,还包括其他国家。具体来说,协定在限制联邦德国国防军发展的同时,也对法、意、荷、比、卢五国军队作了类似的规定;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协定所规定的联邦德国军队的规模在联盟内部并不算小。协定尽管规定联邦德国最多只能建立12个师的规模,但这只是比协定所规定的法国军队的规模少2个师,而与意大利相等,比荷兰、比利时则各多7个师。比起协定所规定的卢森堡1个团的规模,联邦德国国防军更是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了。

至于联邦德国军力发展的局限性,主要来自北约盟国,这里既有他们主观上的因素,又有客观上的影响。从主观上来讲,主要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具体来说,由于作为二战的欧洲策源地的德国曾给世界带来了浩劫,北约国家担心联邦德国重蹈历史覆辙而给世界

再次带来灾难,所以在制定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法律文件中特意禁止它建立总参谋部、规定联邦德国军队50万人的发展上限和禁止生产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武器;从客观上讲,主要是由于军事部署的影响。更明确地说,北约在联邦德国境内以相互交织方式部署成员国军队主观上虽然主要是为了显示北约的命运共同体性质和成员国之间的团结,美国的强大驻军也主要是为了增加北约前沿部队的威慑力,但客观上都影响了联邦德国国防军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第四节　联邦德国国防军的自主性问题

《伦敦—巴黎协定》曾经特别规定,联邦德国军队归北约指挥,联邦德国也因之成为将全部军队交给联盟指挥的唯一成员国。同时,协定还规定,联邦德国保证不在领土内制造任何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长射程火箭、导弹、感应水雷、大型军舰和战略轰炸机,水面舰只排水量最大不超过3000吨,潜艇不超过350吨。这就容易产生联邦德国国防军的自主性问题,即在联盟内部,国防军的"人"能否自主、"枪"能否自给这类问题对联邦德国在北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何影响?

从国防军"人"的自主权来看,联邦德国所丧失的权力极少。这是因为:

首先,联邦德国在北约中的军人代表数量最多。按照有关规定,在北约军事组织中,各成员国基本上是按提供部队数量的比例派出军人代表。联邦德国国防军代表从1955年7月26日开始就参加北约司令部的有关工作。1956年,联邦德国在北约各司令部任职的协定军事代表为17人,两年之后增加到142人,到1961年更是猛增至1200人。[1] 此后,随着联邦德国国防军规模的不断扩充,联邦德国军

① (苏)A. C. 阿尼金:《外交史》,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4页。

人代表不仅继续增加,而且成为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其次,联邦德国将军们占据了北约各战区司令部的大量重要乃至主要领导职务。在北约中欧盟军司令部中,1957 年 1 月,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诺斯塔德将军向联邦政府建议,从联邦共和国提名一位担任中欧盟军陆军总司令的候选人。4 月 1 日,联邦德国的汉斯·斯派达尔将军接替法国的卡潘提埃将军担任该职,驻这个地区的美、英、法、德、比、荷、卢等国的军队都归他指挥。1963 年 8 月,联邦德国的冯·基尔曼塞格将军继任斯派达尔的职务。从此,联邦德国将军长期担任该职;在北约北欧盟军司令部中,联邦德国海军将军罗盖被任命为北约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区陆军司令。根据北约总部决定而设立的北海南区海军司令也由联邦德国将军钦克尔担任。1961 年 6 月,联邦德国海军少将瓦格纳被任命为北约北欧区海军司令,接替英国海军少将汤森德。北约 1961 年决定建立的丹麦—联邦德国波罗的海区联合司令部由联邦德国军官指挥;在欧洲盟军司令部中,1959 年 1 月 1 日,联邦国防军中将弗里德里希·弗奇被任命为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副总参谋长,负责计划和政策工作。在他之后,又由联邦德国将军缪勒尔——希勒布兰德继任这一职务。1961 年,联邦德国准将恩斯特·库塞罗夫被任命为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中欧地区空军协调官。1978 年初,联邦德国的格尔德·施米克勒将军被任命为欧洲盟军副司令。到 80 年代末期,在北约的主要军事机构中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的联邦德国将军多达 36 人。① 其中,北约欧洲盟军副司令、中欧盟军司令、中欧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均为联邦德国将军所占据,北欧盟军司令部也由联邦德国将官占据重要位置。

再次,联邦德国军官进入了北约的最高军事机关并担任显赫职务。如,从 1961 年 4 月起,北约设在华盛顿的、主持战略规划的常设

---

① 张秦洞等:《不再踏碎欧罗巴的梦——德国军队今昔》,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8 页。

军事委员会主席①一职由联邦德国阿道夫·豪辛格将军担任,1964年6月,联邦国防军少将恩斯特·斐贝被任命为北约军事委员会常设小组新设的规划参谋部主任。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联邦德国既保证了对国防军的指挥权②,又可以利用这些优势来实现政府的意愿。退一步说,由于联邦德国不是中立国而是北约组织成员,即使联邦德国对其国防军缺乏自主权,对联邦德国在北约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产生的影响也极其有限。

就国防军"枪"(武器)的供给而言:建军初期,联邦德国主要依靠美国和英国的帮助,如重型武器基本上由美国提供。此后,由于西方国家的抗苏需要和联邦德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联邦德国在军工生产方面的限制被逐渐取消。1959年,西欧联盟采纳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建议,同意取消联邦德国生产短程导弹的限制。同年,西欧联盟允许联邦德国建造排水量5000吨以下的水面战舰,1961年

① 军事委员会由各成员国总参谋长组成(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后,派一军事使团参加),冰岛无军队,可派一文官代表。军事委员会为北大西洋理事会承担,在和平时期就北约地区提供防务所必要的措施提出建议的任务,是北约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作为北约的最高军事当局,军事委员会负责指导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大西洋盟军最高司令部、海峡盟军总司令部和加、美地区计划小组的工作。另外,有15个军事机构在军事委员会权利之下并为它服务。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各国总参谋长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可以延长。他主持参谋长会议和常设会议的工作,负责指导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并担任发言人。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席北大西洋理事会、防务计划委员会和核计划小组的会议。军事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参谋长一级的会议,必要时可随时举行这类会议。不过,一般每年召开3次会议,其中两次在布鲁塞尔举行,另一次在成员国轮流举行。其会议由主席主持。日常事务由各国总参谋长任命的常驻军事代表组成的常设会议处理。

② 按照程度的不同,指挥权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全权指挥,另一种是作战指挥。全权指挥是指包括一切军事命令的指挥权。这种指挥权只赋予部队提供国的司令。例如,由联邦德国提供给北约的陆军司令(联邦德国将军)便拥有全权指挥权;作战指挥授权有限,它只限于下述情况:a. 给自己管辖之下的司令下达任务。如,部分部队的调整部署或调换;b. 视情况需要,自行行使作战控制和战术控制;c. 接受上述权限的委托。如,战时(防御状态)中欧盟军司令(联邦德国人)对自己管辖下的所有部队(其中包括联邦德国以外的军队)就拥有作战指挥权。参见张秦洞等:《不再踏碎欧罗巴的梦——德国军队今昔》,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又放宽至6000吨。[1] 1962年10月,同意联邦德国建造450吨的潜艇,1963年10月又放宽到1000吨,1973年9月进一步放宽到1800吨。1980年7月,西欧联盟完全取消了对联邦德国制造舰只的所有限制,联邦德国从此可以制造包括航空母舰和核动力舰船在内的各种舰艇了。1984年1月,在法国的建议下,西欧联盟常设理事会同意,除对联邦德国不得生产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规定仍然有效外,取消对其生产重型轰炸机和(常规)导弹的所有限制。[2]

由于军工生产限制被陆续取消,加上巨大的生产能力,联邦德国国防军所需各种常规武器陆续做到了自给。同时,由于军工业发达,联邦德国的武器装备极其精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在常规武器特别是在快艇、常规潜艇、装甲车(其中最著名的是"豹"式和"卫兵"式坦克)和电子器材(雷达、导弹等等)生产方面,以及在国际合作的名义下恢复的航空工业(生产阿尔法喷气式飞机,尤其是生产多用途飞机)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这样,联邦德国武器装备不仅做到了自给,而且还向盟国出口武器。诚然,由于国防军规模庞大,国内武器市场广阔,以及联邦政府向北约组织以外的国家出口武器的立法严格,联邦德国出口的武器数量极其有限,只占总数的0.2%,[3]但总体排名却在前列。早在1979年,联邦德国的武器出口就已经在北约中位居第四了(排在美、英、法之后)。自1964年以来,联邦德国还向土耳其、希腊和葡萄牙提供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无偿提供军备装置和一小部分国防军使用的新式装备。

以上情况表明,联邦德国国防军不仅做到了武器装备的自给,而且极其精良,这对联邦德国在北约常规力量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重

---

① 陈宣圣、汉民:《德意志的明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246页。

②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p. 222.

③ (比利时)罗贝尔·克洛兹:《欧洲有没有防务?——可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四十八小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2页。

大影响。这是因为,如果武器落后,联邦德国国防军的战斗力就会受到直接的影响;如果装备不能自给,经济强大的联邦德国虽然有足够的实力去购买盟国的先进武器,但国防军的发展容易受制于人。相反,正是由于武器装备能够自给而又精良,联邦德国才不仅发展成为北约欧洲地区的头号常规军事大国,而且发展成为北约欧洲地区的头号常规军事强国。

第四章

联邦德国与北约的战略调整

在西方，“战略”一词源于希腊文“strategicon”，意为“将道”或“为将之道”。公元580年，东罗马帝国编写了一本军事教科书《strategicon》，以专门用于培训高级军事指挥官。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这是西方最早关于“战略”一词的使用，英文“strategy”就是从“strategicon”衍生出来的。在近代，德国著名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对“战略”所下的定义最具代表性。他在其被后人奉为军事理论经典著作的《战争论》一书中说，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到了当代，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得尔·哈特（1895—1970）对“战略”所下的定义最为经典。他在代表作《战略论》中指出，战略所研究的不只限于兵力的调动——一般的定义都只是注意这一点，而且要考虑到兵力调动的效果。他认为，“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①。显然，他们

① （英）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战略论》，北京：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48页。

这里所说的战略是指纯粹的军事战略。不过,利德尔·哈特还在"战略"之上提出了"大战略"概念。他指出,所谓"大战略",亦称之为高级战略,其任务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一切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①] 在这一定义里,军事战略是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战略这一概念提出后,逐渐被西方国家采纳和不断完善。

北约组织从成立起就制订了指导其活动的战略。不过,在整个冷战时期,北约的官方文件中没有明确阐述过大战略概念,[②]而是不断地调整军事战略。事实上,北约作为一个以军事性为最显著特征的组织,军事战略就是其大战略的核心,即以暴力或以暴力威胁为基础的,力求通过武力来实现联盟目标的战略。本章所指的战略亦即北约的军事战略。北约推行的军事战略先后有"地区遏制战略"(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和"灵活反应战略"。联邦德国在这些军事战略中都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节 门外汉的联邦德国与北约的"地区遏制战略"

北约成立时还没有制定军事战略。1949 年 10 月 10 日,北约常设小组(美、英、法)提出了《防御北大西洋区域的战略概念》的报告草案。[③] 12 月 1 日,该草案经过修改后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防务委员会上获得正式通过。[④] 报告分为序言、北约的防务原则、北约防务概念的目标、贯彻防务战略的军事措施四个部分。报告指出,东西方

① (英)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战略论》,北京: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 年版,第 449 页。

② 陈佩尧:《北约:战略与态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54 页。

③ NATO SG 1 'Strategic Concept for the Defense of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of 10 October 1949.

④ FRUS, Vol 4, 1949, p. 352.

之间的竞争会导致战争。[1] 其中，第四部分提出的六项“基本保证”体现了北约成立初期的军事战略安排。报告指出，北约的整体防务计划必须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明确地提供基本保证，以促进北大西洋地区防务的共同目标。应当按整体计划制定的紧密配合的军事行动来确保这些基本保证付诸实施。这些基本保证[2]是：

（1）尽可能运用一切手段确保拥有能及时进行战略轰炸的各种类型（没有例外）的武器的能力。这一责任主要由美国承担，其他国家按实际所能予以协助。

（2）一旦发现敌方进攻北约国家，运用一切可采用的手段，包括陆、海、空和心理战等手段，及早尽一切可能组织抵御和反击。地面部队的核心部分，在初期应由欧洲国家提供，其他国家则不应耽误时间，尽快按全面计划予以支持。

（3）及早尽一切可能挫败敌方对北约国家的空袭。根据此项保证，欧洲应立即提供战术空中支持和强大的空防后盾，其他国家则不应耽误时间，尽快按全面计划予以支援。

（4）确保和控制对执行共同防务计划有重大意义的海空航道和港口海湾。护卫和控制海空补给线将按各国的能力及同意承担的责任，通过共同行动实施。在这方面，一致认为美国和联合王国在组织和控制海洋交通线方面应承担主要责任，其他国家将护卫各国的海港防务和海岸补给线，并按整体计划规定，参加组织和控制与其领土有重大意义的补给线。

（5）确保、维护和保卫对成功实现这些基本保证有重大意义的主要支援地区、空军基地、海军基地和其他设施。对于这些重要基地、地区和设施拥有主权的国家，此项保证乃是一种责任，必须按集体防务计划规定之防务进行援助。

---

① Beatrice Heuser. *NATO*, *Britain*, *France and the FRG*: *Nuclear Strategies and Forces for Europe*, 1949—200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8, 1999, p. 28.

② FRUS, Vol. 4, 1949, pp. 355—356.

(6)按计划规定,为维护北约地区之安全,对此后的进攻行动需作出承诺的贡献,缔约国应动员和扩大全部军事力量。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北约成立初期所确定的军事战略是针对苏联的"地区遏制战略"。虽然苏联还刚刚造出原子弹,而北约方面美国的原子弹已形成了战斗力,但原子弹并没有使北约的军事战略成为核战略。北约成立初期的战略研究小组负责人、法国著名军事战略家安德烈·博弗尔将军认为,原子弹在当时是一种昂贵的武器,数量很少,因此,在北约战略中,它同其他武器一样,是一种武器,只不过威力更大而已,它丝毫不能改变战争原则。[①] 因此,在实施"地区遏制战略"时,报告强调的是原子弹和常规力量并用的方针。北约军事委员会编制的《战略指导方针》也说明了这一点。方针中设想,在一场对苏联的战争中必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战斗打响后欧洲盟军在莱茵河以东阻止对方的进攻,同时美国的战略空军向对方的纵深目标轰炸;第二阶段,盟国的地面部队和战术空军进行反击,夺回失去的领土;第三阶段,恢复北约的领土完整和安全。

另外,在当时情况下,由于使用原子弹还得靠欧洲的基地才能实施战略轰炸任务,所以在所设想的以欧洲为主战场的战争中,北约强调常规部队要足以"遏制"苏联力量,而且尽量将北约的防御往东移动,并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经验,主要依靠强大的陆军取胜。这样,"地区遏制战略"实际上变成了"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

为此,北约强调发展陆军以提高常规作战能力作为军队建设的重心,力图通过这种途径来建立北约地面部队的优势,以便在一定数量的战术核武器的支援下,依靠地面作战击败华约部队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常规军事进攻。

此后,北约的"地区遏制战略"(又称"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不断充实。1950 年 9 月 15—18 日,北约理事会纽约会议决定,为了

① (法)安德烈·博弗尔:《明天的战略:现代战争的军事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 74 页。

使北约欧洲成员国免遭类似在朝鲜发生的侵略，在欧洲采取前沿战略，即为保卫西欧的安全，尽可能将侵略阻止在东部。因此，前沿战略成为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最重要的内容。

要实现大规模地面作战和防线东移的目标，就必须有足够的前沿部队来阻挡东方的进攻。然而，当时东西方的军力对比表明，北约在战略空军、战术空军和海军方面虽然占有较大优势，但在欧洲的地面部队却相当薄弱。北约驻西欧的常规部队远远不及华约在东欧的驻军，即大约 14 个师对 210 个师[①]。因此，西方不得不将“前沿”定位在莱茵河一线，主力部队部署在莱茵河以西。北约当时的设想是，战略纵深以法国为主要防守阵地，对来自东方的进攻采取边打边撤、逐步加强防御的方针。显然，这离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的目标和要求相距甚远。

常规军事力量对比的悬殊及其产生的后果要求北约部署远远超过当时可动用的部队。为此，美国大量增加驻欧部队，其他国家也相继增加了兵力。从实际情况来看，要建立足够的前沿部队，增强美、英、法等国在欧洲大陆的驻军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挖掘直接处于前沿地带的联邦德国的军事潜力。所以，在增加驻军的同时，北约开始讨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1950 年 9 月 26 日，重新召开的理事会承认，前沿战略意味着将在联邦德国领土上进行防卫，因此决定研究联邦德国参与的政治和军事问题。12 月 18 日，北约理事会布鲁塞尔会议最终确立了联邦德国参与共同防务的原则。

另外，到 1951 年 12 月底，由于在欧洲的驻军还只有 35 个师，北约国家认识到，还必须扩充常规部队。1952 年 2 月，在里斯本召开的外交、国防、财政部长的理事会议上决定，在欧洲建立 96 师，计划在

①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NATO: Facts and Figures*. Brussels: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 1976, p. 29.

1954年底完成。[1] 同时,会议还决定,当年北约地面部队须增加到50个师。[2]

一般而言,要大量扩充军事力量就必须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在计划制定的当年,由于朝鲜战争正酣,北约国家的军费都大幅度上升。与1951年相比,北约军费总额从419.21亿美元增加到597.21亿美元[3],净增179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了40%。军费开支的大幅度增长加重了北约国家的财政负担,对它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这对于刚从战争废墟中走上经济恢复的西欧各国来说尤其如此。进入1953年,由于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北约大部分国家的军费虽然有所增长,但增长的幅度很小。北约军费总额只增加40亿美元,即从1952年的597.21亿美元增加到637.73亿美元[4],增长幅度不足7%。其中,有的国家如意大利的军费甚至减少了。到了1954年,虽然2/3的北约国家,包括比利时、希腊、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和土耳其的军费在增加,但增幅甚微,而且北约主要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三国的军费在减少。就北约军费总额来说,1954年比1953年减少了74.6亿美元,即从637.73亿美元减少到563.13亿美元,减幅达12%。这样,1954年的军费不仅比1953年减少了,而且比1952年少了32亿美元。详情见表4-1:

① David Gress. *Peace and Survival: Germany, the Peace Movement, and European Secu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5, p. 13.

② 陈佩尧:《北约:战略与态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

③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NATO: Facts and Figures*. Brussels: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1976, p. 296.

④ Ibid.

表4-1 1950—1954年北约各国的军费开支

国　家	计量单位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比利时	比利时法郎	8,914	14,095	20,735	20,589	20,707
加拿大	加元	495	1,220	1,875	1,970	1,771
丹　麦	丹麦克朗	359	475	676	889	885
法　国	新法郎	5,591	8,811	12,531	13,865	11,710
西　德	马克	-	-	-	6,195	6,287
希　腊	德拉克马	1,971	2,515	2,655	2,767	3,428
意大利	里拉	353	457	521	480	543
卢森堡	卢森堡法郎	170	264	436	488	565
荷　兰	荷盾	901	1060	1,253	1,330	1,583
挪　威	挪威克朗	357	572	831	1,067	1,141
葡萄牙	埃斯库多	1,516	1,553	1,691	1,975	2,100
土耳其	土耳其镑	599	652	725	827	934
英　国	英镑	849	1,149	1,561	1,684	1,569
美　国	美元	14,307	33,059	47,598	49,377	42,786
欧　洲	百万美元	5,458	7,642	10,248	12,426	11,756
北　美	百万美元	14,802	34,279	49,473	51,347	44,557
北　约	百万美元	20,260	41,921	59,721	63,773	56,313

（资料来源：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NATO: Facts and Figures*. Brussels: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 1976.）

北约国家特别是欧洲成员国的军费开支之所以在1953年和1954年增幅不大甚至减少，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其一，西欧国家正处于艰难的经济复兴中，它们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生产黄油而不是大炮。因为没有能力同时生产大量的大炮和黄油，它们不愿意把大量预算用于重整军备，以免庞大的军费开支拖累本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不愿意增加军费；其二，在苏联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美国的

原子弹、氢弹以及舰载飞机的生产仍然遥遥领先，这一优势使西欧国家相信美国人用“核支柱”能够抵御苏联的进攻，这也使得他们不愿意花太多的钱来扩充常规武装力量。这种状况不仅使北约各国的常规军扩充计划受阻，而且使常规军逐渐缩减，里斯本计划也因此成为一纸空文。

在北约推行“地区遏制战略”（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时，还不是成员国的联邦德国也被北约组织纳入了西方防务体系。为了实施前沿防御，北约特别需要挖掘联邦德国的军事潜力。联邦德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力争实施前沿防御战略。为此，它在西方还在讨论对其进行重新武装时就进行了积极努力。

当时，联邦德国对北约将部队部署在莱茵河一线严重不满，认为这是一项放弃德国的“后退计划”。1952 年，在关于联盟各国出兵额的第一次谈判中，联邦德国与会代表（因为西方打算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联邦德国也有代表参加）、后来在 1955—1956 年担任第一任国防部长的特奥多尔·布兰克要求，一旦联邦国防军能够提供 12 个师，北约就应该将防御战略从“后退”改为“前沿防御”，而不是“前进战略”，以便在边界上抵御苏联来犯者。1953 年，布兰克访问美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斯将军向他保证，只要国防军符合上述条件，他们就按照布兰克的愿望修改防御计划。[1]

然而，由于里斯本计划是为满足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特别是前沿战略的要求而制定的，因此，在里斯本计划破产后，这些战略不可能再实施了，北约仍然将一线防御部队部署到莱茵河边。

此时，联邦德国不是北约成员国，对北约的战略部署没有发言权；同时，它还没有实现重新武装，在北约战略部署上没有实际的利用价值。因此，联邦德国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前沿防御战略及以此为基础的“地区遏制战略”（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成为明日黄花了。

---

① *Der Spiegel*, N1. 41/1962, Seite 32—53. 转引自上海国际关系学会：《战后国际关系史料》，第四辑，第 59 页。

这样，在北约的整个战略特别是前沿防御战略安排中，联邦德国只具有理论上的战略地位，而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

第二节 联邦德国与北约的"大规模报复战略"

"地区遏制战略"（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破产后，为了能够有效阻击苏联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北约组织需要谋求新的战略出路。在常规部队处于劣势而北约盟主美国的核武器又占优势的情况下，核武器的使用合乎逻辑地成为北约的选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规模报复战略"应运而生。

大规模报复战略最初是由美国提出来的。早在里斯本计划还没有破产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核武器的使用就非常重视。他在1953年上台后表示，赞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的观点，认为"各种类型的原子武器——在1946年仅仅被认为是遥远的将来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获得了我们武装力量中的常规地位。"[①] 按照这种逻辑，既然核武器获得了常规武器地位，那么在战争中就可以像使用常规武器一样使用了。

同年12月1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福德将军在国防报告中指出，美国是否拥有报复能力尤其是核打击力量是能否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这就表明，美国已将核报复能力提高到了战略高度。

1954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外交委员会上发表讲话，宣布国家安全委员会162/2号决定。他说，"我们需要盟友和集体安全，我们的目的是使这些关系更有效、更省钱。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多依靠威慑力量，少依靠地区防御力量……我们的门是上着锁的，但我们并非每家都有一名武装门卫。我们主要依靠装备精良的共同安全体系来惩罚……实际上，那些可怕的侵略者一般来说被阻止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寻求的是一个相同的国际安全体系……地区防御将永远是

---

① Mc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88, p. 255.

重要的……(但是)必须有大规模报复力量的进一步威慑力予以增强……阻止侵略的办法就是由自由世界愿意并且能够利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在选择的地点作出有力的反应。”

杜勒斯继续解释说,新政府已认识到,如果没有这样一项政策,防务费用将高得难以承受。“如果敌人能选择战争的时间、地点、方式,如果我们的政策仍旧是以直接抵抗和地区抵抗对付侵略的传统政策,那么我们必须准备在北极和热带,在亚洲、近东和欧洲,在海上、陆地和空中作战;使用旧武器,也使用新武器。”因此,“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不得不作出一些基本政策决定……这一基本决定将主要依靠用我们选择的手段在我们选择的地点迅速进行报复的强大能力。”①至于“用我们自己选择的手段”究竟何意,在杜勒斯讲话前不到一周,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在国情咨文中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将充分考虑现有的和不断增加的大量核武器以及最有效地使用它们打击任何侵略者的方法,如果需要这些武器来维护我们的自由的话。”“这些武器将节省人力,但要求加强空中力量。陆军以外的人没有表示震惊。”②正因为如此,人们将杜勒斯讲话中所论述的战略不准确却又永久地称为“大规模报复战略”。

为了在社会舆论中掌握主动,美国政要极力对“大规模报复战略”进行辩护。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任何一场战斗中,如果为了纯粹的军事目的而使用这些东西(即核武器)对付纯粹的军事目标,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像使用子弹或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使用它们。”③言下之意,在战争中攻击敌方军事目标时,美国对核武器可以任意使用,包括大规模使用。

“大规模报复战略”一经提出,就在北约国家中受到普遍青睐。

---

① *Speech of John Foster Dulles, Secretary of State, before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anuary 12, 1954, in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54, pp. 7—15.

② Mc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1988, p. 257.

③ Eisenhower, *Public Papers*, 1953, pp. 261—262. Eisenhower, *Public Papers*, 1954, p. 332,March 16.

1954年12月,北约理事会宣布:"对北约领土完整的任何侵犯都将报以一场沉重的大规模核回击。"与此同时,北约还着手按大规模报复的要求制定作战计划。欧洲盟军最高副司令、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将军强调,"我们驻欧洲盟军统帅部的全部作战计划立足于在我们的防御中使用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如果我们遭到进攻,就决定使用它们,事实上我们已打定主意在热战中使用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①]至此,北约开始正式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基本思想是:依靠美国的核优势,以美国的核报复遏制苏联对西欧的进攻;为对付苏联对北约国家发动的任何进攻,北约一开始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对苏联进行大规模报复。大规模报复战略因其战略实施的特点,又被称为"剑盾战略"。按照"剑盾战略"的要求,北约部队由"剑"和"盾"两部分组成。"剑"是指北约的核力量,亦即当时装备核武器的美、英空军,其主要任务是向华约集团发动核突击,以摧毁这些国家的战略要地、作战部队、军事基地、主要工业区、交通枢纽、人口密集的城市,使它们丧失作战能力;"盾"是指北约的常规力量,亦即北约的地面部队,它主要在前沿地带起"警铃"和"绊索"作用,以便为核打击争取有利的时机,并伺机利用核突击的效果,东进追击和歼灭华约残余部队。

在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北约进行了多次核战争演习。演习的结果都是苏军在北约的核打击下损失惨重甚至全军覆没。因此,北约在1955年6月所进行的大规模核战争演习结束后得出结论:突然的原子弹袭击是正确的,是取胜的决定性因素。[②] 这表明,在"剑盾战略"中,北约突出的是"剑"的作用。

此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内容不断充实和完善。1956年,北约理事会通过一项进行核战争的指导方针。方针规定,欧洲一旦发生紧

① 王美权:《为了谁的安全? ——北约军事战略大透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② 王昉:《北约新战略》,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9页。

急情况或东西方军事冲突时,北约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1957 年,由于苏联洲际导弹发射成功,北约提出了“新剑盾战略”。为了实施这个战略,美国提出了“中程导弹加海外基地等于洲际导弹”的理论,以弥补北约国家没有洲际导弹的缺陷。12 月,北约巴黎首脑会议决定,在欧洲建立核弹头储备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有效保卫联盟。[①] 从这时起,在北约的防务问题上,北约部长们首先考虑的是核武器的使用。[②] 1958—1959 年,美国先后在英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建立了“雷神”等中程导弹基地。与此同时,北约还酝酿建立多边核力量。

“大规模报复战略”被正式采用后,“地区遏制战略”(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中所强调的前沿防御方针仍旧沿用。但是,由于“大规模报复战略”突出的是作为“剑”的核力量的作用,因此,北约在大力建设利“剑”时虽然也意识到,需要建设相当数量的“盾”牌部队,但“盾”牌部队(主要是地面部队)在整个战略安排中的地位明显降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北约驻欧洲大陆的部队数量在减少。英国曾在 1954 年承诺在欧洲大陆保持 4 个师的陆军和战术空军,拨归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指挥。但是,到 1957 年,英国提出撤回其驻联邦德国兵力的三分之一,英国莱茵军的编制也相应缩减,从 1957 年的 77000 人降到 1958 年的 64000 人,次年再降至 55000 人。同期,战术空军也减少了一半。法国在 1954 年曾承诺向北约提供 14 个师的常规部队,事实上最初只提供 6 个师,后来更是降到了 2 个师;其二,从后勤供应来说,这些常规部队即使到了战时也只能保持两个星期的补给,因为北约把希望寄托于战争打响后很快实施核打击。这样,盾牌部队实际上只是起到辅助性作用,前沿防御方针也因此只被当做“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补充因素。

---

① Uni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reau of Public Affairs Public Service Division. *NATO: 1949—1959——the First Ten Years.*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p. 15.

②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Brussels 1981, pp. 137—138.

然而,对联邦德国来说,前沿防御却至关重要。首先,从地理位置上讲,联邦德国不仅处于与华约集团对抗的最前沿,而且是东西方对抗最为激烈的中欧,在800公里的边界线上同华约集团的东欧部分直接接壤。因此,如果东方集团要发动对西方集团的进攻,那么联邦德国将首当其冲;其次,从联邦德国的人口分布来说,东部边境人口稠密,全国约25%的人口居住在与华沙条约国家的边界以西100公里的区域内,[①]而延伸到200公里,这个地区就有人口4180万和工业劳动力的69%,[②]一旦战争爆发而这些居民又来不及疏散的情况下,将会给联邦德国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第三,从经济布局来说,联邦德国15%~20%的工业分布在这一地区,[③]一旦丢失这些领土,联邦德国经济将遭受重创;第四,由于以上因素的影响,联邦德国一旦在战争中丧失了这些领土,对己方的士气也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总之,从地缘战略来说,联邦德国在军事战略的制定上,除前沿防御战略外,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北约扩充常规军的里斯本计划破产了,前沿防御战略没有得到实施,但联邦德国并没有灰心;尽管北约在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时极不重视常规部队建设,前沿防御战略只是整个战略的补充因素,但联邦德国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

为满足"前沿防御"的条件,联邦德国在重新武装后就在国防部长布兰克的领导下制定了一个扩军计划。如前所述,按照这一计划,联邦德国将分三阶段扩军:1956年组建部队9.6万人,1957年增加到27万人,1958年扩充到50万人。然而,联邦德国当时不具备扩军的客观条件,它们缺少军官,缺少军士,缺少武器,缺少兵营和练兵

① Wolfram F. Hanrieder. *The foreign Politices of West Germany*, France, and Britai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Inc, 1980, p. 25.

② (比利时)罗贝尔·克洛兹:《欧洲有没有防务?——可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四十八小时》,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3页。

③ Wolfram F. Hanrieder. *The foreign Politices of West Germany*, France, and Britai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Inc, 1980, p. 25.

场。一句话，几乎样样都缺。因此，扩军计划在当年就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施特劳斯担任国防部长后，受北约“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影响，他摒弃了前任的计划，而着手建立他所说的“优质军队”，提出“质量优先于数量”的口号。[①]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施特劳斯虽然并不打算打一场核战争，甚至认为这种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虽然他也排除任何诉诸威胁或讹诈的手段，但是他坚决主张，同苏联进行任何谈判必须从实力地位出发，不仅是从经济实力也从军事实力出发。[②] 为此，他非常相信核武器的作用，认为“一颗原子弹抵得上一个旅”，并断言，如果北约为常规战争作准备，核威慑将失去其可靠性。这样，他将1958年的扩军目标定为17.2万人，[③]并将联邦国防军分为战时编制与和平编制两种，并将战时50万人的编制缩减到和平时期的35万人的编制。[④]

与此相反，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副总参谋长的联邦德国将军弗里德里希·弗奇对常规部队的建设和前沿战略的实施极为重视。他通过总参谋部严谨的工作认识到，建立在常规力量基础上的“前沿防御”能比不可靠的核恐吓提供更多的安全，并认为对（联邦）德国来说尤其如此。他的主张得到其前任、当时的联邦国防军总监阿道夫·豪辛格将军，以及北约中欧司令部陆军司令、联邦德国将军汉斯·斯派达尔的支持。他们的主张对联邦德国的军队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

---

①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p.96.

② Franz Josef Strauss. *Challenge and Response: A Programme for Europe*. New York: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td, 1968, Preface, xi.

③ Roger Morg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 Germany 1945—1973: A Study in Alliance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53.

④ Der Spiegel, N1.41/1962. 转引自上海国际关系学会:《战后国际关系史料》,第60页。

因此，虽然布兰克制定的扩军计划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但联邦德国还是建立了数量可观的军队。到1960年，国防军总额达到了27万人，使北约在中欧的部队增加了60%以上。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及在其他指挥机构担任要职的联邦德国将军们极力坚持前沿防御，就在这年，北约将防线大幅度东移，从莱茵河一线推进到了威悉河地区，亦即从联邦德国的西部推进到了中部。

一年后，时任联邦德国国防军总监的弗奇将军再也顶不住国防部长施特劳斯的能言善辩了，转而支持依靠核武器进行防御。然而，当时以北约参谋部的联邦德国军官为后盾的总参谋长小组提出并反复强调他们的论证：只有存在一支强大的德国常规军事力量，才能提高威慑成分并阻挡苏联人的常规进攻；同样，也只有扩充（联邦）德国常规部队，才能保证边界上的“前沿防御”。北约最高司令部的联邦德国军官则在给弗奇的呈文中指出，国防军士兵的增多将提高联邦共和国在大西洋联盟中的政治地位，而波恩谋求中程导弹只会引起北约盟国的怀疑。

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联邦德国国防军仍在继续扩大，1961年达到了32.5万人，[①]这就为北约防线的进一步东移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诺斯塔德将军命令，鉴于可能发

①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3—1974*,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3, p. 79;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8—1979*,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8, p. 88;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2—1973*,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2, p. 74;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4—1975*,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4, p. 8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5—197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5, p. 8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6—1977*,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6, p. 83;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7—1978*,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7, p. 87.

生的情况，必须对边境区域进行防御，把侵犯边境的人民军和苏联部队顶回去。随即，一个荷兰旅奉命前移到离易北河很近的吕内堡荒原布防。这样，北约的防线就从联邦德国中部推进到了东部。1962年，联邦国防军总额在1961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万，达到35万，北约防线进一步推到苏联“铁幕”的边缘。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北约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期间，由于北约强调作为“剑”的核力量的作用而忽视作为“盾”的常规部队的利用价值，前沿防御战略没有成为整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只是其中的补充因素，因此，联邦德国在整个战略安排中不具有理论上的战略地位。然而，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在北约指挥机构担任要职的联邦德国将军们及联邦德国国内的一大批高级将领排除不利因素的影响，坚持实施前沿防御战略，并认为增加常规力量有利于提高联邦共和国在北约中的地位，于是，联邦德国建立了数量可观的常规部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约防线才一步步从联邦德国的西部推进到了东部，从而最终完成前沿部署。这表明，联邦德国虽然在北约的整个战略安排中不具有理论上的战略地位，但已经发挥了重大的现实作用。

第三节 联邦德国与北约的“灵活反应战略”

随着形势的发展，“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极大困难。这项战略是在美国核武器占绝对优势而苏联核武器不具备洲际作战能力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因此，在苏联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相继发射成功后，北约国家就对该战略的可操作性产生了动摇。1957年10月，“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制定者杜勒斯忧心忡忡地说，美国及其盟国应该“较少地依赖报复力量的威慑作用”，并在局部冲突中采

取必要的措施，以避免"因为我们的行动而引起一场全面的核战争"。[1] 1959 年，他进一步公开表示对"大规模报复战略"丧失了信心。同年底，西欧联盟在决议中指出，西欧国家没有理由认为，当欧洲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会冒着遭受苏联核打击的危险而自动投入一场美苏核大战。同时，由于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北约组织在发展武装力量时将注意力集中在作为"剑"的核力量上，这就使得维持足够的地面部队和加强北约的防御盾牌的必要性显得不那么迫切了。这种情况又反过来使人们更加相信，每一个争端——无论它是哪一级的挑衅——都与西方的生存息息相关，因为要回击苏联在欧洲心脏地区的挑战，美国除了使用战略空军力量以外，没有别的武器可用。[2]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东西方之间的战争爆发，北约将面临要么投降，要么在核大战中遭受毁灭的厄运。

显而易见，"大规模报复战略"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北约需要寻找新的军事战略。退役的美国陆军参谋长、后来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将军在其 1960 年出版的《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中系统地分析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缺陷，并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3] 同年，在科摩湖畔斯蒂克的别墅里会晤时，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诺斯塔德在对其所提出的北约作为"第四个核力量"的思想作出解释时，一开始就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即苏联已经建立一支核力量，再也不能将核武器理解为只是对西方有利的因素，并把它看做是对常规力量劣势的弥补。他认为，使用仅限于战场的战术核武器是可能的，主张对付进攻只应采取相应的手段，而不是在任何情况下立即考虑全面使用一切核战争手段。[4] 当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认为，武力

---

① 祁长松等:《走向疯狂——北约 50 年之路》,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第 79 页。

②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Eleventh Edition 1988, p. 114.

③ Maxwell D. Taylor: *The Uncertain Trumpet*, New York, 1960.

④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1960.

的使用是可以相当精密地加以控制的，可以像用药似的配成一定的剂量去达到政治目的。他掌管五角大楼不久就得出结论，不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实际上，"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理论都过于僵硬，而且使得常规军事力量实际上失去了作用。① 因此，他极力鼓吹"灵活反应论"。受这些思想的影响，肯尼迪总统上台不久就作出了用"灵活反应战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决定。

1962年5月，麦克纳马拉在雅典举行的北约理事会会议上正式宣布了这个战略。同年6月，他在安亚伯市所作的演说中向国际社会重申了这个战略。美国提出灵活反应理论的基本思想是：西方必须对不同形式的危机或实际战争保留一系列可能采取的方针或可供选择的方案；万一威慑失灵，这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报复问题，而首先是一个防御的问题，即在那些通过核报复的威胁进行战略威慑已失去它的可靠性的地区，西方联盟仍要保持威慑能力的问题。② 为了说明这些，麦克纳马拉在1962年12月举行的北约理事会上特别指出，剑盾部队的传统作用正在颠倒过来，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必须使常规部队能够坚持90天的战斗力。③ 也就是说，在麦克纳马拉看来，由于核均势的变化，核军备已经成为北约组织的盾牌，而常规军备则成为它的一把利剑（这样就完全颠倒了雷福德计划的战略原则）。不仅如此，他还暗示，反击使用常规武器的攻击的核打击可能被推迟。总的来说，在新战略的设想中，除了回击使用核武器的攻击外，北约（主要是美国）在交战开始时不准备使用核武器；在遭受小规模攻击时，北约不会使用核武器；即使在遭受一场大规模袭击的情况下，北约组织将首先使用常规部队，以便有时间同敌方进行谈判，并在组织内部

---

① Henry Owen. *The Next Phase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 C.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3.

② Helmut Schmidt. *The Balance of Power: Germany's Peace and the Super Powers*. London: William Kimber & C. Limited , 1971, pp. 176—177.

③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p. 211.

磋商有关初次使用核武器的问题。

麦克纳马拉在没有同盟国进行足够的磋商、又没有得到它们同意的情况下就公开提出了他认为是必然的和逻辑上恰当的理论，这在联盟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北约欧洲成员国不仅普遍认为，美国不同它们商量就宣布联盟战略的行为是对它们的不尊重，而且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反对这项战略。

在联邦德国，“灵活反应”战略引起了人们的严重不安。波恩特别强调，那种认为“在每次严重的核打击之前保留一个‘间隙’，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让双方认真考虑是否真的要冒险采取最后一步（使战争升级到大规模核战争）”的想法特别有问题，因为它包含着某种出于害怕大规模核战争不可估量的风险而产生的保留态度，而这种保留态度又含有在牺牲盟友利益情况下进行政治投降的可能性。这种担心由于法国批评家对这一战略的怀疑而得到加强。波恩提出，为了保持有效的威慑，必须使进攻者无法估量风险。具体来说，就是必须同时保持常规战争、战术核战争和战略核战争三者之间的升级关系，如果放弃在地区反击中和有限的进攻时逐步升级到大规模核战争的可能性，战争对欧洲而言就是难以想象的，威慑将变得靠不住。[①] 正因为在新战略设想中与美国存在着严重分歧，联邦德国代表对麦克纳马拉所阐述的立场进行了潮水般的抨击。

此后，联邦德国不断在各种场合阐明自己的主张，以使可能出现的新战略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1963 年，在麦克纳马拉访问联邦德国期间，联邦德国官员建议，除苏联发动的最小规模的常规进攻外，北约对任何其他直接的常规反应中都应该使用小型战场核武器；[②]一旦发现敌方的计划不是局部进攻而是大规模推进，北约就应

① （联邦德国）威廉·格雷韦：《联邦德国外交风云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第 633—666 页。

② *Die Welt*, October 30, 1963;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p.212.

该使用“重型”战术核武器来攻击敌方主力部队;考虑到这些较大武器的可操作性要求,北约应该在战争爆发后的几小时之内就应该作出决定。[1] 当然,他们也指出,“在这两个阶段中间,不可控制的危险将会出现。”[2]联邦德国国防部长哈塞尔还在西欧联盟大会上对此声明,“危险的增加是可能出现的,但不是有限使用核武器所必然出现的原子战后果,”他强调,“当双方都担心会扩大为全面(核)战争的时候,这种担心就会成为阻止全面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3]

从联邦德国的反应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从整体上反对灵活反应战略,而只是反对那种在灵活反应各阶段保持一定时间的“间隙”以寻求政治谈判来解决东西方军事冲突的思想,而对于灵活反应战略将北约反应分为三级的思想是持赞同态度的。另外,即使对前一思想的反对,联邦德国也没有坚持到底。

在这种情况下,北约防务计划委员会在 1967 年 5 月举行的巴黎会议上,较为顺利地通过决议,决定正式采纳灵活反应战略。到 12 月中旬,北约防务计划委员会布鲁塞尔会议根据灵活反应战略的原则制定了新的防务计划。计划规定,“(北约将)运用灵活的军事手段,包括常规力量和核武器,对付任何水平的侵略或侵略威胁。这些反应手段受政治控制,首要目的是抵御侵略,从而保障和平。但是,一旦侵略不幸发生,就必须努力在按照前沿防御的要求维护北约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4]这样,“灵活反应战略”就完全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而成为北约的新战略。

灵活反应战略的核心是“分级制止”的概念。按照“灵活反应战略”的要求,如有必要,北约部队能在北约区域的任何地方反击任何

---

①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p.212.

② Ibid.

③ *Speech to the WEU Assembly*, Defense Ministry Press Release, June 6, 1963.

④ *NATO Letter*, January, 1968, p.25.; Carl H. Amme. *NATO Strategy and Nuclear Defense*, New York,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Inc, 1988, p.111.

规模的军事入侵。为达此目的，"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建立常规力量、战术核力量和战略核力量三位一体的体制，从而使北约在对付华约的进攻时可采用灵活反应的手段。对付任何侵略采用合适水平的直接防卫措施抵御进攻，一旦第一步防务不能奏效时，准备在维持强有力的政治控制下审慎地逐步升级，以使进攻者确信，北约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但使用的时间和条件则不为侵略者所知。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威慑来避免战争。① 也就是说，它假定华约最初的攻击没有使用核武器，这种攻击可能导致一系列受到控制的逐步升级的回击，即从常规部队等级到"有选择和有限度地使用"战术核武器，再到普遍地使用这些武器，最后直到对苏联进行战略核攻击的威胁。在北约的这一战略里，它把未来的战争分为使用常规力量的常规战争、使用战术核力量的有限核战争和使用战略核力量的全面核战争三个等级，它们之间则随着战事的发展形成逐步升级的关系。

然而，在核武器早已达到均势的情况下②，无论北约还是华约，当战争真正爆发时，核武器只能是双方互相进行政治威慑的工具。因为，不管是哪一方首先使用核武器，都必然会遭到另一方的疯狂报复。而当一场核战争爆发之日，也可能是双方失去理智之时。这样，和平时期制定的战争规则都可能成为一纸空文。毕竟，真实的核战争不是核战争演习，更不是核战争游戏。因此，如果东西方之间发生全面核战争，最终结果不可能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只可能是同归于尽。对北约的欧洲盟国而言，即使用战术核武器打有限核战争，也可能使自己遭受灭顶之灾。欧洲人口稠密，城市彼此相距太近，民用的与军用的、战术的与战略的目标交织在一起。一场地面上的核战争对欧洲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可能造成欧洲文明的毁灭，无论是有

---

①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Brussels 1981, pp. 138—139.

② 比利时人罗贝尔·克洛兹将美苏核力量的对比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美国核垄断时期（1945—1955 年）；第二阶段，美国核优势时期（1955 年至 1962 年古巴危机）；第三阶段，美苏核均势时期。

限的核战争还是全面核战争都将如此。另外,即使北约国家能够承受有限核战争的打击,这样的战争也不太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了,也难以进行下去,北约国家也不太可能成为这种战争的胜利者。虽然,在二战时,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后,日本几乎立刻就投降了,但可以断言,当年日本的历史不会在苏联重演。苏联掌握了大规模核报复手段,如果遭到了北约的核打击,就不是选择投降,而是进行核报复,而且受核打击的破坏越严重,苏联的核报复程度也就越大。因此,很难设想,核战争爆发后,在己方也会瞬间丧失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军队的情况下,北约的剩存官兵还会顽强作战。

正因为如此,从操作层面上讲,北约灵活反应战略中的全面核战争和有限核战争都是不切实际的。这样,核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起威慑作用,而不可能成为直接使用的武器;一旦战争爆发,真正派得上用场的还是北约的常规力量。因此,与"大规模报复战略"相比较,"灵活反应战略"的核心虽然仍是核威慑,但特别重视常规力量的运用。

然而,长期以来,北约与华约在常规力量的对比上是不相称的,华约享有常规力量的优势。当苏联取得核均势后,明显地打破了军事力量平衡。因此,北约如果要取得有效的军事平衡,就必须建设好常规部队。正如西方人所说的,"不以充足的常规力量为基础的灵活反应战略是一种危险的战略","如果苏联人已经建立了一支在一场短期战争中能迅速践踏联邦德国的常规部队,那么,由于北约目前的战略可能不容许北约有充分的时间对使用核武器进行周密考虑,这种战略可能促使苏联人跃跃欲试。这种状态的结果将削弱谈判地位;而软弱的谈判地位可能使受到巨大压力的联盟陷于分裂。显然,没有充足的常规部队来约束苏联人,就没有向各类核(战争)升级过渡的中间环节。如果常规部队遭到挫败,并且近乎被制服或突破,那么就无法实现逐步升级的反应。这种灵活反应战略就无灵活性可

言。”①

另外，为了能够在常规战争中取胜，“灵活反应战略”特别强调在欧洲战区建立强大的“前沿防御”，并以此作为战略的基本点。

对北约而言，“前沿防御”并不是一项新战略，只不过以往不是没有付诸实施就是没有将它提到应有的战略高度罢了。在推行“地区遏制战略”（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时，北约就提出了“前沿防御战略”并将之作为整个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只是由于缺乏足够的部队，军事部署只限于莱茵河一线。莱茵河地区在联邦德国西部，因此，一旦战争真正爆发，北约的战略纵深将只有法国，战略回旋空间极其有限。如果要保护联邦德国东部领土的话，北约只有紧急将部队从西部调到东部。这样，所谓的“前沿战略”实际上变成了“前进战略”；当北约以“大规模报复战略”代替“地区遏制战略”后，“前沿防御战略”虽然得以保留，但是，由于北约此时强调的是作为“剑”的核力量的作用，对起“盾牌”作用的常规部队很不重视，因此，“前沿防御战略”在这时只是作为整个战略的补充因素，而没有上升到应有的战略地位。

然而，对北约欧洲国家而言，这是不可接受的。关于“前沿防御”对北约欧洲成员国的重要性，西方学者也有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在政治上，欧洲人根本不想接受那种要他们撤退而让苏军去占领边境地区，从而使他们的国家易遭侵略的战略。他们根本不愿意让自己的国家再度沦为战场；他们要苏军远离他们的国境线。而在一场投掷原子弹的战争里是根本谈不上解放，因为人们不能去解放死尸。确实，如果苏联的第一次进攻就把盟军逐出欧洲的话，这块大陆将长期甚至永远被苏联占领。而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将使二战中诺曼底式的登陆遭到失败。因此，从政治上讲，盟军是不能撤退的，应当在

①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战后国际关系史料》,第四辑,第 118 页。

联邦德国以东尽可能远的地方来保卫欧洲。①

因此,“灵活反应战略”不仅将“前沿防御战略”作为战略的基本点,而且还具体规定,“前沿防御”就是要紧挨着联邦德国的东部边境进行协调一致的防御,其目的是尽可能少地丢失土地,以及把损害降到最低限度。

按照“灵活反应战略”的上述要求,“前沿防御”实际上意味着寸土必争,使北约部队能够在边境地区投入战斗,要求北约每个成员国将其全部战斗部队部署在边境沿线,把北约最尖锐的装甲部队固定在阵地防御上。

从纯军事角度来说,“前沿防御”带有一定的风险。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和中欧盟军司令斯派达尔的估计,如在联邦德国东部边界而不是在威悉河与莱茵河之间进行防御,北约就必须在中欧战区部署至少35个师的兵力,每个师防守23公里。联邦德国国防军1962年军队指挥条例甚至规定,在常规战争中每个师的防御正面为12公里。然而,当时北约驻中欧部队只有27个师,这就意味着每个师要防守30公里。同时,由于驻中欧的北约部队分为各国部队的驻防地带,这就使得在800公里设防的师级和旅级规模的部队部署显得更为分散。根据火力射界交叉和火力射界重叠的防御战术原则,完全可以说,并不是800公里边界上的所有地形都在直射武器或者曲射武器的监视之下。因此,在防线上很可能出现缺口。在有缺口的地方,华约的装甲部队能够像它的其他战斗部队一样穿插进来包围北约防御部队。部队部署及其火力的过度分散使得北约前沿部队可能面临被各个击破的风险。而且,在没有预备部队和纵深防御部署的情况下,这种风险将变得更为严重。

正因为如此,“前沿防御战略”被重新确定为北约军事战略的基本点来之不易,而这一切又是在联邦德国建立了强大的常规部队使

①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Eleventh Edition 1988, p. 53.

得北约完成前沿防御部署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此，联邦德国在“灵活反应战略”中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

另外，在北约前沿部队中，联邦德国国防军所占的比例最大。1964年，北约组织驻中欧部队大约相当于25个师，其中联邦德国10个，美国6个，英国2 $\frac{1}{3}$个，法国2个，比利时2个，荷兰2个，加拿大1个加强旅。[①] 也就是说，联邦德国占了其中的40%。而到灵活反应战略出台时，联邦德国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个师，国防军在北约前沿部队的比例进一步提高，这就使得联邦德国在“灵活反应战略”中的现实作用进一步增强。

综上所述，由于在核均势情况下，一旦东西方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其形式只可能是灵活反应战略中所提到的三级战争中的第一级即常规战争，而不可能是更高级别的有限核战争和全面核战争。与之相适应，北约武装力量中真正在战争中可以派得上用场的是常规力量，而不是战术核力量，更不是战略核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前沿防御战略”是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战略。因此，当“前沿防御战略”被确定为“灵活反应战略”的基本内容后，处于北约与华约对抗前沿、且在北约部署的前沿部队中占有最大比例的联邦德国，就不仅在北约的整个军事战略中具有战略地位，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

第四节 小结

在不同历史时期，联邦德国在北约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总的来说，在北约实施“地区遏制战略”（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阶段，联邦德国只具有理论上的战略地位，而不具有现实的作用；在北约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阶段，联邦德国不具有理论上的战略地

① （美）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7页。

位,只有现实的作用;在北约实施“灵活反应战略”阶段,联邦德国既具有理论上的战略地位,又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

也就是说,联邦德国在北约战略中首先是具有理论上的战略地位,然后具有现实的作用,最后才既具有理论上的战略地位又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简而言之,联邦德国在北约不同时期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一个“理论上的战略地位—现实的作用—理论上的战略地位与现实作用相统一”的发展过程。这表明,联邦德国在北约战略中的地位和现实作用并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经过交替式发展后才最终统一的。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就联邦德国在北约战略中是否具有战略地位而言,主要与“前沿防御战略”在北约战略中的地位有关:在第一阶段,由于“前沿防御”是“地区遏制战略”(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处于东西方对抗前沿的联邦德国尽管还不是北约成员国,但被纳入了西方防务体系。这样,在北约的战略安排中,联邦德国就具有理论上的战略地位;在第二阶段,由于“前沿防御战略”只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补充性因素,所以尽管联邦德国处于前沿位置,但在北约的战略安排中并不具有理论上的战略地位;在第三阶段,由于“前沿防御”被重新确立北约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的基本内容,所以联邦德国在北约战略安排中又具有了理论上的战略地位。

至于联邦德国在北约战略中是否具有现实作用乃至重大作用,则主要与其军队实力有关:在第一阶段,尽管“前沿防御战略”是北约“地区遏制战略”(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联邦德国只是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而并没有重新武装,所以,它只在北约战略中具有理论上的战略地位,而不具有现实的作用;在第二阶段,尽管“前沿防御战略”只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补充因素,但是,由于联邦德国不仅实现了重新武装,而且还逐渐建立了数量可观的军队,所以,它在北约战略中虽然不具有理论上的战略地位,但已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在第三阶段,由于北约的“灵活反应战略”是

在联邦德国建立数量可观的军队完成前沿部署的情况下制定的，而且在北约的三级反应中，只有常规战争具有可操作性，另外的两种反应——有限核战争和全面核战争不可能发生，所以，当"前沿防御战略"被重新确立为北约战略的基本内容后，联邦德国在北约战略中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战略地位，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

另外，联邦德国尽管在北约战略中具有上述种种地位和作用，但在北约战略的制定上却没有大的作为，这是其地位和作用局限性的一面。这种局限性不是历史遗留问题，具体来说，不是由二战及《伦敦—巴黎协定》引起的，而是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联盟中"一家独大"的结果。正是由于美国的超强地位，北约战略实际上成了美国军事战略在北约的推广，联邦德国也像其他盟国一样基本上是被动接受，而不能在战略的制定上发挥重大的作用。在北约制定"地区遏制战略"（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和"大规模报复战略"时，由于还不是北约的正式成员，联邦德国在北约战略制定上作用的局限性还不明显，但在北约制定灵活反应战略时，联邦德国的局限性已清晰可见了。

第五章

联邦德国与北约危机的处理

在组织发展方面，北约在冷战时期经历过两次危机。第一次是法国因争取大国地位和对北约决策机制的不满而在 1966 年宣布退出军事一体化机构所引起的危机，第二次是希腊因对盟国在希土战争中政策的不满而在 1974 年效仿法国行动所引起的危机。由于国力和战略地位的巨大差异，两次危机对北约发展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其中法国行动所造成的影响远比希腊大得多。本章即以联邦德国应对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政策及对北约发展的影响为个案，探讨联邦德国在北约的组织发展特别是危机处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节　北约前所未有的危机——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法国曾在二战中被排挤出了大国行列，与之相反，英国不仅与美国同为西方世界两巨头，而且还建立了坚实的同盟关系，这成为法国痛苦的回忆。战后，英、

美两国不仅延续了战时同盟关系,而且仍然把法国排除在这种联盟之外,而英国当时虽然自诩或被当做大国,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令法国领导人非常沮丧。

在核武器时代,法国人认识到要取得大国地位就必须拥有核武器。这样,从 1950 年开始,法国就开始研究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问题。① 在英国 1952 年造出核武器后,法国又感到必须迎头赶上。尤其重要的是,法国人认为,美国之所以掌控大西洋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核优势决定的。有鉴于此,1954 年,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决定建立核力量。

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后,法国痛彻地感到需要凸显自己的军事实力,并认为核力量将使自己保持对昔日敌人的明显优势。② 由于技术力量薄弱,法国极想获得美国的帮助。然而,英国在 1956 年获准分享美国的核技术时,法国却没能享受到同等待遇。对此,法国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当时的总理费力克斯 · 加亚尔说,如果在核武器的生产以及北约战略的制定中只被当做一个次要伙伴的话,法国将"更加容易地去进行自身的努力。③ 这表明,法国研制核武器的决心进一步增强。

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苏联威胁用核武器摧毁巴黎。在此情况下,法国亟须美国支持。可是,法国在试探美国对这个威胁的反应时,等来的却是含糊其辞的回答。美国的反应深深地刺痛了法国人的心。

受此教训,法国领导人认为,发展核力量将使法国继续在大西洋防务之外推行殖民政策,并有能力在缺乏美国保护的情况下单独抗

① Beatrice Heuser. *NATO, Britain, France and the FRG: Nuclear Strategies and Forces for Europe, 1949—200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8, 1999, p. 93.

② Wilfrid L. Kohl, *French Nuclear Diplomac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1.

③ Ibid, p. 38.

衡苏联的压力。[①] 出于这种考虑,加亚尔政府于 1958 年作出了在 1960 年进行核试验的决定。

这时,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苏联拥有摧毁美国的核武器后,很难设想美苏之间会打一场同归于尽的核战争。于是,东山再起的戴高乐对美国的核保护产生了怀疑。他认为,法国必须有自己的防务,法国“若不站在前列就不是她自己……若不伟大就不是法国”,法国不拥有核武器的事实是不能接受的。[②] 显然,法国希望掌握核武器建立独立防务,以取得世界大国地位。

在没有独立核力量的情况下,法国力图通过组织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以二战中美、英之间的强大同盟为历史依据,戴高乐非常相信大国合作的作用。1958 年 6 月 29—30 日,他与来访的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会谈时表示,无论如何,法国下决心拥有核武器,即使是由别国制造的核武器也可,同时需要一个由西方主要国家分享控制权的西方原子武器常设小组,法国将参与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决定。他还说,北约组织本身应扩大地理界限,改组指挥机构,建立一个三国指挥的世界组织。7 月 5 日,戴高乐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两次会谈表明,法国政府不仅强烈要求获得大国地位,而且清晰地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即拥有自己支配的核武器和在西方联盟内部建立三强政治并成为其中的成员。

为进一步阐明法国的立场和目标,戴高乐于 9 月 24 日分别给美、英首脑发去备忘录。备忘录指出,“联盟的危险,法国有份;联盟的决策权,法国却享受不到”,北约军事行动的范围和现实不再相称了,北约组织不再适应自由世界的基本安全需要了,建议在联盟内部成立一个美、法、英三大国理事会。还要求这个组织有责任在所有影

① Wilfrid L. Kohl, *French Nuclear Diplomac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35—37.

② Wilfrid L. Kohl, *French Nuclear Diplomac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61.

响全球安全的政治问题上作出共同决定。[①] 从备忘录的内容可以看出,法国的目的在于,改变联盟的防务决策由美国把持、英国参与其中且举足轻重、法国因被排除在美英同盟之外而发言权低微的局面。

尽管法国的外交攻势咄咄逼人,美、英两国并没有妥协。10 月 20 日,艾森豪威尔在复函中指出,法国已经得到在全球与盟国合作的机会,如果采取法国建议的机制,就会引起"严重的问题",表示准备通过适当途径来探讨戴高乐所提出的问题。[②] 不难看出,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准备探讨"是假,那只不过是给戴高乐一个安慰和外交体面罢了,实际上,他持的是拒绝态度。麦克米伦在 11 月 3 日也给了戴高乐否定的答复。不仅如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 12 月 15 日拜会戴高乐时,更是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戴高乐的提议。

在提议被再三拒绝后,戴高乐愤怒了。他在 12 月举行的北约理事会上威胁说,法国要么以平等身份参加美国的全球性决策,要么在军事上退出北约。戴高乐的态度让其他与会代表特别是美国代表甚为恼火,会议没有就此问题达成任何协议。

由于通过联盟的组织途径没有实现既定的外交目标,戴高乐决定逐渐将法国从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中分离出来。1959 年 3 月 6 日,法国政府宣布,鉴于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的是保卫本国海岸和北非,法国驻地中海舰队将脱离大西洋联盟指挥。25 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该事件作了进一步解释,并驳斥了那种认为法国的行动将会削弱联盟的观点。他说,恰恰相反,他相信,"只要大国能在合作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联盟就将更富生命力,更强大。按照这种合作方式,各国担负起自己的重任,而非立足在一体化的基础上;因为在一体化中,各国人民和政府在其防务领域内感到或多或少地

---

①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5, 1958; *Atlantic Community Quarterly 14*, no. 3, Fall 1966, pp. 455—458.

② *Atlantic Community Quarterly 14*, no. 3, Fall 1966, pp. 455—458.

被剥夺了自己的作用和责任。”①

两个月之后，戴高乐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进一步表达了对核问题及联盟决策的看法。信中提到，美国不愿意向法国透露原子装备的秘密，从而迫使法国“为发现这些秘密付出沉重代价”，法国只有表示遗憾。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把是否使用核力量完全看做自己的权利。可是，一旦东西方之间发生核战争，法国就会顷刻毁灭。显然，法国不能把生死存亡完全置于他国手中，即使是最友好的国家也不例外。因此，法国坚持，一旦盟国使用原子武装，在某一时间将它们发射到某一地区时，必须允许法国参与决策。戴高乐继续表示，只要协议没有这一要求，就不要在法国领土上部署核弹头，除非这些核弹头完全处于他的长期控制之下。② 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戴高乐不仅再次表达了对没有获得美国核分享的不满，而且重申了对联盟决策过程的不满。法国的意图主要是两个：其一，向美国表明，法国将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核武器；其二，要求在联盟内部建立美、英、法三国决策机制，以便在重大问题特别是核问题上获得与美、英两国的平等决策权。

尽管如此，但美国的政策并没有松动。于是，法国政府在同年6月和7月采取了针对核问题的措施，拒绝美国在法国领土上储存核弹头和安装导弹发射装置的要求，并迫使美国部署在法国的约200架战斗轰炸机撤往英国和联邦德国。

在此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于1959年9月访问法国。由于担心法国制造核武器，他提出向法国提供这类武器的建议，其条件是通过盟国最高统帅的批准来控制这些武器的使用。然而，戴高乐说，这正是法国制造自己的核武器的原因，而且，一旦遭到苏联的进攻，法国人

① *Major Addresses, Statements, and Press Comference of General de Gaulle*, New York: French Embassy, Press and Information Division, March 25, 1959;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9, pp. 459—460.

② Mc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88, p. 478.

不能肯定,美国会冒着毁灭的风险与法国共同抗击苏联。为阐释其观点,他还以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及时援助法国作为例证。基于此,戴高乐表示,法国虽然忠诚于联盟,但反对北约组织一体化。当艾森豪威尔指出法国的核武器远远不能达到苏联水平时,他反驳说,以百万吨当量为计算单位的原子弹,只要用几个就可以毁灭任何一个国家,法国只需杀死敌人一次就够了。[①] 显然,艾森豪威尔的访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与以往立场相比,试图通过向法国提供核武器的方法来阻止法国制造核武器,虽然是美国在核问题上作出的重大让步,但法国并不为之所动,它毫不妥协地要求制造和掌控自己的核武器,以避免在新时代出现历史上遭遇过的厄运。

同年 11 月 3 日,戴高乐在军事学校发表的演说中又一次表达了法国必须掌握核武器和防卫权的观点。他讲到,"法国的防卫必须依靠法国人自己……如若不然,就是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她的作用、她的自尊和她的灵魂的背叛。"在讲到核武器时,他说,"由于对法国的毁灭性打击可能来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因此法国不仅需要核武装,而且这支武装必须能够在世界各地执行任务。"[②]

另外,为了力争在联盟内部获得与美、英的平等决策权,戴高乐还于 1960 年 4 月对美、英两国进行了访问,但在三强政治问题上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外交努力失利后,法国决定采取去北约军事一体化的进一步措施。一个月之后,法国拒绝把军事航空纳入北约的防空体系,宣布建立自己的防空系统。

不过,法国虽然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但仍然没有放弃外交努力。1960 年 8 月 9 日,戴高乐在给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信中要求 9 月中旬在百慕大举行三国最高级会议,并列出了需要讨论的四个主要问题,即更密切的三国合作、扩大北约的地理范围、在联盟内不搞

---

① (法)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第 640 页。

②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9, pp. 494—496. (英)G·巴勒克拉夫:《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57—158 页。

军事一体化和在当时的形势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9月5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比过去更加明确地说明他对北约组织的态度。戴高乐不仅阐述了北约改革的必要性,而且对北约的具体改革提出了两个起码要求:第一,联盟内部至少在大国法、英、美三国之间必须有某种组织起来的东西来处理欧洲以外的政治和战略活动;第二,一国国防虽然应同它国互相配合,但必须具有本国性质,亦如法国保持对地中海舰队的直接指挥、不允许在领土上储存北约原子武器那样。最后,他特别指出,以上这些就是法国所主张的改组北约组织的意义。[①]

艾森豪威尔给戴高乐一封很长的复信,再次从建立"三强政治"的危害和现有的北约组织对防务的有效性角度否定了法国的建议。他还在信的结尾语气强硬地表示,他不能理解"法国今天的基本哲学"。他还反问,法国是否想在拟议中的三国讨论会上代表欧洲大陆讲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削弱美国和德国之间的亲密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联邦共和国向西方靠拢)是否明智呢?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再一次让戴高乐失望了,这年年底,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之间有关三头政治的通信宣告结束。

对于法国的要求,英国外交部1961年1月公开表示,不管为了使法国支持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要付出多大代价,都不应削弱北约,因此,英国和法国的核力量也应置于多边的北约体系之下。

由于在"三强政治"上没有取得进展,随着联盟内部在"多边核力量"建设上的矛盾和美、苏、英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61年4月1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一个大国的命运要取决于另一个国家的决定和行动是不能容忍的。"[②]1963年1月,法国拒绝将从阿尔

---

① (法)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48页。

② *Major Addresses, Statesments, and Press Comference of General de Gaulle.* New York: French Embassy, Press and Information Division, fourth press conference of de Gaulle , April 11, 1961.

及利亚撤回的部队置于北约管辖之下。6 月，法国政府宣布将大西洋舰队从北约撤出，并从盟国海军参谋部撤出法国军官。1965 年 5 月，法国拒绝参加北约军事演习。9 月 9 日，法国宣布，最迟在条约有效期满的 1969 年，法国对北约一体化的从属关系就将结束，因为这种从属关系使法国的命运掌握在外国人手中。① 11 月，北约核专门委员会开始工作，法国没有参加。

戴高乐连任总统后更坚定地推行其既定政策。1966 年 2 月 21 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示意，法国将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② 3 月 7 日，戴高乐在写给约翰逊总统的私人信件中明确表示法国部队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③ 3 月 10 日和 29 日，法国政府向北约成员国正式递交备忘录，全面阐述其立场。备忘录声称，法国暂时保留联盟成员国身份，但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法国撤走分派到联盟司令部以及北约防务学院的所有法国人员；欧洲盟军司令部和中欧盟军司令部，一切外国军队、装置和基地必须于 1967 年 4 月 1 日以前迁出法国；法国驻联邦德国部队仍然留驻，但从 1967 年 7 月 1 日起不再受欧洲盟军司令部的管辖。④ 至此，法国完全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尽管法国在作出上述决定的当时及此后一再强调，将继续忠于北大西洋公约和北约联盟，继续参加北大西洋理事会和联盟的某些活动和计划，继续在联邦德国驻军，同时也与北约进行了一些军事合作，但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的行动对北约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

---

① Beatrice Heuser. *NATO, Britain, France and the FRG: Nuclear Strategies and Forces for Europe, 1949—200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8, 1999, p. 102.

②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 1966.

③ Guy De Carmoy,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France 1944—1968*,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 316.

④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 1966.

响是十分严重的。美国官方甚至说，“这是对准联盟心脏刺了一刀。”[1]这种评价虽然有点夸大其词，但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是北约发展的一次危机，则恰如其分。这是因为：

其一，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后，北约组织必须撤走法国领土上的7万驻军，[2]北约战机在没有得到法国许可的情况下将不得飞越其领空，这就严重打乱了北约的军事部署。

其二，法国位于主要的北约欧洲盟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之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由于瑞士和奥地利是中立国，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后，北约欧洲战区一分为二，即分为南北两部分。也就是说，北部的英国、冰岛、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联邦德国和南部地区的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不能在军事上连成一片，整个北约的防务体系出现了缺口。

其三，法国拥有55.1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领土，是北约欧洲战区重要的战略防御纵深。它退出军事一体化组织后，北约的欧洲战略防御纵深实际上只剩下联邦德国24.9万平方公里土地。也就是说，北约在欧洲大陆的战略防御纵深缩减了约7/10。这样，北约的战略回旋余地大大缩小了。

其四，法国是盟军驻联邦德国基地物资供应的交通要道，它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机构后，北约组织在法国的运输线、油管等设备和70万吨物资储备[3]必须撤除，这对北约的后勤供应产生了严重影响。

其五，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后，驻联邦德国法军的去留产生了法律问题。

其六，法国是承担防务费较多的北约国家，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后，其他成员国分担的联盟防务费用必然要大量增加，这就会

---

① 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②③ Carl H. Amme. *NATO Strategy and Nuclear Defense*, New York,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Inc, 1988, p. 29.

增加它们的经济负担和政治压力,从而影响整个北约防务费的支出。

第七,法国是第一个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成员国,这就在北约内部开创了类似事件的先例,严重影响了联盟的团结,极大地削弱了联盟的凝聚力。

最后,由于西方内部当时也发生了一些不利于北约发展的因素,如,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越南,英国的经济情况使它不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和平主义在欧洲左翼中更受人尊重,一些成员国要求减少他们部队所承担的任务,这就使得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后果变得尤其严重,甚至超出了这一事件本身的影响。

第二节 联邦德国与北约危机的处理

1958年9月14日和15日,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问法国,并与戴高乐在科隆贝教堂村的私人宅邸举行了会晤。阿登纳在会晤中听取了戴高乐对法国外交政策的介绍。戴高乐当时说:“法国人民对别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和良好愿望并不抱幻想,至于对苏联集团则更是不抱幻想,虽然法国人民未曾对俄国有过什么期望。法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善良愿望、能力和智慧也不抱幻想。美国人毕竟是美国人。我不谈英国,英国是第二流的问题,它毕竟是一个岛屿。对法国来说,在欧洲只可能有一个伙伴,甚至是理想的伙伴,这就是德国,今天的德国。……我早在战争期间就已声明,欧洲必须演变,但没有德国这是不可能的。……现今,我们两国除了走共同一条路之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这条道路是极其艰难的。我们这儿存在着某些妨碍着走这条共同道路的东西,你们那儿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合作,而不要成为美国的工具,我们不能只限于意大利,与比、荷、卢经济联盟国家发生联系,而应该更加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必须把其他国家也拉到我们这边来。我希望同德国建立经常性接触。为了欧洲的未来,也就是为了你们的和我们的未来,我将准备这样做。现在这是关系发展整个欧洲或失去整个欧洲的问题。”在涉及欧洲统一的必要

性时,戴高乐认为,“有必要把欧洲统一起来”,在世界政治和欧洲问题上执行不依赖美国人的共同政策,并建议从法、德两国的紧密接触开始。[1] 戴高乐的谈话反映了他的对外政策目标,即建立一个包括东欧甚至苏联在内的欧洲力量,以便在欧洲和全球政治中推行自己的政策。为达此目的,戴高乐极力拉拢联邦德国,将其称之为法国在欧洲的唯一可靠的伙伴,强调法德合作,走共同的路,执行共同的外交政策,并以此作为在世界政治中推行欧洲政策的基础。

阿登纳对戴高乐的上述观点表示大部分赞同。他说,联邦德国也不愿意成为美国人的工具,在美国对俄政策上,他同杜勒斯有过不同意见。他表示,必须向美国坦率地表明对它的政策的态度。在谈到北约组织时,阿登纳和戴高乐一样,认为联盟处于糟糕状态。[2] 但是,阿登纳又同时强调,必须同美国保持团结,指出“倘若美国脱离欧洲,那将是不幸的。”另外,阿登纳对戴高乐所说的有关法国与北约的下述立场也表示不满,即因为法国很快就拥有核武器,他迟早要让法国退出北约组织,而法国一旦退出北约,就不可能存在军事一体化的问题。

总的来看,阿登纳与戴高乐会晤后,联邦德国与法国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合作进一步加强,但在对待联盟的立场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与法国想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以执行不依赖美国人的政策相反,联邦德国极力主张加强同美国的团结,并保持北约的军事一体化。

9 月 24 日,阿登纳收到戴高乐送交美国总统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备忘录摘要。摘要是通过法国外交部交给联邦德国驻法大使的。摘要中提到的在大西洋联盟内部建立美、英、法三国理事

---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5—195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 508—510 页。

② Charles Williams. *Adenauer: The Father of the New German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0, p. 462.

会的建议让阿登纳大为恼火。[①]

当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法国作出决策的时间和程序来看,在阿登纳上次对法国进行访问期间,戴高乐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进行法德合作,实施共同外交政策,十天之后,法国政府却在没有与联邦德国政府进行任何磋商的情况下作出了重大外交决策。法国的这一行动不仅让阿登纳脸面尽失,而且让他有上当受骗之感;从内容上讲,戴高乐在十天前提出,联邦德国是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政治中的唯一合作伙伴,建议法德合作以避免大西洋联盟乃至欧洲成为美国的工具,而法国在备忘录中提到的建立三国理事会的设想却将联邦德国排除在大西洋联盟决策层之外,倘若这个设想得以实现的话,联邦德国将在联盟内部的决策中被"边缘化",这是与阿登纳追求的目标相矛盾的;另外,联邦德国政府虽然主张改革北约组织,但是,如果按照法国备忘录的设想,在大西洋联盟内部成立一个美、英、法三国理事会,并加以制度化,那势必会造成联盟的裂痕,而这是与联邦德国政府维护联盟团结的立场格格不入的。

尽管如此,联邦德国对法国所提出的对北约组织进行改革这一要求本身还是深表赞同的。正因为如此,当戴高乐 1959 年 3 月通知盟国"法国将从北约撤走其地中海舰队"时,阿登纳不仅对此表示理解,而且还肯定了戴高乐改革北约的要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个环节松动,处处松动。如果西方想要克服当前的危机,并且希望几月之后出现平静的话,就必须着手改革北约组织。他认为,就这方面来说,戴高乐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他强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得到治疗。"[②]

然而,前文所述的戴高乐 1959 年 11 月 3 日在一军事学校的演

① Charles Williams. *Adenauer: The Father of the New German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0, p.462.

②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5—195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 570 页。

说又一次严重地打击了阿登纳。因为,戴高乐讲到“法国的防卫必须依靠法国人自己”,并表示,为此目的,无论如何要拥有核武器,并建立法国自己掌控的核武装。如果戴高乐的这一目标实现的话,必然会破坏北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可是,在阿登纳看来,北约组织的一体化是一条基本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959 年 11 月底,阿登纳在访问法国前夕接见《世界报》驻波恩的记者时宣称,“大西洋联盟是法国安全的基础,也是德国安全的基础以及整个西欧安全的基础。”他说,他很难设想,如果没有“美国和加拿大在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内同自由欧洲的军事合作”,自由世界怎样能够保卫自己。[①] 阿登纳的立场表明,联邦德国对法国建立独立防务的目标严重不满。

为了消除双方的分歧,阿登纳于 12 月 1—2 日访问法国。第一天,德法双方举行了高级会谈。联邦德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总理阿登纳、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勃伦塔诺等人,法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总理米歇尔·德勃雷、外交部长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等人。法国代表在会谈中强调法德领导欧洲防务的必要性。德姆维尔说,很多问题特别是北约组织问题发生变化的时期开始了,因为美国人将要撤出欧洲,以便在北美用洲际导弹防御东方的袭击,因此,欧洲开始进入自己负责防御事务的时期,而法、德两国必须承担起领导欧洲防务的责任。对于法方的这些看法和提议,阿登纳表示坚决反对。他强调,“只要有监督的核裁军没有实现,欧洲国家由于缺乏经济力量,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核均势。美国负责欧洲防务自然是符合欧洲利益的,但同样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为如果苏联占领了欧洲大陆,美国就将被苏联所消灭。”在第一天会谈之后,联邦德国官方发言人冯·埃卡特先生对政府的立场进行了阐述。他说,“要么必须核裁军,要么必须保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还表示,他不认为,在没

① (英)G·巴勒克拉夫:《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20 页。

有一定程度的一体化的情况下可以设想十五国的联盟。[①] 德方会谈代表的态度及其政府发言人的声明表明,联邦德国坚持北约组织一体化的既定政策,它坚决维护联盟团结的立场没有改变。

12月2日上午,阿登纳和戴高乐进行了单独会谈。在谈到北约组织时,戴高乐说北约组织的发展没有跟上已经变化了的政治情况,并对美国在非洲问题上的政策讲得咬牙切齿,说这是一种无意而拙劣的政策,指出法国地中海舰队之所以从北约组织撤出,是因为地中海不属北约防务范围内,而地中海对法国和整个欧洲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担心,美国人将会逐渐撤出欧洲,在欧洲只留下象征性的武装部队,并从美国本土来操纵欧洲防务。针对戴高乐在联盟政策上的立场,阿登纳采取了两手对策:一方面,他承认北约组织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全面衰落现象,肯定戴高乐对北约组织曾经给予的一些批评,希望他提出有关北约组织改革的建议,赞同戴高乐的北约组织范围必须继续扩展的观点,认为北约组织必须在前十年基础上不仅在武器技术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要继续往前发展;另一方面,他特别肯定美国在西欧防务中的重要作用。他深信一个国家是再也不可能防御苏联的,没有美国而单靠欧洲国家也是不可能防御的,因为,根本无法提供足以赶上苏联核武装优势所需的经费,而只有实现了核裁军后,一国或欧洲国家防御苏联才是可能的设想。

当天下午,双方代表团再次进行会谈。戴高乐在发言时指出,必须依靠欧洲大陆自身的力量来负责欧洲防务,理由是美国将会压缩自己的开支,削减担任欧洲防务的美国部队。戴高乐向阿登纳保证,法国政府并不打算按照有关地中海舰队的决策,在北约组织的现有防务安排内再做进一步的单方面改变。但他同时也表示,无意改善(法国)现有的安排。这表明,戴高乐反对北约组织一体化的根本主张并没有改变。[②] 针对戴高乐的这一说法,阿登纳再次强调,只要有

---

① *The Times*, December 2,1959.

②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1959.

监督的裁军没有成为事实，欧洲国家就根本不能自己承担防务，它们根本没有资金，无法赶上苏联在这方面的优势。他还认为，如果美国人真有撤出欧洲的计划，就必须尽力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实行这种计划将把欧洲送进苏联的势力范围，从而大大增加美国自身的危险。[1] 由于在对待联盟政策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会谈以失败而告终。

半年后，由于法国拒绝把军事航空纳入北约的空防体系并准备建立自己的空防系统，联邦德国与法国在联盟政策问题上再起纷争。1960 年 5 月 20 日，阿登纳与戴高乐举行了会谈。戴高乐说，军事一体化是有害的。他进一步阐释道，如果发生危急情况，法国无论如何也会全力以赴密切配合行动的，可是处在和平时期，搞一体化只会削弱民族感情，从而也会削弱人民的防御意志。对此，阿登纳针锋相对地指出："法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持保留态度危害了有监督的裁军，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决不允许发生一次战争；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实力，让苏联望而生畏"。像戴高乐那样所说的发生危急情况时法国全力以赴密切配合行动是无济于事的，决不允许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叫苏联看到西方在扩军问题上团结一致时，才能避免战争。阿登纳最后强调，"由于这些原因，法国必须一道走。"[2]这次会谈表明，与此前相比，联邦德国政府维护北约一体化的立场更加强硬了。

同年 7 月 29—30 日，阿登纳与戴高乐又在朗布依埃就北约组织问题举行了会晤。阿登纳首先对戴高乐的一些辩解进行了反驳。当时，戴高乐对阿登纳说，他从来没有提出过北约组织要有美、英、法三国平等共事关系，他要求的只是为了解决美、英、法三国具有共同利

---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 · 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9—196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 8—15 页。

② （联邦德国）康拉德 · 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9—196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 112—113 页。

益的问题,而这一点是跟德、法两国无关的。阿登纳认为戴高乐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并举例说,法国总理米歇尔·德勃雷曾经在议会明确地要求建立"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的三国平等共事关系"。阿登纳还对德勃雷有关没有原子弹的国家就是卫星国家的说法感到震惊。① 阿登纳的反驳有理有据,戴高乐只好默不作答。在谈到北约组织的改革时,阿登纳与戴高乐既有一致观点,又有意见分歧。在北约改革的必要性上,阿登纳表示赞成戴高乐的下述观点:西方世界目前有四个强国,即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这四个国家是抵抗共产主义的主要支柱,它们的作用应该是与此相称的,而"目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总是以美国人为首"的状况与这一点是不一致的,由美国领导而欧洲却没有责任的北约组织一体化的状况必须改变。他认为,美国的核武器只有美国总统下令才可以使用的状况已不能容许了,因为美国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和站在欧洲立场上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往往是不同的,再者,每四年举行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可能使一个完全两样的新人物上台。西欧的根本任务就是关心西欧人民能否抵御一个高度核武装的敌人。他与戴高乐一致同意,大西洋联盟必须继续维持下去,但需要改革,改革方案应由(联邦)德国和法国共同制订,并在美国大选以后提出。至于如何改革,阿登纳表示,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整个事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在 1948 年和 1949 年创建的,由于当时存在着各种各样动乱的根子,人们害怕发生一场战争,而(联邦)德国当时还没有什么力量,法国虚弱,英国在大战中也受到打击,唯独美国是强大的,所以,即使是战后时期,也像战时那样,领导权自然而然地落到美国人手中。因此,他认为,形势的发展虽然需要着手创建新秩序,但行动起来必须十分小心。阿登纳还向戴高乐澄清,必须绝对明确一点,即不能有任何这样的解释,好像欧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9—196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 59 页。

洲要摆脱美国。[1] 从这次会谈可以看出,像以往一样,联邦德国在对待北约组织问题上虽然主张改革北约,但坚持维护美欧联盟关系,坚决反对"摆脱"美国,并认为美国对西方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

因为在北约改革问题上的分歧没有克服,德、法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继续进行外交磋商。1960 年 10 月 7 日,阿登纳与来访的法国总理马歇尔·德勃雷进行会谈。他表示,如果德勃雷能同意德、法两国以联合的力量促使美国总统作出这样的决定,即北约组织一些国家在紧急关头不必征得美国总统的同意可以共同使用核弹头,那他将感到高兴。[2] 当德勃雷表达了同样的担心时,阿登纳表示满意。但是,当德勃雷重复法国政府在北约的领导权、一体化和北约组织的范围等问题上的既定政策时,阿登纳再一次进行了辩驳。他说,他并不担心各国政府由于一体化而失去对自己军队的威信。相反,他认为,欧洲国家越是紧密地与美国联结在一起,它们的国内政治地位就越巩固。即使为了一体化而牺牲了某些军事威信,但通过一体化却可以在本国人民中大大地赢得国内威信。他再次强调,"每个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都懂得,他们没有美国而去反对一个像苏联这样核武装的敌人是要完蛋的。"下午,会议收到戴高乐一个讲话的电报。电报重申了法国在联盟问题上的立场。阿登纳认为,戴高乐的讲话与北约组织是不协调的。因此,在将电报读给德勃雷听时,阿登纳非常严肃地声明,"联邦共和国将不会跟着法国走这条路。"[3]

联邦德国不仅在法国面前显示了强硬的维护联盟的立场,而且还对美国公开宣布,坚持执行美国对联盟进行领导的政策。1961 年 4 月 9 日,阿登纳在波恩对美国记者表示,支持加强北约组织和更有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9—196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 63 页。

②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9—196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 73 页。

③ 同上,第 78 页。

力地强调美国在北约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同月 17 日，阿登纳在美国访问时公开宣布，反对法国提出的在北约组织内部设置一个三国管理机构的计划。[①]

1962 年秋，针对法国政府提出的成立一个由法国人任总司令的法德战略空军联合指挥部的外交秘密倡议，联邦德国政府明确表示，决不会以在美国核保护下获得的可靠安全，去换取法国新研制的原子弹的不可靠保护。

当然，这并没有妨碍法、德签订合作条约。1963 年 1 月 22 日，阿登纳访问巴黎。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会见阿登纳谈到有关北约改革问题时说，欧洲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应占有一半席位，在战略决定上要和美国人平起平坐地发挥共同作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这样来改革，要不就根本谈不上改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指挥权的改革，必须达到不再让美国主宰一切，而让欧洲人承担一部分战略上的责任的目的。同一天，联邦德国与法国签订友好合作条约。按照条约规定，法德军事合作和协商成为主要内容之一。[②] 法国原本打算将两国条约作为向美苏抗衡的武器，然而，联邦德国却无意如此。2 月 5—7 日，联邦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卡斯滕斯在华盛顿阐释了联邦政府对德法条约意义的见解，并同美国总统肯尼迪、国务卿腊斯克、特别顾问麦乔治·邦迪以及国会成员进行了会谈。卡斯滕斯声称，"条约丝毫不会影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美国的联盟。"2 月 6 日，阿登纳在政府声明中说，古巴危机表明，在攸关生存与自由的时刻，美国政府有能力采取断然措施；保持与美国的关系，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安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欧洲要没有美国的支持，就谈不到防务；只要美国能长期保持自由，欧洲也就能保持自由。同美国的合作是极其必要的。同年 5 月，联邦议院在批准该条约时对条约的序言作了澄清，说明条约并不违背欧洲同美国保持密切的伙伴关系，不违

①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1961.

② *Bulletin*, January 24, 1963.

背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发展欧洲一体化(包括英国加入一体化)的任务。[①] 显然,联邦德国的举措使戴高乐所进行的建立法德联盟以在北约内部抗衡美国对北约的领导的努力失败了。

1963 年 2 月,联邦德国国防部长哈塞尔在访美期间再次重申前任施特劳斯的声明,强调对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说,"联邦共和国将像过去一样,继续大量采购美国军事装备、食品和设施。这些采购主要是为了补偿美国在德国驻军的防务费。"[②]

正因为如此,1963 年 7 月 4—5 日,在按法德合作条约规定每年召开两次最高级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前夕,戴高乐无可奈何地对法国议员们说,"你们知道,条约像少女和玫瑰花一样,她们的日子有多长就是多长。"同时,他还引用了维克多·雨果《东方》一诗中的名句说,"啊! 我曾目睹多少少女的青春消逝。"[③]7 月 4 日,戴高乐访问联邦德国。这次访问是在法国大西洋舰队已经从北约撤出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戴高乐之行带有为法国行动辩护的强烈色彩。在谈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戴高乐指出,法国要成为过去那样的强国,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此是一种灾难,因为它破坏了民族责任这种感情,法国不同意联盟组织过分一体化。对此,阿登纳表示,他理解戴高乐的全部动机。同时,他也清楚地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任何一种裂痕,都只能是对赫鲁晓夫的加强。阿登纳还说,他一再告诫属下,任何一种外交行动,都必须着眼于有否加强防御苏联来加以考虑。撤回法国舰队肯定会被苏联人看做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削弱的一种标志。他进一步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发生危机的时候抽走北约中的地中海舰队是"容易说清楚"的,但是,不能说戴高乐当时所申

---

① *The Times*, May 17,1963.

② *Bulletin*, March 5, 1963;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p. 220.

③ (法)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第 664 页。

述的理由足以抵消因此而增强苏联对西方瓦解的指望的这种巨大缺陷。[①] 言下之意,联邦德国对法国在没有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从北约组织撤出其大西洋舰队就更难理解了。显然,阿登纳是在对法国的行动进行责备。

1963 年 10 月阿登纳退出政坛,继任的路德维希·艾哈德总理推行亲大西洋政策,靠拢美国。[②] 12 月初,艾哈德在第一次访问法国期间,带有讽刺意味地说,他非常敬仰法国的核力量,但是宁愿依靠美国的核力量。这表明,当需要在美国和法国之间作出选择时,联邦德国选择的是美国而不是法国。

1966 年 3 月 18 日,在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并要求盟国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撤出法国后,联邦德国与北约其他 13 个盟国一道发表联合声明,[③]重申北大西洋公约以及根据此公约建立的组织对各成员国安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要继续保持北约组织并坚持北约军事一体化。

3 月 29 日,法国向北约其他十四个成员国递交备忘录,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保留联盟成员国资格,驻联邦德国陆军和空军部队仍然留驻。对此,联邦德国在 4 月 28 日致法国的备忘录中声明,[④]不能同意法国政府所转达的意图的论据,也不能接受法国政府采取行动的法律依据,同时对法国采取的行动深表遗憾。备忘录还指出,法国从盟军司令部撤出驻联邦共和国军队的决定对《伦敦—巴黎协定》产生了影响,指责法国没按法德条约规定与德国商量就作出了决定。联邦德国还借此强调,继续保持北约组织的结构和一体化体系,同时建议就驻扎在联邦德国的法国部队的法律地位问题进行

---

①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9—196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 258—260 页。

② Roger Morg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 Germany 1945—1973: A Study in Alliance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46.

③④ Hearing by Special Subcommittee on North Atlantic Orgnization Commitments, 1972. 参见本章附录。

谈判。

1966 年 12 月,分别接替艾哈德总理和施罗德外长的库特・基辛格与维利・勃兰特访问法国,并与法国领导人就驻德法军的法律地位问题进行谈判。联邦德国代表表达了自己对待北约组织的立场和政策。勃兰特外长对法国领导人坦言,"为了欧洲的安全,需要同美国搞联盟;欧洲同美国背靠背是无法生存的,而只能超越大西洋进行公开合作。"[①]也就是说,联邦德国新一届政府承续了往届政府维护大西洋联盟的政策。最后,两国代表签订了法国部队驻德章程。章程的签订使法国军队可以继续驻扎在联邦德国,从而为继续进行起码的军事合作创造了条件。对联盟各伙伴国来说,保留了继续使用法国领土的可能性,以适应某些演习和后勤供应的需要。在战争期间,北约组织不需要将法国视为中立地区。至此,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所带来的北约发展危机才得以化解。

第三节 小结

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是北约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发展危机。这次危机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北约的兴衰甚至存亡。在整个危机的处理过程中,联邦德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具体来说:

第一,法国在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过程中自始至终(特别是在美、英、法三大国理事会不能成立的情况下)追求在联盟内部进行法德合作,并且力图以此为基础联合欧洲其他国家执行独立的欧洲政策。就其实质而言,法国主观上是想实现其大国地位,客观上却会抗衡美国。如果联邦德国与法国切实进行这种合作的话,势必会在北约内部形成法德集团和美英集团,从而造成北约的分裂。

第二,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时,离北大西洋公约的有效

① (联邦德国)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 141 页。

期限截止时间只有3年了，对北约的命运而言，此时联盟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过程也就是联邦德国被迫在美国和法国之间作出选择的过程，而这种选择对北约的发展影响巨大甚至生死攸关。美国国际政治学大师汉斯·摩根索在评论联邦德国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影响力时曾风趣幽默地描述，“联邦德国已成为大西洋联盟的中心，她像一个十分可爱但还不十分情愿结婚的姑娘，为大家所追逐。”可以说，如果联邦德国当时选择的不是美国而是法国，北约的团结就会遭到极大的破坏，凝聚力也会锐减，甚至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离心力。这样，北约面临的可能不只是分裂的危险，还可能崩溃。

第三，在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过程中，联邦德国不是片面抨击和抵制，而是在拒绝与法国一道在联盟内部摆脱美国并且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同时，还同情、支持法国要求改革北约的主张，以及与法国签订带有保留条款的合作条约。联邦德国的这种对策务实、灵活，既打击了法国的分裂行径，又在一程度上维护了法国的外交体面，避免法国出现众叛亲离的局面。这成为法国在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后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这样，法国将可能不只是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还可能完全退出北约。

第四，作为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重要决定，法国驻联邦德国部队从1967年7月1日起不再受欧洲盟军司令部的管辖，但仍然留驻。然而，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就成了一个主权国家，没有它的同意，就不能在其领土上驻军。进一步说，如果没有联邦德国的应允，法国就不能继续在此驻军。在此情况下，联邦德国建议两国就此问题进行协商。1966年12月，联邦德国最终与法国签订法国部队驻德章程，从而解决了这一法律难题。正因为这一难题的解决，才使法国在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后能够经常保持同北约军事上的实质联系，从而避免法国在军事上彻底脱离北约，进而使危机降低到最低程度。

第五，如果不是联邦德国适时采取有利于北约团结及使法国维持与北约事实上的军事联系的政策，北约可能会分裂，从而削弱北约在两极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说，如果北约因之而解体的话，北约就在冷战中不战自败了。

联邦德国在北约危机处理之所以具有上述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地处欧洲心脏，战略地位重要。其二，综合实力强大。经济上，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在 1955 年超过法国后，又在 1960 年超过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居第二位。军事上，联邦德国虽然没有核武器，但常规力量的规模已相当可观，1960 年有 27 万，1962 年有 32.5 万，1966 年有 45.5 万；[①]人口上，联邦德国 1958 年有人口 5429 万，[②]是北约欧洲盟国中最多的国家。其三，由于前两个原因，联邦德国成为法国极力争取的对象，使两国走向了密切合作，并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使法国不至于在北约特别是主要成员国中孤立，从而大大减少了法国采取进一步损害联盟行动的可能性。其四，联邦德国与法国签订的驻军协定成为法国与北约保持实质性军事联系的重要纽带。其五，这是联邦德国长期推行大西洋联盟政策的结果。最后，由于历史原因，联邦德国珍惜与美国的结盟关系，阿登纳政府与法国签订友好

①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3—1974*,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3, p. 79;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8—1979*,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8, p. 86;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2—1973*,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2, p. 74;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4—1975*,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4, p. 8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5—197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5, p. 8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6—1977*,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6, p. 83;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7—1978*,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7, p. 87.

② Thelma Liesner. *Economic Statistics 1900—1983: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New York: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 1985, p. 91.

合作条约时特别声明，条约“丝毫不能损害德国与美国的联盟”；由于美国的头号强国地位（特别是在核武器方面），阿登纳和艾哈德政府都强调，联邦德国从美国得到的安全比法国得到的安全要可靠得多，保持与美国的关系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安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因此不想在北约问题上与美国的关系搞僵，其中，艾哈德政府更是推行亲大西洋政策。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所形成的合力，联邦德国在这一危机的处理过程中才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附录：

北约十四个成员国声明

1966年3月18日，白宫

比利时、加拿大、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土耳其、联合王国和美国的政府首脑一致同意发表下列声明：

“北大西洋公约以及根据此公约建立的组织对于我们各国的安全都是同样地必不可少。”

“大西洋联盟通过在和平时期保持着一个一体化的、互相依靠的军事组织，保证了它作为防御和威慑工具的效用。在这个组织中，每个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以保证全体的共同安全，这是历史上以前的任何联盟所未做过的。我们确信，这个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将继续下去。任何双边安排的制度都不可能替代。”

“北大西洋公约及其组织并不仅仅是共同防御的工具。它们还满足了一种共同的政治上需要，并反应了北大西洋共同体的各成员国随时准备和决心尽一切可能通过磋商和共同行动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安全，促进国际和平、进步和繁荣。”

联邦德国致法国的备忘录

（对法国1966年3月29日备忘录的答复）

1966年4月28日

德国政府告知已收到法国政府1966年3月29日备忘录。德国政府已经声明它不能同意法国政府所转达的意图的论据，德国政府认为对西方世界特别是对欧洲的威胁依然存在。德国政府同时也不能接受法国政府采取行动的法律依据，德国政府为法国政府没有能按照北大西洋公约规定的途径即提出修改建议进行讨论而深表遗憾。

法国备忘录声称法国政府并不排除目前部署在德国的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继续留在德国的可能性。法国政府还声明它打算使联盟维持到1969年以后，德国政府由此推测法国的意图是继续参加联盟的共同防御。对此德国表示欢迎。盟军在德国的军事使命只能是防御的，即在共同防御的范围内作为联盟提供的一种有效的威慑以保证各成员国的领土完整。鉴于现代化武器技术，只有各成员国在和平时期就达成一旦战争爆发就立即相互提供支援的协议，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款和西欧联盟条约第五款中所规定的义务才能得到有效的履行。

这就意味着联盟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的职责是在集体防御的范围内各自负有明确的任务以对付不测事件，同时也要在和平时期确立一些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的先决条件。鉴于有效防御的领土区域太窄，以及预期军事行动的快速性，为盟国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成立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以对付不测事件是绝对必要的。

德国政府因此意识到要从法国政府得悉驻德国的法国部队同北约部队在战时及和平时期的合作将如何安排。特别是，德国政府认为法国政府有必要使它的盟国清楚地了解在对付不测事件时法国是否准备在集体防御的范围内，用它的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承担明确

规定的防务责任;在和平时期,法国是否准备确定一些必要的先决条件以便与负有重大责任的北约司令部协作;是否愿意在对付不测事件时把自己的部队置于负有重大责任的北约司令官的指挥之下;是否愿意把它的防空部队继续同北约的共同空中防御系统合作;并且是否准备把它的部队同北约警戒系统密切合作。除此之外,还产生了一些诸如规则、程序等影响北约军用飞机使用法国领空的问题。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是由一个条约系统和北约部长理事会的决定组成的结构中产生,这体现了有关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这个系统包括1954年10月3日伦敦会议最后决议书、1954年10月22日北约部长理事会的执行决议以及1954年10月23日根据执行决议而达成的巴黎协定。

法国政府宣布打算于1967年7月1日从北约司令部撤出法国驻德部队,这对这个条约系统的基础条款产生影响,即对伦敦九国会议最后条约第四款和1954年10月22日北约部长理事会的执行决议产生影响。伦敦九国会议的与会国以及后来联盟的各成员国都明确地承担义务把部署在欧洲大陆的部队划归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统辖。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打算用于保卫海外领土的部队和北约已经承认或将要同意时宜继续归本国司令部统辖的部队。在1954年10月22日北约部长理事会的执行决议中,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对他所统辖部队的责任和权限也有详细的规定。

这种安排不仅适合军事上的需要而且也与那时联盟声明的各缔约国政治平等原则相一致。

与北约各成员国承担义务的保证相联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据1954年10月23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扎外国军队的协定,同美国、英国和法国达成协议:与当时已部署在联邦领土上的实力相同的部队将来仍可以部署在那里。

驻联邦共和国领土的部队退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管辖,影响它们继续留在联邦共和国的权利。因为驻联邦领土的外国军队是置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一定程度上所参加的联合司令部的管辖,还

是直接受其本国司令部的管辖，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既然法国驻联邦领土的军队没有得到大西洋联盟其他成员国的同意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管辖撤回，那么法国就不能再行使1954年10月23日签订的协定所规定的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部署军队的权利。然而，德国政府希望能同法国政府达成一些新的协定使法国军队在共同防御的范围内留驻联邦领土。要能为法国驻德部队的军事任务及其作用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协定，也仍有为它们的存在提供新的法律基础，使它们的地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

这些新协定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同时要考虑到接受国的主权以及有关期限的相应条款。

德国政府正与其他成员国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它希望随后按照双方同意的程序同法国政府就法国部队的军事任务开始会谈。就德国政府本身来说，它准备同法国政府就有关法国驻德部队的存在及它们的法律地位进行会谈，并建议在会谈中两国政府应该利用1963年1月2日德法合作条约所提供的一切方式。①

① *Hearing by Special Subcommittee on North Atlantic Orgnization Commitments.* 1972, pp. 12523—12534. 转引自上海国际关系学会:《战后国际关系史料》,第四辑,第83—84页,94—97页。

第六章

联邦德国与两德统一前北约对华约在欧洲均势的重建

——以联邦德国与北约“双重决议”的出台和实施为个案

冷战时期，北约（以美国为主）与华约（苏联）核力量的对比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总的来说，以古巴导弹危机为分水岭，此前北约基本上处于核优势地位，此后则两集团逐渐达到了均势。当北约核力量占优势时，华约核力量如何发展和部署对北约不会出现威胁性的变化，但双方核力量达到均势后，华约核力量的发展及其部署就有可能打破均势状态，对北约来说就意味着严重的事态，即使在双方出现政治上的缓和时也不例外，这在双方常规武装力量处于平衡状态时尤其如此。因此，一旦均势被华约破坏，恢复均势就会成为北约的必然选择。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苏联加速生产和部署SS-20中程导弹，东西方的军力特别是核力量均势遭到了破坏。为重建均势，北约出台和实施了“双重决议”，一方面由美国出面与苏联进行限制欧洲中程导弹谈判；另一方面准备在谈判不成功时部署相对抗的武器。从北约第二个有效期生效起至两德统一前，“双重决议”是北约发展中最重要的篇章。本章以此为个案，试图对联邦德国在欧洲核均势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探讨。

第一节 施密特的演说与“双重决议”的萌芽

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东西方之间针对对方的战略有所调整。北约方面，1967年12月，北约理事会通过了“哈默尔报告”，提出对东方实行“防务+缓和”的政治战略。同时，北约各国也对自身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调整。1969年，美国提出了尼克松主义，决定在保持强大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以谈判作为处理同共产党国家关系的主要手段。福特、卡特时期基本上继承了这一政策。同年，处于对抗前沿的联邦德国勃兰特政府开始推行“新东方政策”，积极发展同东方国家的关系。此后，施密特政府继续坚持这一政策；华约方面，苏联尽管在1968年入侵了盟国捷克斯洛伐克，但对西方却采取了缓和战略。1969年，勃列日涅夫在华约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了“欧洲缓和”的一整套主张。1971年，苏共通过了“和平纲领”，宣称把“缓和”摆在“巩固和加强苏联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首位”，同美国进行友好对话与谈判。此后，苏联开展了一系列缓和攻势。

在此背景下，东西方之间出现了缓和局面。联邦德国先后与苏联、波兰、东德签订了统称为《东方条约》的《莫斯科条约》、《华沙条约》和《基础条约》。这些条约的内容大同小异，都规定双方将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承认边界现状，承担不使用武力威胁和不使用武力的义务等。在这一系列条约的基础上，联邦德国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与波兰和东德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东西方争夺激烈的西柏林，美、苏、英、法于1971年签订《关于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协定特别规定四国政府将尽力促进在有关地区消除紧张局势和防止发生纠纷，在本地区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头号国家美苏之间进行多次首脑会晤，并签署了包括《美苏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在内的一系列条约。另外，东西方之间还从1973年开始举行一系列的中欧裁军谈判。

在缓和的同时，东西方之间的对抗仍在继续，双方都在加强防务

能力。不过,就军力对比而言,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集团大体上平衡,华约稍占优势。

在常规力量方面:以东西方对抗最激烈的中欧为例。如果将苏联西部三军区计算在内,在武装力量的规模上,华约在中欧约有58个师,北约只有27个师;在战术作战飞机的数量上,华约有2460架,北约只有1700架;在坦克数量上,华约多达19000辆,北约只有6100辆。[①]

从直观对比来看,华约的师级武装力量数量是北约的两倍多,战术作战飞机数量是1.4倍,坦克数量则高达3倍。这表明,华约在常规力量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然而,如果不将苏联西部三军区的武装力量包括在中欧范围内,则两大集团旗鼓相当。华约和北约在武装力量规模上基本相等,前者为28个师,只比后者多1个师;前者的坦克数量虽然仍然庞大,高达11000辆,比后者多4900辆,但其战术作战飞机的数量只有1170架,比后者少530架。详情见表6-1:

表6-1 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约与华约在中欧的常规力量对比

类别	北约组织[①]	华约组织[②]	苏联西部三军区[③]
战斗师(个)	27	58	30
坦克(辆)	6,100	19,000	8,000
战术飞机(架)[④]	1,700	2,460	1,290

说明:① 北约组织在中欧的兵力包括北约组织的中欧国家比利时、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卢森堡、荷兰提供的兵力和加拿大、英国、美国在此驻扎的兵力。

② 华约组织在中欧的兵力包括华约组织的中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提供的兵力和苏联驻西方缓冲地区的兵力,以及苏联西部三军区的兵力。

③ 此处的西部三军区是指波罗的海军区、白俄罗斯军区和喀尔巴阡军区。

④ 此处的战术飞机是指侦察机、歼击轰炸机和歼击机,不包括海军飞机。

---

① (比利时)罗贝尔·克洛兹:《欧洲有没有防务?——可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四十八小时》,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2页。

在战略力量方面：陆基洲际导弹，华约有1594枚，北约为1054枚；陆基中程导弹，前者为600枚，后者为48枚；潜艇导弹，前者为696枚，后者为768枚；战略轰炸机，前者为460架，后者为400架；中型轰炸机，前者为600架，后者为96架；带核弹头的导弹，前者为3420枚，后者为6794枚；战略核潜艇，前者为73艘，后者为41艘。详情见表6－2：

表6－2　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约与华约的战略力量对比

武器项目	苏联	美国	英国	法国
陆基洲际导弹	1,594	1,054		
陆基中程导弹	600			48
潜艇导弹	696	656	64	48
战略轰炸机	460	400		
中型轰炸机	600	60		36
带核弹头的导弹	3,420	6,794		
战略核潜艇	73	41		

（资料来源：Weissbuch 1975/1976, Herausgegeben vom Bundesminister der Verteidigung.）

以上对比表明，华约占优势的战略武器项目比北约多，在七个项目中，它占优势的就有陆基洲际导弹、陆基中程导弹、战略轰炸机、中型轰炸机、战略核潜艇五个，但是，在这些项目的任何一个方面，华约都不占压倒性优势；相比之下，北约虽然占优势的项目只有两个，但它在其中的“带核弹头的导弹”的数量上却占压倒性优势。综合优势项目和优势数量来考察，两者的战略力量势均力敌。

但是，这种缓和与平衡局面很快发生了变化。1977年，苏联决定

并开始在欧洲部署 SS－20 中程导弹。[①] SS－20 导弹在技术的复杂性、精度、可靠性、生存能力、移动性、射程等方面都超过苏联此前部署的所有其他导弹，特别是超过 SS－4 和 SS－5 导弹。[②] 具体来说，在技术的复杂性上，每枚 SS－4 或 SS－5 导弹只能携带一个核弹头，而每枚 SS－20 导弹却可以运载 3 个核弹头，其中每一个弹头又可以单独引向另一个目标。[③] 这就是说，每枚 SS－20 导弹可以同时毁灭 3 个不同的目标；在精度上，SS－20 导弹的目标误差小于 300 米，[④]这比起 SS－4 和 SS－5 导弹来说已经大大提高了；在生存能力上，旧的 SS－4 和 SS－5 导弹发射架发射一枚导弹后即毁坏，而 SS－20 导弹发射架却可以补充装填，它可以发射更多的导弹；在机动性上，旧的 SS－4 和 SS－5 导弹发射架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而新的 SS－20 导弹发射架是机动的，因而很难被西方的武器击中；从射程来看，SS－4

---

① Caspar Weinberger. *Fighting for Peace: Seven Critical Years at the Pentagon*.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90, p. 235.

② Brady, Linda P., Kaufman, Joyce P. *NATO in the 1980s——Challenges and Response*. New York: Praeger, 1985, p. 23; Rudolf Steinke and Michel Vale. *Germany Debates Defense: The NATO Alliance at the Crossroads*,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83, p. 77.

③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3—1974*,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3, p. 69;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8—1979*,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8, p. 8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2—1973*,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2, p. 65;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4—1975*,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4, p. 8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5—197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5, p. 7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6—1977*,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6, p. 73;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7—1978*,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7, p. 77.

④ 周琪、王国明:《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10 页。

和 SS－5 导弹的射程分别只有约 1200 和 2300 公里，[①]而 SS－20 导弹的射程可达 5000 公里。[②] 因此，向西发射的 SS－20 导弹虽然不可能越过大西洋，但与 SS－4 和 SS－5 导弹相比，它们可以部署在东部更远的地方，甚至可以从乌拉尔以东的地方击中西欧领土上的所有目标。

由于性能先进，SS－20 导弹能准确地摧毁加固的军事目标，弹头的当量和射程都足以摧毁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或者欧洲的任何一个军事目标。[③] 另外，由于发射阵地的东移，SS－20 导弹对部署在欧洲的美、英、法核武器来说是不可及的，它们只能由美国的洲际导弹加以破坏。而在洲际导弹方面，自从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以来，美苏之间已建立了均势，不能指望美国能用它的洲际导弹来摧毁苏联的 SS－20 导弹。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SS－20 导弹的部署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北约与华约在欧洲的战略平衡。毫无疑问，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这种不平衡对欧洲的核平衡都是具有威胁性的变化，这对处于东西方对抗前沿的联邦德国来说尤其如此。

---

①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3—1974*,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69;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8—1979*,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8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2—1973*,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65;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4—1975*,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73;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5—197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7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6—1977*,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73;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7—1978*,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77.

② David Gress. *Peace and Survival: Germany, the Peace Movement, and European Secu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5, p. 70.

③ Caspar Weinberger. *Fighting for Peace: Seven Critical Years at the Pentagon.*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90, p. 235.

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率先主张，北约必须对苏联部署 SS－20 导弹的举措作出强有力的反应。1977 年 5 月，当美国在与苏联举行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中作出让步、同意把远程巡航导弹纳入战略核武器范畴时，施密特表示强烈不满。[①] 巡航导弹尽管是美国正在研制的武器，但施密特认为它是西方赖以抗衡苏联 SS－20 导弹的重要武器，因而对美国的谈判方针表示忧虑。他一开始就认为，美国忽视苏联在中程核武器领域的扩军可能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动机：第一，美国担心部署在欧洲的一部分核武器也被纳入谈判；第二，为了照顾英、法两国的核武器；第三，美国只打算减少对其本土的战略威胁，并且不愿意由于照顾欧洲的安全利益而在这方面受到干扰。[②] 当自己的忧虑没有引起美国的重视后，施密特断定，第三个动机在美国是起决定作用的。为了维护本国安全，施密特在 7 月中旬访美期间，要求卡特总统或者把苏联的 SS－20 导弹也纳入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内容，或者不把巡航导弹纳入谈判中。他还表示愿意充当中间人，并向勃列日涅夫进行试探。然而，卡特并没有接受施密特的建议。

同年 9 月，施密特又花了大量时间向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明联邦德国以及被分裂的德意志民族所处的战略形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着重强调苏联迅速扩充的 SS－20 导弹对联邦德国构成的政治威胁。与以往一样，施密特的谈话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布热津斯基表示，这一切根本与波恩无关，说这是美国的事，倘若联邦共和国在某个时候受到苏联 SS－20 导弹的压力，美国可以用它的战略核武器来对付。卡特赞成布热津斯基的意见，表示不理解施密特的担忧。

在建议一再遭受拒绝后，施密特决定采取公开行动。1977 年 10

① 潘其昌：《走出夹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73 页。

②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德国——施密特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74 页。

月28日,施密特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演说,呼吁西方采取对策。他指出,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均势是西方安全的前提,只有维持均势才能保证世界局势的缓和,西方决不能忽视均势的必要性;由于苏联坚持军队现代化,部署了SS-20导弹和喷气式轰炸机,欧洲的军事平衡发生了质的变化;[①]在德国人看来,光谈对洲际战略武器的平衡和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进一步增加限制的前景,而不对苏联的SS-20导弹实行任何限制的话,会对他称之为"欧洲战略"核力量的均势产生消极影响。[②] 他还提醒美国,应该让欧洲国家参与限制战略武器和中程导弹谈判。对于苏联部署新型SS-20导弹造成苏联的优势,施密特强调,这些导弹是以西欧为主要目标的,因此,有必要部署适当的武器进行反击。[③] 只要欧洲在这方面的失衡情况消除不了,"我们就必须抓住构成威慑战略的一切有分量的要素,这就是说,联盟必须作好准备,提供充分的和正确的手段以实施这个有效的战略,从而阻止一切会对我们始终正确的战略釜底抽薪的事态发展下去。" [④]

因发表上述演说,施密特总理成了对东西方力量均势的失衡状况提出警告并呼吁采取措施重建均势的第一位北约国家领导人。从演说的内容可以看出,为了应对因苏联部署SS-20导弹而造成欧洲均势遭受破坏这一形势,施密特呼吁西方所采取的对策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方面通过谈判对苏联的这类导弹加以限制;另一方面采取一切威慑手段特别是部署适当的武器予以反击。实际上,这是一个

---

① Helmut Schmidt, "*The 1977 Alstair Buchan Lecture*", Survival, Vol. 20 no. 1, 1978, p. 1—6.

② Cyrus Vance. *Hard Choice: 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nc, 1983, p. 67.

③ Carl H. Amme. *NATO Strategy and Nuclear Defense*, New York,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Inc, 1988, p. 24.

④ Helmut Schmidt, "*The 1977 Alastair Buchan Memorial Lecture*", Survial 20, nol. , Janurary - February, 1978, pp. 2—10 ;又见潘其昌:《走出夹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页。

双管齐下的对策。正因为如此,这篇演说被西方当作北约后来所制定的“双重决议”的萌芽。

第二节 “双重决议”萌芽的原因

施密特之所以发表演说从而使双重决议得以萌芽,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施密特总理是均势战略①的积极宣传者和实践者。他之所以成为均势战略的推崇者,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苏联及其传统的认识。在他看来,苏联的外交政策和总战略在许多方面始终是从16世纪开始的,是经过17世纪直至18、19世纪旧俄国政策的直线继续和延伸的。说得粗略一点,莫斯科的总战略过去和现在都是四分之三的传统俄国战略,四分之一的共产主义战略。至于苏联的具体战略,施密特将之归纳为从历史上继承的源于救世主义的对外扩张战略。他说,“不管是伊凡四世、彼得一世统治时期,还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斯大林、赫鲁晓夫或是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俄国向外扩张的欲望尽管遭到某些挫折,但从未真正熄灭过。其根源是存在一种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救世主义,它是俄罗斯国家意识中内存的思想。当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土耳其人征服,从而使奥斯曼帝国的中心脱离基督教时,莫斯科宣称自己是‘第三个罗马’,而第四个罗马永远也不会有。救世的信念在19世纪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即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泛斯拉夫主义,而20世纪它又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

① 在施密特(1969—1974年)之前担任总理的勃兰特曾提出,联邦德国的安全政策就是均势政策。他说:“……不管我们是考虑由我们认真持久地努力促成共同均衡限制和控制军备所体现出来的、安全政策的一个方面,还是考虑同保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具有适当的防务任务有关的、安全政策的另一个方面,联邦政府都认为它的安全政策就是均势政策与保障和平的政策。根据我们的安全政策的这两个方面来看,联邦政府也把保卫我们国家的外部安全看做我们所属的联盟的一种任务,而且作为联盟的一个成员,对东西方之间力量的均势作出我们的贡献。”(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均势战略——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页。

共产主义出现。"[①]他特别阐明,苏联领导人患有一种俄罗斯安全综合征,并认为这种病症在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第一次显示出来。在论证这种安全综合征时,施密特引用沙皇时代一位大臣说过的话说,俄罗斯"只有当边界两侧都有俄国士兵站岗的时候",才会感到"俄国的边界才是安全的"。斯大林时代的政策则是在周围建立一个由卫星国组成的弧圈,这一政策导致了杜勒斯在欧洲、中东和远东建立美国的联盟体系,以作为西方的"防疫地带"。这反过来又被俄罗斯看做是危险的包围圈,而20世纪50年代末由赫鲁晓夫挑起的同中国的破裂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综合征。另外,谋求另一个世界大国具有的全球战略地位和"同等安全",不仅是为了防务政策上的需要,同时也是对苏联自卑感的一种补偿,这种自卑感显然是由于没有能力在经济上达到西方工业社会的同样水平而产生的。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施密特指出,从历史上认识俄国扩张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相信地缘政治决定论。他更相信,这是一种政治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从未放弃过最初源自俄罗斯东正教,后来被苏联共产党吸收并继承下来的那种使命感。[②] 苏联就是传统地依靠强权政治,而与这一传统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官僚政治控制的革命理论;这个混合体,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给世界政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所以人们进行估计时必须始终把苏联行为的基本因素考虑在内。如果一个人不这么做,不从苏联所处地位去考虑问题,就会发现他的努力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实际上是危险的。由于这个原因,"对我们来说不仅需要对苏联的行为作一个彻底的分析,还要对苏联的军事和政治能力作一个估计。对西方同等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忽视自己的能

①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和德国——施密特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页。

②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和德国——施密特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5页。

力和目标。”[①]如果在争取缓和的同时，不重视为自己提供必要的军事防御，那仍旧是愚蠢的；如果低估在一场旷日持久而漫无限制的军备竞赛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则仍旧是不负责任的。[②]

基于此，施密特强调，必须在东西方之间实施均势战略。他所说的均势指的是保持军事力量的均衡，即西方联盟的紧密结合和防务能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与华约的实力旗鼓相当。[③] 施密特还认为，欧洲安全的关键在于不仅要同苏联的地面部队保持均势，而且也要同苏联的导弹保持均势。[④] 均势建立得越稳固，每一方越能牢固地掌握他们现在所占有的东西，也越能加强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至于“均势战略”政策中所说的战略有它自己的含义。施密特曾在《均势战略》一书中说，在他看来，战略不是属于一种军事范畴，而是属于一种对外(或世界)政治的范畴……是政府的事情。总之，均势战略往往会变成一种维持现状的战略；因为谁要改变现状，他就要负破坏均势的责任。

关于均势对联邦德国的重要性，施密特指出，欧洲均势是政治稳定的一个必需条件，而政治稳定又是安全必须有的基础。只有预先规定均势的必要，才能够发展有关将来的欧洲安全体系的有意义的设想。[⑤] 正因为如此，联邦德国将均势战略视为安全政策。

由于推崇均势并将之视为安全政策，所以当苏联部署 SS－20 导弹后，施密特认为这种行为极大地破坏了欧洲均势，危害了欧洲安全，呼吁西方采取相应对策。

---

① Helmut Schmidt. *The Balance of Power: Germany's Peace and the Super Powers*. London: William Kimber & C. Limited, 1971, pp. 21—22.

② Helmut Schmidt. *The Balance of Power: Germany's Peace and the Super Powers*. London: William Kimber & C. Limited, 1971, p. 15.

③ Ibid, p. 206.

④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和德国——施密特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6 页。

⑤ Helmut Schmidt. *The Balance of Power: Germany's Peace and the Super Powers*. London: William Kimber & C. Limited, 1971, p. 225.

其次,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和欧洲核平衡的破坏以及自身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迫使联邦德国积极寻找对策。

据1970年12月《南德意志报》报道,在卡尔·弗里德利希·冯·魏茨塞克教授的领导下,一批联邦德国学者经过长期的研究得出结论,22枚百万吨级的炸弹可以把1000万(联邦)德国人置于死地,200枚就可以毁灭5000万(联邦)德国人。[①] 因此,对处于东西方对抗前沿的联邦德国人来说,即使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在欧洲的核力量保持平衡,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也不能不引起他们的重视。在苏联部署SS-20中程导弹后,欧洲的核平衡遭到了破坏,核天平向华约一方倾斜。同时,SS-20导弹核弹头属于大当量核武器,[②]每枚当量达15—20万吨,[③]而且苏联还以每月8枚的速度在欧洲部署这种导弹。[④] 这就意味着,苏联每月在欧洲部署的SS-20导弹的总爆炸当量相当于120—160万吨。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德国对苏联部署SS-20导弹的行动不可能不予以高度警惕,也不可能不寻找应对良策。

---

① *Süddeutsche Zeitung*, December 16, 1970.

② 根据爆炸当量大小的不同,可以把核武器分为五大类:1. 大当量核武器:当量在10—50万吨之间的核武器,又叫10万吨级核武器。主要用于实现战略目的,打击战略目标,有时也可以用来实现战役目的,打击战役目标;2. 小当量核武器:当量在1000吨至2万吨之间,又叫千吨级核武器,射程较近,威力较小,主要用来实现战役战术目的,打击战役战术目标;3. 中当量核武器:当量在2—10万吨之间,又叫万吨级核武器,具有中等威力,射程数十至数百公里,主要用于打击战役战术目标,有时也用于打击战略目标;4. 特大当量核武器:当量在50万吨以上。其中当量在100—1000万吨之间的又叫百万吨级核武器,1000—10000万吨之间又叫千万吨级核武器。主要用于实现战略目的,打击战略目标。射程远、威力大的战略核武器,如洲际弹道导弹弹头和重型核炸弹,一般为氢弹;5. 特小当量核武器:当量在1000吨以下。它是一种用以实现战术目的,打击战术目标,射程较近,威力较小的战术核武器,如核炮弹、核鱼雷、核水雷、战术导弹核弹头等。参见舒涵:《蘑菇云:恐怖中的和平——核大国五十年角逐风云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页。

③ 周琪、王国明:《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④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德国——施密特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第三,联邦德国民众对苏联人的不信任及其比例的增加为施密特对华约采取强硬政策提供了民意支持。

由于处于东西方对抗的前沿,受长期冷战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联邦德国民众对苏联不信任的比例长期居高不下。1974 年,有关机构按照 16—19 岁、30—44 岁、45—59 岁和 60 岁以上四个年龄段分组,调查了联邦德国民众对"你是否相信苏联人有了解西方的诚意或苏联人对了解西方持友善态度?"这一问题所持的看法。结果显示,回答"相信"的人在各个年龄段的最高比例只有 37%,最低则只有 19%。[①] 而且年纪越大,回答"相信"的人的比例越低。相反,回答"不相信"的人的比例最低也有 44%,[②]其他三个年龄段则都超过[③]了一半。到 1977 年,有关机构就同一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回答"相信"的人的最低比例虽然相近,但最高比例又下降了 5 个百分点;回答"不相信"的比例都增加了,最多的增加了 9 个百分点,而且所有年龄段的这一比例都超过了一半,最高比例逼近 70%。(详情见表 6-3)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联邦德国民众对苏联人表示"不信任"的比例不仅高,而且这一比例在苏联 1977 年开始部署 SS-20 导弹后进一步增加了。这样,就为联邦德国针对苏联部署 SS-20 的行动采取强硬政策提供了民意支持。

---

①②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Allensbacher Jahrbuch der Demoskopie 1976, Munich: Verlag Fritz Mdlden, 1976, Seite 281.

③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Allensbacher Jahrbuch der Demoskopie 1976, Munich: Verlag Fritz Mdlden, 1977, Seite 134.

表 6-3 对"你是否相信苏联人有了解西方的诚意或苏联人对了解西方持友善态度?"这一问题的民意调查

回答	年龄段(岁)	1974 年(%)	1977 年(%)
相信	16—29	37	32
	30—44	35	31
	45—59	26	25
	60 +	19	20
不相信	16—29	44	53
	30—44	52	57
	45—59	60	63
	60 +	64	67
不知道或没有表态的	16—29	19	15
	30—44	13	12
	45—59	14	12
	60 +	17	13

资料来源:1. Elisabeth Noelle – Neumann, Allensbacher Jahrbuch der Demoskopie 1976, Munich: Verlag Fritz Mdlden, 1976.

2. Elisabeth Noelle – Neumann, Allensbacher Jahrbuch der Demoskopie 1977, Munich: Verlag Fritz Mdlden, 1977.

第三节 "双重决议"的制定

促使双重决议萌芽的施密特的演说对西方核武器的现代化施加了政治压力。这个政治压力调动了搞技术和分析工作的专业人员的积极性,他们真正相信欧洲安全取决于针对特定的苏联武器系统的特定反应。这个政治压力还鼓舞了一些人,他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

相信在欧洲部署丘比特之类的导弹是非常需要的，并相信在20世纪60年代不该撤除它们。① 因此，它成为北约改变其战场核武器不平衡的催化剂。此后不久，在核计划小组的领导下，北约成立了一个高级小组，以便分析这种不平衡带来的威胁并提出北约应对这种威胁的建议。高级小组认为，任何入选方案都必须是对苏联部署的SS－20导弹和喷气式轰炸机的军事反应，都必须加强3个一组的核leg；从军事上讲，最重要的是加强欧洲本土的核系统与美国战略核系统的联系。最后，从政治上来讲，是要向苏联传达一个信息，即北约有意志和决心去应对华约对欧洲的威胁。②

在上述基础上，由联邦德国发起，1979年1月5—6日，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法国的安提列斯岛屿瓜德罗普举行会议，讨论外交与防务问题。卡特在讨论中建议，为了从世界上消除对"灰色区域"③的不安，拟在欧洲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以对抗苏联的SS－20导弹。他说，这样一来，"均势就重新建立起来了"。卡特首先征求施密特的意见。施密特因为没有思想准备，一开始并没有表露声色。他表示，另外两位欧洲政府首脑都是核国家的代表，他想先听听他们的意见。卡拉汉认为，这么一步棋，最后可能非走不可，但现在先不要走，应该先看一下美苏两国关于限制灰色区域武器谈判的结果如何，如果谈判出现消极结果，那时再走不迟。因此，卡拉汉主张马上举行这一谈判。德斯坦同意这一建议，并对此作了补

① Mc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1988, p. 568.

② Brady, Linda P., Kaufman, Joyce P. *NATO in the 1980s——Challenges and Response*, New York: Praeger, 1985, pp. 132—133.

③ 所谓"灰色区域"，是指数年来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在中欧共同均衡裁军谈判以及到当时为止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都没有涉及到的军备范围。参见（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德国——施密特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页。

充说明。他说,由于正在加紧扩充 SS-20 导弹,苏联人在中程导弹方面已经大大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他们会无限期地拖延谈判,直至把谈判拖垮,因此美国从一开始就应给谈判规定一个期限,如果到了期限,谈判还没有结果的话,就必须采取行动,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关键在于,要使苏联人从一开始就明白西方的这种决心。[①] 德斯坦还认为,西方各大国应当能够自卫,还要有一种等同于 SS-20 导弹的武器能力——这是减少苏联中远程导弹体系对欧洲的威胁的先决条件。[②] 施密特表示同意德斯坦的意见。在他看来,在欧洲和自己党内,都不会被一致通过。然而,他一直确信西方必须在"灰色区域"建立均势,一直希望西方和东方就这一问题举行谈判。在提出这一问题后,施密特指出,显而易见,如果西方没有强有力的手段,要取得这场谈判的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西方的手段却只是一个声明,声明在必要时打算四年后也同样部署中程导弹。他断言,在这期间,苏联将开动庞大的宣传机器来反对这些计划,并且,这些需要努力完成的事情都将集中压在(联邦)德国身上。所以,施密特强调,不应该让(联邦)德国成为唯一为部署美国中程导弹提供国土的国家,在需要的时候,欧洲其他北约国家也必须为部署这种武器提供自己的国土。[③] 对此,卡特回答说,这次关于欧洲核力量不平衡的讨论完全是由施密特发起的,西方要想同苏联人进行成功谈判的话,(联邦)德国就必须同意部署这些导弹。[④]从与会代表的发言可以看出,针对苏联部署 SS-20 中程导弹的行动,西方准备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就此问题与苏联谈判,如若谈判失败,将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实际上,西方是要进行"软"、"硬"两手准备。

---

①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大国》,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25—226 页。

②④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Toronto, New York: Bantam Book, Inc, 1982, p. 235.

③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大国》,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26 页。

尽管北约上述四国达成了意向,但能否将之变成协议,还要看北约有关国家能否协调立场,并为此努力。

对此,联邦德国政府主要采取两方面行动:一方面,加强与盟国的磋商,表明联邦政府在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上的立场。1979 年 5 月 11 日,施密特与英国新任首相撒切尔夫人(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伦敦就有关加强欧洲的核武器问题进行了磋商。鉴于一般民众不赞成安置更多核导弹于联邦德国境内,施密特尽管最早倡议重新建立欧洲核均势,但在会谈中却坚持,由于联邦德国是非核国家,联邦德国决不能成为安置这些核导弹的唯一国家。施密特的态度是急于向世人表明,虽然这些核弹由美国安置于境内,但联邦德国绝没有拥有或控制核武器。[①] 联邦德国的这一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由于二战的原因,不仅世界各国对联邦德国任何加强军事的行动特别是在核问题上的举措都怀有高度警惕,而且联邦德国人民对此也极为敏感;另一方面,联邦德国政府加强了对苏联的外交攻势。1979 年 6 月 25 日,施密特在飞赴东京参加世界经济首脑会议途中,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柯西金、外交部长安·葛罗米柯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举行了 3 个多小时的会晤。他在会晤中向苏联领导人阐明了联邦德国在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立场。他说,联邦共和国有三点主要利益:第一,必须继续减少洲际战略武器和核武器的数量;第二,必须把欧洲战略武器(即中程武器)也纳入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第三,同样的均势原则也必须适用于这类武器,这些原则是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商定的。[②] 施密特阐明的立场表明,联邦德国政府尽管作好了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的准备,但还是希望通过外交谈判途径达到重新建立东西方核均势的目标。之所以如

---

① (英)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63 页。

②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和德国——施密特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版,第 69 页。

此，正如英国《泰晤士报》指出的那样，“波恩一刻也不可能忘记，东方与西方的分界线是直接穿过德国中部的。在德国的领土上有双方的许多有生力量和武器，一旦战争爆发，德国人大概会第一个受害和遭受最大苦难。”[①]

英国政府为重新建立东西方的核均势也在进行积极努力。6月13日，撒切尔夫人会见了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并讨论了有关核武政策问题。1979年9月19日，英国的核武政策小组决定，将安置美国的144枚巡航导弹，同时决定接受施密特的请求，移置联邦德国的16枚巡航导弹于英国境内。在撒切尔夫人看来，唯有英、德两国能保持坚定密切合作，西欧的战略才能成功。[②] 也就是说，英国将联邦德国视为北约解决欧洲核武问题的至关重要的国家。

与部署美国中程导弹有关的另外几个国家则不像联邦德国、英国那样积极。荷兰、意大利当时犹豫不决，两国政府因北约拟议中的核对策而倍感国内政治压力，荷兰尤其如此，它在强大的反核民意压力之下岌岌可危。比利时总理马腾的意思似乎是要看荷兰的动向。

然而，就东西方冷战形势来看，北约必须在1979年之前对新式中程导弹的配置达成具体协议。时间拖得愈久，就愈能为苏联提供宣传战和情报战的机会。苏联此时处心积虑瓦解北约的团结。之前卡特曾一度考虑部署中子弹，却在苏联的反对之下胎死腹中。[③] 针对北约国家准备在美苏谈判不成就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的形势，苏联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一方面，发动攻心战，以和解姿态提出建议甚至让步。1979年10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东柏林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数点建议，当中包括在未来12个月之内，从东德撤出两万军队和千辆坦克，以及只要西欧不再部署更多的中程核弹，苏联亦将裁减中程核

① *The Times*, September 16, 1979.

② （英）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③ （英）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164页。

武器系统；另一方面，对北约国家发出威胁。勃列日涅夫在上述演讲中警告北约不要作出那个拟议中的双重决议，说在欧洲部署美国新式导弹将使欧洲战略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在此情况下，苏联将采取额外的步骤以加强安全。[①] 11 月 23 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访问联邦德国期间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如果西方仍执意“新的军备竞赛”，那么限制武器系统谈判将难以进行。[②] 显然，苏联的这些建议和警告是想动摇北约国家的态度。

从东西方以往的斗争情况来看，像美国一样，苏联所提出的建议和让步虽然常常宣传胜过实际，但此次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部分北约国家的立场。以荷兰为例，由于国内存在强大的宗教反核势力及内阁因军力部署问题面临倒台危机，在苏联提出建议和让步的情况下，荷兰政府更加相信，应将重心置于军备控制，而不应在此时决定现代化与加强部署。

当然，作为成员国之一的荷兰不支持组织的议题虽然是严重的事态，但并没有影响北约的整体计划。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协商，1979 年 12 月 12 日，北约各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会议同意联邦德国此前提出的撤走美国部署在西欧的 1000 枚废弃核弹头的建议，充分讨论了中程武器现代化和军备控制问题。联邦德国代表在会谈中表示，要严重关注对苏联部署的瞄准西欧的新型导弹 SS－20 中程导弹问题，同时建议，为对抗这种导弹，美国在西欧部署的中程导弹要达到 572 枚，其中包括 108 枚潘兴Ⅱ型弹道导弹和 464 枚亚音速陆基巡航导弹(GLCM)。[③] 这样，会议最后通过了世人所称的“双重决议”。所谓“双重决议”，亦即，一方面，由美国出

---

①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和德国——施密特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版，第 70 页。

② (英)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64—165 页。

③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Eleventh Edition 1988, p. 292.

面，力图与苏联就尽快限制欧洲中程导弹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北约准备在西欧部署由美国生产的潘兴Ⅱ型中程导弹和“战斧”陆基巡航导弹[①]。按照“双重决议”的要求，在部署潘兴Ⅱ型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之前与苏联谈判，要求它撤除SS-20导弹的威胁，[②]如果美苏的战略核武器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话，北约将从1983年12月起在西欧盟国中的5个国家部署464枚陆基巡航导弹和108枚潘兴Ⅱ型弹道导弹。[③] 具体部署情况是，潘兴Ⅱ型导弹将替代老式的潘兴Ⅰ型导弹并全部部署在联邦德国，464枚巡航导弹则分别部署在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联邦德国。[④]

与苏联部署的SS-20导弹的性能相比，北约将要部署的潘兴Ⅱ型中程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虽然稍逊一筹，但差别不大。在爆炸当量方面，它们处在同一水平，都在15万—20万吨之间，都属于大当量核武器，威力极大；在射程方面，潘兴Ⅱ型中程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虽然都不及SS-20导弹，但已经可以有效打击苏联目标了。潘兴Ⅱ型中程导弹能从北约的西欧基地直接打击苏联的西部领土，而且只需5分钟的时间。因此，北约一旦按照双重决议的规定部署这种导弹，西欧实际上等于有了打击苏联的“战略导弹”。陆基巡航导弹的射程比潘兴Ⅱ型中程导弹还要远700公里，那就更加可以攻击苏联目标了。由于两种导弹所具有的先进性能，苏联缺乏有效的防御方

---

① 潘兴Ⅱ型中程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由美国研制，是北约国家当时最先进的中程导弹。前者携带1个爆炸力为15万吨的核弹头，射程为1800公里。David Gress. *Peace and Survival: Germany, the Peace Movement, and European Secu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5, p. 70；后者携带一个20万吨级爆炸力的核弹头，射程为2500公里。参见潘其昌：《走出夹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5页。

② Carl H. Amme. *NATO Strategy and Nuclear Defense*, New York,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Inc, 1988, p. 24.

③ Brady, Linda P., Kaufman, Joyce P. *NATO in the 1980s——Challenges and Response.* New York: Praeger, 1985, p. 23.

④ Brady, Linda P., Kaufman, Joyce P. *NATO in the 1980s——Challenges and Response.* New York: Praeger, 1985, p. 133.

法，所以对苏联的威胁极大。正因为如此，潘兴Ⅱ型中程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被当作北约重建对华约核均势以保证成员国安全的手段，双重决议也因此而成为北约各国关注的焦点。

第四节　联邦德国在"双重决议"制定后的最初反应

北约尽管作出了"双重决议"，但决议本身是不可能达到重建东西方核均势这一目标的。能否实现预期目的，关键在于能否顺利实施；能否顺利实施，关键又在于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

然而，北约作出决议后，马上就遇到了实施的麻烦。在北约的大部分国家里，人们普遍认为华约军队本来在数量和装备上就占有优势，所以当苏联部署了 SS-20 导弹后，西方在发生意外情况下也不敢动用战术或战场核武器了。超级大国从战略方面来说达到相互制约了，美国的战略力量已不再像从前那样作为阻止苏联入侵西欧的威慑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北约的明确反应是投入足够的常规部队，以挡住苏联装甲部队的突袭，而不必用核武器（除非敌人首先使用）就将它挫败。[①] 也就是说，人们普遍寄希望于常规部队，而不是核武器。所以，他们对要求部署美国的中程核武器——潘兴Ⅱ型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的双重决议缺乏热情。

这样，直接部署决议中所提到的导弹的国家的动向对决议的实施特别重要。其中，联邦德国的态度及其行动尤其如此。因为，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四国只是承担在国土上部署陆基巡航导弹的任务，而联邦德国除了部署这种导弹外，还要部署全部的潘兴Ⅱ型导弹。

联邦德国政府对部署中程核导弹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施密特虽然是均势战略的提倡者和推行者，但不是唯均势战略至上者。他

①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Eleventh Edition, 1988, p. 294.

曾经说,“我愿意承认,我对常规的——和核的——陆、海、空军队和武器大体均衡的设想还不能保证和平。当希特勒进攻几乎所有的欧洲邻国时,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在均势的情况下,被一个强大的邻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征服的危险要小一些。除了均势外,还必须包括相互对话、听取对方意见和签署条约的愿望。”①

因此,施密特既想推行自己所提出的均势战略设想,通过部署中程核导弹来重建欧洲的军事均势,或通过部署与苏联谈判,再经过谈判来换取苏联减少甚至取消 SS-20 导弹的部署,使双方在核武器方面达到低水平的均势,以确保联邦德国安全,又担心如果双重决议中所计划部署的潘兴Ⅱ型导弹真正全部部署在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将会成为苏联核袭击的首要对象。所以,施密特政府对“双重决议”的执行是把侧重点放在“谈判”上,而不是放在“部署”上。

出于这种考虑,施密特一方面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指出苏联必须对阿富汗战争负责,要求撤走全部苏军,并把北约作出双重决议的局势归咎于苏联,②以便为联邦德国可能要部署“双重决议”中的导弹的事实作辩护;另一方面,施密特又不失时机地发出通过谈判以解决欧洲核武器问题的和解信息。1979 年 12 月,施密特在西方首先提出“零点方案”。③这个方案建议,如果苏联撤走 SS-20 导弹以及老

---

①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和德国——施密特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09 页。

② 同上,第 81 页。

③ 1979 年 12 月,施密特首先提出“零点方案”,以后又数次公开讲过。里根 1981 年第一次公开表示接受。对于零点方案,尼采为强调它对双边的均衡性,在内部称它为零—零方案。勃列日涅夫 1980 和 1981 年拒绝了这一建议,里根在 1981 年接受了。里根深信,在一场核战争中谁也赢不了,所以也决不应该打起来。他深信双方手中的核武器都太多了,而且这个建议很可能导致其他类型武器的裁减。正因为如此,尽管遭到国务卿的强烈反对,里根还是欣然接受了“零点方案”。苏联方面嘲笑这个建议。原因很简单,当时北约还没有在西欧部署一枚潘兴Ⅱ型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他们可以操纵公众舆论来阻挠北约的部署工作,而最主要的是他们期待着美国人和欧洲人看到苏联已经部署的 SS-20 导弹而怯懦。

式的SS－4导弹、SS－5导弹和稍新一些的SS－23导弹，那么北约将不在欧洲部署潘兴Ⅱ型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许多反核组织及其他一些人都支持"零点方案"。1980年4月，他在一次竞选演说中谈到，以某种方式暂缓三年在欧洲战区部署更多的核武器是可取的。他说，"如果在今后三年内，双方不再进一步部署核武器，而且立即就双方限制核武器问题开始举行谈判，那是有利于和平事业的。"[①]

那么联邦德国民众的态度又如何呢？要了解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分析联邦德国民众对核战争的态度。1979年，在有关北约战略的一系列问题上，联邦德国国防部就三个问题进行了民意测验：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应当抵御对领土的侵犯吗"；第二个问题是"即使绝大部分战斗发生在联邦共和国领土上，你无论如何（不管怎样）都会赞成抵御军事进攻吗"；最后一个问题是"即使在联邦共和国领土上使用了核武器，你也会赞成军事抵抗吗"。结果，在18—24岁、25—34岁、35—49岁、50—64岁和65岁以上各个年龄阶段的成年人中，无论是哪个年龄段，对问题一和问题二回答"赞成"的人不仅都超过了一半，而且大部分甚至超过了60%。对问题三回答"赞成"的人，无论在哪个年龄段，比例都很低，最高也只有24%，大多数人回答"反对"。[②] 详情见表6－4：

---

①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Toronto, New York: Bantam Book, Inc, 1982, p. 535.

②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se (West Germany), "Sicherheit, Verteidigung und Bundeswehr in der Oeffentlichen Meinung", Bonn: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1979, table 3.4.03; Brady, Linda P., Kaufman, Joyce P. *NATO in the 1980s——Challenges and Response.* New York: Praeger, 1985, p. 240.

表 6－4　1979 年联邦德国国防部对民众抵抗意志的民意调查

问题一:“你认为应当抵御对领土的侵犯吗?”

年龄段	赞成	反对	不知道或没有回答
18—24 岁(207 人)	59%	18%	23%
25—34 岁(314 人)	61%	25%	14%
35—49 岁(550 人)	59%	22%	19%
50—64 岁(455 人)	58%	22%	20%
65 岁以上(387 人)	52%	21%	27%

问题二:“即使绝大部分战斗发生联邦共和国领土上,你无论如何(不管怎样)都会赞成抵御军事进攻吗?”

年龄段	赞成	反对	不知道或没有回答
18—24 岁(207 人)	58%	37%	5%
25—34 岁(314 人)	61%	34%	5%
35—49 岁(550 人)	58%	39%	3%
50—64 岁(455 人)	56%	39%	5%
65 岁以上(387 人)	53%	41%	6%

问题三:“即使在联邦共和国领土上使用了核武器,你也会赞成军事抵抗吗?”

年龄段	赞成	反对	不知道或没有回答
18—24 岁(207 人)	24%	55%	21%
25—34 岁(314 人)	18%	65%	17%
35—49 岁(550 人)	17%	65%	18%
50—64 岁(455 人)	19%	61%	20%
65 岁以上(387 人)	19%	54%	27%

资料来源: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se (West Germany), “*Sicherheit, Verteidigung und Bundeswehr in der Oeffentlichen Meinung*”, Bonn: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1979, table 3. 4. 03; Brady, Linda P., Kaufman, Joyce P. *NATO in the 1980s——Challenges and Response*. New York: Praeger, 1985.

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问题一和问题二实际上问的是民众在常规战争中的战争意志,问题三实际上问的是民众在核战争状态下的战争意志。因此,上述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在常规战争中,大部分人都有反抗外敌入侵的决心,一旦爆发核战争,则大部分人反对抵抗。也就是说,大部分联邦德国人反对核战争。

因此,为了避免核战争的爆发,在苏联部署 SS－20 中程核导弹并打破东西方的核均势后,采取相应措施重新建立核均势就成为大多数联邦德国民众的要求。表 6－5 反映的是 1981 年 5 月联邦德国人对双重决议的态度。

表 6－5　1981 年联邦德国对"你认为双重决议好还是不好?"的民意调查

	好	不好	不知道
全部	53	20	27
年龄 16—29	43	31	26
30—44	57	19	24
45—59	63	18	19
60 +	52	13	24
政党 CDU/CSU	63	13	24
SPD	51	20	29
FDP	53	25	22
绿党	22	59	19

注:CDU/CSU =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SPD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FDP = Free Democratic Party.

(资料来源:"Bretie Mehrheit" Capital, August 1981, p88. 转引自 Brady, Linda P., Kaufman, Joyce P. *NATO in the 1980s——Challenges and Response.* New York: Praeger, 1985.)

表格资料表明,总的来说,大部分联邦德国人支持双重决议。不

仅如此，而且支持双重决议的人所占的比例要比反对双重决议的人所占的比例高出 33 个百分点，前者几乎是后者的 2.7 倍。具体而言，从各年龄段的一般民众的态度来看，在 16—29 岁、30—44 岁、45—59岁和 60 岁以上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中，无论是哪个年龄段，对“你认为双重决议是好还是不好”这一问题回答“好”的人比例都要远远高于回答“不好”的人，而且除 16—29 岁的人以外，回答“好”的人的比例都超过了一半，最高的达到了 60% 以上；就各政党党员而言，除绿党回答“好”的比例低于回答“不好”的比例外，其他几个政党“回答”好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回答“不好”的人所占的比例。因此，当北约为重建与东方的核均势而作出双重决议后，大部分联邦德国人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是一个好决议。

尽管认为双重决议“不好”的人所占的比例在各年龄段和政党党员（绿党除外）中都比较小，但这部分人还是通过不同方式特别是声势浩大的和平主义运动来阻止双重决议的实施。

自 1981 年开始，和平主义运动在联邦德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①] 和平主义者不仅主张停止军备竞赛，还主张联邦德国拒绝参加北约组织的“双重决议”。联邦德国有 400 多万民众在“克莱费尔特公众书”上签名，呼吁政府撤消同意在本国部署北约双重决议中规定的新的美国中程核导弹的协议。不见结果的军备控制谈判促使“和平运动”更加壮大。

群众性的反战情绪也严重地波及到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及其执政联盟自由民主党。在部署中程导弹及与此关联的和平运动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内部争论激烈。以勃兰特为代表的左翼反对部署导弹，认为美国在中欧部署中程导弹是想把（联邦）德国变成核战场。党内激进的左翼人士如艾哈德·艾普勒——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成员和基本价值委员会主席，甚至亲自参加和平示威游行、集会并发表反对部

① David Gress. *Peace and Survival: West Germany, the Peace Movement, and European Secu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5, p. 69.

署中程核导弹的演说。在党内担任要职的汉·约·福格尔则公开说:“如果在西欧部署潘兴(Ⅱ型)导弹和巡航导弹,将增加战争的危险。”①以施密特总理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右翼主张部署中程核导弹,认为应该制止和平运动。与此同时,自由民主党内部也发生了严重争执。

但是,一开始,无论在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之间,还是社会民主党内部,为了顾全大局,保持执政地位,分歧的双方尽可能地达成妥协,不使这些分歧白热化。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1982年2月5日联邦议院对施密特提出的信任投票案进行的表决中。当时,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的269名议员全都投了“信任票”,这个结果使施密特激动得热泪盈眶。

此后,形势发生了变化。4月,在社会民主党的慕尼黑党代会上,许多代表特别是左翼发言,强烈反对“双重决议”。对此,施密特针锋相对进行辩驳,坚决主张实施双重决议,并威胁说,如果大会不批准就辞去总理职务。在他的要挟下,会议最后达成妥协:把就部署导弹作出决议问题推迟到1983年秋的代表大会。施密特尽管暂时取得了党内胜利,但这一事件给其党组织带来了很大负面影响,造成了党的分裂,并削弱了党在全国的影响。

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之间的关系从1982年下半年起也急转直下。两党冲突表面化的缘起是如何填补1983年国家预算中的亏空。9月15日,施密特在议院针对自由民主党的一篇抨击政府经济政策的备忘录中说,不同意他的政策的部长可以退出政府。17日,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发言人宣布其政府内的4名部长辞职,不久,施密特正式宣布两党执政联盟解体,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

在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时,施密特总理不顾党内存在的重大分歧,仍然坚持实施双重决议。他在召见常驻波恩的使节时说,“我们不会忘记,个人自由权利的精神遗产我们是从富兰克林、杰弗逊、华

---

① 凌翔:《科尔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盛顿那里继承下来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哪些东西要归功于乔治·马歇尔和战后美国人千百万次的慷慨解囊。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不仅读过《汤姆叔叔的小屋》,而且读过桑顿·怀尔德或者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作品。爵士乐已经成为所有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文化!今天,我们的任务仍然是要设法使大西洋两边的子孙后代也能坚持相互友好……"①实际上,施密特是想通过实施双重决议维持与美国的联盟。10月1日,他在联邦议院发表演说中指出,"北大西洋联盟符合欧洲人和北美人的共同利益……只有同舟共济,他们才能保卫大家的安全、自由与和平。同时,联盟也是联结德美友谊最主要的环节之一……我们彼此是由基本价值联结起来的,即便我们也互有区别。"②施密特的坚定立场进一步加深了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从而加重了政府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不失时机地联合自由民主党,推出基民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为总理候选人,对施密特提出不信任案。10月1日,联邦议院表决,科尔以256票的多数票(总数496票)推翻了施密特而出任总理。施密特因此而成为联邦德国第一个被不信任案推下台的总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施密特之所以下台固然与社会民主党同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因经济政策而造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反核的和平运动的冲击以及作为执政党主体的社会民主党因在双重决议问题上自乱阵脚而造成的党内分裂。当施密特下台时,离双重决议的实施期限只有两个月了,而施密特又是双重决议的倡议者和坚定支持者,所以,他的下台不仅为其继任者带来了挑战,而且给双重决议的实施带来了不确定因素。

---

①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和德国——施密特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116页。

② 同上,第116页。

第五节 科尔政府与“双重决议”的实施

继施密特担任总理的科尔长期以来坚持这样一种观点：以尽量少的武器和人员达到和平目的。他说，不用武器来实现和平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愿望，但也是一种危险的幻想；仅靠武器来建立和平则是一种失去理性的危险做法；只有用越来越少的武器来实现和平，才是时代的任务。至于如何达到用越来越少的武器来实现和平这一目标，科尔认为，应该自始至终把立足点放在与美国保持传统的友谊和密切两国之间的全面合作上。[①] 1978 年 4 月 8 日，他在讲话中指出，“从阿登纳时代起我们就是一个主张德美友好即德美结盟的党，这一主张从未改变过。长期在（联邦）德国从政的人都知道，只有跟美利坚合众国结盟才能实现（联邦）德国的民主和自由。失去这个自由世界里最强大的国家作盾牌，我们的自由将受到威胁，这一点没有谁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民更有体会。我们跟专制政体为邻，铁幕穿过我们的祖国，原首都柏林又一分为二。珍惜和发展同美利坚合众国的良好关系是我们的头等大事。”1979 年 4 月下半月，他再次强调，（联邦）德国要在自由前提下获得安全，就只有通过大西洋联盟才能得以保证。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及增强其权威性，他还提醒人们注意阿登纳于 1954 年在联邦议院讲过的话：“单靠我们的力量不能确保德国人民的安全”，因而“我们要与西方结盟”。[②]所有这些表明，科尔实际上是要坚持联盟政策，通过联盟政策来维系与美国的结盟关系，从而维护联邦德国的自由与安全。

科尔的联盟政策在其对待“双重决议”的态度上得到充分体现。他认为，苏联部署的 SS－20 导弹对西欧构成了可怕的核威胁，而北约的双重决议则可以恢复和加强东西方的均势。1980 年 5 月 31 日，

① 凌翔：《科尔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75—176 页。

② （德）维尔纳·马泽尔：《科尔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52 页。

在基民盟的新闻发布会上，科尔敦促施密特至少在选举前就军备问题向苏联摊牌。他强调，北约的“补充军备决议”（即双重决议）是经过艰难的讨论才作出的，这个决议使西方国家终于和生产这类武器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苏联扯平了。[①] 因此，他坚定地支持双重决议。

同时，科尔对群众性的反核运动进行了批评。他说，在（联邦）德国，几十万人高举着和平运动的大旗进行游行，不是把矛头指向SS－20导弹，而是抗议北约对这一威胁作出的反应。他们结成统一的联盟并游行示威，反对“战争贩子”的政策，把美国及其北约盟国视为“战争贩子”。[②]在他看来，这种运动表明，这些民众丧失了西方价值观的一致性。

另外，科尔还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左翼在双重决议问题上所持的僵硬的“否定”态度。1980年10月5日大选后，他在演说中指出，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思想倾向是一股“中立主义潮流”，他要求其党领导制止这一潮流，并警告说，中立主义的民族主义将使联邦共和国的安全取决于苏联的意图，并进而使北约解体。[③] 显然，科尔将双重决议作为一项北约的家庭团聚政策，坚决主张加以实施。

1982年10月1日，科尔上台执政，更加坚定地推行其主张。13日，他发表“施政纲领”，阐明其“中派联合政府”政策的基本思想。在这份施政纲领里，他不仅将加强西方联盟的凝聚力并履行联邦德国义务作为政府施政的基本目标之一，[④]而且将其放在外交政策的首位。科尔指出，加入北约组织和同美国的友谊是（联邦）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石，“这个同盟是（联邦）德国国家利益至上的核心”。

---

① （德）维尔纳·马泽尔：《科尔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② （德）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③ 凌翔：《科尔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④ Gale A. Mattox and John H. Vaughan, Jr., *Germany Through American Eyes——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Issues*, Boulder, San Francisco, &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9, p. 16.

他解释说，不应把北约组织视为为结盟而结盟成立的组织，而应视作价值观上的一致，因为“我们所拥护的自由宣传的基本价值，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我们所需要的安全”，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① 为此，科尔虽然坚持西方的零点方案这一谈判目标，即全部放弃两超级大国的地面中程导弹系统，同苏联实现真正的缓和以及实现欧洲联合，但同时保证，联邦政府毫无保留地信守双重决议。

为实现“施政纲领”中的外交目标，科尔决定，倘若美苏谈判不成功，就如期部署双重决议中规定的美国中程核导弹。同年 11 月 25 日，科尔在谈到部署核导弹问题时强调，中程核武器是联邦共和国安全政策中最现实的问题。他说，“谁要是真正希望拆除苏联的SS-20中程导弹，不希望在欧洲进行相应的军备追补，那么他就必须支持双重决议的政策。”在谈到双重决议时，科尔坚持决议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准备部署中程核导弹，另一方面又要与东方进行外交谈判。他指出，在联邦的任何人都不希望部署新的美国导弹，但是，联邦共和国及其盟友都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现状，即几百枚现代化的苏联中程导弹直接威胁着西方；阻止西方追补军备的唯一途径就是双方都放弃部署导弹。② 1983 年 2 月，科尔在国防军司令员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再一次表明了上述立场。他认为，要重视部署中程核导弹在政治战略上的意义，不过，目的不是为了部署，而是要迫使苏联再次坐到谈判桌上来。

3 月 6 日，联邦德国举行第十届联邦议院选举。如历届选举一样，这次选举斗争主要在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展开。当时，两党在双重决议上持不同立场。前者在科尔的领导下，坚决主张实施双重决议；后者虽然在施密特领导时期最早倡议双重决议，但此时大部分党员反对部署美国的中程核导弹。这样，选举结果会直接涉及在

① 冈特·穆斯勒尔：《科尔传》，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 52 页。

② 凌翔：《科尔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20—181 页。

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和两大集团在欧洲核力量的对比。因此,大选不仅牵动着联邦德国选民的心,也是东西两大阵营注视的焦点。早在选举前,东西方之间为争取有利于自己的选举结果就开始进行激烈的外交角逐。1月中旬,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访问波恩,他离去后,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也来访问。美苏两位政要从不同角度表达各自政府对联邦德国政局的关注。对此,《明镜》周刊评论说:"俄国人向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汉斯—约翰·福格尔献殷勤……美国人寄希望于右翼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大选前夕,大多数北约国家暗中支持科尔,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觉得,要是保守的科尔总理大选之后能够留任,那就比较称心。西方传媒对大选也非常关心。法国《费加罗报》1983年3月3日的一篇题为《德国的选举:潘兴导弹的幽灵》的文章,直接将选举与北约的双重决议联系起来,并认为联邦大选关系到联邦德国和欧洲的前途。

大选结果,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联盟党,科尔再次当选为总理。科尔的胜利受到北约国家的普遍欢迎。美国国务院3月6日发表声明,对科尔当选表示"非常高兴"。声明说,保守的科尔当选为总理显然是莫斯科的一次失败,使莫斯科不得不在中远程核力量会谈中表现出灵活性。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大臣赫德称,科尔的胜利是"对北约的直接支持"。[①]

连任总理后,科尔更加坚定了自己在双重决议和联盟政策上的立场。大选结束不久,他就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投票结果将有助于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使欧洲的战略武器成为均势的美苏谈判。他表示,联邦政府将坚决支持北约的双重决议,完全信任参加谈判的日内瓦代表团,同时,他领导的政府将使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组织的一根"牢固的支柱",并认为"北约联盟越强大,东西之间裁军的步伐将越大"。[②]

---

① 朱忠武:《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② 凌翔:《科尔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为显示对联盟的忠诚，科尔于 1983 年 4 月 15 日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在与里根总统会谈时，他除了讨论即将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外，就是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他说，"一旦美苏达不成协议，联邦德国同意在其领土上部署美国新式中程导弹。"[①]

同年 7 月 4 日，科尔又访问苏联，以促使苏联同意与美国举行最高级会晤，希望苏联改变在导弹问题上的立场。因此，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已经白热化的欧洲中程核导弹问题。会谈中，双方存在严重的分歧，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吉洪诺夫在宴会上说："一旦在西欧部署新导弹，欧洲和整个世界局势将急剧恶化。战后德国的土地上将首次出现对苏联的军事威胁，苏联及其盟国将会立即采取补充的应对措施。"他声称，苏联决不会在日内瓦苏美会谈中作出任何让步，希望科尔政府三思而行和采取现实主义立场，考虑不谨慎行动将会承担的责任。[②] 苏联方面甚至警告，如果联邦德国部署导弹，对它的军事危险将成倍增长，苏联同它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复杂化。[③] 然而，科尔并没有在苏联领导人的强硬态度面前妥协。他坚决回击苏联对西方谋求军事优势的指责，认为即使日内瓦谈判失败，北约各国部署新导弹的数目也比苏联已经部署的针对西欧的导弹要少得多。他指出，苏联的 SS－20 导弹是对联邦德国安全的直接威胁，要求苏联在中程导弹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以便日内瓦谈判能够取得互相平衡的结果。科尔还着重声明，要是在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不能就裁减军备问题达成一致，他就准备让北约的中程导弹进驻联邦德国，[④]并表示，达成一项协议还为时不晚，而且即使部署导弹的工作开始后，谈判仍可进行下去。[⑤] 由于双方互不相让，会谈没有达成任何

---

① 凌翔：《科尔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81 页。

② 凌翔：《科尔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82—183 页。

③ 潘其昌：《走出夹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310—311 页。

④ （德）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27 页。

⑤ 凌翔：《科尔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83 页。

默契。

与科尔政府的强硬立场相反，联邦德国民众这时普遍反对双重决议。8月份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75%的人反对部署潘兴Ⅱ型导弹和巡航导弹。[1] 10月，反核的和平运动再次高涨。仅在10月22日“全欧行动日”这一天，联邦德国就有120万人参加示威。在一些地方，反核人士还组成人链。如，从斯图加特美军最高司令部到准备部署双重决议规定中的导弹的新乌尔姆美军基地共108公里的公路上，20万示威群众手拉手接成人链，阻止在该地区部署导弹。[2] 同时，最大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党代会的多数，都坚决拒绝实施北约双重决议中关于在欧洲部署中程核武器的协议。

尽管国内反核运动高涨，科尔还是立场坚定。1983年11月21—22日，他顶住一切压力，将是否在联邦德国部署中程核导弹问题提交联邦议院。他在辩论中强调，中程导弹的部署与否，已不是单纯涉及军备限制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关系到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方向问题。他还回顾了近年来的军备形势，他说，“在近20年中，美国在战略核武器上失去优势，已给欧洲人和（联邦）德国人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后果。面对华约在常规武器上的优势和苏联在核武器上的威胁，北约至今还不拥有地面中程导弹，也不具有在各个层次上都能保持威慑的手段。实际上，在欧洲已不存在什么均势。”他指责苏联试图强迫联邦德国放弃部署的决定，并说他决不会向威胁屈服。在联邦议院表决前，苏联领导人写信警告科尔说，如果联邦德国坚持部署中程导弹，它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对此，科尔在议会辩论时指出，新导弹对西方的防务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导弹部署之后，北约仍愿意同苏联讨论削减欧洲导弹问题。[3] 经过长达26小时

---

① 周琪、王国明：《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页。

② 刘东国：《绿党政治》，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③ 朱忠武：《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又见：凌翔：《科尔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页。

的辩论，联邦议院最后以 286 票对 226 票通过了部署中程导弹的决议。第二天，美国将首批潘兴Ⅱ型导弹和巡航导弹运到西欧部署（按照北约计划，到 1988 年，完成中程导弹的全部部署工作[①]）。至此，双重决议正式实施。

第六节 小结

综上所述，从 1977 年酝酿开始，经过长达 6 年的时间，双重决议才最终得以实施。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双重决议的萌芽、制定和实施，联邦德国在每一个阶段都起了重要乃至关键性的作用。

在第一阶段，在苏联部署 SS-20 导弹破坏东西方核均势的情况下，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施密特首先站出来对此提出建议和警告，并发表演说呼吁西方采取两手对策，即一方面与苏联谈判以限制其导弹，另一方面又采取一切可能的威慑手段。这样，就出现了双重决议的萌芽。

在第二阶段，在施密特演说的推动下，北约专门成立了“高级小组”，研究应对 SS-20 导弹的对策。后来，又由于施密特的发起，美、英、法、联邦德国四国首脑于 1979 年 1 月在瓜德罗普岛举行会议并决定，倘若与苏联的谈判不能成功，就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这表明，施密特的演说内容已变成北约的初步对策。也就是从这时起，双重决议开始浮出水面。同年 12 月，北约布鲁塞尔会议正式通过了双重决议。由于决议规定，一方面由美国出面，力争与苏联就尽快限制欧洲中程导弹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如果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话，北约将从 1983 年 12 月起在西欧盟国中的 5 个国家部署 464 枚

① Carl H. Amme. *NATO Strategy and Nuclear Defense*, New York,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Inc, 1988, p. 43; NATO, *NATO and the Warsaw Pact: Force Comparison*, p. 61.

陆基巡航导弹和108枚潘兴Ⅱ型弹道导弹，所以双重决议实际上是施密特演说所呼吁的对策的具体化。不仅如此，在西欧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的数目也是由联邦德国建议的。从中可以看出，没有联邦德国，也许就不会有北约的双重决议，联邦德国在北约双重决议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了倡导和推动作用。

在第三阶段，由于按照双重决议的规定，联邦德国不仅要部署部分巡航导弹，而且还要部署全部潘兴Ⅱ型导弹，因此，它能否实施双重决议，直接关系到双重决议实施的成败。事实上，双重决议也是在联邦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部署中程导弹的决议后才得以实施的。由此可见，联邦德国对北约双重决议的实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双重决议的实施对北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科尔曾经说，"是否实施北约双重决议即在联邦共和国土地上部署潘兴导弹和美国巡航导弹，这最终关系到我们是不是一如既往的可靠伙伴。在我看来，假如1983年我们没有部署这些导弹，联邦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就首当其冲地受到很大的动摇，北约将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也许有可能就此解体。"[①]科尔的评判虽然有抬高联邦德国的地位和作用之嫌，但不无道理。因为，北约虽然并不会因双重决议得不到实施而解体，但会使北约欧洲盟国陷入安全恐慌，北约本身也会面临一场危机。所以，联邦德国的立场和举措稳定了北约的"军心"，维护了联盟的团结。同时，北约如果没有实施双重决议，就不可能在欧洲重建对华约的军事均势特别是核均势。

具体来说，双重决议从两个方面重建了均势，也就是通过部署中程导弹恢复均势和通过部署逼迫苏联在中程导弹谈判中让步并最终销毁中程导弹来恢复均势。以后者为例。从1981年11月30日起，美苏就中程导弹问题举行正式谈判。北约正式实施双重决议之后，苏联于1983年11月23日从谈判中退出，他们发誓，如果北约不把

① （德）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潘兴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撤走，他们就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在北约部署中程导弹并无意撤走的情况下，苏联被迫在 1985 年 3 月 12 日恢复军备控制谈判。此后，双方在消除中程导弹问题上的立场日益接近。1987 年 12 月，美苏两国终于达成了销毁全部中程导弹的协议。可以说，北约如果在此之前没有部署双重决议规定的中程导弹，那么苏联就可能不会销毁其中程导弹，北约也就不可能重建与华约的均势。因此，联邦德国在均势重建过程和重建后的均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至于联邦德国在欧洲核均势中所处的上述地位和所起的上述作用的原因，则要针对其在“双重决议”萌芽、出台和实施的不同阶段进行具体分析：

（1）联邦德国促使双重决议萌芽的原因：对此，本章已在第二节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2）联邦德国在决议的出台阶段之所以起到了倡导和推动作用，主要在于联邦德国不仅在 1979 年 1 月发起了美、英、法、（西）德四国首脑会议，并与其他三国首脑共同努力，使会议达成了制定“双重决议”的意向，而且在 1979 年布鲁塞尔会议上提出的具体建议还成为“双重决议”的 t 主要内容之一。

（3）联邦德国在决议实施阶段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原因：第一，这是联邦德国长期推行联盟政策的惯性作用的结果；第二，与科尔政府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科尔连任总理后，将加强联盟的凝聚力并履行联邦德国的联盟义务放在外交政策的首位，这成为他推动联邦德国实施“双重决议”的重要原因；第三，实施“双重决议”符合联邦德国的国家利益，这成为联邦德国实施这一决议的根本原因；第四，与科尔个人不折不挠的意志分不开。由于这个原因，科尔最终顶住在野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和 75% 的民众反对部署潘兴Ⅱ型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反核运动高涨的巨大压力，促使联邦议院通过了部署这些导弹的决议；第五，联邦德国所处战略地位及因此而部署的中程导弹的数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地处东西方对抗的前沿，联邦德

国不仅要部署决议中的全部潘兴Ⅱ型导弹，而且还要与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一道部署巡航导弹，因此，联邦德国在“双重决议”实施问题上的政策将会对其他国家带来连锁反应，直接影响决议实施的成功与否。

另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联邦德国对北约与华约在欧洲重建核均势具有上述地位和作用，但不能过分夸大。这是因为，在“双重决议”关于导弹的部署方面，联邦德国尽管通过部署决议中的导弹而在欧洲核均势的重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所部署的这些导弹都不是联邦德国自己所有而是由美国提供的，如果美国不提供，则联邦德国不能发挥这些作用；在“双重决议”规定的谈判方面，北约尽管通过部署决议中的中程导弹逼迫苏联在谈判中让步，达到了重建欧洲核均势的目的，但谈判是通过美国与苏联进行的，如果美国不进行这种谈判，联邦德国所发挥的作用也会大受影响。

结 语

总的来看，联邦德国在北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北约的武装力量建设、战略调整和组织发展这些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方面体现出来的。从不同角度来考察，它在北约发展中显示地位和发挥作用的各方面，既包括北约的战略调整，又包括北约发展的具体运作；既包括北约源于自身的发展，又包括北约对华约挑战的应战。

在北约武装力量建设方面，联邦德国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北约的共同核力量建设、常规武装力量建设和北约与华约均势的重建中。这些都是北约发展的具体运作。不同的是，前两者主要是源于北约自身的发展，后者是北约对华约挑战的应战。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联邦德国在这三方面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具体情况虽然不同，但具有相似性。确切地说，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在这些事例中都凸显了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其地位和作用不仅都具有局限性，而且局限性一脉相承，都受到二战罪责和其加入北约的法律文件《伦敦—巴黎协定》对它的限制性条款

的影响。

在北约的战略调整中,联邦德国的地位和作用也具有双重性。但是,与上述双重性不同的是,这种双重性中的局限性不是由历史遗留问题引起的,即不是由二战罪责和《伦敦—巴黎协定》所引起的,而是美国在联盟中"一家独大"的结果。

至于在北约的组织发展上,联邦德国尽管在加入北约一事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双重性(第一章已经详细阐述),但加入北约后则没有。冷战时期,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使北约面临最严重的组织发展危机。这次危机处理是否妥当,直接关系到北约的兴衰甚至存亡。在这种危急关头,北约需要的是法国以外的其他成员国同心同德维护联盟团结,需要各国尽其所能发挥作用,以缓和、化解危机,而不是要限制某国。在此背景下,联邦德国在北约危机处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没有受到限制。

在对上述各方面进行论述时,文章是从横向展开的。如果从纵向分析,联邦德国在北约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49 到 1969 年,这是北大西洋公约的第一个有效期,[①]也是北约发展的初期。这一阶段,北约的发展较为复杂,它既获得重大发展,又出现了不稳定状况乃至危机。就前者而言,北约在冷战时期推行的战略都是在这一阶段制定的,后者主要是指北约在共同核力量的建设问题上长达十年的争斗和法国退出军事一体化组织所引起的发展危机。在这些事件中,联邦德国既凸显出自己的重要地位、发挥了重大的现实作用,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如果仅从军队实力来考察,则联邦德国已从"有国无防"状态发展成为北约中欧盟军的支柱。

第二阶段从 1969 年即北约的第二个有效期生效起到两德统一前,这是北约的稳定发展期。在这一阶段,联邦德国在北约中的地位

① 1949 年 4 月 4 日,北约的成立文件《北大西洋公约》规定,条约有效期为 20 年。

和作用虽然仍然具有局限性，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其地位进一步加强，作用进一步彰显。在常规力量上，它从第一阶段北约中欧盟军支柱发展成为北约欧洲盟军支柱。同时，当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部署SS－20导弹破坏东西方在欧洲的核均势后，联邦德国又在北约对华约欧洲核均势的重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它在北约核问题上发挥的这种作用，是第一阶段所不具有的。

在两极格局中考察，联邦德国在北约发展中所凸显的上述地位和作用，实质上也就是它在北约抗衡华约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来说：

第一，在地缘战略上，联邦德国既是北约抗衡华约的前沿阵地，又是北约抗衡华约的重要战略防御纵深（在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后尤其如此）。

第二，在常规力量上，在加入北约的最初几年内，联邦德国军队规模小，1955年只有2万人，1956年6.6万人，1957年12.2万人，1958年17.5万人，[①]同时，武器装备大量依靠美、英提供，所以在北约抗衡华约中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此后，联邦德国先后发展成为北约中欧盟军的主干力量、中欧盟军支柱和欧洲支柱，武器装备逐渐自给，而且在除美国以外的成员国中最为精良，这样，就使北约在中欧逐渐建立起对华约的常规力量均势，联邦德国也最终成为北约抗衡华约的欧洲支柱。

---

①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3—1974*,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79;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8—1979*,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88;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2—1973*,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74;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4—1975*,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8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5 - 197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8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6—1977*,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83;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7—1978*,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87.

第三,在核力量上,由于《伦敦—巴黎协定》的限制性条款,联邦德国不能靠制造核武器在北约对华约的核均势中发挥威慑作用;由于“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流产,联邦德国也不能靠拥有和参与控制的核武器在北约对华约的核均势中发挥威慑作用;由于不能制造、没能拥有、不能参与控制核武器,联邦德国必须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但是,它通过倡导“双重决议”、推动“双重决议”实施,在北约对华约欧洲核均势的重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在北约针对华约的战略安排和部署中,随着“前沿防御战略”在北约战略中的地位和联邦德国自身军力的变化,联邦德国在北约抗衡华约中的地位作用也在变化,即从最初只具备理论上的战略地位,发展到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最终既具备理论上的战略地位,又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但就北约战略的制定而言,联邦德国不具有主导北约调整抗衡华约的战略的能力。

第五,在处理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所引起的危机中,联邦德国由于采取了弃法投美、与法国签订驻军协定等政策,使北约危机降低到最小限度,避免北约抗衡华约的实力进一步削弱,乃至因解体而失败。

第六,联邦德国常规力量的日益增强,为美国日益减少其常规力量,以节约这一方面的开支来发展高科技武器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北约抗衡华约的实力。

整体上讲,联邦德国在北约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北约取得冷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从反面来讲,也是北约国家强烈要求统一德国留在北约以在组织内制约它的重要因素。对联邦德国而言,它在北约发展和北约抗衡华约中的重要作用,则是北约国家最终支持德国统一的重要原因。

两德统一后,统一德国加入了北约。与联邦德国相比,统一德国军队的法定最高规模减少了 13 万,但综合实力大增。其中,领土面积由原来的 24.7 万平方公里扩大到 35.7 万平方公里,扩大了 45.7%,在北约欧洲国家中仅次于法国和西班牙;人口由原来的 6100

万增加到7850万,增加了28.7%,成为北约欧洲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2.9%,把英、法远远甩在了后面。

然而,在统一后的十多年里,德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一,国际格局的变化。1991年7月1日,华约宣布解散,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这样,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宣告结束。此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世界格局向多级方向发展。

其二,北约的变化。在军事实力上,北约成为世界最大的军事组织;在国际竞争中,由于华约的解散,北约失去了直接的对抗对手;在与原华约国家的关系上,北约与它们建立了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以建立伙伴关系,并推行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在组织上,北约不断进行东扩,将原华约国家纳入组织中;在性质上,北约已从军事政治组织转变为政治军事组织;在军事行动中,北约将军事行动范围延伸到了防区外,并发动了科索沃战争。

其三,欧洲盟国合作的变化。欧共体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盟不断加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不断在北约防务中彰显欧洲特性,而其最终目标则是要建立独立于北约之外的欧洲防务。

在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德国的安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北约的前沿防御阵地,所有邻国都成了它的盟国和朋友。

随着自身实力、国际形势和安全环境的变化,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目标转变为争取成为世界政治大国,这样,其实现目标的政策和手段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一系列的变化必然引起德国在北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鉴于时间、精力和已有资料情况的限制,本书对后冷战时代的这些问题没有涉及,拟在后续研究中予以关注。

附　录

附表 1　1960—1976 年北约各国的军队人数及其构成

国家	军队	1960 年	1961—1962 年	1966—1967 年
1. 比利时	总数	120,000 (9)	110,000 (10)	107,000 (11)
	陆	95,000	85,000	83,500
	海	5,000	5,000	4,500
	空	20,000	20,000	19,000
2. 加拿大	总数	120,000 (10)	119,300 (9)	107,000 (10)
	陆	48,000	47,800	44,000
	海	20,500	20,000	18,100
	空	51,500	51,500	45,000
3. 丹　麦	总数	43,000(12)	43,000(12)	50,000(12)
	陆	29,000	29,000	30,000
	海	7,000	7,000	7,200
	空	7,000	7,000	12,600
4. 美　国	总数	2,989,000(1)	2,606,000(1)	3,093,960(1)
	陆	870,000	967,000	1,200,000
	海军陆战队	——	——	261,660
	海	619,000	635,787	745,000
	空	825,000	824,900	887,300
5. 法　国	总数	1,026,000①(2)	1,008,791(2)	522,500(2)
	陆	812,000	804,000	338,000
	海	68,000	67,791	84,000
	空	146,000	137,000	113,000
6. 希　腊	总数	157,900(7)	159,000	159,000(7)
	陆	120,000	120,000	118,000
	海	16,400	17,000	18,000
	空	21,500	22,000	23,000

续表：

国家	军队	1960 年	1961—1962 年	1966—1967 年
7. 意大利	总数	400,000(5)	466,392(4)	376,000(6)
	陆 海 空	310,000 40,000 50,000	369,000 40,814 55,978	270,000 40,000 66,000
8. 卢森堡	总数(陆)	3,200(14)	5,500(14)	1,545(14)
9. 挪威	总数	40,000 (13)	37,000 (13)	34,000 (13)
	陆 海 空	21,000 8,000 11,000	20,000 7,000 10,000	17,000 6,000 9,000
10. 荷兰	总数	135,000 (8)	142,000 (8)	129,250 (9)
	陆 海 空	—— —— ——	98,000 23,000 21,000	85,000 21,250 23,000
11. 葡萄牙	总数	79,000 (11)	80,000② (11)	148,000 (8)
	陆 海 空	58,000 8,500 12,500	58,000 9,000 12,500	120,000 14,500 13,500
12. 联邦德国	总数	260,000③ (6)	330,000 (6)	440,000 (6)
	陆 海 空	172,000 24,000 64,000	224,000 26,000 80,000	307,000 33,000 100,000
13. 英国	总数	593,000④ (3)	454,330 (5)	437,600 (5)
	陆 海 空	317,000 102,000 174,000	200,000 96,330 158,000	218,200 97,200 122,000
14. 土耳其	总数	500,000 (4)	500,000 (3)	450,000 (3)
	陆 海 空	—— —— ——	—— —— ——	360,000 37,000 53,000

附表1(续一)

国家	军队	1968 - 1969 年	1970—1971 年	1971—1972 年
1. 比利时	总数	99,000 (11)	94,900 (10)	96,500 (11)
	陆	75,000	70,000	71,500
	海	4,000	4,400	5,000
	空	20,000	20,500	20,000
2. 加拿大	总数	101,600(10)	93,325(11)	85,000 (10)
	陆	41,500	35,350	33,000
	海	16,600	16,975	15,000
	空	43,500	41,000	37,000
3. 丹麦	总数	45,500 (12)	44,500 (12)	40,500 (12)
	陆	28,000	27,000	24,000
	海	7,200	7,000	6,500
	空	10,300	10,500	10,000
4. 美　国	总数	3,500,000	3,161,000(1)	2,699,000
	陆	1,535,000	1,363,000	1,107,000
	海军陆战队	302,000	294,000	212,000
	海	763,000	694,000	623,000
	空	900,000	810,000	757,000
5. 法　国	总数	505,000 (3)	506,000 (2)	501,500 (3)
	陆	328,000	328,000	329,000
	海	69,000	72,000	68,500
	空	108,000	106,000	104,000
6. 希　腊	总数	161,000 (8)	159,000 (8)	159,000 (8)
	陆	118,000	118,000	118,000
	海	20,000	18,000	18,000
	空	23,000	23,000	23,000
7. 意大利	总数	365,000 (6)	413,000 (5)	414,000 (5)
	陆	265,000	295,000	295,000
	海	40,000	45,000	45,000
	空	60,000	73,000	74,000

续表:

国家	军队	1968－1969年	1970—1971年	1971—1972年
8.卢森堡	总数(陆)	560 (14)	550 (14)	550 (14)
9.挪　威	总数	35,000(13)	41,100 (13)	35,900 (13)
	陆	19,000	23,500	18,000
	海	7,000	8,600	8,500
	空	9,000	9,000	9,400
10.荷　兰	总数	128,500 (9)	121,250 (9)	116,500 (9)
	陆	83,500	80,000	76,000
	海	21,500	20,000	19,000
	空	23,500	21,250	21,500
11.葡萄牙	总数	182,500 (7)	185,500 (7)	218,000 (7)
	陆	150,000	150,000	179,000
	海	15,000	18,000	18,000
	空	17,500	17,500	21,000
12.联邦德国	总数	456,000 (4)	466,000 (4)	467,000 (4)
	陆	326,000	326,000	327,000
	海	32,000	36,000	36,000
	空	98,000	104,000	104,000
13.英　国	总数	427,000 (5)	390,000 (6)	380,900 (6)
	陆	210,000	190,000	185,300
	海	96,000	87,000	84,600
	空	121,000	113,000	111,000
14.土耳其	总数	514,000 (2)	477,500 (3)	508,500 (2)
	陆	425,000	390,000	420,000
	海	39,000	37,500	38,500
	空	50,000	50,000	50,000

附表 1(续二)

国家	军队	1972—1973 年	1973—1974 年
1. 比利时	总数	90,200 (10)	89,600 (10)
	陆 海 空	66,000 4,200 20,000	65,000 4,600 20,000
2. 加拿大	总数	84,000(11)	83,000 (11)
	陆 海 空	34,000 14,000 36,000	33,000 14,000 36,000
3. 丹　麦	总数	43,400 (12)	39,800 (12)
	陆 海 空	27,000 6,600 9,800	24,000 6,300 9,500
4. 美　国	总数	2,391,000(1)	2,252,900 (1)
	陆 海军陆战队 海 空	861,000 198,000 602,000 730,000	801,500 196,000 564,400 691,000
5. 法　国	总数	500,600 (2)	503,600 (2)
	陆 海 空	328,000 67,600 105,000	332,400 69,000 102,000
6. 希　腊	总数	157,000 (8)	160,000 (8)
	陆 海 空	118,000 18,000 21,000	120,000 18,000 22,000
7. 意大利	总数	427,600 (5)	427,500 (5)
	陆 海 空	306,600 44,500 76,500	306,500 44,500 76,500

续表：

国家	军队	1972—1973 年	1973—1974 年
8. 卢森堡	总数(陆)	550 (14)	550(14)
9. 挪　威	总数	35,900 (13)	35,400 (13)
	陆	18,000	18,000
	海	8,500	8,000
	空	9,400	9,400
10. 荷　兰	总数	122,200 (9)	112,200 (9)
	陆	80,000	70,000
	海	20,000	20,000
	空	22,200	22,200
11. 葡萄牙	总数	218,000 (7)	204,000 (7)
	陆	179,000	170,000
	海	18,000	18,000
	空	21,000	16,000
12. 联邦德国	总数	467,000 (3)	475,000 (3)
	陆	327,000	334,000
	海	36,000	37,000
	空	104,000	104,000
13. 英　国	总数	372,331 (6)	361,500 (6)
	陆	180,458	177,000
	海	82,024	81,000
	空	109,849	103,500
14. 土耳其	总数	449,000 (4)	45,000 (4)
	陆	360,000	365,000
	海	39,000	40,000
	空	50,000	50,000

附表 1(续三)

国家	军队	1974—1975 年	1975—1976 年
1. 比利时	总数	89,700 (10)	87,000 (11)
	陆	65,400	62,700
	海	4,200	4,200
	空	20,100	20,100
2. 加拿大	总数	83,000 (11)	77,000 (10)
	陆	33,000	28,000
	海	14,000	14,000
	空	36,000	35,000
3. 丹　麦	总数	37,100 (12)	34,400 (12)
	陆	21,500	21,500
	海	6,000	5,800
	空	9,600	7,100
4. 美　国	总数	2,174,000(1)	2,130,000
	陆	782,000	785,000
	海军陆战队	196,000	197,000
	海	551,000	536,000
	空	645,000	612,000
5. 法　国	总数	502,500 (2)	502,500 (2)
	陆	331,500	331,500
	海	69,000	69,000
	空	102,000	102,000
6. 希　腊	总数	161,200 (8)	161,200 (8)
	陆	121,000	121,000
	海	17,500	17,500
	空	22,700	22,700
7. 意大利	总数	421,000 (5)	421,000 (5)
	陆	306,500	306,500
	海	44,500	44,500
	空	70,000	70,000

续表：

国家	军队	1974—1975 年	1975—1976 年
8. 卢森堡	总数(陆)	550 (14)	550 (14)
9. 挪 威	总数	34,900 (13)	35,000 (13)
	陆 海 空	17,700 8,300 8,900	18,000 8,000 9,000
10. 荷 兰	总数	113,900 (9)	112,500 (9)
	陆 海 空	75,000 19,000 19,900	75,000 18,500 19,500
11. 葡萄牙	总数	217,000 (7)	217,000 (7)
	陆 海 空	179,000 19,500 18,500	179,000 19,500 18,500
12. 联邦德国	总数	490,000 (3)	495,000 (3)
	陆 海 空	340,000 39,000 111,000	345,000 39,000 111,000
13. 英 国	总数	354,600 (6)	345,100 (6)
	陆 海 空	178,300 78,100 98,200	174,900 76,100 94,100
14. 土耳其	总数	453,000 (4)	453,000 (4)
	陆 海 空	365,000 40,000 48,000	365,000 40,000 48,000

附表 1(续四)

国家	1960 年至 1966—1967 年度变化情况		1966—1967 年度至 1972—1973 年度变化情况	
1. 比利时	-13000	-10.8%	-16800	-15.7%
2. 加拿大	-13000	-10.8%	-23000	-21.5%
3. 丹麦	7000	16.3%	-6600	-13.2%
4. 美国	104960	3.5%	-702960	-22.7%
5. 法国	-503500	-49.1%	-21900	-4.2%
6. 希腊	1100	0.7%	-2000	1.3%
7. 意大利	-24000	-6%	51600	13.7%
8. 卢森堡	-1655	-51.7%	0	0.0%
9. 挪威	-6000	-15%	1900	5.6%
10. 荷兰	-5750	-4.3%	-7050	-5.5%
11. 葡萄牙	69000	87.3%	70000	47.3%
12. 联邦德国	180000	69.2%	27000	6.1%
13. 英国	-155400	-26.2%	-65269	-14.9%
14. 土耳其	-50000	-10%	-1000	——

附表 1(续五)

国家	1960 年至 1972—1973 年度变化情况		1960 年至 1975—1976 年度的变化情况	
1. 比利时	-29800	24.8%	-33000	-27.5%
2. 加拿大	-36000	30.0%	-43000	-35.8%
3. 丹麦	-600	1.4%	-8600	-20%
4. 美国	-598000	20.0%	-859000	-28.7%
5. 法国	-525400	-51.2%	-523500	-52.4%
6. 希腊	-900	0.6%	3300	2.1%
7. 意大利	27600	6.9%	21000	5.3%
8. 卢森堡	-2650	-82.8%	-2650	-82.8%
9. 挪威	-4100	-10.3%	-5000	-12.5%
10. 荷兰	-12800	-9.5%	-22500	-16.7%
11. 葡萄牙	139000	175.9%	138000	174.7%
12. 联邦德国	207000	79.6%	235000	90.4%
13. 英国	-220669	-37.2%	-247900	-41.8%
14. 土耳其	-51000	-10.2%	-47000	-9.4%

注:① 阿尔及利亚战争。

② 3 万在安哥拉。

③ 允许设 12 个师,当时有 7 个师。

④ 1962 年度废除义务兵役制。

⑤ 本表根据“罗贝尔·克洛兹:《欧洲有没有防务——可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四十八小时》,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和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1960—1976 提供的资料制作。

附表2 1975—1990年北约主要欧洲成员国的兵力对比(单位:人)

年份	英国	法国	西德	意大利
1972—1973年	372,331	500,600	467,000	427,600
1973—1974年	361,500	503,600	475,000	427,500
1974—1975年	354,600	502,500	490,000	421,000
1975—1976年	345,100	502,500	495,000	421,000
1976—1977年	344,150	512,900	495,000	352,000
1978—1979年	313,253	502,800	489,900	362,000
1979—1980年	322,891	509,300	495,000	365,000
1980—1981年	329,204	494,730	495,000	366,000
1981—1982年	343,646	504,630	495,000	366,000
1982—1983年	327,600	492,850	495,000	370,000
1983—1984年	320,623	492,850	495,000	373,100
1985—1986年	327,100	476,560	478,000	385,100
1986—1987年	323,800	557,493	485,800	387,800
1987—1988年	318,700	546,900	488,400	388,300
1988—1989年	316,700	456,900	488,700	386,000
1989—1990年	311,650	466,300	494,300	390,000
1972—1973年至1989—1990年的变化情况	-60681 -16.3%	-34300 -6.9%	27300 5.8%	-37600 -8.8%

(本表根据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2—1979和吴学永:《论德国安全政策》,北京:北京大学,1994年博士学位论文提供的数据统计而成。)

附表 3　1949—1974 年北约各国的防务费（单位：以市场价格计算百万该国货币）

国家	计量单位	1949 年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	1955 年
比利时	比利时法郎	8,273	8,914	14,095	20,735	20,589	20,707	17,857
加拿大	加元	372	495	1,220	1,875	1,970	1,771	1,819
丹　麦	丹麦克朗	360	359	475	676	889	885	920
法　国	新法郎	4,787	5,591	8,811	12,531	13,865	11,710	11,020
西　德	马克	—	—	—	—	6,195	6,287	7,383
希　腊	德拉克马	1,630	1,971	2,515	2,655	2,767	3,428	3,688
意大利	里拉	301	353	457	521	480	543	551
卢森堡	卢森堡法郎	112	170	264	436	488	565	614
荷　兰	荷盾	680	901	1,060	1,253	1,330	1,583	1,699
挪　威	挪威克朗	370	357	572	831	1,067	1,141	953
葡萄牙	埃斯库多	1,419	1,516	1,553	1,691	1,975	2,100	2,224
土耳其	土耳其镑	556	599	652	725	827	934	1,077
英　国	英镑	779	849	1,149	1,561	1,684	1,569	1,565
美　国	美元	13,503	14,307	33,059	47,598	49,377	42,786	40,371
欧　洲	百万美元	4,838	5,458	7,642	10,248	12,426	11,756	11,838
北　美	百万美元	13,875	14,802	34,279	49,473	51,347	44,557	42,215
北　约	百万美元	18,713	20,260	41,921	59,721	63,773	56,313	54,053

附表3(续一)

国家	计量单位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比利时	比利时法郎	17,887	18,356	18,312	19,658	20,209	20,641	22,341
加拿大	加元	1,888	1,829	1,740	1,642	1,654	1,716	1,810
丹　麦	丹麦克朗	936	1,012	988	986	1,113	1,180	1,551
法　国	新法郎	14,690	15,600	16,569	17,926	19,162	20,395	22,184
西　德	马克	7,211	8,962	6,853	11,087	12,115	13,175	17,233
希　腊	德拉克马	4,939	4,477	4,469	4,735	5,110	5,034	5,102
意大利	里拉	584	611	647	667	710	749	861
卢森堡	卢森堡法郎	395	439	429	402	263	290	355
荷　兰	荷盾	1,854	1,845	1,656	1,505	1,728	2,013	2,186
挪　威	挪威克朗	967	1,049	1,024	1,107	1,058	1,179	1,371
葡萄牙	埃斯库多	2,297	2,391	2,845	2,820	3,023	4,922	5,744
土耳其	土耳其镑	1,159	1,266	1,470	2,153	2,410	2,718	2,980
英　国	英镑	1,615	1,574	1,591	1,595	1,657	1,709	1,814
美　国	美元	41,513	44,548	45,503	45,833	45,380	47,808	52,398
欧　洲	百万美元	13,154	—	—	13,924	14,466	15,335	17,433
北　美	百万美元	43,432	—	—	47,545	47,085	49,501	54,089
北　约	百万美元	56,586	60,191	60,168	61,469	61,551	64,836	71,522

附表3(续二)

国家	计量单位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比利时	比利时法郎	23,596	26,241	26,606	28,169	30,396	32,676
加拿大	加元	1,712	1,813	1,659	1,766	1,965	1,927
丹　麦	丹麦克朗	1,651	1,764	1,974	2,080	2,249	2,591
法　国	新法郎	22,849	24,280	25,300	26,732	28,912	30,264
西　德	马克	19,924	19,553	19,915	20,254	21,408	19,310
希　腊	德拉克马	5,385	5,647	6,290	7,168	9,390	11,003
意大利	里拉	1031	1,118	1,212	1,342	1,359	1,403
卢森堡	卢森堡法郎	348	462	477	497	413	374
荷　兰	荷盾	2,307	2,661	2,714	2,790	3,200	3,280
挪　威	挪威克朗	1,465	1,570	1,897	1,947	2,097	2,300
葡萄牙	埃斯库多	5,724	6,451	6,680	7,393	9,575	10,692
土耳其	土耳其镑	3,157	3,443	3,821	3,996	4,596	5,159
英　国	英镑	1,870	2,000	2,091	2,153	2,276	2,332
美　国	美元	52,295	51,213	51,827	63,572	75,448	80,732
欧　洲	百万美元	18,784	18,733	20,606	21,512	22,925	22,346
北　美	百万美元	53,879	52,890	53,362	65,205	77,265	82,515
北　约	百万美元	72,663	72,623	73,968	86,717	100,190	104,861

附表3(续三)

国家	计量单位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比利时	比利时法郎	33,892	37,502	39,670	44,140	48,941	57,315
加拿大	加元	1,899	2,061	2,131	2,238	2,405	2,770
丹　麦	丹麦克朗	2,640	2,757	3,195	3,386	3,520	4,343
法　国	新法郎	30,696	32,672	34,907	37,992	42,284	46,570
西　德	马克	21,577	22,573	25,450	28,720	31,908	35,964
希　腊	德拉克马	12,762	14,208	15,480	17,211	19,866	24,126
意大利	里拉	1,412	1,562	1,852	2,162	2,392	2,676
卢森堡	卢森堡法郎	391	416	442	517	601	677
荷　兰	荷盾	3,682	3,968	4,466	4,974	5,465	6,347
挪　威	挪威克朗	2,502	2,774	3,022	3,239	3,505	4,081
葡萄牙	埃斯库多	10,779	12,538	14,699	16,046	16,736	20,910
土耳其	土耳其镑	5,395	6,237	8,487	9,961	12,192	15,831
英　国	英镑	2,303	2,444	2,815	3,258	3,505	4,148
美　国	美元	81,443	77,854	74,862	77,639	78,473	84,332
欧　洲	百万美元	22,999	24,482	28,028	33,606	40,678	45,167
北　美	百万美元	83,199	79,821	76,973	79,898	80,876	87,176
北　约	百万美元	106,198	104,303	105,001	113,504	121,554	132,343

附表3(续四)

国家	计量单位	1955—1960年变化情况		1960—1967年变化情况		1967—1973年变化情况		1955—1973年变化情况	
比利时	比利时法郎	2,352	13.2%	10,187	50.4%	18,545	61.0%	31,084	174.1%
加拿大	加元	-165	-9.0%	311	18.8%	440	22.4%	586	32.2%
丹　麦	丹麦克朗	193	21%	1,136	102.1%	1,271	49.1%	2,600	282.6%
法　国	新法郎	8,142	73.9%	9,750	50.9%	13,372	46.3%	31,264	283.3%
西　德	马克	4,732	64.1%	9,293	76.7%	10,500	49.0%	24,525	332.2%
希　腊	德拉克马	1,424	38.2%	4,280	83.8%	10,476	111.6%	16,178	438.7%
意大利	里拉	159	28.9%	649	91.4%	1,033	76.0%	1,841	334.1%
卢森堡	卢森堡法郎	-351	-57.2%	150	57.0%	188	45.5%	-13	-2.1%
荷　兰	荷盾	29	1.7%	1,472	85.2%	2,265	70.8%	3,769	222.2%
挪　威	挪威克朗	105	11.0%	1,039	98.2%	1,408	67.1%	2,552	267.8%
葡萄牙	埃斯库多	799	35.9%	6,552	216.7%	7161	74.8%	14,512	652.5%
土耳其	土耳其镑	1,333	123.8%	2,186	90.7%	7,596	165.3%	11,115	1032.0%
英　国	英镑	92	5.9%	619	37.3%	1,229	54.0%	1,940	124.0%
美　国	美元	5,009	12.4%	30,068	66.3%	3,025	4.0%	38,102	94.4%
欧　洲	百万美元	2,628	22.1%	8,459	58.4%	17,753	77.4%	28,840	243.6%
北　美	百万美元	4,870	11.5%	30,180	64.1%	3,611	4.8%	38,661	91.6%
北　约	百万美元	7,498	13.9%	38,639	62.8%	21,364	21.3%	67,501	124.9%

说明:①本表根据“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NATO: Facts and Figures*, Brussels: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 1976.”提供的资料制作。

②西德在柏林的费用没有包括在内,如果加上这笔费用,则西德的防务费将大量增加。如1974年,西德在柏林的花费高达7405百万马克。

附表4　1960—1976 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费支出(市场价格和不变价格)指数①(按各国货币计算,1970 = 100)

国家	1960 年	1961 年	1962 年	1963 年	1964 年	1965 年	1966 年	1967 年
1. 比利时	53.9 72.5	55.0 73.3	59.6 78.3	62.9 81.0	70.0 86.4	70.9 84.2	75.1 85.6	81.1 89.8
2. 英　国	67.7 100.6	69.9 100.6	74.2 102.3	76.5 103.5	81.8 107.2	85.6 107.0	88.1 106.0	93.1 109.3
3. 加拿大	80.3 105.3	83.3 108.0	87.8 112.6	83.1 104.6	88.0 109.0	80.5 97.2	85.7 99.8	95.3 107.2
4. 丹　麦	40.4 71.4	42.8 73.0	56.3 89.6	59.9 89.8	64.0 93.0	71.6 98.7	75.4 97.0	81.6 97.3
5. 法　国	57.7 85.7	61.4 89.1	66.8 92.1	68.8 90.3	73.1 93.0	76.2 94.4	80.5 97.1	87.1 102.3
6. 西　德	53.7 70.2	58.4 74.6	76.3 94.5	88.3 106.4	86.6 101.8	88.2 100.7	89.7 98.7	94.8 102.6
7. 希　腊	36.0 44.2	35.4 42.7	35.9 43.5	37.9 44.5	39.7 46.3	44.3 50.2	50.5 54.3	66.2 70.0
8. 意大利	45.5 67.0	48.0 69.3	55.1 76.0	66.0 84.6	71.6 86.7	77.6 89.9	85.9 97.1	87.0 95.0
9. 卢森堡	63.2 81.5	69.7 89.5	85.3 108.4	83.7 103.6	111.1 133.2	114.7 133.1	119.5 134.1	99.3 109.1
10. 荷　兰	43.5 65.6	50.7 75.2	55.1 80.2	58.1 81.5	67.1 89.1	68.4 87.5	70.3 84.0	80.6 93.1
11. 挪　威	38.1 59.2	42.5 64.4	49.4 71.1	52.8 74.1	56.6 75.1	68.4 87.0	70.2 86.5	75.6 89.3
12. 葡萄牙	24.1 37.3	39.3 59.9	45.8 68.0	45.7 66.5	51.5 72.5	53.3 72.5	59.0 76.4	76.4 93.4
13. 土耳其	38.6 68.4	43.6 75.4	47.8 79.3	50.6 78.7	55.2 85.2	61.3 90.5	64.1 87.0	73.7 87.7
14. 美　国	58.3 76.5	61.4 79.6	67.3 86.4	67.2 85.1	65.8 82.4	66.6 82.1	81.7 97.6	96.9 112.7

附表4(续)

国家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1960—1974年年均增长率	
1. 比利时	87.1	90.4	100.0	105.8	117.7	130.5	152.8	7.7%	9
	93.9	*94.0*	*100.0*	*101.3*	*107.0*	*110.9*	*115.2*	*3.4%*	*8*
2. 英国	95.4	94.2	100.0	115.2	133.3	143.4	169.7	6.8%	11
	106.9	*100.2*	*100.0*	*105.2*	*113.7*	*112.0*	*114.3*	*0.9%*	*11*
3. 加拿大	93.5	92.1	100.0	103.4	108.6	116.7	134.4	3.7%	14
	101.1	*95.2*	*100.0*	*100.6*	*100.8*	*100.6*	*104.5*	*0%*	*14*
4. 丹麦	94.0	95.8	100.0	115.9	122.8	127.7	157.5	10.2%	4
	103.7	*102.0*	*100.0*	*109.4*	*108.9*	*103.6*	*110.8*	*3.2%*	*10*
5. 法国	91.0	95.5	100.0	105.4	110.8	121.2	132.4	6.1%	12
	102.3	*101.1*	*100.0*	*99.8*	*99.2*	*101.1*	*97.1*	*0.9%*	*11*
6. 联邦德国	85.5	95.6	100.0	112.7	127.2	141.4	159.3	8.1%	8
	91.1	*99.2*	*100.0*	*107.2*	*114.6*	*119.0*	*125.3*	*4.2%*	*6*
7. 希腊	77.4	89.8	100.0	109.0	121.1	139.8	169.9	11.7%	3
	81.7	*92.6*	*100.0*	*105.8*	*112.6*	*112.9*	*108.1*	*6.6%*	*2*
8. 意大利	89.8	90.4	100.0	118.6	138.4	153.1	171.3	9.9%	6
	96.8	*94.8*	*100.0*	*113.1*	*125.0*	*124.7*	*117.1*	*4.1%*	*7*
9. 卢森堡	89.9	94.0	100.0	106.1	124.3	144.5	162.7	7.0%	10
	96.3	*98.3*	*100.0*	*101.6*	*112.9*	*124.1*	*128.7*	*3.3%*	*9*
10. 荷兰	82.7	92.8	100.0	112.6	125.4	137.7	162.2	9.9%	6
	92.0	*96.1*	*100.0*	*104.7*	*108.2*	*110.0*	*118.1*	*4.3%*	*5*
11. 挪威	82.9	90.2	100.0	108.9	116.8	126.4	147.1	10.1%	5
	94.5	*99.8*	*100.0*	*102.5*	*102.6*	*103.3*	*109.9*	*4.5%*	*4*
12. 葡萄牙	85.3	86.0	100.0	117.2	128.0	133.5	166.8	14.7%	1
	98.7	*91.0*	*100.0*	*104.7*	*103.3*	*95.4*	*94.8*	*6.9%*	*1*
13. 土耳其	82.7	86.5	100.0	136.1	159.7	195.5	253.8	14.4%	2
	93.0	*92.6*	*100.0*	*114.3*	*123.6*	*131.1*	*147.0*	*5.6%*	*3*
14. 美国	103.7	104.6	100.0	96.2	99.7	100.8	108.3	4.5%	13
	115.7	*110.8*	*100.0*	*92.3*	*92.6*	*88.1*	*85.3*	*0.8%*	*13*

说明:① 本表根据"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5—1976, 1976—1977, 1977—1978, 1978—1979"提供的资料制作。

② 本表所列不变价格指数(斜体字)是以军费支出指数乘以消费价格最低指数得出来的。因此不变价格的变化已把单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升包括进去。

附表5　1970—1976年北约各国的防务费及占北约欧洲盟国和北约整体的份额(单位:百万该国货币)

国家	1970年			1971年		
1.美　国	76,507	73.61%	—	78,743	74.98%	—
2.西　德	7,067	6.80%	28.27%	6,860	6.53%	28.41%
3.法　国	5,982	5.76%	23.93%	5,202	4.95%	21.54%
4.英　国	5,950	5.72%	23.80%	6,108	5.67%	25.305
5.意大利	2,599	2.50%	10.40%	2,651	2.52%	10.98%
6.加拿大	1,931	1.86%	—	1,688	1.61%	—
7.比利时	688	0.66%	2.75%	594	0.57%	2.46%
8.荷　兰	1,106	1.06%	4.42%	1,166	1.11%	4.83%
9.丹　麦	368	0.35%	1.47%	410	0.39%	1.70%
10.土耳其	503	0.48%	—	446	0.42%	—
11.挪　威	376	0.36%	1.50%	411	0.39%	1.70%
12.希　腊	453	0.44%	1.81%	338	0.32%	1.40%
13.葡萄牙	398	0.38%	1.60%	398	0.38%	1.65%
14.卢森堡	8	0.01%	0.03%	9	0.01%	0.04%
北约欧洲	24995	24.05%	100%	24147	23.00%	100%
北　约	103936	100%	—	105024	100%	—

附表 5(续一)

国家	1972 年			1973 年		
1.美　国	83,400	71.87%	—	79,500	64.62%	—
2.西　德	9,531	8.21%	31.65%	14,044	11.42%	34.62%
3.法　国	6,238	5.38%	20.72%	8,438	6.86%	20.80%
4.英　国	6,968	6.00%	23.14%	8,673	7.05%	21.38%
5.意大利	3,251	2.80%	10.80%	3,997	3.25%	9.85%
6.加拿大	1,966	1.69%	—	2,154	1.75%	—
7.比利时	723	0.62%	2.40%	990	0.80%	2.44%
8.荷　兰	1,568	1.35%	5.21%	2,102	1.71%	5.18%
9.丹　麦	441	0.38%	1.46%	568	0.46%	1.40%
10.土耳其	568	0.49%	—	803	0.65%	1.98%
11.挪　威	462	3.98%	1.53%	666	0.54%	1.64%
12.希　腊	495	0.43%	1.64%	552	0.45%	1.36%
13.葡萄牙	425	0.37%	1.41%	523	0.43%	1.29%
14.卢森堡	10	0.01%	0.03%	17	0.01%	0.04%
北约欧洲	30112	25.95%	100%	40570	32.98%	100%
北　约	116046	100%	—	123027	100%	—

附表5(续二)

国家	1974年			1975年		
1.美　国	85,906	61.60%	—	88,903	58.19%	—
2.西　德	16,688	11.97%	33.8%	19,540	12.80%	33.29%
3.法　国	9,970	7.15%	20.18%	13,984	9.15%	23.82%
4.英　国	10,410	7.46%	21.0%	11,118	7.28%	18.94%
5.意大利	4,142	2.97%	8.38%	4,700	3.08%	8.07%
6.加拿大	2,965	2.13%	—	2,965	1.94%	—
7.比利时	1,506	1.08%	3.05%	1,971	1.29%	3.36%
8.荷　兰	2,406	1.73%	4.87%	2,978	1.95%	5.07%
9.丹　麦	741	0.53%	1.50%	939	0.61%	1.60%
10.土耳其	1,173	0.84%	—	2,200	1.44%	—
11.挪　威	723	0.52%	1.46%	929	0.61%	1.58%
12.希　腊	1,807	1.30%	3.66%	1,435	0.94%	2.44%
13.葡萄牙	1,000	0.72%	2.02%	1,088	0.71%	1.85%
14.卢森堡	19	0.01%	0.04%	22	0.01%	0.04%
北约欧洲	49412	35.43%	100%	58704	38.43%	100%
北　约	139456	100%	—	152772	100%	—

附表 5(续三)

国家	1976 年			1970—1976 年防务费的变化	
1. 美　国	102,191	62.29%	—	25,684	3.6%
2. 西　德	18,758	11.43%	33.60%	11,691	165.4%
3. 法　国	12,857	7.84%	23.03%	6,872	114.9%
4. 英　国	10,734	6.54%	19.23%	4,784	80.4%
5. 意大利	3,821	2.33%	6.84%	1,222	47.0%
6. 加拿大	3,231	1.97%	—	1,300	67.3%
7. 比利时	2,013	1.23%	3.61%	1,325	192.6%
8. 荷　兰	2,825	1.72%	5.06%	1,719	155.4%
9. 丹　麦	861	0.52%	1.54%	493	134.0%
10. 土耳其	2,800	1.71%	—	2,297	456.7%
11. 挪　威	909	0.55%	1.63%	533	141.8%
12. 希　腊	2,276	1.39%	4.08%	1,823	40.2%
13. 葡萄牙	748	0.46%	1.34%	350	88.0%
14. 卢森堡	23	0.01%	0.04%	15	187.5%
北约欧洲	55,822	34.03%	100%	30,827	123.3%
北　约	16,4047	100%	—	60,111	57.8%

注:① 本表根据 1971—1978 年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和 Gavin Kennedy, *Burden Sharing in NATO.*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79. 提供的资料制作。

② 西德的有关数字包括对驻西德的盟军所支付的费用。

③ 表中所列的第一个百分比是指成员国占北约防务费的比例,第二个百分比是指成员国占北约欧洲国家的防务费的比例。

附表 6　1961－1977 年北约各国防务开支占国家开支的比例

国家	1961 年	1964 年	1965 年	1966 年	1967 年
1. 比利时	13.6 (13)	14.7 (12)	12.7 (13)	12.3 (13)	11.9 (13)
2. 加拿大	27.2 (6)	24.2 (7)	21.6 (7)	20.4 (7)	16.9 (9)
3. 丹　麦	15.8 (12)	14.7 (12)	14.3 (12)	12.4 (12)	12.4 (12)
4. 美　国	47.3 (1)	41.4 (1)	42.3 (1)	44.3 (1)	44.6 (1)
5. 法　国	27.2 (6)	24.3 (6)	24.0 (6)	23.4 (5)	22.7 (5)
6. 英　国	27.8 (5)	26.3 (4)	25.2 (5)	23.2 (6)	21.3 (6)
7. 希　腊	23.6 (8)	19.2 (9)	18.9 (8)	18.6 (7)	20.9 (7)
8. 意大利	16.0 (11)	19.8 (8)	14.8 (11)	14.8 (11)	13.7 (11)
9. 卢森堡	4.3(14)	5.5(14)	5.4(14)	5.0(14)	4.1(14)
10. 挪　威	18.4 (9)	17.6 (8)	18.9 (8)	18.0 (9)	17.2 (8)
11. 荷　兰	18.0 (10)	18.4 (10)	16.1 (10)	14.9 (10)	15.4 (10)
12. 葡萄牙	35.3 (2)	36.9 (2)	37.0 (2)	37.7 (2)	41.0 (2)
13. 西德②	32.6 (3)	35.3 (3)	33.5 (3)	32.6 (3)	32.2 (3)
14. 土耳其	30.5 (4)	26.3 (4)	26.5 (4)	24.1 (4)	24.6 (4)

附表 6（续一）

国家	1968 年	1969 年	1970 年	1971 年	1972 年①
1. 比利时	11.5 (12)	11.1 (11)	10.9 (12)	10.6 (12)	9.6 (12)
2. 加拿大	15.3 (9)	14.4 (9)	12.6 (10)	12.2 (11)	11.5 (11)
3. 丹　麦	10.5 (13)	9.6(13)	8.8(13)	9.0(13)	8.1(13)
4. 美　国	43.7 (1)	40.6 (1)	36.7 (2)	33.7 (2)	31.9 (2)
5. 法　国	21.7 (5)	20.2 (6)	20.0 (5)	19.0 (6)	18.6 (7)
6. 英　国	20.1 (7)	18.0 (7)	9.4(7)	21.1 (5)	20.5 (4)
7. 希　腊	21.2 (6)	21.9 (4)	21.9 (4)	21.5 (4)	19.0 (5)
8. 意大利	12.0 (11)	10.6 (12)	11.3 (11)	13.2 (9)	13.5 (9)
9. 卢森堡	3.4(14)	3.4(14)	3.1(14)	3.0(14)	3.6(14)
10. 挪　威	17.1 (8)	16.3 (8)	15.3 (8)	14.4 (8)	13.7 (8)
11. 荷　兰	13.5 (10)	13.8 (10)	13.3 (9)	12.6 (10)	13.0 (10)
12. 葡萄牙	42.4 (2)	38.9 (2)	39.5 (1)	45.9 (1)	44.9 (1)
13. 西德②	28.2 (3)	29.4 (3)	29.6 (3)	30.6 (3)	31.5 (3)
14. 土耳其	23.5 (4)	20.9 (5)	19.9 (6)	18.8 (7)	18.9 (6)

附表6(续二)

国家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 比利时	9.6 (12)	9.8(11)	10.0 (10)	10.2 (8)	10.4 (7)
2. 加拿大	15.3 (8)	14.3 (7)	11.9 (7)	10.9 (7)	—
3. 丹　麦	9.0 (13)	7.4(13)	7.3(13)	7.4(12)	6.8(12)
4. 美　国	36.6 (2)	26.5 (3)	23.8 (5)	26.0 (3)	24.4 (2)
5. 法　国	20.6 (4)	20.3 (5)	20.2 (6)	20.6 (5)	20.4 (4)
6. 英　国	19.7 (5)	12.9 (8)	11.6 (8)	11.0 (6)	11.4 (6)
7. 希　腊	16.3 (7)	25.2 (4)	25.5 (4)	26.0 (3)	—
8. 意大利	11.0 (11)	11.0 (10)	9.7(11)	8.6(10)	8.3(10)
9. 卢森堡	3.5(14)	3.5(14)	3.0(14)	2.9(13)	2.9(13)
10. 挪　威	13.4 (9)	8.5(12)	8.2(12)	7.6(11)	9.9(8)
11. 荷　兰	12.7 (10)	12.2 (9)	11.0 (9)	9.8(9)	9.7(9)
12. 葡萄牙	38.4 (1)	47.3 (1)	35.2 (1)	—	19.2 (5)
13. 西德②	31.8 (3)	28.8 (2)	29.2 (2)	28.9 (2)	29.2 (1)
14. 土耳其	16.8 (6)	19.2 (6)	26.6 (3)	29.4 (1)	21.1 (3)

注:① 临时数量;

② 包括对柏林的支援;

③ 本表综合以下资料制作:(比利时)罗贝尔·克洛兹:《欧洲有没有防务——可以改变世界的四十八小时》,商务印书馆,1979;Kenneth A. Myers, *NATO——The Next Thirty Years: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Setting*, Westview Press, Inc, 1980; Gavin Kennedy, *Burden Sharing in NATO*,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79.

附表 7　北约各国的人均防务费

国家	1972 年	1973 年	1974 年	1975 年	1976 年
1. 比利时	104 （7）	139 （7）	153 （7）	185 （6）	204 （6）
2. 英国	141 （4）	161 （5）	176 （5）	184 （7）	190 （7）
3. 加拿大	102 （8）	109 （9）	126 （9）	129 （10）	140 （9）
4. 丹麦	97 （9）	125 （8）	143 （8）	184 （7）	168 （8）
5. 法国	142 （3）	189 （3）	175 （6）	233 （3）	241 （3）
6. 西德	146 （2）	215 （2）	226 （2）	260 （2）	242 （2）
7. 希腊	65 （11）	74 （12）	90 （11）	144 （9）	138 （10）
8. 意大利	68 （10）	75 （11）	75 （12）	76 （12）	68 （13）
9. 卢森堡	34 （13）	49 （13）	50 （13）	61 （13）	68 （13）
10. 荷兰	117 （6）	157 （6）	179 （4）	215 （5）	205 （5）
11. 挪威	127 （5）	169 （4）	187 （3）	223 （4）	223 （4）
12. 葡萄牙	65 （11）	80 （10）	91 （10）	95 （11）	85 （11）
13. 土耳其	19 （14）	23 （14）	30 （14）	55 （14）	70 （12）
14. 美国	372 （1）	372 （1）	395 （1）	430 （1）	477 （1）

（本表根据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1975 – 1976*，London：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和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1976 – 1977*，London：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提供的资料制作）

附表8 北约各国所承担的基础军事设施建设费用份额(1956年最初规定,1960年修改)及其排名

国家	份额	排名
1. 比利时	4.39%	7
2. 加拿大	6.15%	5
3. 丹麦	2.63%	9
4. 法国	11.87%	3
5. 西德	13.72%	2
6. 希腊	0.87%	12
7. 意大利	5.61%	6
8. 卢森堡	0.17%	14
9. 荷兰	3.51%	8
10. 挪威	2.19%	10
11. 葡萄牙	0.28%	13
12. 土耳其	1.75%	11
13. 英国	9.88%	4
14. 美国	36.98%	1

说明:本表根据 Alastair Buchan. *NATO in the* 1960's: *The Implic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London: Wienenfeld & Nicolson, 1960. 提供的资料制作。

参考文献

外文参考文献：

1. Morgan, Rog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 Germany, 1945—1973: a Study in Alliance Politics.*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Harva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2. Burchett, Wilfred G. *Cold War in Germany.* Melbourne: World Unity, 1950.

3. Warburg, James P. *Germany: Key to Peace.* London: Andre Deutsch, 1954.

4. Finer, Herman. *Governments of Greater European Pow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Governments and Political Culture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Holt, 1956.

5. Bathurst, Maurice Edward. *German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Community: A Legal Survey.* London: Stevens, 1956.

6. Kissinger, Henry.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57.

7. Finletter, Thomas Knight. *Foreign Policy: the next Phase.* New York: Harper, 1958.

8. Smell, John L. *Dilemma over Germany.* New Orleans: Hanser Pro., 1959.

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Public Services Division. *NATO 1949—1959: the first ten years*, U. 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10. Hiscodks, Richard. *Democracy in German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11. Ludwig Erhard. *Prosperity through Competition.* New York: Praeger, 1959.

12. 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960. Paris: The Organization, 1960.

13. Stolper, Wolfgang F. *Germany: between East and West.* [S. L.]: 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1960.

14.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60—1961*,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60.

15. Alastair Buchan. *NATO in the 1960's: The Implic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London: Wienenfeld & Nicolson, 1960.

16.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61—1962*,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61.

17. Muller, Steven. *From Occupation to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Germany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New York: Norton, 1962.

18. Osgood, Robert Endicott. *NATO: the entangling alli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9. Lowenstein, Prince Hubertus Zu. *NATO and the Defense of the West.*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2.

20. Heinrich von Brentano. *Germany and Europe: Reflections on Germany Foreign Policy.* London: Andre Deutsch Limited, 1964.

21. Von Brentano, Heinrich. *Germany and Europe.* London: Andre Deutsch, 1964.

22. Wills, F. Roy. *France, Germany and the New Europe, 1945—1963.*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3.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65—196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65.

24.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66—1967*,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66.

25.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67—1968*,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67.

26. F . Roy Willis. *France , Germany and the New Europe 1945—196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7. Franz Josef Strauss. *Challenge and Response*: *A Program for Europe.* New York: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td, 1968.

28.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69—1970*,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69.

29. Dulles, Eleanor Lansing. *One Germany or two*: *The Struggle at the Heart of Europe*,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0.

30. Guy De Carmoy.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France 1944—1968*,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31.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0—1971*,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0.

32. McGeehan, Robert. *The German Rearmament Question*: *American Diplomacy and European Defense After World War* Ⅱ. Urbana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33. Wilfrid L. Kohl, *French Nuclear Diplomacy*. Princer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34.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1—1972*.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1.

35.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2—1973*.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36. Stewart - Smith, Geoffrey. *Brandt & the Destruction of NATO*. Richmond, Surrey : Foreign Affairs Pub. Co. , 1973.

37.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3—1974*,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3.

38. Cromwell, Willam C. *The Eurogroup and NATO*. Philadelphia: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1974.

39.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 Conventional Strategy for the Central Front in NATO*. London: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1975.

40. Sloss, Leon. *NATO reform: Prospects and Priorit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5.

41. Kelleher, Catherine Mcardle. *Germany &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42.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5—197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5.

43. Maiziere, Ulrich de. *Armed Forces in the NATO Alliance*. Washingt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76.

44.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se), Weissbuch 1975/1976. Bonn, 1976.

45.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6—1977*,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6.

46.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NATO: Facts and Figures*. Brussels: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1976.

47. Graham, Daniel Orrin. *A New Strategy for the West: NATO after Détente*. Washington: Heritage Foundation, 1977.

48. Vogt, John W. *Improving NATO Force Capabilities.* Washington: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

49.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8—1979*,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8.

50.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9—1980*,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9.

51. Smith, Gordon R. *Democracy in West Germany: Parties and Politic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Heinemann, 1979.

52. Jordan, Robert S.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NATO: A study in Multinational Diploma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9.

53. Saulle, Maria Rita. *NATO and its Activities: a political and juridical approach.* Dobbs Ferry ; New York : Oceana, 1979.

54. Kennedy, Gavin. *Burden Sharing in NATO.* New York: Holmes& Meier Publishers, 1979.

55. A · W · Deporte. *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the Enduring Bal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td, 1979.

56. Hanrieder, Wolfram F.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West Germany, France and Britain.*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 Hall, 1980.

57. U. 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NATO and Western Security in the 1980's.* Wash. , DC: US GPO, 1980.

58. Menaul, Stewart. *NATO in the eighties: A War – winning Strategy.* London: [s. n.], 1980.

59. Kohl Wilfrid L. *West Germany, a European and Global Power.*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0.

60. Mann, Anthony. *Comeback: Germany, 1945 – 1952.* London: Macmillan, 1980.

61. Major – General Edward Furdson. *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London and: The MacMillan Ressltd , 1980.

62.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

ance: *1980—1981*,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80.

63. Kaplan, Lawrence S. *NATO after Thirty Years.*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81.

64. Dereck W. Urw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a short political histor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1.

65. Ireland, Timothy P. *Creating the Entangling Alliance*: *The Origin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Connecticut, 1981.

66. Feld, Werner J. *NATO and the Atlantic Defense*: *Perceptions and Illusions.* New York: Praeger, 1982.

67. Roudolf Rsteinke and Michel Vale: *Germany Debates Defense*: *the NATO Alliance at the Crossroads.* New York: M. E. Sharpe, 1983.

68. Sigal, Leon V. *Alliance Security*: *NATO and the no - first - use Questio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3.

69. Cabriel, Richard A.. *NATO and the Warsaw Pact*: *A Combat Assessmen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3.

70.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se). Weissbuch 1983. Bonn, 1983.

71. Lunn, Simon: *Burden Sharing in NATO.* London, Boston: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by] Routledge & k. Paul, 1983.

72. Hartley, Keith. *NATO Arms Co - operation.* London, Boston: Allen & Unwin, 1983.

73. Golden, James Reed. *The Dynamics of Change in NATO*: *A Burden - sharing Perspective.* New York: Praeger, 1983.

74. Alford, Jonathan. *Arms Control and European Secur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75.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NATO and the Warsaw Pact*: *Force Comparisons.* Brussels: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1984.

76. Jonas, Manfr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A Diplomatic His-*

tory.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77. David Dilks. *The British View of Security: Europe and a Wider World*, 1945—1948. Oslo, 1985.

78. Olav Riste. *Western Security, The Formative Years: European and Atlantic Defense*, 1947—1953. Oslo, 1985.

79. Weizsacker, Richard von. *A Voice from German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5.

80. Botting, Douglas. *From the Ruins of the Reich: Germany in 1945—1949*. New York: Crown, 1985.

81.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U. S. Dept. of State, Office of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1985.

82. Brady, Linda P. *NATO in the 1980s: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New York: Praeger, 1985.

83. David Gress. *Peace and Survival: Germany, the Peace Movement, and European Secu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5.

84. Liesner, Thelma. *Economic Statistics 1900—1983: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London: The Economist, 1985.

85.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85—1986*,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85.

86. Krauss, Melvyn B. *How NATO Weakens the Wes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87. Richey, George. *Britain's Strategic Role in NATO*.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1986.

88. Hanning, Hugh. *NATO, Our Guarantee of Peace*. London, Washington: Brassey's Defence Publishers, 1986.

89. Moreton, N. Edvina. *Germany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90. Pfetsch, Frank R. *West Germany, Internal Structures and External*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New York: Praeger, 1988.

91. Amme, Carl H. *NATO Strategy and Nuclear Defens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8.

92. Mc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1988.

93. Thomas G. Paterson. *Meeting the Communist Threat: Truman to Reg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4. Golden, James Reed. *NATO at Forty: change, continuity, & prospect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95. Merkl, Peter H.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t For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9.

96. Mattox, Gale A. *Germany through American Eyes: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Issu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89.

97. Sloan, Stanley R. *NATO in the 1990s.* Washington: Pergamon - Brassey's, 1989 .

98.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89—1990*,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89.

99. Bruce George. *Jane's NATO Handbook: 1989—1990.* Coulsdon, Surrey: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LTD. , 1989.

100.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0—1991*,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0—1991.

101. Bruce George. *Jane's NATO Handbook: 1990—1991.* Coulsdon, Surrey: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LTD. , 1990.

102. Bruce George. *Jane's NATO Handbook: 1991—1992.* Coulsdon, Surrey: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LTD. , 1991.

103. Menges, Constantine Christopher. *The Future of Germany and the Atlantic Alliance.* Washington, D. C. : AEI Press, 1991.

104. Richard J. Aldrich, London. *British Intelligence Strategy and the*

Cold War, 1945 – 1951. London: Routledge, 1992.

105. Balfour, Michael Leonard Graham. *Germany: The Tides of Power.* London: Rouledge, 1992.

106. Turner, Henry Ashby, Jr. *Germany from Partition to Reunific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92.

107. Gutjahr, Lothar. *Germ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after Unification.*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4.

108. Lyman, Stanford M. *NATO and Germany: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supranational relations.*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109. Heuser, Beatrice. *NATO, Britain, France and the FRG: Nuclear Strategies and Forces for Europe, 1949—2000.*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1997.

110. Brenner, Michael J. *NATO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Hounds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1998.

111. Patton, David Francis. *Cold War Politics in Postwar German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112.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89—1990*,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9.

113. Berger, Roland. *Germany Global Visions.* Dusseldorf: MVV Medien, 2000.

114. Smith, Martin A. *NATO in the first Decade after the Cold War.* Dordrecht;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115.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89—1990*,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0.

116. Charles Williams. *Adenauer: The Father of the New German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0.

117. Thomaneck, Jurgen. *Dividing and Uniting Germany.* London: Routledge, 2001.

118. Webber, Douglas. *New Europe, New Germany, Old Foreign Poli-*

cy: *Germany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 London, Portland, OR: F. Cass, 2001.

119. Carpenter, Ted Galen. *NATO enters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1.

120. Willams, Geoffrey Lee. *NATO and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121. Rauchhaus, Robert W.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London, Portland, Or. : Frank Cass, 2001.

122. Schmidt, Gustav. *A History of NATO – the first fifty years*. Basingstok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123.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4—1975*,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4.

中文参考文献:

1.《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2.(英)安东尼·艾登著,书报简讯社译:《艾登回忆录》(上、下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

3.(英)安东尼·艾登,书报简讯社译:《艾登回忆录》(下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

4.(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著,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等译:《阿登纳回忆录(1959—196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5.(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著,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等译:《阿登纳回忆录(1955—195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6.(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

7.(美)亨利·布兰登著,齐沛合译:《美国力量的收缩》,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版。

8.(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著,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等译:《阿登纳回忆录(1953—195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9.(西德)威廉·格雷韦著,梅姚荣译:《西德外交风云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10.(西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著,托马斯·爱德华英译:《均势战略——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1. 本书编译组编译:《威尔逊及其外交扩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2.(联邦德国)克·哈普雷希特著,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维利·勃兰特——画像与自画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3.(联邦德国)安纳丽丝·波萍迦著,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等译:《回忆阿登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4.(美)亨利·欧文主编,齐沛合译:《七十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版。

15.(美)托马斯·沃尔夫著,冷向洋译:《苏联霸权与欧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6.(联邦德国)弗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挑战与应战:一个欧洲纲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7.(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著,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等译:《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8.(西德)约翰内斯·斯泰因霍夫著,张连根等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19.(英)温斯顿·丘吉尔著,本馆翻译组译:《欧洲联合起来》,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20.(美)迪安·艾奇逊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　伍协力合译:《艾奇逊回忆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21.(比)罗贝尔·克洛兹著,施谋仁等译:《欧洲有没有防务?——可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四十八小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2.(西德)维利·勃兰特著,张连根译:《会见与思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3.(苏)A.C.阿尼金编,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外交史》,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

24.(英)哈罗德·麦克米伦著,张里京等译:《麦克米伦回忆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5. 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主编:《德国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

26.(英)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著,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略论》,北京: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

27.(美)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著,伍文雄等译:《剑与犁——泰勒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8.(法)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斯洛著,全康康等译:《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29.(美)埃德温·哈特里奇著,国甫、培根译:《第四帝国》,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30.(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著,李仓人等译:《外交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汪绍麟等译,1992年版)

31.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著:《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与华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2.(英)科拉尔·贝尔著,云汀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33.(英)D·C·瓦特编著,上海市政协编译工作委员会译:《国际事务概览》(1962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34. 孙炳辉、李巨廉著:《世界近现代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5.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6.(民主德国)Л.迈耶尔主编,秋风等译:《今日西欧》,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37.(法)乔治·蓬皮杜著,龚元兴等译:《恢复事实真相——蓬皮杜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

38.(美)吉米·卡特著,卢君甫等译:《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年版。

39.(英)阿伦·斯克德、克里斯·库克著,王子珍、秦新民译:《战后英国政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版。

40.(英)德里克·W·厄尔温著,章定昭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年版。

41.(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雷切尔·F·沃尔著,陆英普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 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版。

42.(英)D·C·瓦特编著,上海市政协编译工作委员会译:《国际事务概览》(1963 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版。

43.(联邦德国)库特·宗特海默尔著,孙克武译:《联邦德国政府与政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44.(法)阿尔弗罗德·格罗塞著,刘其中等译:《战后欧美关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版。

45.(美)A·W·德波特著,唐雪葆等译:《欧洲与超级大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

46.(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曾稣黎译:《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 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版。

47. 刘志攻等编著:《战后国际关系史手册》,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48.(美)塞勒斯·万斯著,郭靖安等译:《困难的抉择——美国对外政策的危急年代》,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年版。

49.(德)施密特,H. 著,江曼译:《西方的战略》,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年版。

50.(英)亨利·佩林著,沈永兴等译:《丘吉尔传》,上海:东方出版社,1988 年版。

51.(奥)霍斯特·梅德尔著,总参轻武器论证研究所译:《北约十六国军力手册》,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8 年版。

52. 王斯德著:《世界现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

53.(苏)B·H·舍纳耶夫等主编,裘元伦译:《联邦德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

54.(英)D·C·瓦特编著,于树生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61 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年版。

55.(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韩正等译:《苏联对外政策》(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56.(英)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季国兴、刘士箴译:《国际事务概览》(1953 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年版。

57.(美)W. F. 汉里德,G. P. 奥顿著,徐宗士等译:《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年版。

58. 陈佩尧著:《北约:战略与态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59.(美)斯蒂芬·安布罗斯著,徐向栓等译:《艾森豪威尔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60.(英)彼得·卡尔沃科雷西著,吴世明译:《国际事务概览》(1952 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年版。

61. 王斯德、钱洪著:《世界当代史:1945—1988》,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

62.(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著,梅兆荣等译:《伟人与德国——施密特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版。

63.(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著,隋亚琴译:《伟人与大国》,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64. 潘其昌著:《走出夹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

65.(英)劳伦斯·弗里德曼著,黄钟青译:《核战略的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

66.(法)吉斯卡尔·德斯坦著,侯忠信等译:《德斯坦回忆录——政权与人生》,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版。

67.(美)麦乔治·邦迪著,褚广友等译:《美国核战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版。

68.(美)卡斯帕·温伯格著,封长虹译:《温伯格回忆录》,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版。

69. 李义虎著:《破灭的神话:世界的裂变与弥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70. 周琪、王国明主编:《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71. 陈宣圣、汉民著:《德意志的明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72.(美)J·斯帕尼尔著,段若石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

73. 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一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年版。

74.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

75. 彭滂沱著:《德国问题与欧洲秩序》,台北:三民书局,民 1992 年版。

76. 阎铸著:《军事战略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

77.(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过渡时期的德国》,1994 年版。

78. 吴学永著:《论德国安全政策》,北京:北京大学,1994 年博士学位论文。

79. 侯力强著:《大西洋联盟与德国重新武装》,上海:复旦大学,1995 年博士学位论文。

80.(法)布赖恩·克罗泽著,西安外语学院等译:《戴高乐传》(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

81. 郑寅达著:《会议桌上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国安排战后世界纪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82. 金重远著:《战后世界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83. 孙炳辉、郑寅达编著:《德国史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84. 麦克尼尔,W. H. 著,倪大昕、杨润殷译:《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年版。

85. 张炳杰编著:《德国——历史与现状》,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86. 李东燕著:《走向冷战——杜鲁门》,上海:学苑出版社,1996 年版。

87. 赵润、王正富编著:《废墟上崛起的联邦德国——从战败国到经济巨人》,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88. 李工真著:《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89.(英)玛格丽特·撒切尔著,本书翻译组译:《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 年版。

90. 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 年版。

91. 朱忠武著:《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92.(德)埃里希·卡勒尔著,黄正柏等译:《德意志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93. 章前明:《竞赛与裁军:二十世纪的国际军事与战争》,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9 年版。

94. 叶江著:《解读美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美欧关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版。

95. 王昉等编著:《北约新战略》,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年版。

96. 李涛著:《世界军事组织》,济南:黄河出版社,1999 年版。

97.(德)莱德蒙·谢德曼主编,张丛原等译:《德国政治概括》,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

98. 李巨廉著:《战争与和平:时代主旋律的变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

99.(德)维尔纳·马泽尔著,樊迪生、虞龙发译:《科尔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版。

100.(德)凯·迪珂曼著,葛放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101. 祁长松等编著:《走向疯狂——北约 50 年之路》,北京:专利文

献出版社,1999 年版。

102. 庄锡昌、顾云深著:《世界文化史》(现当代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103. 资中筠等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卷),北京:三联书店,2009 年版。

104. 王美权主编:《为了谁的安全——北约军事战略大透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年版。

105. (德)何孟笔主编,庞健、冯兴元译:《德国秩序理论与实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106. 梁方编著:《话说北约》,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

107. 吴友法、黄正柏主编:《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108. 吴友法等著:《当代德国——命运多舛的世界新秀》,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109. 冯梁、余建民著:《德国——一个正在松绑的巨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110. 顾俊礼、刘立群主编:《迈入 21 世纪的德国与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

111. 金重远主编:《20 世纪的世界:百年历史回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112. 郭少棠著:《权利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113. 张秦洞等编著:《不再踏碎欧罗巴的梦——德国军队今昔》,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114. 王斯德、余伟民、郑寅达主编:《世界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115. 吴万宝著:《西欧联盟:一个军事组织的变迁》,台北:2001 年版。

116. 孙秀民著:《统一后的德国对欧洲及世界的影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117. 侯小河等著:《联盟战车——北约军事战略发展与现状》,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2002 年版。

118. 韩旭东主编:《北约军情内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年版。

119.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120. 沈志华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

121. 刘东国著:《绿党政治》,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版。

122. 丁建弘著:《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版。

123. 连玉如著:《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124.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2004 年版。

125. 金重远著:《20 世纪的法兰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126. 金重远、冯炜、李海东等著:《世界现当代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127.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战后国际关系史料》。

128. (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年版。

后 记

1999年，我以一名湖南乡村中学教师的身份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攻读世界史硕士学位，师从程舒宁副教授，主要研究非洲问题，同时对有关北约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尝试对北约的发展问题进行探讨。

2002年，在程老师和许洁明教授的再三鼓励以及唐敏教授的亲切关心下，承蒙许洁明教授、徐康明教授推荐，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世界史博士学位，师从郑寅达教授。郑老师是研究德国问题的知名学者，他希望我能在德国问题研究上有所造诣。在郑老师的点拨下，我将德国与北约结合起来研究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中，我虽然时常为生活上的青黄不接所困扰，但为了心中的那份坚持和老师的殷切期待，不敢在学业上有半点松懈，直至顺利完稿。

郑老师与我的关系亦师亦友。在论文的选题、构思、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先生都倾注了心血。因为先生的悉心指导，我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同时，在与先

生交往的三年里，先生那谆谆教诲激励着我、严谨的治学态度感染了我、渊博的学识震撼了我、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折服了我、献身学术的敬业精神鞭策着我、和蔼谦逊的为人风格影响着我，这些都将使我终生受益。

在论文即将出版之际，先生欣然为拙著作序，序言所及表现出仍然对学生关爱有加。在此，向先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斯德教授、李巨廉教授、潘人杰教授、余伟民教授、陈兼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叶书宗教授。感谢他们的教诲和对我论文写作提出大量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感谢复旦大学的金重远教授和庄锡昌教授，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许多治学之道。感谢师母费佩君女士，感谢她对我生活的关怀和给我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感谢云南大学的程舒宁副教授、唐敏教授、许洁明教授、徐康明教授、刘鸿武教授、何平教授，感谢他们在引领我进入学术殿堂中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感谢同窗好友对我的所有帮助，感谢好友、复旦大学杨煜达博士，感谢所有对我学习、工作和生活关心、支持而不能在此一一提及的朋友们。

感谢南昌航空大学学术出版基金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团队创新基金对本书出版的资助。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亲人。他们陪我走过了风风雨雨，伴我经历了曲曲折折，他们的理解、激励和支持是我战胜困难、潜心研究的重要动力和保证。

刘芝平

2011 年 5 月 9 日